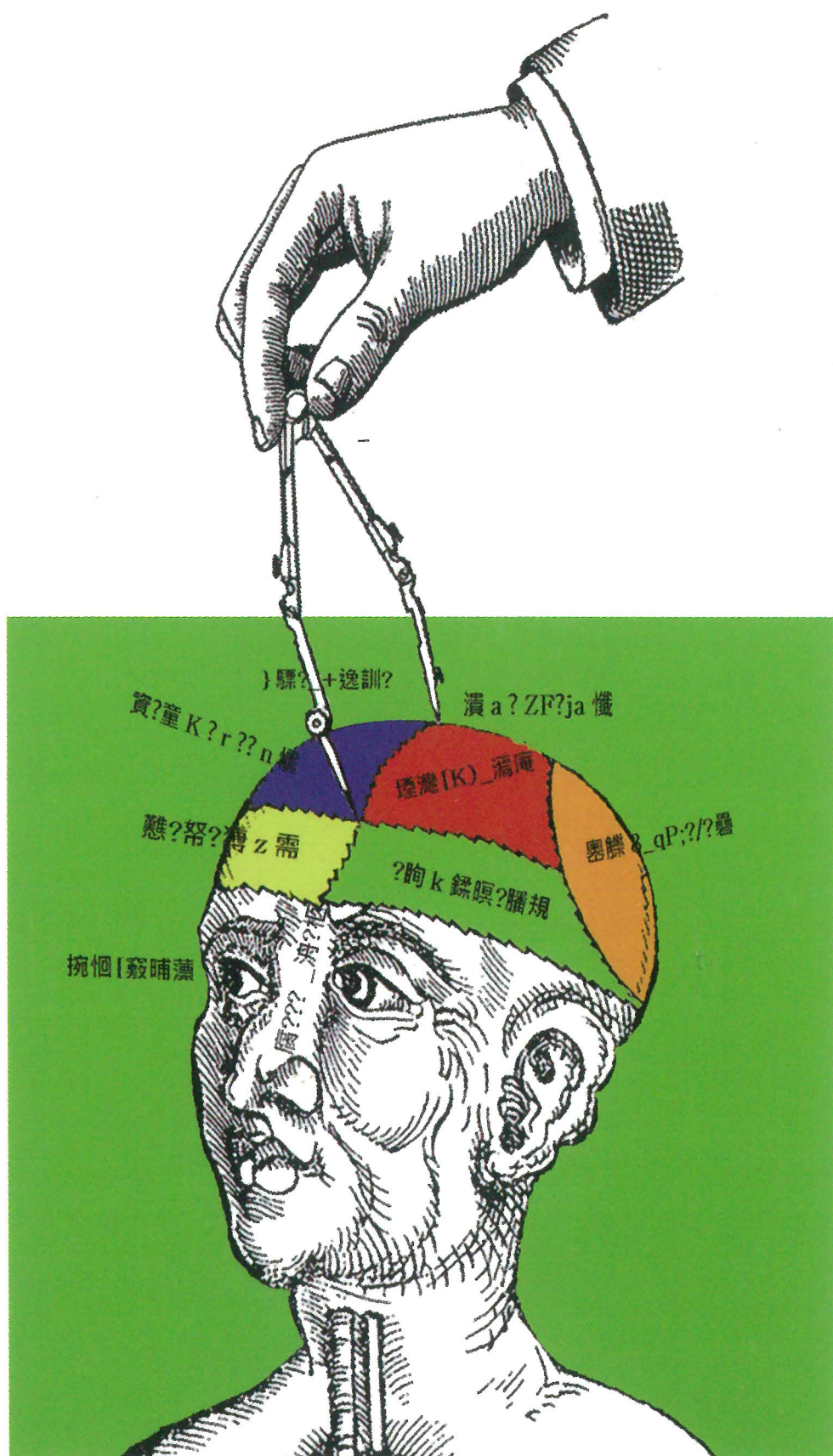


台灣意識形態批判

曾健民◎著



- 初論「台灣意識型態」
 - 「台灣意識」辨析
- 台灣「日本情結」的歷史諸相
 - 綜論台灣的「壁壘意識」
- 戰後台灣精神史的異變
 - 「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
- 從《奪還我們的語言》到《台灣將會怎樣？》
 - 打破魔咒化的「二二八論述」
- 打破刻板印象·重回台灣語言問題的原點
 - 皇民文學總批判
- 略論「皇民史觀」
 - 台灣殖民歷史的「瘡疤」
- 告別一個皇民化的作家及其時代
 - 別把「奴隸根性」當作「台灣精神」
- 「老」台獨和日本「新」右翼的大合唱
 - 著紅衫的「公民社會」列車的向路
- 揭開帝國主義幽靈的假面左的「幻視」
 - 《內戰冷戰意識形態的新魔咒—評龍應台的1949》

ISBN 978-986-6480-70-6



9 789866 480706



作者簡介

曾健民

高雄醫學大學畢業，日本九州齒科大學研究，日本行醫10年後返台，現為執業醫師。曾任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會長，專研台灣近現代社會史，尤著力於光復前後台灣史。曾編著：

《新二二八史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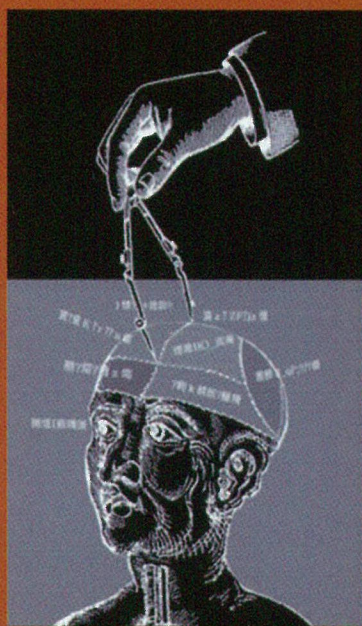
《文學二二八》

《光復新聲》

《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

《台灣1946·動盪的曙光》

《1949·國共內戰與台灣》



封面設計：梅丁衍（台灣藝術大學美術系教授）

曾健民 著

「台灣意識型態」批判

海峽學術出版社

目錄

序文	／	007
初論「台灣意識型態」	／	011
「台灣意識」辨析	／	020
台灣「日本情結」的歷史諸相		
——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視角	／	043
綜論台灣的「壁壘意識」	／	059
戰後台灣精神史的異變		
——從民族認同和去殖民問題的視角	／	081
「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		
——對陳芳明戰後文學史觀的批判	／	099

從《奪還我們的語言》到《台灣將會怎樣？》

——台灣光復初期之去殖民意識和祖國意識 / 128

附錄一：《奪還我們的語言》／楊雲萍 / 134

附錄二：《提議編纂「台灣史」》／《民報》社論 / 138

附錄三：《給青年諸君》／王白淵 / 140

附錄四：《停止內戰》／彭志遠（龍瑛宗） / 142

附錄五：《台灣將會怎樣？》／龍瑛宗 / 143

打破魔咒化的「二二八論述」 / 146

打破刻板印象·重回台灣語言問題的原點 / 155

台灣光復歷史「辯証」

——可悲的分離主義文學論 / 163

台灣「皇民文學」總清算

——從台灣文學的尊嚴出發 / 235

略論「皇民史觀」 / 258

台灣殖民歷史的「瘡疤」

——評葉石濤最近在日本的發言 / 266

告別一個皇民化的作家及其時代

——蓋棺論定葉石濤 / 282

別把「奴隸根性」當作「台灣精神」

——評李登輝的《台灣精神和日本精神》 / 292

「老」台獨和日本「新」右翼的大合唱

——對小林《台灣論》的批判與自省 / 300

著紅衫的「公民社會」列車的向路

——「反貪倒扁」運動的初步街角觀察 / 312

揭開帝國主義幽靈的假面 / 330

左的「幻視」

——就教於《連結》諸君 / 341

內戰冷戰意識型態的新魔咒

——評龍應台的一九四九 / 349

序文

本書收入的這些文章，大多是這二十年來在不同時期，對日漸抬頭的「台灣意識」的批判。現在看來，我所批判的這些所謂台灣意識本土論，已不像它們原來各別出現時的論調，而是已經成了一套發揮政治社會功能的觀念系統。因此，沿用「台灣意識」稱之已無法掌握其本質，本書書名用《台灣意識型態》，就是不再以「意識」視之，而試圖從意識型態的觀點去概括它。

從八十年代以來，近三十年間，是「本土主義」（俗稱台灣意識）從萌芽茁壯到成為統治性意識型態的年代。這期間，台灣社會的舊勢力和新興社會力量之間充滿了利益、權力的矛盾和衝突；在精神世界，腐朽和新生、落後和進步交戰，同時，虛假、偽飾、顛倒的話語在權力的爭鬥中交錯。「本土主義」就是在這樣的時代張力中誕生。

從鄉土主義轉化而來的本土主義，作為台灣戰後本土新興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一開始，在政治上以反獨裁、追求民主的形象，站在道德的歷史正義的高點，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相對於在政治上一定程度的變革性，它在文化上卻表現了相當的保守性。它一方面繼承了蔣國府的「反共親美日」的意識型態，另外又建構了「省籍矛盾」（一種族群矛盾）和「去中國化」（主要在台灣史論上）的新文化政治論述。本

土新興資產階級是在內戰冷戰結構的襁褓中被奶大的新階級，它帶著本土主義的新意識型態從舊勢力中破繭而出，也以本土主義掩蔽了其權力和階級利益的真相，維護了其階級統治。

從八十年代開始，關於台灣歷史的新建構，便一直是本土主義意識型態的重心；它包括：「四大族群論」、「日本殖民現代化論」、「戰後再殖民論」以及「二二八論」。透過這些史論，它建構了一個「去中國化」的歷史想像。透過這些被建構的歷史想像和社會想像，在權力和利益衝突中，它起了招喚了大眾「個人」成為「主體」起了積極作用，而這些被意識型態化的主體，發揮了本土主義意識型態的社會實踐。本書的許多篇是對這些「史論」的批判。

意識型態做為社會結構中不可分的部份，本來就是與人的真實生存狀況有很大脫節的觀念系統；由於這種特質，它在社會結構中扮演著掩蔽社會矛盾真相，起著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社會功能。意識型態雖是虛假或是顛倒的，但卻是客觀存在的觀念體系；而且，它還是物化的現實。譬如，政府的意識型態機器：如新聞局、文建會、教育部、教科書、國史館等等；還有，民間社會的意識型態機器：如校園學界、媒體、政黨、宗教、文化界等，這些都屬於台灣具體的物化的意識型態。台灣的諸權力通過掌握這些意識型態機器，把虛假以真實的面貌，把利益以公義的面貌，把顛倒以正確的面貌，建構一個想像的台灣共同體。

本書收錄的這些編章，大多是在這二十年間前前後後對「本土主義」論的批判。這些篇章不但在揭露其虛假顛倒的面貌，也在揭露其政經權力的本質；希望從根本上克服更廣義的內戰冷戰意識型態。其實，本土主義只不過是台灣內戰冷戰歷史框架中產生的意識型態的一種。本書的最後四篇，跨出了對本土主義的批判，而對內戰冷戰意識型態的另外三種觀念型態——反共主義、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等進行了比較具體的批判；特別集中在針對龍應台的一九四九論的批判，指摘其「內戰冷戰現代化論」的詭辯。龍應台的這種論述，實與本土主義的「日本殖民現代化論」有異曲同工之妙。

書中的許多篇章，在寫作之時，由於在認識上受到時代的限制，仍然從俗而以「台灣意識」的概念框架看本土主義問題。後來，也可說直到最近幾年，才逐漸認識到本土主義已不只是「意識」，而具有濃厚的意識型態性質。而且，使用「台灣意識」的通稱，涉及到話語背後的權力問題，其本身就具有權力的意識型態在起作用的成分，亦即話語權的問題；它不但掩飾了階級統治的真相，而且建構了兩岸對立的想像。

「意識」(consciousness)與「意識型態」(ideology)，在中文字面上似乎相近，但在社會科學上卻是完全不同的範疇。「意識」只是指人在社會生活中，所產生的感覺、表象等的感性形式以及概念、推理等的理性形式，屬於個人對周遭環境的自

然反映。而「意識型態」則是在社會的利益和權力鬥爭中產生的觀念系統，它作為一個社會的「文化客體」，起著教化、馴化「個人」成為「主體」，而且客觀上起著維護統治階級利益的社會職能。

六十幾年來台灣在內戰冷戰框架下產生的支配性的思想和觀念，不管是反共主義、自由主義、本土主義和普世價值，都屬於意識型態的範疇，也都起著意識型態的社會功能；沒有從這樣的角度去看、去批判，就很難掌握它的本質。

因此，本書把這些篇章總括為「台灣意識型態批判」，就是試圖提出一個更有普遍性更有變革幸的批判角度。

十分榮性，本書得到名藝術家·台藝大教授梅丁衍先生親自為本書設計封面，使得本書增添寶貴的藝術光彩。藉此向丁衍先生致最大的謝意。

更感謝曉波兄和海峽學術出版社，概允出版本書。也向辛苦為這本書打字、編排、印刷的小姐先生們致謝。

初論 「台灣意識型態」

九〇年代，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後，西方世界齊聲歡呼，宣稱已進入一個「意識型態終結」的世界；同時，「歷史終結」論也流行一時，認為今後是一個永遠沒有意識型態的自由民主的世界。但是不久，美歐的戰機導彈用「人道主義」的大義名分對科索沃狂轟濫炸；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象徵自由世界的美國紐約雙子星大廈瞬間崩塌的驚悚畫面，接著阿富汗、伊拉克戰爭，金融危機，阿拉伯之春……。每天在我們眼前上演的，不但不是一個歷史終結的世界，也不是一個意識型態終結的世界，而且是一個被霸權主義、新自由主義、西方的普世價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所左右的世界。因此，我們仍生活在一個像病毒一樣蔓延的意識型態世界中。

一、「意識型態」是什麼？

在台灣，不管是官員或專家學者、平民百姓，大多認為意識型態只是一種僵化、教條的思想觀念，只有共產主義、民族主義或極權主義才是意識型態；而自己是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的、沒有意識型態的世界。

其實，這種想法本身正是一種意識型態。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固然是意識型態，自由主義反共主義也是一種意識型態。

人，在本質上是意識型態的動物。任何人類社會，儘管表現形式千變萬化，但一定都有經濟活動，政治組織，以及不可缺少的意識型態（如法律、倫理、思想觀念）；意識型態是社會總體的一個有機部份，它作為社會生活的結構是普遍的無所不在的；沒有意識型態的種種表象體系，人類社會就不可能存在下去。法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杜塞認為：意識型態是具有獨特邏輯和規律的「表象」體系（形象、觀念、概念），它屬於社會上層建築的一部份，並且是在社會鬥爭中確立其形式。英國的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家文化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認為：意識型態是利益和權力鬥爭的產物，其本身充滿了衝突和矛盾的張力，但是，產生的意識型態表現為文化、典章、文學藝術等；它是使統治權力合法化的一套話語體系，是階級社會本身不可或缺的結構。

既然意識型態是社會結構的一部份，它的社會職能（功能）是什麼呢？伊格爾頓認為：意識型態是由物質和權力關係所生的觀念體系，它一方面反映這種關係，另一方面又強化這種關係並維護這種關係。簡單地說，意識型態是以虛假的形式代表社會統治階級的利益，以維持、鞏固現狀或維護統治結構。阿杜塞則認為：意識型態是一種文化客體，它通過建構「個體」成為「主體」，使這個意識型態化的主體，起著維持、維護統治者利益的社會功能。

一一、台灣意識型態

馬克思或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批判的意識型態，是西方資本主義歷史中，反映了階級矛盾和鬥爭的諸觀念體系。它包括：資本主義、啟蒙主義、理性主意、實證主義、自由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然而，包括中國在內的第三世界，由於是在西方帝國主義條件下的歷史發展，當然會有不同於西方的意識型態內容。我們一定要慎重區別兩者的異同。

西方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作為上層建築，其社會功能在維持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和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在台灣，意識型態的內容和社會功能則大為不同，譬如，從五〇年代起台灣最重要的意識型態——反共主義，並非完全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其社會功能主要是為了維護「內戰冷戰國家」的利益，而不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台灣的反共主義與美國的反共主義同樣都是虛假的、顛倒的觀念系統，但台灣的反共主義卻是在恐怖高壓下誕生的。

台灣戰後的社會歷史變遷並不是一個自主的獨立的發展過程，而是在一個有絕對支配力量的中國內戰和美國冷戰的雙重歷史作用下的發展。六十多年來，不管是反共戒嚴體制或是政治獨裁下的資本主義初始發展，甚至今日的半邊陲資本主義，基本都是這雙重結構中的歷史產物。作為維持或鞏固這個雙重結構的觀念體系，或者是作為在這個結構框架下的權力、利益鬥爭而產生的觀念體系，我們稱之為「台灣意識型

態」。

現在台灣流行的意識型態有五花八門，譬如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等，但它們並不是從台灣社會歷史的矛盾衝突中的產物，也並不全然起維護體制的作用，因此都不能算是佔統治地位的思想觀念或意識型態。我們認為，只有六十年來在台灣社會中起著維持和鞏固內戰冷戰結構或者台灣資產階級利益的意識型態，也就是佔有支配地位的意識型態（俗稱「主流意識」），才算「台灣意識型態」。

它們包括有：反共主義、自由主義、本土主義和普世價值等四大範疇。

去年，在抗議大陸海協會陳雲林來台的示威活動中，就出現了「打倒共匪、釋放劉曉波」的標語。雖然只有九個字，背後卻突顯了六十多年來在台灣佔支配地位的這四類「台灣意識型態」的強大作用。

曾經在反共戒嚴時期全民高喊過的「打倒共匪」的口號，竟然再現於今天自詡民主自由的台灣街頭上反中國示威的行列中。可見得反共主義一直支配著台灣人的心靈，構成了台灣人主體性的一部份。也可以說，反共主義是台灣意識型態的核心，其他的意識型態都以它為基礎。另外，示威隊伍中也出現了「釋放劉曉波」的牌子，劉曉波是以西方的自由主義、普世價值反中國共產黨的代表人物；因此，在台灣高喊「釋放劉曉波」的後面，就突顯了今日以自由主義、本土主義、普世價值諸「台灣意

識型態」反中國的作用。當然，台灣朝野熱烈歡迎達賴、熱比婭訪台，或以政治公帑支持王丹、吾爾開希等民運人士，也都是同樣的意識型態的作用。這些「台灣意識型態」都扮演了積極的社會功能，也都起著維護鞏固雙戰的基本結構（兩岸分裂和對立），以及本地資產階級利益的作用。

1、反共主義

反共主義之所以成為台灣最強大最深入的意識型態，有其社會歷史根源。日據期，從一九三一年的台共和左翼團體遭大檢舉後，日本的反共法西斯就全面支配了台灣，反共反中國的日本主義意識型態深深植入了台灣人的心靈。一九五〇年（嚴格說，南京國民黨政府從一九四七年九月開始實施的戡亂總動員體制就已開始），逃台蔣國府的內戰反共體制得到美國的冷戰反共主義的支持後，以軍事戒嚴和國家恐怖主義徹底肅清了「異類」，造成每個人精神的休克狀態（強制的「自清」，造成個人主體的空白），同時，高度的反共主義把空白的「個人」建構為反共的「主體」，形成了一「打倒共匪」的全民歇斯底里現象。由此可知，建構意識型態主體的正是權力，而意識型態又使這個主體的內在存在臣服於權力，而與權力同一，捍衛權力。伊格頓曾描述了西方資本意識型態對個人內心全面統治的狀態：

「製造了主體的正是權力。法則必須寫在我們的身體上和心靈裡。它不僅要求我們被動去寬容，而且要求我們熱誠地去擁抱。它的終極目標，不僅是誘導我們接受

壓迫，而且要我們高高興興地同謀此事。」（《歷史中的政治》，馬海良譯）

這種西方的資本意識型態對個人的極權統治狀態，實際上，與蔣國府以及美國、日本的反共主義共同對台灣社會每個人的意識型態的極權統治極其相似；只不過，台灣的情況是以國家恐怖主義為強制手段，建構反共主義的意識型態。

2、自由主義

美國的冷戰意識型態有兩個面向，一是反共主義，另一是美式的自由主義（或現代化理論）。美國的東亞冷戰對台灣的介入，除了強大的軍事（以《中美協防條約》為中心）之外還有大量的美援。另一方面，跟著美國的軍艦大砲和美金進來的，還有美式的反共主義、自由主義和現代化理論。這些意識型態，通過影響台灣的文化文學、校園和財經官僚，積極培養各階層的政治知識菁英，促使台灣資本主義的萌芽茁壯，使美式的自由主義（或現代化理論）成為台灣社會影響力最大的意識型態。我們從馬英九、蔡英文或龍應台的身上看到其巨大的影響。這個自由主義和反共主義又共同構成了台灣本土主義的基本內容。

3、本土主義

在內戰冷戰框架下，蔣國府一面維持政治上的獨裁，以反共主義統治一切思想，同時，在經濟上走依賴型資本主義發展，奶大了台灣本地的新興資產階級。七〇年代

以後，經歷了退出聯合國、台美斷交、廢約等多重衝擊，蔣國府不管內外都失去了統治的正當性（合法性）。在美國的《台灣關係法》架構下，代表本地新興資產階級利益的政權取代了凋謝的蔣內戰政權。在後冷戰框架下，本地新興資產階級和在野政黨攜手逐步建構了「本土主義」的意識型態。它包括「台灣意識」、「四大族群論」、「殖民統治現代化論」、「戰後再殖民論」以及「二二八論」，政治上主張「台灣獨立」。本土主義意識型態不但起著維持兩岸分裂對立的政治功能，更扮演著掩蔽階級統治的真相，轉化資產階級利益為全民利益的假象。

另一方面，在雙戰結構下被奶大的本土新興資產階級，先天上有妥協、軟弱的性格。雖然掌握了國家機器，意識型態上仍然繼承了蔣國府反共、親美日、反中國的性格。

4、普世價值

三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使台灣資本主義社會進一步依賴美國霸權主導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國際資本成為台灣不容小覷的力量；譬如，台灣股票市場就有一半以上的國際資本在運作。資本邏輯取代了過去的威權秩序成為台灣社會的主要支配力量，改變了社會關係，也改變了人的思想觀念，所謂「公民社會」日漸壯大。作為西方資本的意識型態，也作為國際資本擴張的思想十字軍的「普世價值」，逐漸

成了台灣意識型態的新內容。

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不久前在所謂「茉莉花革命」喧囂一時之際，曾為文向馬英九下指導棋，要馬與「中國」打交道時要勇於提出「普世價值」。蔡英文也表示，應該把「民主人權」列入兩岸交流議題清單。這兩者，與前述街頭示威中「釋放劉曉波」的標語口號一樣，都屬於西方後冷戰框架下的意識型態——「普世價值」。

三、代結語

最後，引一段後現代主義理論家詹明信在《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中的一段話，作為結語：

我們既可以用分析和理論的方法，通過各種意識型態作品或意識型態的歷史形式的研究，理解其運動規律和功能，來達到理解和非神秘化意識型態的作用過程。我們也可以通過實踐來取消意識型態。通過行動。通過改變客觀形勢和環境的努力來取消意識形態；因為正是這些客觀的形式和環境，首先使得那些意識型態得以產生，並且成為必要……意識型態批判對於馬克思主義來說，必須含有一種爭取解放的努力，不僅僅要從意識型態中解放出來，而且也要從異化中解放出來。

二〇一一年九月八日完稿

初論「台灣意識型態」

「台灣意識」辨析

前言

「台灣意識」這個用語，最早出現於六〇年代，當時是作為在日本的台獨運動的一個重要思想武器被提出的。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內，它僅侷限在海外的台獨社團中，對於台灣社會並未產生明顯的作用；直到七〇年代末，才以一種文學的觀點首次登上台灣的文化舞台。至於，它被黨外運動的獨派積極運用並廣泛地鼓吹起來，則是八〇年代以後的事了。到了九〇年代，在某種意義上，它幾乎成了朝野兩大黨的共同口號，成了主流意識的代名詞。

「台灣意識」是什麼？它有一個明確的意涵嗎？

八〇年代以來，隨著台灣的政治經濟劇變以及台獨運動的蓬勃發展，「台灣意識」不斷被反覆言說宣揚，已成為台灣近二十年來成長快速且影響深遠的主流社會意識；但是總的來看，它的意涵卻一直未有一個全面的明確的闡述。

1 參看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一九六二年，東京音羽書房。許世楷：《台灣人意識的形成》，一九六四年，「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機關刊物《台灣青年》三十九期。

這個一般人通稱的台灣意識是什麼？如果歸納台獨人士的說法，簡單地說有下列的意涵：首先，它既非相對於世界也非相對於美國或日本，而是專指相對於中國的意識；其次，它與「台灣人意識」或「台灣民族意識」相近，因此是與「中國人意識」或「中國民族意識」相對立的意識；還有，它不僅是現實意識，而且是生成於台灣四百年的特殊歷史過程中的歷史意識；最重要的，它還是全體台灣人必然共有的精神特徵。

雖然這是目前最常見、最常聽到的，具最常被論述的台灣意識的意涵，但是如果把它等同於在台灣的社會意識領域中存在的所有台灣意識則是有問題的。畢竟，它只是台獨團體的政治理念，是意識型態化的台灣意識。事實上，它只是現實中存在的且歷史上存在過的諸多台灣意識的類型之一，亦即，它只是特殊化的台灣意識，並非台灣意識的全部。

譬如就現實來說，台獨的「台灣意識」既然是一種政治理念，就必然存在一個產生這個政治理念、並且做為這個理念的政治運動對象的一般社會心理層面的台灣意識；這個社會心理層面的台灣意識與政治理念的台灣意識雖互為表裏，但卻有很大的區別，在實際的內容上也有很明顯的不同。我們必須把兩者區別又聯繫地來考察，才能更完整地認識台灣意識的真貌。

還有，即使同稱為「台灣意識」，在不同時期，不同的政治經濟條件下，也有不

同的內容；譬如從海外台獨運動時期的台灣意識到今日成為朝野兩黨共同口號的台灣意識，它們之間在內容上就有很大的變化。何況，台獨理念的台灣意識登上台灣的文化、政治舞台也只不過才二十年的時間，如果把視野擴大到近百年的台灣歷史來看，那就更突顯出當今主流的台獨理念的台灣意識，只不過是許多台灣意識的特殊型態。實際上，歷史上來看，台灣意識未必是與中國對立的意識；有與中國意識相通的台灣意識，也有與日本對立的台灣意識。而從社會科學的觀點來看，與中國對立的台灣意識（台獨理念的台灣意識），也並不是四百年歷史中形成的，而是五〇年代以後，在國際冷戰與中國內戰的歷史規定下特殊的政經過程中產生的一種意識型態。

基於上述思考，本文嘗試從歷史的角度和社會科學的分析對「台灣意識」進行辯析。把「台灣意識」放在更大的歷史中，闡明它在近百年的歷史中，每一歷史時期的特徵和具體內容；特別注重戰後時期，在美國冷戰與中國內戰的特殊歷史規定下，台灣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意識三者的辯證進展過程中去考察台灣意識的變化；並且區分意識型態化的台灣意識與社會心理層面的台灣意識，在兩者的互動關係中去掌握台灣意識的真貌。

一、從海外台獨運動的「台灣意識」到當今成為兩大黨共同口號的「台灣意識」

首先，讓我們簡單地回顧「台灣意識」這個用語，從出現至今，在各個時期的內

容及其變化歷程。

(一) 史明的史觀式「台灣意識」

史明是最早使用這個用語的人之一，他的論述對台獨運動有著深遠的影響。根據他的著作——《台灣人四百年歷史》各章節關於台灣意識的內容，可把他對「台灣意識」的說法要約為二：²

「台灣意識」是台灣本地人的「特殊意識」；是台灣本地人在開拓台灣的過程中形成的「共同意識」；是台灣本地人「反對外來殖民者以及中國大陸人的意識」；是與「中國意識對立的意識」；是「台灣民族」的「民族意識」。

簡單來說，史明所論述的「台灣意識」就是指一個四百年前就開始自然形成的，與「中國大陸」對立的「台灣人共同意識」；而這個台灣人的共同意識，明白地說，就是指「台灣民族意識」。這樣的「台灣意識論」其實就是「台灣民族論」的基礎，是為了台灣獨立建國的終極目標而建構的，因此，它是屬於政治性的概念。至於它在台灣四百年的歷史中是否真實存在呢？它與每一歷史時期客觀存在的台灣社會意識之間的關係如何，是不是一致的呢？或是乖離的呢？那是另一回事。但是，我們可以說，至少在他生活的那個時期（五〇年代末到七〇年代），它是實際存於海外台獨運

² 許南村編：《史明台灣史論的虛構》，頁三〇三，人間出版社。

動人士的主觀意願中的。這種「台灣意識」可說是屬於史觀式的「台灣意識」。

(二) 葉石濤的文學「台灣意識」

一九七七年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中，葉石濤發表了《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³，首次在台灣比較深刻地從文學的觀點論及「台灣意識」。它指出：「台灣意識是帝國主義下在台中國人的精神焦點」，是「居住在台灣的中國人反帝反封建的共通經驗」。在這裡出現的台灣意識，不但不與中國意識對立，而且是與中國意識相通的，它的具體內容便是「帝國主義條件下的反帝反封建意識」。不管這種台灣意識是葉石濤在特定的時空下的主觀意念也好，或是歷史的實存也好，至少它顯示了，所謂的「台灣意識」並不一定如史明所說的是與中國對立的意識。

(三) 反國府獨裁爭民主的「台灣意識」

進入了八〇年代，在新的政經條件下，與中國意識對立的「台灣意識」首次以「中國結、台灣結」的思想文化論戰形式出現在黨外雜誌上；⁴同時，新生的黨外獨派也開始運用省籍情結，把台灣人民高漲的反國府獨裁、爭民主的政治熱潮，以「台灣人意識」、「本土意識」之名上綱到與中國對立的意識；而且運用台灣人民根深蒂

3 葉石濤：《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一九七七年，《夏潮》第十四期。

4 主要的文章收集在施敏輝編的《台灣意識論戰選集》，一九八八年，前衛出版社。

固的反共恐共的感情和當家作主的願望，提出了以台獨為終極目標的「住民自決」主張。總之，在這台灣的政治轉型期，「台灣意識」主要的是作為黨外獨派或初創的民進黨對台灣社會進行政治動員的工具。為了向國府法統體制奪權和抗拒大陸和平統一的壓力，它們把光復後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省籍意識與現實的反國府獨裁爭民主的熱潮結合，把它說成是「台灣人意識」的表現，進而推展到與中國意識對立的層次去。因此，主要以「台灣人意識」或「本土意識」為名的這時期的「台灣意識」，實際上包含了複雜的成分；雖然黨外獨派宣傳反中國的政治作用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反獨裁爭民主」的意識仍是這時期的「台灣意識」的主要內容，而與中國對立的或反中國的意識只是次要的部份。

（四）準國家意識的「台灣意識」

九〇年代以後，國府的法統政權轉型為台灣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權，使「反獨裁、爭民主」的訴求失去了現實的政治動力。這樣，對民進黨來說，只有把「台灣意識」上綱成台灣與中國對立意識的總稱，甚至於等同於「台灣民族意識」；這些都表現在民進黨正式把「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台灣共和國」的理念列入黨綱這件事上。另一方面，為了維持與中國大陸的對抗局面以鞏固政權，轉型後的國府政權則以「去中國化」的「台灣意識」來統合國民意識，使「台灣意識」上升為準國家意識。譬如，李登輝在接受日本《產經新聞》的訪問時便說：「台灣意識愈強愈好！」；還有，朝野

兩大黨共同推動的國中《認識台灣》教科書的內容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⁵，書中所呈現的台灣史觀、社會觀便是去中國化的史觀和社會觀。在國定教科書中首倡「台灣意識」、「台灣精神」、「台灣魂」，這就宣示了新的準國家意識的出台；同時表現在政治經濟上的便是採取「戒急用忍」、「政治偵防」政策，並且高倡「台灣第一」、「台灣優先」、「新台灣人」……等口號。上述朝野兩大黨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領域的準國家意識，其總標幟便是與「中國意識」對立的「台灣意識」。

(五) 政治理念的「台灣意識」與社會心理的「台灣意識」

由上可知，「台灣意識」這個用語，從出現至今，在台灣的社會變化中，呈現了複雜的面貌且包含著多重的意義。在針對面上，它既可為一切與「中國意識」對抗的意識，也可為與「中國意識」互通的意識；既可為反中國的意識，也可為反帝反封建反獨裁的意識。在內容上，它既可上綱為「台灣民族獨立意識型態」，也可轉化為「愛台灣」、「認同台灣」、「愛這塊土地」、「本土精神」、「台灣意識」等民粹式的訴求。在政治運動中，它既可作為獨立建國的理論武器，也可做為推動反獨裁爭民主的運動武器，甚至成為民主的對立面，而被用來做為推動政治偵防、戒急用忍、國家安全的國家機器的工具。它既可喚起台灣人民的受害意識或悲憤意識，也可激發與中國的對抗意識或優越意識。他既被鼓吹為歷史意識，也被說成是現實意識；既可

5 國立編譯館主編：《認識台灣（社會篇）》。

為文學爭論的主題，也可被當作一個判定民族認同或國家認同的政治標準；既可在野意識，也可為當權者的意識。

從這樣多重複雜且互為矛盾的現象中，只要能夠區別政治理念層次的「台灣意識」與社會心理層次的「台灣意識」，並且掌握它們之間的互為轉化關係，就可以進一步認識到下面的事實：從海外獨派、黨外獨派到民進黨，這些政治團體高倡的「台灣意識」，隨著台灣政經現實的變化，在對民眾政治動員的口號內容上雖有很多變化（如愛台灣、愛這塊土地……等），但是它的核心仍是與中國·大陸對立的意識型態；而一般民眾的「台灣意識」（社會心理層次的），其實質是愛鄉愛土、反獨裁爭民主、反共恐共、省籍、資產階級意識……等的複合意識，這些複合意識在政黨或政權的有力宣傳動員下，往往會被投射為「台灣意識」，甚至被轉化為與中國對立的台灣意識，而成為政黨鬥爭或政權鞏固的力量。

一一、五〇年代以前的「台灣意識」

獨派的台灣意識論主要由歷史論和現實論組成，歷史論就是認為：與中國對立的「台灣意識」是自然生成於四百年來台灣的特殊血緣、地緣、風土以及反殖民反中國壓迫的歷史中。然而，這種意涵的台灣意識在台灣歷史中存在過嗎？

若不存在，那麼，從五〇年代開始才以「台灣意識」名之的、上述與中國對立的

意識是起源於何時？它產生的歷史條件是什麼？

為解決這個問題，有必要先概括地考察五〇年代以前，台灣各歷史時期的「台灣意識」的特徵與內容：

(一) 馬關割台以前——屬於中國地方意識的「台灣意識」

除了原住民族以外，馬關割台之前的台灣社會是中國華南社會的拓延；從民族、歷史、語言、習俗、宗教信仰一直到社會經濟制度，都與大陸祖鄉相同，兩岸經貿也密不可分。清朝統治期間，不論在行政制度（省、道、府、縣、廳）、軍事制度或是科舉教育制度上，都與全中國大陸的任何地方相同；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也是以地主封建制度為基礎的封建意識，而俗稱「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亂」的農民暴動，絕不是如史明所說的反唐山反中國的台灣意識的作用，而是與大陸任何地區一樣的中國農民反封建地主的階級意識的作用。如果說這漫長的三百多年有所謂的「台灣意識」存在的話，那它只不過是一個中國的地方意識，當然是與中國意識相通的。鴉片戰爭、中法戰爭開啟了西方列強入侵中國的歷史，台灣的安平、淡水等地的開港與大陸的廈門、上海等地的被迫開港一樣，同是全中國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開端的一部分，在相同的歷史條件下，台灣與大陸是所謂真正的命運共同體。

6 請參考註2書，頁二八三。

(一) 日據期——漢民族意識為基礎的「台灣意識」

百年來，造成台灣與中國大陸長期隔絕，迫使台灣走向與大陸不同的特殊社會進展（殖民地社會），其根本原因是帝國主義對台灣的侵略與支配。這種支配並不是台灣獨有的，而是近百年來帝國列強侵奪中國的歷史過程的一個特殊組成部分，雖然形式不同，全中國也同時處於帝國列強各種各樣的支配和壓迫之下。只是殖民地和半殖民的不同而已。因此，台灣人民的特殊歷史命運是全中國人民普遍的歷史命運的一組成部分；換言之，台灣的特殊歷史同時也內含著近代中國全體歷史的普遍性格。從割台到一九一五年的二十年間，台灣人民的武裝抗日鬥爭是慘烈的，它在中國現代史上，除了義和團外，是首次大規模且長期的反帝武裝鬥爭，而這種反帝武裝鬥爭是以漢民族意識為基礎的。

在帝國主義的殖民體制下產生的「台灣意識」必然有兩種類型；一種是承認、妥協或維護殖民體制的「台灣意識」，另一種則是反殖民體制反帝的「台灣意識」。在日據期，前者表現在「同化會」、「六三法撤廢運動」、「台灣議會期成運動」、以及「台灣自治期成同盟」等運動的性格上；後者，則表現在「農組」、「文協」、「台共」、「民眾黨」等團體的性格上。但不論何者，日據期的「台灣意識」都是相對於日本殖民者的（當然絕對不是相對於中國），它們之間容許或在程度上有所不

7 陳正醒：《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台灣近代研究史》第三號，一九八一年。

同，但都是以「漢民族意識」（某種意義上的中國民族意識）為實體的，恰恰與五〇年代至今的以中國為對立面的「台灣意識」相反。

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台灣進入日本的軍國殖民時期。日本軍國殖民者為遂行對中國以及東亞各國的侵略戰爭，在台灣強行推行了戰爭總動員體制，徹底動員台灣人民的精神、人力、財力和物力為日本侵略戰爭消耗。皇民化運動是其中一環，它企圖連根拔起台灣人民的漢民族意識，植入日本皇民意識，製造憎惡自己的民族蔑視中國人的意識（如「清國奴」、「支那」、「膺懲暴支」等蔑視、仇視中國的稱呼口號），這是台灣歷史上反華意識、仇視、蔑視中國意識的開端（實際上，史明所宣揚的反中國的「台灣意識」，也正式在這時候才出現的）。特別在日本法西斯瘋狂的精神灌輸下，使皇民化運動時期的一些台灣菁英們，雖然身為殖民地人，但心靈上已成了徹底的反中國蔑視自己民族的日本皇國民；這種反中國蔑視自己民族的意識幽靈，雖然在光復初期一度消失，但是二二八事件以後，在台灣的不幸又曲折的歷史過程中再度躍上了政治舞台。

（三）光復——中國意識的勝利，皇民意識的敗亡

歷史的事實說明了，史明所宣揚的生成於台灣四百年的歷史中，沛不可當的反殖民反中國的「台灣民族意識」，不但沒有鬥倒日帝驅除日本殖民勢力，進而台灣獨立建國，反而徹底的在皇民化運動中成了日本的皇國民意識，為日本天皇的侵華戰爭所

奴役。

甲午戰爭後，日本逐步擴大在中國的勢力，終至引發侵華戰爭；激起了中國現代的、戰鬥抵抗的民族意識，不但戰勝了日帝而且驅除了所有在華的帝國主義勢力，包括驅除了佔據台灣的日本殖民勢力，使台灣復歸中國。台灣的歷史命運又與全中國的歷史命運結為一體。

光復後，台灣人民殷望實現良質的中國化以及高度自治的願望，與國府集權腐敗的體制產生了極大的矛盾（這矛盾也是當時全中國人民要求民主和平願望與國府獨裁腐敗的體制之間的矛盾的特殊部分），遂爆發了二二八事件（當時，中國各地也爆發了許多國府鎮壓人民的事件）。自此埋下了深刻的省籍矛盾。在這同時，大陸的國共內戰煙硝也逐漸壟罩了台灣。

（四）二二八事件——與中國對立的台灣意識的出現

前面說過，殖民期有一部分的台灣菁英的反華蔑視中國的意識，是日本皇民化運動所灌輸的，這種意識隨著殖民體制的敗亡曾一時消散，但是，二二八事件以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它又以與中國對立的「台灣意識」的新貌出現。

日本投降後，廖文毅等人立即組成了一「台灣留學國內學友會」，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台灣光復當天出版了《前鋒》雜誌。他在發刊辭《告我同胞書》中如此寫

道。

親愛的同胞……我們是明末漢民族中最有血氣、最有革命精神、最有民族意識、最有奮鬥力、最有精銳的子孫。我們不可忘記了我們有這樣的高尚的血統，有這樣祖宗。我們不可忘記，我們是遺傳著有大陸民族血統，我們的國家是世界五大強國中的大中華民族……。

同期上，他寫的另一篇文章《光復的意義》中也說：

我們在台灣光復的這個時候，所發現的第一個事實是民族精神的振興……第二是國土重圓……第三是家人再聚……第四是統一的國家和統一的政府……。

這樣一個熱情洋溢的「中國民族意識者」，在二二八事件後，距離他發表這些文章不足二年的時間，卻在香港籌組了「台灣再解放聯盟」，該團體第二年向聯合國提出了托管台灣的要求，然後於一九五〇年在日本組成了海外第一個台獨團體「台灣民主獨立黨」，提倡台灣人在血緣上有別於「支那人」（中國人）的「台灣民族論」。

由廖文毅在光復後短期間從一個滿懷「中國民族意識」的人轉向積極的「台灣民族論」者的事例來看，戰後所謂與中國對立的「台灣意識」實際上是在二二八事件以

後才出現；並非如史明所說的四百年來就存在了的。而且，在當時，像廖那樣的「台灣意識」，也只不過是一些流亡海外的台灣人知識菁英主觀的腦海中的觀念。真正的使這種與中國對立的「台灣意識」具有現實的意義，並且成為台灣社會意識領域中的一特殊部份，其決定性因素，還是在二次大戰後立刻浮現的國際冷戰與中國內戰的大歷史潮流。

這種大歷史浪潮，使台灣社會在五〇年代後被編組成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的前線基地，再度與中國大陸長期隔絕對峙；並且在社會經濟上發展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國際加工基地」。戰後迄今，與中國對立的台灣意識是在這樣的特殊的政治經濟過程中產生的特殊意識。

三、五〇年代後的政經過程中產生的「台灣意識」

(一) 台灣社會（在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下的）雙戰基地化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美國重新介入中國的內戰，積極扶植遷逃台灣的國府政權，以確保台灣留在美國的陣營扮演圍堵中國大陸的角色。因此，台灣社會被編組入美國在東亞冷戰中的前線基地，以及國府（為了反攻大陸統一中國）的「復興基地」，台灣海峽則成了冷戰與內戰交集的雙戰線。這把台灣社會推上了世界史罕見的、極端的、長期的、反共反中國大陸歷史的開端。在與中國大陸長期隔絕對

時的條件下的政治經濟發展，以及作為維持這體系的雙戰意識型態的作用，形成了恐共、反共、親美和與中國大陸對立的社會感情和意識，這種感情和意識又進而成為維持這體系強化這體系的意識型態。

為了維持在台灣的利益，美國從外交、軍事、經濟、文化、意識型態全方位地扶植國府，也透過這力量影響國府的政策走向。它一方面防止國府渡峽「反攻復國」，使兩岸的隔絕對峙長期化，亦即，使台灣長期處於「反攻反大陸」的前線基地的狀態（使中國內戰長期化、固定化）；另一方面，則促使國府走「政治獨裁與經濟發展」的路線，亦即在政治上維持高度的獨裁在經濟發展依賴美日資本主義經濟的路線。這便是五〇年代以後台灣社會的「特殊政經條件」，它規定了往後台灣社會從政治、經濟到社會意識的主要方向。

（二）「政治獨裁與經濟發展」路線與社會意識

國府的「政治獨裁與經濟發展」路線，有下面的幾個特徵：以封建的中國意識和反共意識作為統合人民的國家意識；在政治上，表現為個人獨裁、以及主張代表全中國並誓言「反攻復國」的「法統體制」的專政、中央集權、對人民思想與社會生活的戒嚴、政治權利的省籍不均……等；在經濟上，則強力改造台灣社會舊有的經濟關係（如農地改革等），全力奶育依賴美日的資本、市場與技術的資本主義經濟，使台灣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國際加工基地」。

台灣社會的雙戰基地化，首先是風聲鶴唳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它滌清並且湮滅了所有從日據到四九年的台灣社會歷史中生成的反帝、反封建、反腐敗、反內戰、爭民主的人與社會意識。跟著，長期的戒嚴體制，使台灣的社會意識進入了漫長的白色化時期。在這期間，國府的內戰意識和美國的冷戰意識，再加上隨著依賴美日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所必然產生的資本主義意識，共同構成了台灣社會意識的主要內容。它的共同特徵便是「蔑視大陸（如匪區、阿共等稱呼）反共恐共、親日崇美」意識；而與這些並存的，便是封建的中國意識，以及由於政經權力省籍不均，再加上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痕和白色恐怖所產生的省籍意識。

（三）在反國府獨裁的民主化運動中，與中國對立的「台灣意識」的登台

一九七九年是一個歷史的轉捩點。當年，美國與中國大陸建交，同時與國府「斷交、撤軍、廢約」，取而代之的是以美國的國內法《與台灣關係法》來規範美國與台灣之間的關係。這使五〇年代以來受到美國強力支持、庇護並堅稱自己代表全中國法統的國府政權頓失外部的正當性；在內部，由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使茁壯起來的台灣新興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與國府的獨裁政治之間逐漸擴大的矛盾，以及全社會長期間在國府獨裁的政經政策下蓄積的各式各樣的矛盾，全都匯集為「反獨裁要民主」的民主化浪潮，不斷地衝擊著國府政權及其國家意識。接連著發生的「美麗島事件」、「林義雄母女案」、「陳文成案」、「江南案」更激化了反對的聲浪。這使以

「反國府獨裁要民主」為旗號的黨外運動急速壯大。這期間，美國也以《與台灣關係法》中的人權條款和軍售條款來牽制國府，影響台灣民主化運動的走向和局面。在國府處於內外交逼的勢頭上，長期間被徹底「白色化」的台灣社會意識領域中，以史明為教本的「台灣意識論」開始登上了台灣的文化、政治舞台；順著一般人難以區分「國府」與「中國」異同的狀況，把高漲的反國府獨裁的民主感情推到了「反中國」的地步；並混同國府的「封建的中國意識」和「一般意義的中國意識」，把原本是挑戰國府的「封建中國意識」的感情推到反「中國意識」的範圍；而黨外運動的獨派則在反國府獨裁的民主化運動中突出省籍矛盾，使運動轉化到台灣人對中國人的問題上。簡單來說，就是把反國府獨裁的民主化運動化約成這樣的對立程式：

國府||獨裁||外省人||中國人||中國意識||中國民族主義

台灣人民||民主||台灣人||台灣意識||本土意識||台灣民族意識

總的來說，以反國府獨裁為總標誌的台灣政治轉型期，黨外獨派或初創的民進黨在洶湧的大潮流中，一面打著為「全民的民主」打拼的旗號，另一方面卻運作著以台獨建國為終極目標的「台灣意識」。

從一九八二年黨外人士共同主張「住民自決」，並提出「自決、民主、救台灣」（注意：「自決」的口號是放在「民主」的上位）的政治口號，一直到一九八七年解

嚴後民進黨第二屆黨大會決議：「人民有主張台灣獨立的自由」；這其間政治主張的大變化便說明了上述的事實。

(四) 辨別政治層面意識型態化的台灣意識與一般社會心理層面民粹化的台灣意識

從社會科學的觀點來看，可以將台灣意識分二個層面；亦即，屬於體系化的意識型態（如法律、宗教、政治主義……等）層面的「台灣意識」，和屬於一般社會心理層面的「台灣意識」。以台灣獨立為終極目標的「台灣意識」屬於前者，而後者，則很難明確定義，且互相重疊的一般人的感情、思考或意志，譬如省籍意識、悲情意識、本地意識、鄉土意識、反共意識、恐共意識、美國意識、日本意識……等，它們交織、複合在一起，一般又稱為「民粹的台灣意識」或簡稱為「民粹意識」。兩者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同一社會意識的兩種不同型態；前者是後者在特定的政經條件下意識型態化的東西，但後者不一定會意識型態化。但是一旦意識型態化的前者一定會以各種力量（法政權力等）不斷將後者轉化為自己，這之間有複雜的互動過程。

在台灣的政治轉型期，「民粹的台灣意識」（社會心理的台灣意識）在政治上主要集中地表現為反國府獨裁的民主化意識，與中國對立的意識並不明顯；而台獨理念的「台灣意識」則主要侷限在黨外獨派或初創的民進黨的政治主張中。然而，其後隨

著台灣資本主義的經濟經歷了一次大膨脹，以及國府的法統政權轉型為台灣資產階級的政權，所謂「民主化」逐漸完成了其階段性的歷史任務後，才使新時期的與中國對立的「台灣意識」全面登上了前舞台。

(五) 國府政權性質的轉型、經濟膨脹和「台灣意識」的變化

我們知道，處於外部正當性危機以及內部民主化挑戰的國府政權，從八〇年代中期開始，企圖以「國際化、自由化、制度化」的二化政策來化解危機；接著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和報禁，自此國府的轉型便一瀉千里。在這過程中，李登輝上台，在與老法統的鬥爭中，乘著民主化浪潮的大勢頭，拉攏台灣地方派系、財團、利益集團，甚至利用民進黨的力量，共同脫去了國府的法統外衣。台灣的新興資產階級從原本扈從的地位躍升到政治舞台前，直接掌握了政權。在這過程中，被巧妙地運用的民粹的台灣意識，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謂「李登輝情結」便是這樣的產物。當然，做為法統國府的國家意識型態重要部分的「封建的中國意識」，也跟著失去正當性而成為眾矢之的。接著，反映台灣資產階級政權的新國家意識型態也正等著上台。

另一方面，從八〇年代初開始，台灣經濟的對外貿易總額以及貿易順差都呈現了急速的膨脹（在短短數年間，貿易順差從十億美元急速上升到數百億美元以上）。接著，台幣對美元的匯率也急速升值（台幣對美元從三十五元急升到二十六元），這使

9 劉進慶、涂照彥、隅古三喜男共著：《台灣之經濟》，頁二七七，人間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得以美元計價的平均國民所得以倍數躍升，國民的對外購買力也一夕間呈現數倍的膨脹。同時，通貨發行量也呈數倍增大，造成「台灣錢淹腳目」的現象，爆發了全民金錢遊戲。在經貿「國際化、自由化」的政策下，外國商品如洪水般湧入，台灣人民的消費生活一夕間「第一世界化」。林林總總的這些由台幣購買力的膨脹以及房地市股市膨脹所引起的富有的幻覺，造成了台灣人民「先進國意識」、「有錢人意識」；再加上傳播媒體的大幅開放（特別是有線電視），使美國日本的影視、資訊大量湧入，快速佔領了台灣人民的大部分精神生活，造成美國中心價值觀或日本式價值更加在台灣的社會意識領域確立其重要的地位。以上這些，就共同構成了九〇年代以後台灣的社會心理的新內容，若再加上原有的反共恐共心理以及初獲得的部份「民主、自由」的自滿心理，當面臨中國大陸的關係時，便顯現為「富有、先進、民主自由」的優越意識。這便是當前社會心理層面的「台灣意識」的實際內容。

（六）政黨與政權共同推動的「台灣意識」

一九九一年，民進黨把建立台灣共和國的主張正式列入黨綱，台獨的「台灣意識」進一步成為民進黨主要的政治武器。為了取得政權獨立建國，在現實的政治競爭中充分使用台獨的「台灣意識」，全力把上述的台灣社會心理推向與中國對立的意識（譬如「台灣中國、一人一國」的口號）；並且為了打造新國家的意識型態，把這種「台灣意識」擴大到歷史、文化論述，宣傳多族群說、非中國血緣說、外來殖民政權

說、日治有功論、皇民文學有理論……等，進行民眾心靈的去中國化。

但是，在現代社會，任何意識型態唯有透過國家權利的推動才能發揮更深遠的影響。資產階級化的國府，為了鞏固政權，繼續把民粹的台灣意識當作統合國民意識的絕佳工具（取代已失效力的「反共復國」）。譬如：命運共同體、台灣認同、台灣優先、台灣第一、新台灣人……等口號。更具體表現在《認識台灣》教科書上的歷史觀、社會觀上；反映在政策上的便是：在經濟上的戒急用忍、南向政策、前進中美洲……，在政治上的國家安全、政治偵防……等右傾政策。

當前，台獨理念的「台灣意識」和國府民粹式的「台灣意識」互為作用推波助瀾，將一般的社會心理層面的「台灣意識」推上了與中國對立的台灣意識。它起了維持台灣社會繼續與中國大陸隔絕和對峙的作用；鞏固了政權、黨權，並且使「國家安全」（恍如兩蔣時代的口號）凌駕了所有的社會議題，再度成為兩大黨的最高黨綱，掩蔽了台灣資本主義社會所必然內含的諸多問題。因此，它是五〇年代起的雙戰意識的衍續而非克服；是後冷戰時代中，在美國的《與台灣關係法》羽護下的政權或政黨的準國家意識。

結 論

由上面的討論，我們大略地辨識了「台灣意識」的輪廓，下面簡單地作一點總

結：

一、「台灣意識」只是許多內容相異的特殊的台灣社會意識的總稱。基本上，它是反映台灣的特殊政治經濟處境的特殊社會意識。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不同內容的「台灣意識」。因此，在討論它時，要放在具體的歷史條件中討論才能掌握它的真義。

二、台灣意識既屬於社會意識的範疇，它就是客觀的社會諸條件的反映。因此，必須與具體的政治、經濟、文化或相關的其他社會意識聯繫起來討論。抽象的形而上的，與其它的社會條件孤立起來的討論是很難掌握真義的。

三、任何歷史時期的台灣意識都有兩個層面；有一般的社會心理層面（感情、思考或意志），如恐共反共、省籍……等，以及體系化的意識型態層面（政治、法律、文學、藝術），如台獨的台灣意識或國府的準國家意識等。討論台灣意識時，一方面要區分兩者，另一方面也要聯繫兩者，它們是互為作用的。社會心理是意識型態的基礎，而意識型態也反過來結構化強化社會心理的傾向性。

四、歸根究柢，台灣意識的根源，是百年來帝國主義掠奪或圍堵中國，把台灣置於其殖民統治或其勢力範圍下的歷史。在這歷史過程中，台灣處於與中國長期分離、隔絕或對峙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的特殊的政治經濟社會進展，產生了各種不同內容的台灣意識。其中，有維持帝國主義條件與中國意識對立的台灣意識，也有克服帝國

主義條件與中國意識相通的台灣意識。台獨的台灣意識只是其中的特殊型態；它的歷史起緣是戰後的國際冷戰和中國內戰，它的社會根源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國府親美日的「政治獨裁與經濟發展」路線下成長的台灣資本主義社會。

五、社會意識的性格有二種，既有維護既存的社會條件的性格，也有變革社會的反抗的性格。因此，在諸多型態的台灣意識中，日據期的反日反帝的台灣意識或八〇年代的反獨裁的台灣意識是屬於後者；而與中國對立的台灣意識，因為它起了衍續並鞏固五十年來規定台灣命運的特定歷史條件的作用，因此屬於前者。

本文發表於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三、十四日，夏潮基金會主辦

「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澳門學術研討會

台灣「日本情結」的歷史諸相

——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視角

一、台灣的特殊社會意識

編者最早給我的暫訂題目是：「台灣人的日本情懷」，後來編者把「情懷」改成了「情結」，本文認為使用「情結」較恰當。就中文文意，「情懷」與「情結」當然有很大的不同；「情懷」有思慕、懷念之意，特別在恆常站在主流意識的台灣媒體，只要有關於台灣與日本的關係，都慣用「日本情懷」，這當然與台灣的親日主流政治有密切關係；至於「情結」則指比較複雜的感情，且涵蓋了「情懷」，因此，對於台灣重層曲折的對日感情，使用「日本情結」比較貼近客觀的事實。

所謂「台灣的日本情結」，簡單地說，就是台灣人民對於日本全般的一種特殊感情和好惡。因為它牽涉到中國、日本、以及台灣之間近百年的歷史關係，不但十分複雜且隨時代的變遷有極為不同的內容；除了有對日本侵台和殖民台灣的歷史感情和想像之外，還包括了戰後台日政治經濟結構所反映的「日本第一」、「模範日本」的感情和價值觀，乃至近三十年來在流行文化和消費風潮上的「哈日」現象。如果從更大的範圍來看，日本的侵華戰爭歷史所遺留的反日、抗日感情也是「情結」中不可忽視

的部分。

仔細觀察台灣有「日本情結」，卻沒有「美國情結」，也沒有對其他某某國的情結這樣的詞彙，可見得「日本情結」在台灣的獨特性。另一方面，世界上也很難找到一個地方像台灣這樣有這麼濃厚又複雜的日本情結，即使在與台灣同樣曾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朝鮮也沒有，因此可以說台灣的日本情結是世界獨一無二的。這麼獨特的「台灣日本情結」，當然與台日間的百年歷史有密切的關係，然而，台灣的戰後政治經濟史才是真正形塑「日本情結」的基本力量。

基本上，「日本情結」屬於台灣社會感情或社會心理的範疇；然而，它又比一般的社會感情更為顯著、複雜，不但有歷史的延續性和不變性，甚至有價值判斷的屬性。因此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把它當做一個台灣的特殊社會意識應該更為恰當。甚至可以說，近二十年來，由於政治上文化上不斷精神動員的關係，它幾乎已發展到近似一種「意識型態」。

一一、台灣「日本情結」的原型

眾所周知，台灣的日本情結其主要根源來自五十一年前的日本殖民統治和日本侵華戰爭歷史；它非始於今日，而是從六十四年前日本戰敗、台灣光復復歸祖國起就出現了。戰後迄今，在不一樣的歷史時期有不一樣的內容，除了內容上的差異之外，每一

個時期的「日本情結」在社會意識中所佔的強弱濃淡也有很大的不同，甚至於在對日立場上也南轅北轍。譬如，在七〇年代的鄉土浪潮與八〇年代以後的本土浪潮中，日本情結或對日感情就有很大的不同；舉個明顯的例子，如七〇年代黃春明的名作《莎喲娜啦·再見》與今日的熱門電影《海角七號》相較，兩者所呈現的「日本情結」幾乎相反。

從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台灣光復，到一九四七年發生二二八事件為止，去殖民化和祖國化是大時代的主題。從政權、財產、教育、語言到文化，陳儀政權和台灣民眾共同進行了徹底的民族化，並全數遣還了原在台殖民統治者的日本人。當時像這種殖民地徹底的民族化，在世界殖民史上還是少見的。怪不得省籍詩人、評論家王白淵在當時曾經說：「台灣之光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他把台灣光復對台灣社會變革的意義視為「徹底的民族革命」。在這時期，台灣人民的民族立場是鮮烈的，因此，反日或對日本殖民文化和歷史的反省與批判是主要的潮流。不幸，二二八事件使台灣人民在思想和感情上的去殖民化受到了嚴重的挫折。由於對國民政府貪腐顛預無能的絕望，有些知識分子選擇了革命的道路；有人投入紅色祖國的地下黨，有人逃亡上海、香港籌組「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他們反蔣也反日更反美。還有極少數人開始走分離主義道路，主張台灣獨立，他們同是反蔣惟不反美且親日。一般民眾雖然在民族和國家認同上並未明顯動搖，但在語言、生活方式、習慣、思考方面

又逐漸逆回到殖民統治時期，亦即社會生活上延續了殖民統治時期的樣式，因此出現了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不一致的二重構造，這就是後來台灣「日本情結」的原型。

一九四九年蔣國府遷台，台灣從國共內戰的大後方成為前線，甚至成了蔣國府的反共復興基地。自此，台灣民眾在反共風暴的籠罩中，接受黨國式的反共和民族教育，但台灣的民間社會仍平行維持著日本殖民時期延續下來的語言和生活習慣，再加上戰後日本復興期流行文化的傳入。這時期的日本情結是不自覺的、自然產生的社會感情，並未有像今日一樣的美化或合理化日本殖民歷史的現象。

三、兩種成見

許多人把本省人的日本情結完全歸咎於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這不但把問題過度簡單化，甚至可說是一種成見。實際上，台灣本省人的日本情結雖然是由於殖民統治歷史，但是，使「日本情結」得以溫存、延續甚至強化的主要動力，則是在戰後，特別是五〇年代以後台灣的政治經濟結構。在國共內戰和美國在東亞的冷戰格局下，台灣政治經濟結構的基本架構是：在軍事上，依賴美華協防條約再加上美日安保體制；在經濟上，則是依賴美日的日美台三角經貿構造。在美國反共主義的霸權秩序下，台灣與日本不但在政治、軍事防衛和安全保障上維持著緊密的依存關係，在經貿上更形

成了依賴關係。這種戰後台日之間的緊密依存關係，似乎又有了戰前日本帝國主義經濟圈的影子，雖然這並不是恰當的比喻。

是這樣的戰後台灣政經結構，溫存且強化了殖民歷史遺留下來的日本情結。由此可見，社會意識雖有其延續性，但總是受到新的社會存在所規範。

另外，也有許多人認為本省人才有親日情結，那也是一種成見。其實，蔣政權的親日性格更為顯著；它不但嚴重影響中國現代史，也深刻決定著戰後台灣歷史和社會意識的走向。

在中國現代史，特別在國共鬥爭乃至內戰的歷史中，蔣政權為了反共、剿共、勝共經常利用日本右翼，結合日本右翼勢力打內戰。這種情況，從戰前一直到戰後，從大陸延續到台灣；其合作對象，從原侵華日軍到日本的保守官僚、政界、財經界，從岡村寧次到岸信介。

因為蔣政權與日本右翼勢力有一個共同的意識型態基礎，那就是堅決反共。且這種意識型態直達日本天皇。

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那天，蔣便給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下令：「日軍可以暫時保持現有武器和裝備，維持所在地的秩序和交通」，其目的之一便是利用日軍就地「防共」。岡村寧次在回憶錄中也坦承：「要與國民黨政府緊密結合成一體，對付中共」。而二者背後有美國對於戰後世界的戰略的謀圖，當時的美國

總統杜魯門在其回憶錄中也明言：「這種利用日本軍隊阻止共產黨人的辦法，是國防部和國務院的聯合決定而經我批准的」。由此可知，在日本戰敗的那刻起，三者的反共同盟的雛形已形成。

一九四九年一月底，國共內戰中解放軍已兵臨長江北岸，南京上海危急之時，蔣倉促批准把羈押在上海的岡村寧次和近一千名日本戰犯判無罪釋放，並緊急將之送回日本，這引起包括大部分國民黨人和中國人民的憤怒。該年下半年，當解放軍進攻勢如破竹，在國民政府崩潰前夕，蔣歷訪菲、韓，並派心腹訪日企圖籌組太平洋反共聯盟，同時，開始僱用被蔣釋放的原日本侵華高級軍官協助其反共作戰。敗退台灣後，更大量僱用這些原侵華日軍組成軍事顧問團，在台進行反共作戰的訓練和擘畫，此乃大家熟知的「白團」。

四、雙戰結構與「日本第一」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爆發，二十七日美國第七艦隊就進入台灣海峽，宣稱海峽中立化。實際上是美國用軍力強行介入中國內戰，以台灣海峽為界凍結中國內戰，從中國分離台灣，使台灣留在美國手中。自此兩岸隔離對峙，台灣被置於冷戰和內戰的「雙戰結構」中。接著美國用數目龐大的軍援和經援支持退居台灣的國府，並進一步改造台灣的經濟。軍事上，通過「中美」協防條約，一方面防止中共的進攻，

另一方面也防止蔣國府反攻大陸；在國際政治上，美國強力支持在台國府為「自由中國」，並使其擁有在聯合國代表中國的席位，因而確保了蔣國府在國際外交上的地位。使其成為美國在東亞冷戰中的重要一環，與美日安保體制和美韓協防體制共同構成圍堵蘇聯、對抗中國大陸的壁壘。

在美國的東亞冷戰結構下，蔣介石和岸信介、佐藤榮作等戰前原天皇派官僚出身的日本總理大臣，共同攜手築構了亞洲的反共防波堤。一直到八〇年代，蔣國府在美國援體制影響下，採取了「政治獨裁經濟發展」的政策，走上「黨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路線；在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台灣從資本、技術、工業原材料到關鍵零組件幾乎仰賴日本，從日本輸入原料零組件和關鍵技術，進行加工再輸出到美國，形成了緊密的日台美三角經貿關係。

在雙戰結構下，蔣國府雖然在國民意識教育中，強調「黨國民族主義」，灌輸抗日的歷史教育，惟台日間緊密的政經從屬關係的現實，使台灣社會原有的日本情結不但未竭，更得以溫存、延續、強化，甚至還進一步轉化為「日本第一」、「模範日本」等具有現代意識的日本情結。

七〇年代前後，由於美蘇冷戰進入新階段，美國開始改變對中國大陸的政策。首先是尼克森訪問大陸並發表《上海聯合公報》，接著中國大陸取代了台灣國府在聯合國的席位，並撤出駐台美軍；日本也緊接著和中國大陸建交並與台灣國府斷交。這

一連串蔣國府稱之為「國際逆流」的巨大變化，使台灣的雙戰結構開始鬆動；另一方面，北美留學生的保釣運動風起雲湧，迅速從美國傳到台灣，在台灣學園和知識界掀起了民族主義的鄉土浪潮。這個持續近十年的鄉土浪潮中，台灣學生、知識界重新發掘台灣的日據歷史，特別是有關抗日的社會運動和人物，並大力批判了當時脫離台灣社會現實的文化和思想現象，同時對於台灣在政治經濟依賴日本而形成的親美日意識和媚日風氣，進行了反省和批判，這對當時台灣社會日見濃厚的「日本第一」的情緒有一定的制衡作用。

惟八〇年代以後，這股鄉土浪潮很快地被親日的「本土浪潮」所取代，台灣的日本情結遂往新的親日媚日方向發展。

五、《台灣關係法》與新「反共親美日」政權的登台

一九七九年底，美國與中國大陸建交，同時與蔣國府斷交並廢約。這使蔣國府賴以生存的雙戰體制中的冷戰體制受到極大的衝擊，再加上來自中國大陸和平統一的壓力以及島內黨外新興本地政治勢力的挑戰，內戰體制也岌岌可危。然而，這並不意謂著與中國大陸建交同時與台灣國府斷交的美國，從此放棄在台灣獨佔利益。為了繼續確保其在台灣的利益，延續其遏制中國大陸的東亞戰略，美國單方以制訂其國內法——《台灣關係法》的方式，通過軍事威嚇大陸和軍售台灣的手段，繼續干涉台海

兩岸關係。

失去國際正當性的蔣國府，在島內黨外新興政治勢力的挑戰下，其內部正當性也面臨極大的危機。在七〇年代萌芽的黨外運動，到了八〇年代已蔚為一股不容忽視的新生政治力量。這批青年，他們在二戰前後出生，是完全在「政治獨裁經濟發展」的台灣資本主義化時代中，受黨國反共教育成長的一代，同時在冷戰體制下他們也普受美式自由民主的洗禮。他們在反共反大陸、親美親日上與蔣政權無二致，惟在美式自由民主觀念上，他們是反蔣反獨裁的。

在屬於美國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的規範下，黨外很快轉化為民進黨並急速壯大；同時，騎在黨國體制機器上的李登輝政權登上了台灣舞台。自此，一個新的反共反中國大陸、親美親日的非蔣政治勢力統治了台灣，確定了台灣繼續留在美國手中。如果不忘記歷史的話，我們不難發現：扶植一個親美的台籍人士政府，曾經是美國在四十年前（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對中國政策（對台政策）的重要戰略意圖；只是當時並未能實現，而是在四十年後實現了。

六、從「情結」到「情懷」，然後「意識型態」

從李登輝政權到陳水扁政權的二十年間，以「去中國化」為主要內實的「本土論」，取代了兩蔣時期的反共主義，成了台灣社會意識的主流。其實，這種「本土

論」在「去中國化」的另一面是對台灣殖民歷史的合理化或美化，它肯定日本殖民統治對台灣現代化的功績。當然，「本土論」還包含有省籍意識在內，這不在論列。因此，以去中國化和美化「日治」為兩大內容的「本土論」，就構成了這時期台灣人日本情結的主要特徵。如果回到前面的「情懷」與「情結」之辨的話，這時期似乎恰可以「日本情懷」概括之；然而，如果進一步辨析，卻可以發現到，其實只有在李登輝當政的前期才可以「情懷」稱之；此後，經過政權之手大力的精神動員下，「情懷」很快地往「意識型態」的方向發展。

這種「本土論」，本來就是被蔣國府局限在海外活動的台獨政治團體的「意識型態」；八〇年後在美國《台灣關係法》制約下的新兩岸架構，隨著黨外政治活動才出現在島內。之後，它成了民進黨的重要政治論述，也是該黨的主要政治動力。然而使它成為國家意識且真正發揮大影響力的，應該始於李登輝政權。一九九四年李登輝先上演了一幕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談」戲；「對談」中他除了諂媚地說了：「我二十歲之前是日本人」的名言外，還讚美日本「統治台灣」帶來了現代化等。一九九五年，李肯定獨派團體舉辦的「《馬關條約》一百年」的「告別中國」活動；一九九七年，李欽點杜正勝「院士」領軍促成了國中《認識台灣》教科書，自此，這種「本土論」開始進入打造國家意識型態的教育領域，成為「國家意識」；它長期且深刻地形塑著台灣年輕世代思想和認同。今日二十五歲以下的年輕人哪一個不是

在它的日本情懷的教育規訓下成長的；或許有人認為這個說法太過牽強，但是只要看看，今天《海角七號》電影在年輕世代中引起的熱潮，有很大的成分，不就是今天台灣日本「情懷」的集中表現嗎？而其中沒有一九九七年之後李欽定歷史教科書的影響嗎？

李登輝的「台灣意識型態」演出，一直持續到他下台以後，且一次比一次更接近「意識型態」。二〇〇〇年，日本極右翼漫畫家小林善紀的漫畫書《台灣論》的出台過程，前前後後、枝枝節節中背後都有李登輝的手。二〇〇二年底，李有一篇給「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成立大會的講稿，題目是《台灣精神與日本精神》；文中他再度強調說他「一出生就被當做日本國民」；並說「台灣精神中有重要的日本精神」，而「日本精神的根源就是大和魂、武士道」。下面摘錄一段原文以揭露其思想真面目：

這些從中國來的統治者所沒有而台灣人有的，作為現代國民的這些氣質和素養（筆者按：該文前面曾提到的「勇氣、勤勉、奉公、清潔」等氣質），台灣人都自傲地稱為「日本精神」。由於台灣人從根本上具有這種作為「武士道」的「日本精神」，才使台灣在戰後得免於被中國的大陸文化所完全吞沒，甚至可以說才得以抵抗之；也由於有了這種「日本精神」，台灣戰後的現代社會才得以形成和確立。

從擁有比兩蔣更大政治權力和威信的李登輝的這些言行來看，就可以清楚看到這

時期台灣的「日本情懷」已超出情懷而近似意識型態了。接著，在陳水扁當政八年中，更把「本土論」從李登輝時期只限於文化、教育和對日關係的階段，推進到社會各個方面各個角落；再加上民進黨的政治文宣，以及校園、學界、媒體的配合鼓吹，「本土論」成了台灣島內的霸權意識型態，深刻地改變了台灣社會大眾的感情、意識和認同。

七、「本土論」與「日美安保體制」

其實，現在已深入普及成台灣國民意識的「本土論」，如果從政治角度來看，不論在二十年間的發展過程或當下的現實生活中，它在島內社會各領域中作為政治鬥爭工具一直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大至政治選舉、小至各職業或人民團體的權益爭奪）；同時，我們也不可能不看到，它也作為當政者統合台灣國民意識、鞏固「本土」政權的重要手段，李登輝就曾說過：「台灣意識愈多愈好」（這個台灣意識與本土意識或主體意識都是指同一個東西，本文以「本土論」總稱之）。二十年來「本土意識」一直是「本土」政權的最重要基礎，連今日的馬政權也不得不賣力爭取它。另外，它還是在美國的《台灣關係法》規範下，維持或強化兩岸分離和對峙的重要意識型態之一（其他的有民主、人權、主權等所謂「普世價值」）；甚至，從東亞全局來看，對於以遏制中國為中心的「日美安保體制」來說，台灣的「本土論」以及民眾堅固的本土

意識當然是他們絕好的條件和助力；相對的，對李登輝或陳水扁政權來說，強化台灣的「本土論」、挑起兩岸緊張，以爭取「日美安保體制」涵蓋台海，以遏止中國大陸防衛台灣，一直是其與日本關係的核心。

自從「蘇東波」巨變、蘇聯解體後，原本在冷戰時期是針對蘇聯、遏阻共產主義的原日美安保體制，也大大減低了其存在的正當性。在這樣的新局勢中，美國為了繼續維持其在東亞的利益，在一九九五年發表了《美國對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安全保障戰略》，強調美國將繼續維持「日美安保體制」，繼續在東亞駐紮十萬大軍；並且在隔年舉行了日美首腦會議後發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新日美安保體制」成立，世稱「九六安保」。接著在一九九七年日本修訂公布了《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這個日本的新戰爭指南，除了把「日美安保體制」從自衛的角色擴大到區域防衛外（其中關鍵處，在所謂「周邊事態有事」時的軍事介入），更質變為世界性日美軍事同盟。其實，在美國與日本重新建構後冷戰時期的「安保體制」的同時，李登輝政權也主動積極地配合著。這就是大家可能都已淡忘的當時發生的一連串台海緊張局勢。一九九五年李實現了訪美，同年參與了獨派舉辦的「反中國」活動；一九九六年「總統大選」中，大陸在台海進行了為期十數天的導彈試射；一九九七年李欽點杜正勝領軍，通過教科書把「本土論」發展為打造台灣國民意識的工具。同時，李還透過黨國大掌櫃劉泰英，計畫動用龐大黨國資金投資駐日美軍大本營的琉球（「日美安

保體制」的樞紐），計畫在琉球設立「自由貿易區」；企圖利用大資金支持「日美安保體制」，使《日美防衛合作新指針》的「周邊事態有事」涵蓋台海。事實上李登輝的圖謀一時成功了，當時的日本官房長官梶山靜六就明言「周邊事態」包括台海在內。

八、共同的「精神歸宿」或者「末流」？

其實，日本統治階級的右翼勢力一直處心積慮，積極布局介入台海問題未曾稍竭；一方面是由於他們與台灣當局在反中親美上有共同的意識型態，另一方面是為了彼此權益的交換。日本政商界右翼與台灣的所謂「本土派」之間的往來更是熱絡，從由日本各黨派親台議員組成的「日華關係議員懇談會」（據說有三百人之眾）、日本自衛隊退休高官，到如「台灣研究會」（若林正丈領軍）為代表的有關台灣歷史、文學、政社全般的研究社團（特別在有關台灣文學、台灣歷史的領域，日本右翼學者在壯大「本土論」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日本右翼勢力熱衷於台灣，在日台上空絡繹不絕的最大要因，除了台灣本土論的「反中親美情結」之外，台灣濃厚的「日本情懷」對他們而言是最大的魅力；其不絕於途，交往之深、範圍之廣，非常人所知。就如李登輝說的：日本精神是台灣精神的重要支柱，且李又說這個「日本精神」就是「大和魂」。日本右翼在「台灣精神」中找到了他們溫暖的「精神故鄉」（日本精神），而

這「日本精神」在今天的日本社會早已被遺忘或漠視，卻是他們想重建的。相呼應的，台灣文學「本土論」的「大御所」葉石濤也曾說過：「日本是我心靈的故鄉」。由此可見，兩方都在「日本精神」中找到了共同的精神歸宿。這就是今天台灣「日本情懷」的範例。

這種風潮深刻影響了台灣年輕世代的歷史認識和認同，使他們把殖民歷史當作台灣現代化的根源，日本成了現代台灣的典範。再加上自八〇年代起在台灣流行文化和消費生活的「哈日」風潮，從日本漫畫、日劇、日本偶像到流行語、新詞彙、乃至年輕世代的特殊表情神態到生態，都是日本的翻版；台灣流行文化成了日本的亞流文化。這又強化了年輕世代的「本土論」、日本情懷，甚至連審美和人生價值都「原宿」化。

實際上，對於台灣這種偏向的親日、崇日現象，除了少數的日本統治階層和右翼人士外，一般日本民眾都覺得不可思議。譬如台灣街頭經常可以看見頭戴日本兵帽的老人的景象，對一般日本人來說，就像看到從南洋叢林裡出現的舊日本兵一樣，除了驚訝之外，內心難免有可笑的感覺。

九、結語

一個沒有主體的主體意識、沒有自立自主性的「本土論」，一個沒有自己審美

觀、喪失民族心靈歸宿的人們，再怎麼要成為別人或裝扮成別人，也還是亞流，何況這個亞流的源流在日本社會中不是早已消失或被遺忘、拋棄，就是被冷漠以待。舉例便知，日本右翼教科書團體（「制定新教科書之會」）所出版的扶桑社日本教科書（歷史、公民），二〇〇五年在全日本學校的被採用率只有百分之零點四（雖然現在全日本教科書有「扶桑化」的傾向）。由此觀之，台灣的日本情懷所思慕的對象，在現實的日本社會中只可稱之為「末流」。

在未來的新時代中，寄望台灣人民拋棄日本「情懷」，超克「日本情結」，站在中日友好的平台，與絕大多數善良的日本人民共同攜手排除外力戰爭，創造一個平等、和平共存的亞洲。這才是台灣的出路，台灣人尊嚴的保證。這也是新時代賦予我們的嚴肅課題。

二〇〇九年二月三日定稿

發表於《思想》第十四期（台灣的日本症候群），聯經，二〇一〇年一月

綜論台灣的「壁壘意識」

二〇〇八年將是一個世界歷史的轉折之年。

即將誕生的新世界從地底搖撼著現成的世界，「亂」和「變」只是一種現象，世界變革的胎動才是問題的本質。金融風暴橫掃了世界政治、經濟乃至生活的現成秩序，接著文化和思維也必將改變，只是現在還沒有人看得出它的深度及廣度。

從金融風暴開始的世界變動，其本質是對上世紀八〇年代前後以英美為首西方國家倡導的新自由主義政經範式的否定。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各國紛紛採取撤除政府對資本的各種規範，崇尚絕對的自由經濟，解除了規範的資本，如猛獸出柙，拚命追求極大利潤，極盡貪婪之能事，雖然因此造就了三十年的榮景，終至走到了生產過剩消費不足的窮境。金融風暴只是為了解決這個困境的表現，也是對新自由主義範式的反作用。

作為新自由主義中心周邊的台灣，雖不盡相同也經歷了相似的路徑，只不過動盪更大，這更強化了台灣極特殊的政治結構的動盪。當時，美國與中國大陸建交，與台灣國府斷交且廢除協防條約，等於拆除了對蔣國府內戰體制的支持。接著美國以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重新介入台海兩岸，使兩岸繼續隔離與對峙，保持其對台灣的影響力和利益。這是八〇年代以後台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變化的基本格局。

新自由主義的風潮和榮景也波及了台灣，造就了台灣資產階級財富的快速累積，大大膨脹了因財富、貨幣的幻覺而生的主體意識或優越意識，開始鄙視初改革開放的中國大陸；再加上民進黨和李登輝政權的鼓吹，「本土意識」、「台灣意識」抬頭，取代過去兩蔣時代的「反共意識」，近年又有「民主、人權、主權意識」的抬頭，共同構成了台灣的主流意識。只不過，這種主流意識與世界其他國家同名的普世意識有其不同之處；它是針對中國大陸，反對中國大陸，因此在客觀上成了維持且強化兩岸對立的新壁壘意識。

一、以「主權和民主」為論的新壁壘意識

在台灣，二〇〇八年也是一個激變之年，特別在政治領域，當然金融風暴的影響也從年底起將漸次增大。首先是政黨輪替，接著陳水扁因貪污案遭偵辦、起訴和羈押；同時，馬政府實現了兩岸大三通兩岸和平交流逐步進展。這三個巨變，對執政達八年之久的民進黨來說不啻是一次重大的打擊；對泛獨勢力而言，更是攸關生死存亡的一年。作為「本土路線」總代表的陳水扁，當檢方偵辦起訴並揭露了其貪腐的真相，暴露了其「假台獨真貪污」的面目後，以台灣意識、本土意識為號召且實際統治台灣近二十年的泛獨勢力，正面臨巨大的政治和道德的危機。為了保住現有的政治利益和地盤，包括獨派在內的民進黨上下，不惜以護

扁來護盤，藉此延遲崩盤時刻的到來，並喊出響亮的「人權」論，攻詰扁案為政治、司法追殺，企圖模糊扁貪腐的焦點。

另一方面，失去政權後，民進黨眼看馬政府主導的兩岸和平交流步步進展，內心的焦慮鬱悶之情如悶鍋一般；及至十月底大陸海協會會長陳雲林來台進行兩岸協商，民進黨的焦慮全面爆發；發動支持群眾上街頭對抗，並以「顧主權」為口號，要「陳匪滾回去！」，連昔日兩蔣時代的反共八股「消滅共匪」的口號也搬了出來。

處於困境的民進黨此刻喊出「人權」和「主權」的政治口號，雖然不合理但是可理解的。而且可預見，將來扁案逐漸落幕後，民進黨即便不拋棄原有的台灣意識、本土意識的神主牌，「人權、主權」仍可能成為其下一階段的新論述。

馬政府成立以來，其著力之處，即其政治重點顯然在改善兩岸關係，欲藉此打開台灣的困境。如外交休兵、專守防衛、大三通、全面經濟協商等等，顯然與二十年來泛獨政權的兩岸對立和去中國化的政治主軸完全不同；僅僅半年時間，兩岸關係就有本質上的改變。同時，在馬政府著著改善兩岸關係的過程，各方反對聲浪，以及掣肘的力量不可謂不小；因為這從根本損及長久以來以維持兩岸對立獲取政經利益者的權益，且挑動了台灣島內六十年歷史形構成的以「反共、親美、本土、主權」為理念基礎的壁壘意識。民進黨等泛獨勢力的極力反對，自不在話下；值得注意的是，竟有一些原本反獨批扁不遺餘力的報刊輿論界，也紛紛出來反對。且大多以維護台灣的「主

權」「民主」為其論理的基礎。譬如：「堅決確保台灣主權獨立地位」、「堅決護衛民主政治體制」這樣的說法，是其標準的話語。

在反對馬政府改善兩岸關係的立場上，這兩股力量是一致的，在「主權、民主」的口號或立論上也是相近的，而在所謂「本土意識」上，只要去除其中的「省籍意識」或者台灣人獨立的政治主張，兩者也並無大差異。兩者同是冷戰結構中，反共親美壁壘意識的繼承者，在抗拒中國上是同一步調的。如果前者是泛台獨，後者則類似很久沒人提及的「獨台」，將來在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發展中，這兩股力量的結盟不無可能。

二〇〇八年台灣壁壘意識的實態

只要簡單地綜合回顧二〇〇八年台灣各報刊對時事的論述和說法，就可以觀察到今天的台灣社會意識中根深蒂固的，那座無所不在的「反共·反中·親美」壁壘意識的鮮明樣貌。

八月北京奧運時，民進黨等泛獨勢力深恐盛大的京奧營造出來的中國正面形像，必將對台灣民心產生巨大的影響，鬆動台灣民眾的壁壘意識。於是先把京奧類比為「納粹奧運」，且把胡錦濤抹黑成「粉飾太平」的「納粹領袖」；恐嚇台灣民眾說「台灣人民成為中國眼中要打壓的猶太人、或者淪為慕尼黑黑被出賣的捷克」。當然，進一步在島內擴大散播西方反華媒體的謠言，如京奧「造假」、壓制「異議人士」、

「沒有人權新聞自由」……等等，也是其一向的作法。再如，故意派一位民進黨女青年黨工，背著文宣品到北京闖關失敗被遣還的事件，挑撥島內民眾情緒，製造中國是沒人權、欺負台灣人的「野蠻國家」。最可笑的，莫過於當八月十五日中華棒球隊敗給中國隊時，竟有經常見報的親綠評論者以《八一五心碎國恥日》為題，形容台灣棒球輸給中國是國恥、國殤、最黑暗的一刻；然而他們對於中華隊輸給其他外國隊，則評為中華隊技術不如人等等，充分暴露其二套標準。其內心深處以中國為唯一仇敵的壁壘意識昭然若揭。

掌權達二十年的李登輝、陳水扁兩位泛獨總統，從不間斷地以極大的威權進行民眾精神動員。宣揚兩岸關係的「一邊一國」或「兩國」論，並以所謂的「本土意識」不斷深化台灣內部的去中國化；傾政權之力挑撥兩岸對立，使台灣內部的「本土論、主體論」再加上在冷戰內戰時期形構的「反共、反中國」的壁壘意識，加深加高又加厚；此外，又新形構了許多美式的「民主、人權、主權」等新壁壘論述。馬英九上台後，為突破兩岸僵局，解決台灣政經困境，開始逐步推進兩岸關係朝和解、協談交流的方向進展時，除了泛獨的「台灣國」論者之外，原有的一些反獨的「中華民國論者」都如遭電擊般紛紛猛力抨擊。特別是「中華民國主權論」的表現，令人矚目和擔憂。單單從一向被視為泛藍的中時、聯合兩大報上出現的言論來看，歸納其論述與慣用的詞彙，不時出現如：

「台灣主權」倒退的疑慮·台灣利益／台灣優先／「台灣主權」被矮化·台灣的
主體性和中華民國的主權尊嚴受打壓·刻意模糊「國家主權」……

不管是對於馬英九提出的「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或「特殊的非國與國關係」的新論述，或者是對「外交休兵」、「入聯提案」等台灣國際空間的問題，甚至對於如「開放大陸學生來台就讀」、「熊貓來台」、「陸客陸資來台」等開放措施上；特別在兩會恢復協商，陳雲林來台進行江陳會、馬陳會及簽署兩岸大三通協議的時刻，他們都群起反對；他們的論述反復使用的用語、詞彙、與立論都不外這些；簡單地說就是「台灣主權」神聖論。另一方面，雖然他們使用相同的「話語」，但也可依其國家認同的差異，分為二大類：一類是認同「台灣國」的台獨派，另一類是認同「中華民國」的類「獨台」派；後者是台獨下台在野後，馬政府開始真槍真彈地推動兩岸和解才出現的，是新的政治現象。譬如，在馬提出「特殊非國與國關係」論後，在頭載「中國」大名的報上，就出現了一位副總主筆寫了一篇〈懷念「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文章，它說：

堂堂總統淪為「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馬先生」……馬政府似乎仍感受不到民間的統一焦慮感……「中華民國就是台灣」是國內統獨的最大公約數，扁政府搞「去中華民國」，當然無聊；馬政府「去台灣」，更是愚蠢……與其擔心受怕「台

灣會不會被統去」，我寧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該文說的懷念或者寧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並不是的真的認同兩蔣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中的「統一中國」，而是取兩蔣時代背後「漢賊不兩立」的兩岸對峙意識；因為他認同的「中華民國就是台灣」，根本就是抽離了兩蔣的「一個中國」後，只認同台灣的中華民國，簡單的說，就是李登輝式的「特殊國與國關係」的台灣主權論，或者是李氏的「兩國論」。至於民進黨，乾脆就把馬英九的「特殊的非國與國關係」論貶成賣台，貶稱馬英九為「馬區長」。

今天台灣的壁壘意識中，除了集中表現在台獨或獨台論者共通的「台灣主權」論之外，就是表現在「親美」意識上。

今日台灣的「親美」，實繼承於五〇年代蔣國府的冷戰內戰體制；當時蔣國府不但「親美」且完全依賴美國的保護，五〇年代龐大的美援軍援硬撐起了蔣國府的生存。況且蔣國府的親美並非始於遷台後，早在大陸美國就是國府的後台大老闆。「親美反共」也一直是國民黨與民進黨、台獨在本質上的共同點；雖然現在「反共」不太講了，但卻仍是底流，因此「親美」一直是台灣的「主流意識」。「親美」論者奉美國為台灣保護神，曲意奉承，深怕美國走開，美國也把台灣當提款機；實際上只要美國撒手，不管是過去國府時代怎樣的威權體制或今天怎樣的台灣主權、民主體制，都如沙灘上的建築搖搖欲墜。實際上，台灣在政治經濟或意識上早已淪為美國屬

地，近年尤甚，從下面舉的例子就不難理解。在馬政府上台不久，美國太平洋軍區司令基亭不知是偶然或刻意說了一句話，他說：「台灣非常、非常、非常不可能發生衝突……目前沒有售予台灣相關武器系統的迫切需要」。這句話引起了一「親美」論者的大緊張，如喪考妣，深怕美國不賣武器給台灣，這些親美論者說：如果美國不賣武器給台灣，台灣「安全的槓桿與支持」就垮了，政治社會心理也不安定了，兩岸和平交流的「重要政治支撐」也沒了。論者還憂心地叮嚀和提醒基亭說：「台灣安全的槓桿與支柱主要是美國，台美之間是一條獨立自主的軸線」。深怕美國忘了台灣，遺棄台灣。

相較於這樣的親美論，台獨的親美論者更為卑躬曲膝，他們不但親美還媚日。馬政府在釣魚台問題上稍微硬一點，他們就急著學日本右翼政客的舌頭說：馬英九向中國全面傾斜，有「親中反日」的疑慮，日本會重新思考其安保方針，要馬英九放棄「以中反制美日」，趕快重回美日安保同盟的傘下等等。所謂台灣主體、台灣主權云者，在美日面前都不見了。另外還有一個例子，近十年來美軍介入台海問題的主要武力航母「小鷹號」除役時，台灣報紙亦隨之臨別依依地頌揚說：「小鷹號幾乎已成近十年來美軍護台決心的指標、以及台灣民主另類見證者。對台灣來說，小鷹號確實是艘值得懷念的航空母艦。」言下之意，台灣的安全和民主完全靠美國軍艦的保護。美國附庸者諂媚之情溢於言表，全忘了台灣「主權矮化」這回事。

從上述例證所呈現的今日台灣的主權論和親美論，其背後有一個共同的意識，那就是對於中國大陸的壁壘意識，敵對意識，對美國的依扈意識。可見，台灣主權論與親美論並不是兩個不同事物，而是一個事物的兩面，也就是今天台灣壁壘意識的兩個方面，兩者是互為一體的。

一一、壁壘意識與歷史

不錯，兩岸關係或者兩岸問題是現實政治問題，但實際上，很大部分也是一個歷史問題。然而台灣社會一直是一個不願意面對真實歷史，很少從反思反省歷史去汲取教訓找尋出路的地方。這也許是由於台灣近百年來統治者數度更迭的複雜歷史，造成了普遍存在歷史虛無主義的現像，致使「去歷史脈絡」的政治論述或政治口號當道橫行，且大受歡迎蔚為主流。然而，即使主觀上不願正視歷史或有意去除歷史的脈絡，客觀的歷史力量仍然時刻影響著現實。特別在兩岸關係上，歷史問題更是重心，如果避開歷史問題，政治問題就不容易找到正確的道路。

今天兩岸關係進展的最大障礙就在這個壁壘意識，這個壁壘意識鮮明地表現在政黨、政客、論客及媒體身上，而且或多或少、或重或輕地深藏在台灣社會每一人的內心深處，甚至包括馬英九等今日領航兩岸關係者的內心。因此，如何正視分析並掌握這個壁壘意識的實態，是推進兩岸關係的重要課題。且今天的壁壘意識，根本上是一

個歷史問題，是台灣過去曲折多舛的歷史形構出來的，只有歷史地看待它才能更正確理解它、理解它、拆除它。

從艾青的一首詩《牆》說起

我尊敬的大陸作家周良沛先生所編的《中國新詩庫》第六輯艾青卷中，收錄了艾青於一九七九年歷訪歐洲時，到了德國有感於柏林圍牆而寫下的一首詩《牆》。雖然艾青已辭世多年，但讀起這首詩，使人感覺恰似描寫今日仍在海峽高牆陰影下掙扎的台灣處境，故抄錄於後：

牆

一堵牆，像一把刀

把一個城市切成兩半

一半在東方

一半在西方

牆有多高？

有多厚？

有多長？

再高·再厚·再長

也不可能比中國的長城

更高·更厚·更長
牠也只是歷史的陳跡
民主的創傷
誰也不喜歡這樣的牆
三米高算得了什麼
五十厘米厚算得了什麼
四十五公里長算得了什麼
再高一千倍
再厚一千倍
再長一千倍
又怎能阻擋
天上的雲彩·風·雨和陽光？
又怎能阻擋
飛鳥的翅膀和夜鶯的歌唱？
又怎能阻擋
流動的水和空氣？
又怎能阻擋

千百萬人的

比風更自由的思想？

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

比時間更漫長的願望？

艾青用鮮明、充滿浪漫氣息的詩意象批判了柏林圍牆，真如他在詩中所蘊藏寄寓的願望，十年後柏林圍牆倒了。柏林圍牆真被「牆」所無法阻擋的千百萬人的思想、意志和願望所推倒了。

艾青的《牆》所表現的感情，其實已超越了具體的柏林圍牆，普遍批判了戰後世界到處存在的各種軍事、政治、文化、意識型態上的對立的高牆。特別在戰後因冷戰和內戰而民族分裂對峙的南北朝鮮和海峽兩岸，面對六十年仍難以超克的三十八度線和台海的高牆，這首詩讀起來格外令人感動。

然而，事實上，台海高牆比柏林圍牆還高還厚還長，遠遠超過柏林圍牆；比柏林圍牆更複雜，更難超越，更不容易推倒；也比朝鮮的三十八度線更長更深。因為它不單是冷戰問題，更有中國的內戰問題，況且它不止是戰後問題，還包含有台灣戰前的殖民問題，也就是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問題。百多年來，戰前戰後兩個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和霸權控制，以及中國革命歷史的巨浪，使海峽的高牆更高更厚更長。

日本殖民下的「國界」和「皇民意識」

直到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一九三一年，台灣只是一般的殖民地。一九三七年後有了極端的變化，在日本戰爭總動員體制下，台灣除了日本殖民地身份外，又成了日本南侵的基地以及「膺徵暴支」的決戰體。台灣不但脫離了祖國還被日本軍國主義動員為一個與祖國中國為敵的決戰島嶼。

這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海峽築起的第一道敵對的高牆，在台灣島植入的壁壘意識。

楊逵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前後，寫了《「第三代」及其他》一文，文中有一段提到了當時殖民地台灣與中國隔離的狀況，他說：

住在台灣的我們，在地理和中國只有相隔一天的旅程，這與到東京要花五天的時間相比，中國是相當近的。雖然是這麼近的鄰居，卻因為國家「疆界」的關係，而使我們相隔如天涯……。因此，要花上四、五天路程的東京我已來過許多次，卻從未踏上近在咫尺的中國大陸的土地，真是遺憾！

楊逵在同文中，也間接批評了台灣殖民當局廢除報刊漢文，是劃定「文化疆界」；並批判了當時日漸抬頭的日本法西斯文化——「新日本主義」不但阻礙中日文化交流，還不斷強化中日間的「藝術國界線」。

楊逵在戰爭前夕所批判的是「國家疆界」阻隔了台灣海峽台灣和大陸祖國的往

來，以及日本殖民當局強畫定「文化疆界」的問題。然而，隨後八年日本的侵略戰爭，更徹底改變了台灣島；台灣海峽已遠遠超過了傳統的「國家疆界」，而成為決戰的海峽或要塞化的海峽。在這期間，新日本主義在台灣極端化為高壓的「皇民鍊成運動」，使敵前意識和鄙視「支那」的「皇民意識」深植入台灣青少年的腦海。這些都成了台灣社會日後以海峽為隔的壁壘意識的重要歷史根源。

光復後的「澎湖溝」

日本投降台灣光復後，在「去殖民」的時代潮流中，原本日本殖民歷史所遺留的海峽高牆或皇民化的壁壘意識，應可以順利洗滌摧毀；然而，由於祖國接收當局的顛預無能、貪污腐敗，再加上國共兩黨政治協商破裂再度爆發內戰，終使台灣爆發了不幸的「二二八事件」。結果，不但使台灣「去殖民」的潮流中絕，更加深了省籍的鴻溝，使台灣「良性的中國化」機會逸失。

二二八事件爆發不久，國共內戰日益激烈。同年，南京國民政府宣布進入「動員戡亂時期」，台灣也不例外。台灣社會充滿不安和恐懼，對立和猜忌加深。

這時，在《新生報》的「橋」副刊上，出現了長達一年多的台灣文學論戰。楊逵在論戰中發表的《台灣文學問答》之中，對於這種光復後台灣內部新出現的省籍壁壘意識——「澎湖溝」，有很精闢的看法，他說：

所謂内外省的隔閡，所謂奴化教育，或是關於文化高低的爭辯，都是生根在這裡的（按：指該文前面所說的「台灣的特殊性」）。這是很可悲的事情，但卻是無可否認的現實。「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台灣不能切離中國！」這觀念是對的，稍有見識的人都這樣想，為填這條隔閡的溝努力著。但這條「澎湖溝」（按：指台灣海峽）意指省籍隔閡深得很呢！為填這條溝，最好的機會就是光復初的台灣人民的熱情，但這很好的機會失了，現在卻被不肖的貪官與奸商搞得愈深了。

冷戰、國共內戰和吳新榮、楊逵

當時，隔閡或對立的現象並不單只發生在台灣島或中國大陸，而是普遍發生在全世界。就在台灣爆發二二八事件的時候，美國總統杜魯門宣讀了後來被稱為「杜魯門主義」的咨文，該咨文也被稱為美國的「冷戰宣言」。它使美蘇冷戰成為戰後世界對立的主軸，全世界分化為二個對立的陣營，這是世界性壁壘化的開端。

在台灣，最早感知到戰後世界開始分化對立的人是醫生作家吳新榮；他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八日的日記上曾如此寫著：

今日世界到處都對立；在國際上，蘇聯和美國的對立……在國內上，國府和共黨的對立，此是漢民族能否復興的關鍵，我們都無時不關心。在省內有省外人和省內人的對立，此和國內的政治情形有所關，時間可為解決的主人。在本區內有區長派

和非區長派的對立……。

吳新榮所憂慮的世界對立，終至演變成美蘇冷戰和國共內戰，並且日益嚴重。

經過一九四八年底到一九四九年初的國共三大戰役後，國共內戰進入了隔著長江對峙的局面，國府首都南京危在旦夕。這時全國各省各地方紛紛發起國共和談運動，台灣省亦不例外。恰巧就在蔣介石宣布引退的同日（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大公報》台灣版刊出了楊逵以「台灣中部文化界聯誼會」之名發表的「宣言」（後人稱之為「和平宣言」）。宣言直陳：「深恐戰亂蔓延到這塊乾淨土，使其不被捲入戰亂，好好的保持元氣，從事復興」，因而提出了「消滅所謂獨立以及託管的企圖」、「保障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思想信仰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實施地方自治」等五大要求，該宣言並認為：「我們直信以台灣文化界的理性結合，人民的愛國熱情就可以泯滅省內省外無謂的隔閡」；並呼籲：

不要再重武裝來刺激台灣民心，造成威懼局面，把此比較安定的乾淨土因戰亂而毀滅。

然而，國共內戰不但沒有依楊逵善良的願望發展，甚至朝完全相反的方向進展：內戰的腳步一步步逼近台灣。一九四九年是翻天覆地的一年，首先，二月一日成立了「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三月台灣實施了「出入境管理」；四月南京失守，五月上

海淪陷，五月二十日台灣實施「戒嚴」，六月發行新台幣切斷了與大陸的金融聯繫，十二月七日國府中央倉促從成都遷台北。僅僅一年，台灣就從國共內戰的大後方逐步成為國共內戰「反攻大陸的復興基地」。從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後，台灣各報開始經常刊登「反共宣傳標語口號」，如「反共戰爭乃自由對奴役之戰爭」、「反共戰爭乃民主對極權之戰爭」等等。台灣省政府機關報《新生報》，其社論開始出現如《趕快實行戰時體制》、《學校反共教育的實施》等的內容，也經常出現反共理論家葉青的言論，如《動員民眾反共之理論與實際》之類的題目。獨掌台灣黨、政、軍、經大權的省主席陳誠，從一月上任之際就說：「要使台灣成為一個復興中華民族的堡壘」，上海失陷後他又說：「台灣乃反共鬥爭中之一環」。六月之後，「反共鬥爭體」、「反共文化堡壘」之類的言論充斥於台灣的言論空間。台灣彷彿又回到了一九四四年的「決戰期」。

一直到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之前，在美國「等待塵埃落定」袖手旁觀的中國政策下，國府軍民倉惶敗逃台灣，台灣海峽頓時成為內戰的前線。雖然說台灣已成國府宣傳的「反攻大陸復興基地」，實則恰如太平洋孤舟，正處於風雨飄搖、風聲鶴唳之中。

前引的《吳新榮日記》，在六月十五日如此記道：

台灣完全成了太平洋的孤兒了，雖然由兩地集中多少兵力來台，強固各地為重城

湯池，但最高當局也聲明這百日內是最後的關頭。

就在吳新榮記下這則日記後的第十天，台灣的命運再度遭逢巨大的轉折；也就在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了，二十七日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美國由袖手旁觀轉為強行介入中國內戰，名為保護台灣受攻擊，實則以冷戰凍結了國共內戰。在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上吳新榮如此記道：

美政府說台灣未來的地位尚未決定以前，決定以第七艦隊「防止台灣的任何攻擊」，這樣行動或者可以阻止台灣的危險，以使台灣免受戰火，但我們深恐台灣將來的命運，對祖國有嚴重的影響，我們永久主張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也是中國人的台灣了，為此主張我願意犧牲我一生。

一個在台南鄉下行醫的作家吳新榮，的確感受到了台灣命運的巨變。那就是：美國的行動或許使台灣免於戰火，但他「深恐」台灣將來的命運，「對祖國有嚴重的影響」。他吐露在日記上的憂慮，果然預見了現實世界中台灣將來命運的詭譎巨變。以今日觀之，吳新榮所「深恐」的正是在美國冷戰的介入下，台灣將再度成為對抗祖國大陸的島嶼。

冷戰內戰所形構的壁壘意識

美國的軍事介入，使中國內戰隔著海峽長期對峙，形成割畝而治的狀態；同時，

在美國實質的戰略上，台灣省開始淪為美國在東亞冷戰圍堵中國大陸的前線，這才是吳新榮日記中「深恐台灣將來的命運，對祖國有嚴重的影響」的地方。接著，美國不但以強大的軍力援護台灣島，更以巨額的美援援助和改造台灣的經濟，改變台灣的生活和文化，在外交上支持國府為代表中國的「自由中國」，成為世界反共陣營的櫥窗。自此，美國的冷戰意志通過主導台灣島內的國府內戰政權深入影響台灣社會：數十年間台灣不但成了國府內戰政權「反共大陸的復興基地」，更成了美國在東亞冷戰的前線。此即台灣的雙戰結構。

數十年間，鋪天蓋地的美國冷戰意志和國府的內戰意志，如鷹爪般緊攫著台灣島。冷戰和內戰的複合意志通過長期戒嚴，從政治、軍事、經濟乃至文化、思想、審美層次的意識型態，徹底改變了台灣社會。不但改變了政治經濟體制，更改變了心靈和社會意識。在所謂「政治獨裁下的經濟發展」的歷史過程，國府透過白色恐怖的特務威嚇以及政治思想文化上的控制，對全台灣社會進行徹底的「反共匪」教育，在每一個人的內心築構了堅固的反共、仇共、恐共的堡壘；另一方面，在美國政經戰略的強力影響下，台灣快速走上依賴美日的出口導向的資本主義化，在這過程中，美式的生活、政治、民主觀到審美觀成了台灣的「普世價值」，尤有甚者，台灣竟演變成捍衛「美式普世價值」的堡壘尖兵。兩者複合成台灣意識中特有的深層的反共反中國的堡壘意識。

冷戰和內戰戒嚴下的歷史，不但使日據期的皇民意識以及光復後的「澎湖溝意識」的幽靈繼續留存在台灣社會，新形構的反共反中國意識更進一步強化了它。這種深層的複合的壁壘意識，正是今日仍佔統治地位的「本土意識」的歷史根源，甚至是其實質的基礎。

溫存了壁壘意識的民主化

八十年代前後，以美蘇對抗為中心的世界冷戰體系開始鬆動，中國大陸與美國正式建交，廢除了長期支持台灣島內冷戰與內戰體制的所謂「中美協防條約」。然而，美國為了保持其在東亞的霸權和利益，仍然不願意從台灣縮手，泡製了屬於美國國內法的《台灣關係法》取代協防條約。在這同時，五〇年代以來台灣社會在依賴美日的資本主義化中成長起來的新世代，尤其是新興的中產階級，從七〇年代起挾著美式的民主政治理念開始挑戰國府的內戰戒嚴體制。在美國《台灣關係法》架構下繼續維持著兩岸分隔對峙的局面中，島內黨外民主化運動不斷撞擊著國府的威權統治，終至解除了長達三十七年的戒嚴，隨後高舉台灣意識或者本土意識的民進黨逐漸取代蔣內戰政權；成了台灣政治的主流。

依理，解嚴後民主化的過程，對過去長期支配台灣的意識型態應有徹底的反省和清理。可是，台灣的解嚴實際上只解除了政治上的戒嚴；並沒有發展到文化意識層次的解放。新興的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雖然批判了黨國戒嚴體制，卻不批判戒嚴體制的

意識型態——反共反中國的壁壘意識；八〇年代以後，以本土意識為動力的所謂「民主化運動」雖然反蔣反國民黨，卻繼承、溫存了它親美反共的遺業。政治上，朝向主要以突出省籍矛盾為內容的民主化突進；而在文化思想上，則一路向本土意識和以後現代主義為代表的「後學」邁進，獨獨反共反中國的壁壘意識繼續孵化變身。九〇年代以後，李登輝、陳水扁當政期間，反共、反中國的壁壘意識被轉化為台灣意識或本土意識，成功變身為台灣的新「國民意識」，俗稱主流民意。二十年來，挾著這種主流民意進行的正名、制憲、去中國化的台獨政治路線，又進一步強化並極端化了反共親美反中的壁壘意識。

這種壁壘意識，在台灣海峽築起了一座超過艾青詩中的想像，比柏林圍牆更高更厚、比三十八度線更長千萬倍的高牆。在白色恐怖時期，它不但阻擋了「飛鳥的翅膀和夜鶯的歌唱」，更扼殺了千萬人的「思想、意志、願望」甚至於生命。這二十年來，它不但在台灣社會內部狠狠地劃下一道深深分裂的傷口，且鏈鎖住台灣，禁錮台灣人民的心靈，撕裂民族感情，阻礙著台灣正常發展的能力，使台灣瀕臨亞洲孤兒的歧路。

這就是今天抗拒著兩岸關係的改善，以「本土、民主、主權、人權」為名的壁壘意識的歷史根源。

寄望通過文化的力量

在必將來臨的世界變革潮流中，這個根深蒂固的壁壘意識，必定是台灣未來變革

的主要障礙；事實上，如前述過去半年馬政府推動的兩岸和解交流的政策中，壁壘意識的抗拒和反撲已鮮明地說明了這一點。最近，馬政府以「特殊的非國與國關係」定位兩岸關係；胡主席也說明了兩岸關係非領土與主權之爭，乃政治之爭，而它起因於國共內戰的遺留和持續；指出了兩岸今日的紛爭始源於六十年前的國共內戰和美國的介入，也是今日台灣社會壁壘意識的起源。而六十年來在美國介入和營造的台灣與中國大陸的分離和對峙的基本格局下，在台灣社會形塑的壁壘意識超乎想像的強固，今天又轉化為本土、主權、民主、人權的外貌，頑固地阻礙著兩岸良性的發展和民族健康的和解。而且這個問題不能全寄望於政治解決；只有通過文化的力量，思想的力量。認真看待這個問題，歷史地客觀地掌握它，以熱烈的態度挑戰它，是我們新時代的嚴肅課題。

二〇〇九年一月八日

本文原預定刊載《人間思想創作叢刊》，但該叢刊遭廢刊而未能發表。

戰後台灣精神史的異變

——從民族認同和去殖民問題的視角

從二十世紀九〇年代迄今、亦即後冷戰時期的台灣，所面臨的最深刻的精神危機，莫過於有關民族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危機。政治上，一般稱為統獨問題或統獨矛盾的這個民族認同危機，超越了所有的政治議題，左右著台灣政局；在選票導向的所謂「民主政治」的表象下，起著關鍵作用的卻是「族群政治」或「身份認同政治」。除了政治層面外，在文化、教育、媒體乃至一般人際關係，都隱隱約約地存在著這個民族認同的裂痕。表現在各個具體的、實際的問題上，就是國家認同（state identity）問題、文化認同問題、文學問題、語言問題、省籍問題和歷史問題等等；其中，特別是歷史問題，幾乎都與其他問題相關聯，甚至可以說是這些各個問題的根本問題。而歷史問題的焦點，主要是有關日本殖民統治歷史的立場和看法。

因此，在今天的台灣，對日本殖民歷史的看法或立場，不單單只是一個歷史的認識問題，它還與民族認同的問題糾纏在一起，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譬如，成為台灣當今精神危機一大特徵的「殖民歷史肯定論」，便與某些台灣人的「身份認同」、「民族認同」、「國家認同」問題有很深刻的關係。

而，這個「殖民歷史肯定論」（以下簡稱「殖民肯定論」），便是今天台灣的「去殖民問題」的最典型的代表問題。因此，本文想先通過辯析今日被廣為議論的「殖民肯定論」的這個代表現象，認清它的本質；再進入戰後台灣的「去殖民問題」與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的歷史分析，試圖從這樣的角度來解明戰後台灣的精神史變異的一個面向。

一、殖民肯定論和身份認同倒錯的現象

今年六月間，台灣文學界「大老」葉石濤先生（以下略稱葉先生）在日本的演講中公然表示：日據末的「皇民化」，就是日本人要使台灣「現代化」；葉先生把日本殖民者在戰爭總動員體制中企圖消滅台灣人漢民族意識的精神總動員運動——皇民化運動，予以合理化、美化。這位在演講中也自稱「二十歲以前是日本人」的老作家，在今日台灣文學界有相當的地位。連這樣有代表性的作家，都讚美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是「現代化」，可見得台灣的殖民歷史傷痕的深刻性。

還有，前任「總統」李登輝先生（以下略稱李先生），在一九九四年與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也曾表態說：「自己在二十一歲以前也是日本人」。這種把過去日本殖民統治下實際上是「日本殖民地人」的身份地位，自我轉化成與殖民者同等身份，想像「自己也是日本人」的心態，不但透露了李先生和葉先生對日本殖民歷

史的肯定，更透露了他們對「日本人」的身份認同；雖然，實際上他們從來就不曾是「日本人」，而是日本的殖民地人；更悲哀的，日本人根本從來就不把他們看作是「日本人」。這種心態不只存在於前「總統」李先生和有地位的老作家身上，實際上，在曾受日本殖民統治的年長者心中是相當普遍的。即使殖民後近六十年，在心靈上仍然普遍存在的對殖民歷史的肯定和對殖民者的「身份認同」，這種台灣的特殊精神現象在世界的後殖民問題中也是罕見的例子。

成為日本右翼漫畫家小林善紀的《台灣論》主角之一的李總統先生，在該書中，不但讚美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是「世界上最有良心的統治」、「日本在這裡做了大事」，還自誇因為自己保有「日本精神」才有今天的成就；在年輕的右翼日本人面前，把自己在青少年期受到的日本殖民主義、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教育在精神上的烙印，誇為「日本精神」。同時，在該書中出現的，放懷高歌日本童謠、日本軍歌、讚美日本神話天皇的台灣大資產家，也曾在日本的電視節目上教訓日本年輕人要有「日本精神」；這和李先生要日本年輕人知道過去的日本人「在台灣做了大事」，要學習「日本精神」是一模一樣的。他們不只在心態上自認為成了「日本人」，更荒謬的是，竟然還以「日本精神」的傳承者、捍衛者自居呢？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在台灣的「殖民肯定論」已經超出了單純的歷史認識問題，而在精神上，特別在自我身份的認同上產生了倒錯；在現實的政治立場上，也

就是在國家認同上也就產生了倒錯。怪不得李先在今年九月，利用他仍有的政治影響力，大膽宣稱：「釣魚台（日本稱為「尖閣列嶼」）是日本領土！」，在中日台之間的領土爭議中站在日本的一方。

至於未受過日本殖民統治的戰後世代，雖然他們不若年長者連精神都已「日本化」，但是由於戰後歷史的扭曲，最近他們對歷史問題的態度，也出現了一股殖民肯定論、現代化論，甚至於「感謝論」的逆潮。譬如台灣現任「副總統」呂秀蓮女士，就曾在一九九五年馬關割台一百週年之際，率領百人團到日本下關參拜日本神社，大大感謝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宣稱幸好日本殖民統治，才使得台灣脫離中國而現代化。同樣的現象也出現在由前「總統」李先生在一九九七年幕後推動的中學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該教科書的編者、執筆者也都是戰後出生的學者，然而，該書呈現的歷史觀點，除了「去中國化」之外（排除或淡化台灣歷史中的中國歷史成分），便是一「日本殖民肯定論」、一「現代化論」。

從前面描述的當今台灣表現在殖民歷史問題上的一些代表性現象來看，其嚴重程度，似乎已超越了「去殖民」的論題，而到了單單以「去殖民」的概念都無法概括的程度，幾乎成了精神上的「再殖民」問題了！然而，即便如此，它也只不過是問題的現象而不是本質；實際上，它只不過是現階段台灣精神危機諸相之一，並不是單獨存在的，而是與其他問題一起出現的。簡言之，它只不過是台灣當今更根本問題——民族

國家認同危機，所表現出來的現象。

一一、殖民肯定論和去中國化論——兩面一體

更具體來看，這種對日本殖民歷史和身份認同的異常現象，實際上，是與當今台灣的「去中國化」、「反中國」、「妖魔化中國」的現象並存的，不！可以說是「一體兩面」。譬如，前面提到的文學界「大老」葉先生的演講中，除了主張「皇民化就是現代化論」肯定日本殖民歷史之外，還指責一生反日、反殖，有濃厚中國意識的台灣前輩作家楊逵是「大中國主義者」；甚至連溫和的、有中國情懷的前輩作家龍瑛宗也被他歸類為「大中國主義者」，企圖在台灣新文學的歷史中進行「去中國化」。再如，在《台灣論》中的「李登輝們」，不但稱台灣光復後的去殖民的民族教育為「反日」、「中華民族化」的「洗腦」教育，更以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慣用的反華觀點，譏稱中國為「支那」，嘲笑「支那人」比日本人沒規矩、窮酸、骯髒；並且在政治上要日本人不要為侵略歷史向中國道歉，甚至以釣魚台領土歸屬問題，公然挑釁象徵中國民族意識最敏感的神經。至於持日殖肯定論、感謝論的戰後世代，也經常舉行「告別中國大遊行」，高喊「中國豬滾回去！」，執政黨也利用歷史教科書、甚至在語言問題、政府行政組織改造，在社會各領域進行「去中國化」。

至此，我們可以認識到，殖民歷史肯定論與反中國、反華意識的去中國化論是並

存的，一體兩面的現象；甚至更確切地說，應該是反中國意識起著主要的作用，才併生了殖民肯定論。由此可知，根本上，今日台灣的「殖民肯定論」主要是由於民族感情、民族認同的喪失而產生的民族分離意識，亦即反中國意識反映在殖民歷史問題的現象。而且，很清楚地，它們是今日台灣以民進黨為主流的台獨政治的政治意識型態的特殊面向之一。由此我們可以認識到，今日台灣的殖民肯定論，其本質是屬於政治意識型態，而不是學術思想上的意識型態範疇；就這一點來看，台灣的「後殖民問題」與其他的國家、地區，在性質上有很大的不同。

三、後冷戰時期的台灣政治和特殊意識型態

台灣的民族分離主義政治運動，一直到八〇年代初才在台灣的政治舞台上出現。起初，它與黨外反對運動共同反對國民黨政府的獨裁統治，當時確實有民主運動的內容。大約到了一九八五年前後，隨著國民黨政府向自由化、民主化國際化轉型，台灣社會反獨裁統治的政治迫切性減弱後，它又以動員台灣民眾的「省籍矛盾」，以反外省人來獲取民眾的政治支持。到了本省人李登輝掌握了國民黨國家機器執政後，省籍矛盾減弱，才使今天的反中國論加上日殖肯定論正式躍升為主要政治訴求，而在後冷戰期台灣的文化 and 政治空間成為顯著的現象。它形成的政治經濟背景和動力是這樣的：在世界冷戰走上終結的八〇年代，台灣的經濟經歷了空前的繁榮和膨脹，這使台

灣的資產階級獲得了空前的政治經濟實力：在這個過程中，在美國支持下長期統治台灣的、被冷戰化的國民黨內戰國家，逐漸被原本在其懷中奶大的，一部分本地新興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民進黨和李登輝國民黨所取代。取代老國民黨式的「中國意識」，「本土意識」、「台灣意識」（或本土化、台灣化）便成了這個新興政治勢力的意識型態。所謂本土化、台灣化，並非針對外國霸權反對外國勢力，追求民族自主立的意思，而是在內部，是針對大多由外省人組成或有外省人意識的政治集團；對外部，則是針對中國大陸「和平統一」攻勢的反中國意識。這個以「本土意識」、「台灣意識」為名，而實質上是進行「去中國化」、「反中國」為主要政治訴求、主要政治意識型態的新興政治勢力，便是通稱「台獨」的民族分離主義。它的政治意識型態，反映在殖民歷史問題上便是日殖肯定論。隨著它們的執政，這個特殊的政治意識進一步被政治權力打造成「國民意識」，擴大它的社會影響力。當然，就如美國在冷戰期以操弄反共、反大陸的國民黨獨裁政權來圍堵中國大陸，完成它的冷戰目標一樣；在後冷戰期，以反中國為職志的分離主義政權的出現也是美國樂見，樂於把它當做對付中國大陸的棋子。

可見得，作為台灣的民族分離主義政治意識型態一面向的「殖民肯定論」，是九〇年代以後的後冷戰時期，這個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才出現的特定意識，才產生的精神異變。這只要檢證一下它的代表人物李先生、葉先生，在九〇年代以前的冷戰期，強

烈的中國意識（雖然有濃厚的國民黨式中國意識的成分）言行便可知。

在台灣光復初期，青年李登輝曾加入中共在台灣地下黨；冷戰期，他在國民黨的美援機構工作是美援官僚，其後，在保守的國民黨政組織中往上攀沿，從頭到腳是國民黨的忠貞黨員；至少一直到八〇年代中末，從蔣經國「總統」手中接過政權為止，他是一個典型的國民黨式的中國意識者。至於台灣文學界「大老」葉石濤，從他的著作言論來看，至少到一九八五年之前（六十歲之前），也是一個今天他自己批判的作家楊逵的「大中國主義者」；譬如在一九七七年的一次《光復前台灣文學座談會》上，對於台灣的新文學運動的歷史，他是這麼說的：「光復前的新文學運動是屬於抗日民族新文學運動中的重要一環……那便是推翻日本人的殖民統治，獲得解放和自由，重歸祖國的懷抱。因此，台灣新文學運動始終是中國文學不可分離的一支流……」；這時的葉石濤是典型的抗日反殖的復歸祖國派（中國派）。另外，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著作《文學回憶錄》中，有一篇徹底反省自己年少在皇民化時期的文學思想和活動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說：「這種錯誤的見解，來自我的意識型態的不明確；那時我還未能確立堅定的世界觀，我的思想裡充滿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遺毒，一直要到台灣社會發生巨變——即台灣光復，回歸祖國懷抱，脫離殖民地的枷鎖，接受來自大陸的各種思想形態，讀破了五四文學運動以後豐繁的文學作品以後才扭轉過來」。這句話，明確地表達了一種去殖民復歸祖國的中國意識，有強烈的中國認同；其實這種想法，在當時，不只是

葉石濤一個人的想法，而是包括李登輝在內的大多數台灣民眾的普通想法。然而，今天看來，在葉石濤說這些話時內心幽微的角落中，還有，李登輝在蔣經國面前只敢把屁股的三分之一坐在椅子上的恭謹外表下，內心暗處的精神世界似乎都已開始產生異變。

可見得，如葉石濤形容的，把他從「思想裡充滿著軍國主義教育遺毒」扭轉過來的「台灣光復，回復祖國懷抱」的歷史，是一次徹底的去殖民化的歷史；然而，其中卻已含有「去殖民化」的挫折因素，否則就無法解釋九〇年代以後，葉先生又「扭轉過去」的精神異變了。這曲折的歷史過程，當然也是他所看不見的。

四、復歸祖國的明暗和去殖民問題

從一八九五年中國由於甲午戰敗割讓台灣後，台灣人民的抗日反日反殖運動無一日稍戢，可說前仆後繼、壯烈可泣。直到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運動才被鎮壓下來後，但是從事反殖、反日運動的人紛紛轉往中國大陸投入全中國的抗日戰爭；因此「保衛祖國光復台灣」便成為運動的新目標。也就是，把台灣的反殖反日運動匯合到全中國的抗日戰爭，並在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中，追求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復歸中國；這個運動一直進行到日本戰敗台灣光復。

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舉行了中國戰區台灣省受降典禮；在盟軍代表

以及台灣各界代表的觀禮中，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從日本在台末代總督兼台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手中接下受降書，隨即宣告：

從今天起，台灣及澎湖列島，已正式重入中國版圖，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於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權之下。

台灣正式脫離日本的殖民統治，並復歸為中國民族國家的一省。在經濟上，也全盤接收了日資、日產，使原來的殖民資本徹底成為民族資本（不論它成為公營或私營也好）。在台灣的近五十萬日軍、日人也成為「日僑」身份，被分批遣還日本。對於這個台灣光復的歷史重大意義，在日據期就以詩集《荊棘之路》出名的前輩作家王白淵，曾有力地形容道：「台灣之光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還有，當時任「台灣光復慶祝大會」（在台灣省受降典禮後舉行）主席團主席的林茂生博士，在《祝詞》一文中生動地說明了他對台灣光復的喜悅之情，他表示：「在光復共慶之秋，有三大發見」，一是，「發見我是人，是自然人」（即，已不再是殖民地人）；二是，「發見社會」（發現有了自己的民族社會）；三是，「發見國家」（發現有了自己的民族國家）。在光復後的一年中，台灣文化的重建也是官民的共同目標，它包括對過去殖民歷史的批判，對過去台灣人民抗日反殖歷史和人物的紀念、表揚，檢舉漢奸，檢肅焚毀有宣傳日本殖民主義、軍國主義內容的書籍，推行中國白話和台灣

方言，回復傳統漢民族生活、習俗……等等。並且，在光復後不滿三個月就舉行了普選，成立了台灣各級議會，還進一步分別選出了台灣的參政員和台灣省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全中國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和「國民代表大會」以及制憲國民代表大會；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行使了參政權。光復後的第一年，台灣人民的民族認同和復歸祖國的現實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去殖民化的工作順利。

然而，在復歸祖國徹底「中國化」的「歡天喜地」的現象下，卻已潛藏著兩方面的重大隱憂：

一是長達五十一年日本殖民統治後的遺害問題，另一則是國民黨政府的半封建半殖民性格的問題。這兩個問題，對光復後的台灣歷史的發展產生基本的、結構性的重大影響。台灣雖然在「政治」上脫離了日本殖民統治而光復了，但日本殖民所遺留的問題仍深刻存在，殖民地社會的性格仍左右著台灣，光復的熱潮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這個客觀存在的事實。而國民黨政府的民族國家的外表，也將隨著光復的狂喜消褪，逐漸顯露出它的半封建半殖民的性格。實際上，這兩大問題也可看做一個問題，那就是，被高度殖民化的台灣社會，忽然復歸到帶著半封建性格的國民黨政府所產生的巨大矛盾，這個矛盾將是光復後逐漸出現的諸問題的根源。

就第一方面而言，台灣光復後首先必須面對的，就是殖民統治的歷史對民族文化和民族語言的破壞和社會結構殖民化的問題。雖然這是全世界所有殖民地在政治剛解

放時都會面臨的問題，然而，這問題在台灣尤為嚴重。因為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除了實施一般的同化政策外，在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的殖民後期（一九三七年以後），為了遂行它侵華的總體戰，不但強制台灣人民在舉止、習俗、信仰、語言乃至各生活細節「皇民化」，甚至灌輸日本的軍國法西斯思想，企圖造成台灣人民與中國大陸人民同一民族之間的隔閡、對峙與齟齬。這個問題給光復後的台灣社會帶來深刻深遠的影響。這就是光復後一般言論中經常指出的，日本的殖民「毒化」、「遺害」的問題；甚至殖民後五十餘年的今天，這問題仍然夢魘般困擾著台灣社會。

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光復一週年出版的《新知識》上，作家楊逵寫了《為此一年而哭》，說道：「哭民國不民主、哭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未得保障，哭寶貴的一年白費」；作家賴明弘在同刊上的《光復雜感》一文也說道：「現在對『光復』不僅不感到興奮，反而個個都有點近於『討厭』的情緒……由狂歡而失望了，而痛哭了，甚至而『排斥』了」。

使楊逵、賴明弘痛哭、排斥的光復一年後的台灣現實是怎麼樣的呢？

在政治上：貪污、腐敗、顛預無能、不重用本省人、要職幾乎全為國民黨獨佔、甚至起用日本人和日據期舊御用仕紳。在經濟上民族經濟重建困難：生產停頓、失業恐慌、物價飆漲、投機橫行。在文化思想上：言論自由受限制、國內進步刊物被禁止進入台灣，實施新聞檢查。以上這些問題，表現在一般的社會生活中便是「省內省

外隔閡」日愈嚴重。以上光復後現實的急速惡化，與光復初時的昂奮期待有太大的落差。而使作家楊逵、賴明弘痛哭。

可見得光復後一年，台灣已開始由當初的「歡天喜地」跌落到「呼天搶地」的地步，台灣社會產生了嚴重的「省籍矛盾」，台灣人與大陸來台的官民之間的對立意識日漸深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來台就任當初，所榻檮的政治、經濟、心理的三大建設目標中，其中的前二項，雖然在政治上腐敗、在經濟上重建困難，但基本上已完成了去殖民、民族化初步的目標，只有心理建設，亦即民族意識的重建（精神的去殖民化，同時祖國化、民族化）受到了嚴重的挫折。結果，由於殖民後的社會衰竭、戰後的蕭條，再加上國民黨政府的封建、腐敗、無能的統治，以及國共內戰的影響等複合因素，終於激化了省籍矛盾，爆發了一二一八事件。國民黨軍隊在事件中的鎮壓、屠殺、更加深了民族內部的傷痕。台灣民眾對國民黨政府的不滿、恨意，使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民族信心喪失；特別是對剛從日本長期的殖民統治下復歸祖國不久的一般台灣民眾而言，亟待長期重建民族意識之時，卻遭逢二二八事件打擊。眼見祖國軍隊的鎮壓，由於對復歸祖國的失望，斲喪了民族的信心而使殖民意識再度復活，這是不難想像的。另一方面，許多台灣的進步知識分子透過大陸的進步知識，早就認識到台灣光復後的各種矛盾衝突其本質並不是省籍問題，其根源是國民黨的半封建而帶著官僚主義性格的統治體制問題。並且他們認識到，這問題不是台灣單獨的問題，而是全中

國普遍存在的問題，因而台灣的問題應放在全中國範圍去解決。因此二二八事件後，這些知識份子由於對國民黨政府的徹底絕望，而毅然投入全中國的民族民主解放洪流，投向紅色祖國對抗白色祖國，而不是喪失民族信心滋生殖民意識。

在這同時，美國與蘇聯的對立也日漸尖銳，世界朝向兩極對立的冷戰發展。在美國調停國共內戰失敗後，其對日佔領政策大右轉，轉向扶植日本戰前保守勢力的復興。本來戰後台灣的「去殖民」，是以復歸祖國的方式，在國民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民族化、中國化、民主化；然而，由於國府統治的失策，造成了去殖民的第一次挫折。這時如何重新組合原日本帝國勢力的大東亞共榮圈，逐漸成了美國東亞政策的重心；因此，在麥克阿瑟的眼中曾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便成了美國東亞戰略的重要島嶼。在二二八事件的前後，美國利用台灣民心對國府的不滿絕望，開始暗地底扶植少數徹底喪失民族信心的本地資產階級的分離主義勢力，並散播「台灣地位未定論」和「台灣托管論」，這便是台灣分離主義的起源。另一方面，美國也利用支援國民黨政府打內戰，在台灣大事修建軍港和空軍設施，並且，在背後促使日台恢復經貿關係。美國在韓戰爆發之前，在東亞冷戰形成的過程，早就企圖用「兩手策略」把台灣掌握在它的手中。

五、東亞冷戰體制和台灣的民族分離意識

韓戰爆發後第三天，美國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用武力介入中國內戰，使台灣

落入美國在東亞冷戰的勢力範圍，自此，台灣與中國大陸長期處於隔離和對峙的局面。就歷史結果來看，正是這個美國以日美安保和日美經濟為重心的東亞冷戰體制，以及做為這體制一組成部分的「被冷戰化」的國民黨國家，所製造的兩岸民族分離和對峙局面，和對島內的政治獨裁、經濟對美日依扈的歷史結構，才是使台灣社會內部的民族分離意識和其面向的殖民意識滋長的真正原因。

被冷戰化的國民黨國家聲稱代表正統中國，以通稱「法統」的意識型態和國家機器來維持對島內的一黨獨裁，並以大陸的威脅和「反攻大陸」為藉口，在台灣繼續維持內戰狀態（所謂「動員戡亂時期」），而進行長達三十七年，史無前例的反共戒嚴狀態。在這個長期的被冷戰化的國民黨政權下，完全改變了台灣社會歷史。五〇年代大規模的白色恐怖風暴，肅清了從日據期成長起來的反日反殖的一代，隨著也肅清了進步的社會科學、美學和思想感情，使台灣的社會意識落後停滯，甚至退化，阻礙了從客觀角度再認識民族問題的能力。再由於長期間民族隔離下，刻意製造的反共、反大陸、鄙視仇視中國大陸的政治宣傳，造成了台灣人民對中國大陸的畸形意識，對中國大陸的恐怖、黑暗的印象深植腦海，扭曲了喪失了民族同胞的自然感情。還有，雖然國民黨政府為了維持統治，積極在台灣灌輸國民黨式的民族精神教育，但是，由於其政權的壓迫性，由上而下的封建的教條式的內容，即便維持了一定的民族意識，但終究是表面的，不穩定的；特別在七〇年代以後，由於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影響，聲稱

代表正統中國的國民黨政府被排出聯合國之後，聲稱代表正統中國的國府對台灣的統治合法性開始鬆動，國民黨式的民族主義神話受到嚴重的質疑，受到嘲笑。國民黨式民族教育的破滅，再加上國民黨政府一手造成的對中國大陸的畸形意識，加速了台灣民眾民族信心的喪失，使民族分離意識滋生。

同時，東亞冷戰的另一面，便是以日美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的進一步發展和擴張；國民黨政府也在這結構下，進行了依扈日美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使台灣的本地資產家順利地在美日台三角經貿體系中得到快速的資本積累，而在短期間成長為台灣社會新興的、主要的階級——資產階級。他們大多數原是日據期的地主、仕紳或是在日本侵略戰爭中受過日本軍國主義訓練的青少年，在國民黨政府的政治獨裁經濟發展的統治下，只有投身企業發展；而且，在嚴密的思想戒嚴以及語言問題中，使他們只有透過日文閱讀吸收外部的新資訊，因此，日文成為他們認識世界形成人生觀和知識成長的途徑。由於日常的日文思考和日文意識，再加上實際上與日本經濟的緊密關係，在他們的資本積累和經濟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就容易成為他們精神形成歷程的「內地」；就如後殖民主義理論先驅法農（F. Fanon）所指出的：

殖民地人不得不從殖民者的語言去形成關於自身獨特的意識，無法樹立自己的身份。

對他們來說，台灣與日本在政治、經濟關係上雖然緊密，但在民族國家關係上，日本畢竟是異國；然而在精神關係上，卻仍舊維持著「內地」與「外地」的關係。

同時，對他們來說，在他們心目中，台灣的舊國民黨中國早已破產，而且由於前述國民黨政府所埋下的對中國大陸的畸形意識的作用，中國大陸也已成爲他們的「異地」、「異國」；再加上兩岸經濟生活落差所生的「優越感」，更阻礙了他們的民族認同。這些複合因素，造成了民族認同的喪失，因而促成了民族分離意識，這便成了在政治上追求新而獨立的國家——台獨政治的現實社會基礎。

更重要的是，在後冷戰時期成爲單極超強的美國，在制霸世界的野心中，如何繼續操控台灣問題來對付快速崛起的中國大陸，仍是它的重要戰略行動；因此，在台灣出現一個反中國的民族分離主義政權，當然是美國樂見也是樂於操弄的；就像在冷戰時期，美國操弄反共反大陸的國民黨獨裁政權一樣。在這同時，在後冷戰時期急速浮上的日本右傾勢力，從學術、文化到經濟、政治各層面，也積極與台灣的民族分離主義交往，支持和利用，更加強了「日殖肯定論」的風潮。

這便是促成和支持台灣的民族分離主義的國際勢力。

結語

由上分析可知，做爲台灣當下精神危機一面向的，以「殖民肯定論」爲代表的台

灣「後殖民」問題，其本質是後冷戰期台灣的民族分離主義的政治意識型態之一。它與反中國意識是一物的兩面。同時它與日本的右傾勢力互為唱合，構成了後冷戰時期，日台之間顯著的共同現象。

台灣的民族分離主義起源於戰後初期台灣復歸祖國的挫折歷史，並在東亞冷戰體制下長期的民族分斷和對立歷史中，成為潛在的結構性意識，而在後冷戰期發展為統治性意識。它是民族自信喪失和民族認同異變的表現，它不但是百年來中國民族自求解放的挫折的傷痕，更是近百年來東亞的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把台灣從中國分離的歷史後果。

今天台灣的「殖民肯定論」，是在新殖民主義條件下對前殖民主義的肯定和讚美；可見得，東亞的新殖民主義和前殖民主義之間，有它傳承之處，不但不是斷裂，甚至可以說，新殖民主義是前殖民主義的進一步發展和擴張。而今日台灣的民族分離主義的「日殖肯定論」，可以說是台灣的殖民主義幽靈，在新殖民主義產兒身上的復活。

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一日脫稿

本文發表於二〇〇二年十月十七日—二十日，第六屆

「東亞冷戰與國家恐怖主義國際研討會」

韓國麗水大會（朝鮮麗順事件54周年）論文

「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

——對陳芳明戰後文學史觀的批判

去年（一九九九年）的《聯合文學》八月號，刊登了陳芳明先生（以下禮稱略）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建構與分期》一文。該文開宗明義就強調了他欲建構的台灣新文學史所依據的「台灣史觀」和「台灣社會性質」論的重要性；並依他的台灣史觀的架構簡要論述了他的台灣新文學史。可見得台灣史觀對於他的台灣新文學史有關鍵性的作用，決定著他的台灣新文學史的好壞對錯，值得重視。對於他的台灣社會性質論，陳映真先生已有很犀利的批判，不再贅言；至於他的「台灣史觀」，本文認為不論在知識上、事實上或認識上都有很大的問題，有必要進一步提出來辯正。

他欲建構的台灣新文學史所依據的「台灣史觀」，也就是他的台灣新文學史的歷史分期，簡單地說，就是把近百年來的台灣歷史劃分為：日據殖民期（一八九五—一九四五）、戰後再殖民期（一九四五—一九八七）以及解嚴後殖民期（一九八七—）的三個時期。這種似曾相識的史觀，顯然是把台獨理論宗師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稍加改造後，在文學史上的運用。它的最大特點，便是把戰後國府統治下的台灣跟戰前日帝殖民統治下的台灣等「質」齊觀，都視為「被殖民時期」；並且認為直

到解嚴或李登輝登台以後，台灣才從漫長的「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進入所謂的「後殖民時期」。顯然，它的重點就在「戰後再殖民」論，主要在突出戰後的台灣乃是在國民政府「殖民統治」下的「殖民社會」，這樣的中心觀點。本文主要針對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從社會科學、台灣歷史和文學的角度，進行批判。

一、背離社會科學和台灣社會歷史的「殖民」論

簡單地說，陳芳明所欲建構的台灣新文學史的歷史架構，其核心便是「台灣殖民論」。大家都知道，「殖民歷史」早已是世界史中的常識，「殖民理論」也早已是社會科學的範疇，一門重要的學科。依常理，只要有關殖民的論述，不管在概念上或事實上，決不可偏離社會科學的規範。然而，在陳芳明的「台灣殖民論」中，卻找不到一點與社會科學上的「殖民」概念有任何的關連之處；他所指的殖民統治的內容也曖昧不清，充其量只反覆舉些如國語政策、價值壟斷、霸權論述……等擬似殖民其實根本不是殖民的論點。因此，使他所欲建構的台灣新文學史的歷史架構，充斥著殖民的字眼和話語，但卻與社會科學上的「殖民」概念無關，更與客觀的台灣社會歷史（特別是戰後史）背離。

（一）社會科學上的「殖民」概念

現當代史的「殖民」始於十九世紀中末，此時，西方各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已

從自由競爭階段進入壟斷階段。少數巨大壟斷資本獨佔了國內市場，資本運動的規律使它必得跨越國界，把全世界都納入它的擴大再生產的範圍；為了攫取原料、爭奪市場和資本輸出地，各國紛紛以帝國主義的手段對落後地區的弱小國家進行侵略和殖民統治。因此，首先要認識到，現當代史中的「殖民」是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壟斷期的產物；壟斷資本在世界範圍的經濟掠奪是它的本質，政治上的支配或文化上的歧視是它的手段，它的表象；物質世界的掠奪是它的第一要義，精神世界的掠奪是它的第二要義。陳芳明的「殖民論」的最大問題，就是把「文化殖民」當作殖民本身，而看不到現當代殖民的本質（何況，他的文化殖民說也是虛構與知識不足的產物，這問題在後面有深入的分析），也就是說殖民之所以成為殖民，它的核心，是在經濟的掠奪問題。

進入二十世紀，世界也進入了帝國主義的年代。這個世紀的前半，全世界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土地都曾淪為帝國主義殖民地；因此，「殖民」已成為全世界人民共同的重要歷史經驗，當然，反殖民或去殖民更是重要的共同課題。這些經驗和課題，早已成了社會科學的範疇。因此，一個社會是不是「殖民地」，某政權是不是「殖民政權」、是不是「殖民統治」，有它的知識上的客觀判定基準，不是可以像陳芳明那樣憑主觀臆想或意識型態，用「有那麼嚴重嗎？」的態度任意建構的。

因此，論說現當代史的「殖民」問題時，最起碼要從下面的基本概念出發：

1、「殖民者」（宗主國）必然是一個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它為了維繫自國壟斷資本的擴大再生產，以帝國主義的手段對外侵略或進行殖民統治。

2、殖民者為了遂行從殖民地榨取經濟利益的目的（這是殖民統治的本質，也是判定是否「殖民」的基準），在殖民地強制施行各種軍事、政治、社會、文化的殖民主義政策。殖民地人民被剝奪了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各種權利，致使民族經濟衰敗，完全從屬於殖民資本而無法自立；民族文化也逐步淪喪而無法自主。因此，殖民地社會的主要矛盾，表現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的民族矛盾。

接著，我們不妨以上述的「殖民」概念，簡單地檢驗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的荒謬。

（二）是「資本主義化」不是「殖民地化」

如果，戰後的台灣真如陳芳明所說的是「再殖民時期」，國民政府是「殖民政權」。那麼，依前述社會科學有關現當代「殖民」的概念來看，國民政府不但成了外來政權，甚至成了一個殖民台灣的帝國主義國家；台灣的「光復」也成了帝國主義中國對台灣的侵略。顯然，歷史的事實並非如此。一九四九年底遷逃台灣的國民政府，已是一個失去了大陸的江山（包括它的政權、土地、人民、財富和軍隊）的逃亡政權，連自身的生存都不得不依賴美國保護，怎會是帝國主義國家呢？而且，如果國民政府是「殖民政權」，它必定對台灣進行吸血式的殖民榨取，被殖民的台灣本地資本

根本得不到發展，本地的經濟也必定走上衰頹依附的命運。然而，歷史的事實卻非如此。正好相反地，台灣的社會經濟快速地走上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台灣本地資本也在短期間得到了巨大的積累，同時快速地改變了台灣社會的階級結構，台灣的新興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很快地登上了社會的主要舞台，掌握了台灣的物質和精神的統治權；最後，國民黨政權卻像完成任務的朝露般地，毫無掙扎地讓位給了台灣的本地資產階級。這明明是「資本主義化」的過程，絕不是什麼「殖民地化」的過程。

再設若，戰後的台灣，真如陳芳明所說的是「殖民地社會」的特徵，它的主要社會矛盾就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間的民族矛盾；那麼，戰後台灣社會內部（注意：我指的是社會內部，外部非本文討論範圍）到底是那一個殖民民族對那一個被殖民民族之間的矛盾呢？在台灣，省籍矛盾（它並不是社會矛盾的本質）是有的，但民族矛盾，除了漢族與原住民族之間的矛盾（何況那更是社會內部的更次要的矛盾）之外，真是點著燈也找不著。如果台灣是國民政府統治的「殖民地社會」，那麼戰後迄今的反國民政府的運動，不都成了反殖民壓迫的「民族解放」運動嗎？任誰都知道這是荒誕無稽之談。對於戰後的台灣反對運動，陳芳明不也稱之為「民主化運動」嗎？既然是一「民主化運動」，它的本質就是民族國家內部資本主義形成期的反獨裁專制的資產階級的民主運動，而不是什麼反殖民統治運動。可見得，國民政府的統治本質是民族內部的「反共獨裁」，而不是異民族的「殖民壓迫」。「戰後再殖民」論純屬向壁虛

構。

由上述的簡單推論可知，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一點也禁不起社會科學的檢驗，只不過是意識型態的產物，完全與戰後的台灣社會歷史無關，不！根本就是顛倒是非。

一一、錯亂的「殖民統治」說

歸納陳芳明再三指陳的國民政府對台灣「戰後再殖民統治」的內容（也就是他的殖民統治說），包括有下面幾種話語：

1、在文化上：國語政策、語言文化的歧視政策、中原取向的民族教育、對「台灣歷史」「台灣文學」的打壓等。

2、經濟上：壟斷式的金融資本、專賣制度。

3、權利關係上：價值壟斷、威權支配、霸權論述、權力控制……等。

這些到底是不是「殖民統治」，下面將逐條辯析。

（一）殖民主義的「國語政策」和去殖民「國語政策」

眾所周知，統一的語言——國語，是現代民族國家的主要特徵之一；但它並不是自然天生的，而是現代民族國家建立的過程中「強制」的結果。譬如，今天的日本國國語，就是在明治國家的形成過程中，以國家的權力強力排除日本各地的方言，以

「東京便」(東京)方言為國定語言的結果。總之，任何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國語，都難免烙印著「強制」的痕跡。

特別是曾遭受帝國主義侵略和殖民統治的國家，由於民族語言曾遭到極大的破壞而淪喪，在脫離殖民統治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國家語言的建立更備嘗艱辛；就不得不採取語言上的「去殖民」政策，以民族主體的國家權力為後盾，對已內化的殖民者的語言進行強制性的排除，這就是強制性的國語政策的本義。在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這種強制性，除了表現在國語政策上外，諸如：國民教育、度量衡或貨幣的統一、市場的統一、民族經濟的扶植與形成等，莫不是「強制」的過程。如果依照陳芳明的殖民邏輯，這些「強制」豈不都成了「殖民統治」，那麼，世界上的民族國家豈不都全部變成了殖民國家。

其次，要區別殖民者所強制的「國語政策」和民族國家的「國語政策」在本質上的不同。特別是在台灣的近百年歷史中，曾經有過兩次的「國語政策」；在日據期，日本殖民者所強力推行的所謂的「國語政策」(特別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以後)是企圖消滅民族語言推行殖民者的語言的政策，因此，是殖民主義的「國語政策」；它與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且復歸中國的「光復」後，推行的「國語政策」，在字面上雖然相同，但在性質上是截然不同的；不止不同，根本是相反的。前者是殖民主義的、軍國主義的語言政策，而後者則是去殖民的民族語言政策，不得任意顛倒。陳芳明把

這個光復後的「國語政策」等同於日據下的「國語政策」，以做為他的「戰後再殖民」論的論據，就是利用一般人對史實的不熟悉，刻意掩蔽語言的實質歷史意義，再運用語言的表象以達到顛倒歷史是非的目的。

(二) 光復初期的「國語政策」——推行國語與恢復台灣話並進

「國語政策」和「語言文化的歧視」，一直是被陳芳明並舉為戰後再殖民的論據。他所指的「語言文化的歧視」，主要是指在推行國語的同時所造成的對台灣話的歧視。推行國語是不是一定會歧視台灣話，要視實際情況而定；而且，到底是一「強制」還是一「歧視」，完全是主觀的認定。但是，徹底普及國語的結果，會使台灣話屈居地方方言的地位，這是可以確定的。然而，光復初期的「國語政策」卻不是這樣的，當時面對殖民者語言——日語的強大壓力，也就是，日本殖民統治的「國語政策」的結果，使台灣人民幾乎喪失了說台灣話的能力，特別是戰中世代更為嚴重，因此，當時推行國語與恢復台灣話是相輔並進的。

光復初，在行政長官公署的機關報《新生報》上，曾刊載過兩篇有關語言的文章：一篇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八日的社論，題目是《國語問題》；另一篇是國語推行委員會副主委的何容先生的專論，題目是《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一九四六年四月七日）。雖然前一篇的主要內容是有關推行國語的問題，後一篇則是談論如何恢復台灣方言的問題，但兩者都同時觸及了推行國語與台灣方言的關係。何容先生在

文章的開頭便直接說道：

「推行國語不必，也不能，把方言消滅」，爲什麼？

他說：「因為國語本身也是一種方言……是同系的語言。推行同系的語言的一支派，來消滅另一支派，是不可能的。而且，正像保存方言能幫助國語的推行一樣，推行國語也能幫助方言的保存。」

而在《國語問題》一文中，對於台灣話，它是如此看待的：「我們可對不同方言的同胞，加以歧視嗎？不可以的，所謂台灣話——福佬話，實際就是中國話……台灣話是中國話的一種，完全是中國話，我們這種話，比中國國語所帶漢族的古音更多，訕笑『蠻南缺舌之人』是錯誤的。」

對於國語的態度，它是這樣看的：「我們應該學習國語，爲什麼呢？中國通用國語的人最多，面積最廣，可以說已通用全國，做一個中華民國的國民，福建人廣東人也在學著國語。國語是我們自己的語言，要懂。懂是應該的，並不光榮，不懂也並不是可恥……政府對台灣話不會禁止使用，或企圖消滅它，因為台灣話也是一種有國魂的中國話。」

對於台灣話，何容先生進一步認為：「一種方言在它自己的本區域內，應該是日常生活上的用語。」但是，台灣光復初期的情形卻是「自政府機關學校，以至於一

般社會，還多是用日本話」，「這誠然是便利」，但這種便利是「不合理的」。因為「台灣話受日本話強力的壓迫，同我國其他區域的方言相比，已經喪失了它應有的方言的地位」。因此，他呼籲「現在本省推行國語固然很重要，同時我們應該設法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

而為了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何容先生倡議：「第一：凡是可以台灣話的時候，都用台灣話，不用日本話。第二：從內地來的不會台灣話的人，應該學習台灣話。」

從上述兩篇光復初有關「國語政策」的專論可知，當時的「國語政策」是與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相輔相成的，推行國語與保存方言是互利並進的，只有兩者並進才能減少殖民者語言——日語在台灣的影響，絲毫沒有對台灣話「歧視」的問題，甚至鼓勵要恢復台灣話的方言地位。它的特色，在共同向殖民者的語言奪回民族語言（國語和台灣話）的主權，也就是「語言的光復」，套一句流行話就是「語言的去殖民」主義。

可見得光復初期的「國語政策」，在對待台灣地方語言——台灣話的主張上，是科學的、進步的和民主的。它主張「台灣話也是一種有國魂的中國話」、是古漢話，呼籲要把它從被日語壓迫的狀況下解放出來，鼓勵以台灣話破除日語的霸權地位，以恢復它地方語言應有的功能和地位。並且它一點也沒有「中央」心態，反而以一個國

語推行委員會成員身分，要求來台省外人士也要學習台灣話。這就是「國語政策」的本義，這種具有科學的、進步的、民主的精神的，民族主義的「國語政策」，陳芳明等的刻板、僵化、顛倒的「台灣史觀」當然是看不到的。

(三) 誇大光復初期台灣作家的語言障礙的謬誤

光復剛滿一年，行政長官公署就實施了報刊禁用日文的政策；這個政策在當時確實引起了不少的反彈。誠然，它是不科學也是不民主的作法。特別是，對於在戰爭期間（或皇民化時期）受教育、成長而登上社會舞台的年輕人來說（所謂的「日語世代」），確是不小的衝擊。但是，全面誇大它的衝擊，只強調它的負面而看不到它的正面，甚至否定它到了站在維護殖民者語言的地步，則不可取。

陳芳明把光復初的這個禁日文政策對台灣文學的衝擊，誇大成使「日據期的新文學傳統又遭逢另一次斷裂」，以及使「本地作家變成無聲的一代」。但是，他對一九三七年日本殖民者廢止中文的影響，卻淡化成只是「語言傳統的斷裂」。實際上，後者才真使以中國白話文為主要文學表達工具而成長起來的台灣新文學，受到致命的打擊；它不只使語言的傳統斷裂，更使台灣文學的精神傳統斷裂；當時，維繫台灣文學的兩刊物《台灣文藝》和《台灣新文學》被迫相繼停刊；白話文作家，如賴如、陳虛谷、楊守愚、朱點人等人，因拒用日文而封筆，作家失去了文學園地，一直到一九四一年日語的《台灣文學》的出現，前後四年台灣的文學幾乎處於空白的狀

態。而《台灣文學》（季刊）也只不過存在一年半的時間，甚且，在「文學奉公會」皇民文學的打壓下，台灣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瀕臨危機。由此觀之，一九三七年殖民者禁中文，對台灣新文學的打擊，並不僅止於「語言傳統的斷裂」，根本就是「文學傳統的斷裂」。

台灣光復後，第一年，報刊雜誌如雨後春筍，言論出版呈現難見的榮景。文學創作和評論也逐漸恢復，特別是重回中國文學的大潮流後，中國現代文學的作品大量流通於台灣，對台灣文學起了很大的影響。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報刊禁用日文的政策，對文學環境並沒有產生立即的大影響，應該是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台灣作家思想感情變化和內心的恐懼。但是，整體而言，事件後不及半年，以報紙副刊為中心又逐漸恢復了文學活動，只是，許多台灣作家逐日消沉或淡出文壇。

其次，不能把兩者等「質」齊觀；因為一九三七年的廢止中文，性質是消滅民族語言的「殖民主義」政策，而一九四六年的禁止日文，則是為了排除殖民者的語言以恢復民族語言的「民族主義」政策，兩者有本質上的差別。是要站在殖民主義者那一邊呢？還是要站在民族主義者這邊？

再說，報刊禁日文的政策，與「本地作家變成無聲的一代」也沒有必然的關係。也就是說，把光復後的語言障礙誇大到使「本地作家變成無聲的一代」的說法，是錯誤的。應該就各別的作家來看：譬如，光復後，同屬日文作家的楊逵，就用各種方

法克服了語言的障礙，積極從事文學活動，直到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前夕為止；很多沒有語言障礙的作家，如王白淵、賴明弘、張深切等人，雖然在光復初十分活躍，但二二八事件後就逐漸消沉了；像日文作家呂赫若、張冬芳，在光復不久，很快就克服了語言的障礙（一年內），重新出發開始創作，但隨著時代矛盾的深化，他們也與作家徐瓊二（淵琛）、朱點人一樣，都直接投身了台灣的中共地下黨，參加了全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洪流而犧牲了，當然不會再有文學聲音了。還有，也要看到當時以「銀鈴會」為中心的一批青年作家（真正的「日文世代」），如林亭泰、張彥勳、朱實……等，在短短一年內就克服了語言障礙，衝上台灣文學舞台的事實，因為台灣話和中國白話相近本是同系語言，同是民族語言，不是外國語，要克服並不困難。可見得，片面誇大報刊禁用日語或光復後的語言障礙對台灣文學的影響是不正確的。而且可以說，「本地作家變成無言的一代」，並不是語言政策造成的，而是時代的多難所造成的。

（四）把國府對全民的反共戒嚴統治曲解為對台灣人的殖民統治

況且，五〇年代以後變成「無聲的一代」的，何止省籍作家呢？在反共肅清的風暴中，更多的外省籍作家受到嚴酷的鎮壓。有人逃亡、有人被打入黑牢、有人轉向、有人噤啞，譬如雷石榆、歌雷、歐坦生、姚隼、姚一葦、黎烈文……等不勝枚舉；而且，在台灣，三〇年代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的進步傳統更遭到徹底的肅清、禁絕而

「斷裂」，豈止台灣的文學呢？

這又關聯到陳芳明再三指陳，國府打壓「台灣文學」、「台灣歷史」，是「殖民統治」的問題。實際上，在極權的國府反共戒嚴體制下，所有的異議無不受到鎮壓；反共肅清是不分台灣或大陸、本省或外省，也不分高官或平民、身份高低的，它是對全民的反共專攻。在這樣的時代下，豈止台灣文學、台灣歷史、台灣意識受到打壓？受到最徹底打壓的，倒是中國現代文學（特別是三〇年代四〇年代文學）、中國近現代歷史和中國意識；何止是打壓呢？根本就是肅清！何止是肅清，更要檢查「反共對峙」思想的忠誠度呢。在反共戒嚴下，台灣文學、台灣歷史充其量只是未能成為「顯學」，只是屈居非主流地位而已，什麼時候「不能閱讀台灣歷史、不能閱讀台灣文學、是危險的學問」（陳芳明語）了呢？什麼時候什麼人因為研究、寫作、傳播台灣歷史或文學而成為叛亂犯了？而入獄了？受歧視了？而被「白色恐怖」掉了呢？請舉出具體事證。

把過去五十年間，國府的反共戒嚴體制對全民的反共專政、對所有異議的打壓、對所有觸犯反共教條的人民進行肅清的歷史，轉化為專對台灣人、台灣歷史、台灣文學、台灣意識打壓的歷史，並據以高呼國府政權對台灣進行了「殖民統治」、台灣社會是「被殖民的社會」，把民族內部的問題轉化為異民族間的問題，這就是陳芳明的「台灣史觀」，也是他的「戰後再殖民」論的真相。它為著打造「新而獨立國家」的

國民歷史意識的居心，是誰都看得到的。

(五) 資本的壟斷並不同於殖民統治

在經濟上，陳芳明認為「壟斷式的金融資本」也是「殖民統治」，那更是天大的笑話。全世界有那一個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壟斷式金融資本」的？若依陳芳明式的思維，美國、日本、英國等國發達的「壟斷式金融資本」都對它本國實施了殖民統治了？實際上，陳芳明所頌讚的台灣「後殖民時期」，也就是李登輝政權確立對台灣的統治時期，它的社會經濟本質就是台灣本土金融資本進一步壟斷化，那麼，是不是台灣本土資本家對台灣的進一步「殖民統治」了呢？不是的，它是資本的統治也是階級的統治，絕對不是殖民的統治。至於「專賣制度」，它更不是「殖民統治」所專有，譬如，戰後成為「民主國家」的日本，就繼續延用戰前的「專賣制度」，難道日本政府對日本人民實施了「殖民統治」了嗎？專賣制度只是一種獨特的財稅手段，絕不是「殖民統治」所專有。

(六) 國家暴力並不同於殖民統治

陳芳明慣常把「價值壟斷」、「威權支配」、「霸權論述」、「權力控制」……等時髦字眼，當作戰後國民黨對台灣殖民統治的論據。實際上，這些都不等同於殖民統治。自人類進入了階級社會，產生了支配階級和被支配階級，特別是「國家」這種統治機器出現後，社會就分化成擁有「霸權」、「威權」、「權利」的少數統治者，

以及被支配、被壟斷、被控制的大多數被統治者；試想有那個統治者不支配、控制、壟斷？這種權力關係，在任何一個階級社會都有，古代羅馬的奴隸社會有，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有，美、歐、日等先進國家有，陳芳明所讚頌的台灣「後殖民社會」更有，它只是現代國家機器所特有的暴力特徵，並不是殖民統治所專有。把一般的國家暴力等同於殖民統治，不是在社會科學上的無知，就是意識型態的作祟。

二、是台灣「光復」不是「再殖民」

(一) 日據期抗日反殖運動的歷史歸趨

日據期台灣殖民地化的歷史，有與其他的殖民地不同的特殊性格；它並不是以一個獨立的民族或國家（如朝鮮）為單位淪為日本殖民地，而是以爛熟的中國封建社會（國家）的一部分淪為日本的殖民地（這與香港類似）。就像當年台灣籍的《大公報》資深記者李純青先生在《中國的政治與台灣》一文（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七日，《和平日報》）所說的：「台灣獨立是荒唐的，台灣沒有獨立的條件，根本也不應有此要求，因為台灣和國內民族相同，地理接近，本來就是在中國身上被日本咬去的一塊肉。」這塊被日本咬去的中國地方性封建社會，雖然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轉化為「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但是，從它被日本咬去的那一刻起，不論是前仆後繼的反割台鬥爭、反抗日本佔領的武裝鬥爭或日據下的武裝抗日運動，莫不以回歸祖國恢復中國對

台灣的主權為訴求；直到一九一四年的苗栗事件，屬同盟會會員的羅福星在殖民者的法庭上還大義凜然宣稱，其抗日目的就在「使台灣復歸中國」；一九一五年的西來庵事件，余清芳仍自命為「大元帥」奉「大明慈悲國」之號。隨著日本對台灣殖民地支配的日益深化，台灣的反抗運動性質雖已轉變為現代性的民族運動和階級運動，但在日本殖民者於一九三八年所編寫的《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的《台灣社會運動史》序文中，也承認台灣社會運動和台灣人民的漢民族意識有很深的關係，它如此寫道：

關於本島人的民族意識問題，關鍵在其屬於漢民族系統。漢民族向來以五千年的傳統民族文化為榮，民族意識牢不可拔。……故其以支那為祖國的感情難以拂拭，乃是不爭之事實。……此實為本島社會運動勃興之原因。

序文的另一段，也特別提及當時的幾個抗日事件、譬如：邱琮指導下的「台灣光復運動」、「意圖以武力革命使台灣復歸支那」的「台灣民眾黨事件」，另外有，「謀求與中國國民黨要人取得聯繫，於島內進行武裝峰起」的「眾友會」事件等等。可見得，連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認，台灣的抗日運動有許多是「以『支那』為祖國」，是意圖以武力革命「使台灣復歸『支那』」。這些都與當時全中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有深刻的關聯。

雖然，一九二八年的台共綱領中，曾有主張「台灣獨立」的字句；但這種「獨立」論必須放在當時的具體歷史脈絡來理解，其實它是針對殖民台灣的日本帝國的「獨立」，與今天針對中國的「獨立」是完全不同的。況且從台共往後的發展，各成員一生的言行以及追求的目標來看，這個「獨立」與脫離中國是毫不相干的。

到了日據後期，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許多台灣人民返回中國大陸，組成了各種抗日團體。一九四一年二月十日，在重慶，各抗日團體聯合組成了一「台灣革命同盟會」，確定該會的宗旨為「集中一切台灣革命力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光復台灣」。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二天，也就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國民政府正式對日宣戰，正式廢除了《馬關條約》以及中日間的一切條約，確立了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是中國的老淪陷區的原則。於是一「台灣革命同盟會」在第二屆臨時代表大會決議：革命的目標在「推翻日寇統治，復歸祖國」，並於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的《馬關條約》四十八周年之日，積極展開了「台灣光復運動」宣傳。至此，台灣的反日民族解放鬥爭與全中國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匯合，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光復台灣的目標上是一致的。就像當時李友邦將軍在《台灣革命現階段之任務》（一九四二年一月）文中說：「今日的台灣，已不再是單由台灣人向日寇爭取『獨立自由』的台灣，而是台灣人與祖國同胞共同向日寇『收復』台灣了」。指出了台灣革命的現階段任務，已從先前的「台灣獨立革命黨」時期所主張的「先單獨追求台灣獨立，再回歸祖國」，

進入了「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的階段。台灣的反日革命鬥爭的事業只有在加入全中國的抗日民族解放戰爭，先保衛祖國爭取勝利，才能達到台灣的殖民解放和復歸祖國的目標。這預告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必然會實現台灣的殖民解放和復歸祖國。

作家歐陽明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發表的《台灣新文學的建設》一文中，也說道：「從社會歷史發展上看，從客觀形勢的要求上看，台灣反日的民族解放革命，必然隨著祖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革命的取得勝利而勝利」。

從上述五十一年間台灣人民的抗日反殖運動的歷史來看，即使在不同的時期在不同的階段反抗的形式和性質不同，但所追求的總是或現或隱地伴隨著復歸中國的目標，這是台灣的抗日反殖運動的特徵，也是它的歷史規律。這一點，與朝鮮在「殖民解放」後追求「獨立建國」有根本的不同。

(二) 「發見我是人」——台灣「光復」的意義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中國抗戰勝利，依《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宣言》，台灣脫離了日本的殖民統治後復歸中國；這是上述台灣抗日反殖運動的歷史歸趨，也是歷史規律的體現。更近的來說，它是抗戰後期「台灣光復運動」的結果，故習稱「光復」。對台灣人民來說，「光復」是一個巨大的歷史變革，它有兩種意義；一是從殖民統治的桎梏解放出來的大變革，另一是復歸中國民族國家的大變

革。同一時刻面臨這兩大歷史變革，其狂喜昂奮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親愛的同胞，我在這地方要慎重的告訴你們，我們是明末漢民族最有血氣、最有革命精神、最有民族意識、最有奮鬥力的……我們不可忘記，我們是遺傳著大陸民族的血統，我們的國家是世界五大強國中的大中華民國……最後我將與大眾合唱，
中華民國萬歲！漢民族萬歲！

讀了這一篇充滿了中華民族意識的激情和愛國感情的文章，不要又以為它是國民黨官方民族主義的宣傳教材；實際上，它是台獨運動的始祖，「台灣民族論」的先驅者廖文毅先生，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出版的《前鋒》雜誌創刊號，也是「光復紀念專刊」上所寫的發刊辭《告我台灣同胞》。在同誌上，他另一篇文章《光復的意義》也這樣寫道：「在台灣光復的這個時候，所發現著的第一個事實，就是『民族精神的振興』……第二個事實就是『國土重圓』……第三個事實就是『家人再集』……第四個事實就是『統一的國家』、『統一的政府』」。

日據期曾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當時任「台灣光復慶祝大會」（台灣省受降典禮之後舉行）主席團主席的林茂生先生，在同誌上的《祝詞》一文，對「光復」的感受表達得更為生動，他說：「在光復共慶之秋」，有「三大發現」，一是「發見我是人，是自然人」，二是「發見社會」，三是「發見國家」。

這類文章，在台灣光復之初俯拾皆是，這只不過是比較突出的一、二例而已。這些文章流露著自然的真情，洋溢著民族感情和愛國意識，可說反映了當時台灣人民對「光復」的歷史變革的共同心理。這種心理也表現在楊逵的身上；楊逵在日本投降不久，國民政府尚未踏上台灣之土的九月，便興匆匆地把他的「首陽」農場改名為「一陽」，並出版《一陽週報》，開始宣揚起孫文的三民主義理念。

因為，在長期的嚴酷的殖民統治下，台灣人民被剝奪了政治權、經濟權和文化權，處於沒有「人權」的、「非國民」的、殖民地人的地位；民族意識受到壓抑，民族社會被支離，更沒有自己的民族國家，這就是身為殖民地人的屈辱和悲哀。殖民地人民的最大願望，也是反殖民運動的最大目標，就在打破這些殖民桎梏，脫離殖民地人的地位，成為一個完整自主的「自然人」，並且做為一個「國民」生活在自己的「民族社會」和「民族國家」中。而「光復」給台灣人民帶來的「殖民解放」和「復歸祖國」的兩大歷史變革，正實現了台灣人民夢寐以求的願望。當時，除了極少數在殖民時代依仗日本殖民統治者維持自己權勢的台灣人大資產家以外，對於台灣人民（不管左中右派）來說，「光復」就是自己夢想的實現，其狂喜和對祖國的熱烈期待是不難想像的。

因此，歷史地來看，從初期的反日佔武裝鬥爭到末期的「台灣光復運動」，日據下五十一年間台灣人民前仆後繼所求追的，總是指向復歸祖國的方向；而「光復」

給台灣帶來的巨大歷史變革，使台灣重歸中國的「民族社會」和「民族國家」，就是實現了台灣人民的歷史願望；這並不是歷史的偶然，而是台灣的社會歷史的特性所規定的必然歸趨。對於這樣的「光復」，陳芳明居然把它顛倒為「再殖民」，把體現了台灣人民歷史願望的復歸中國，倒錯為再度被中國殖民。如果光復是「再度受中國殖民」，台灣人民怎麼不像割台時一樣以武裝鬥爭相向呢？而是以「張燈結綵」，以「歡天喜地」的心情相迎呢？實際上，在當時，把「光復」視同「再殖民」的，恐怕只有那些極少數依仗日本殖民者權勢的台灣人資產家、爪牙以及日本極右翼勢力吧！不料，這種站在台灣人民的「願望、夢想」對立面的「感情和觀點」，居然在五十年後，以「台灣史觀」的外形現身在陳芳明等人的身上。

（三）是中國民族國家內部的矛盾，不是「再殖民」

但是，對於光復後的歷史發展，決不可愚昧到只看到光復的變革所激發的昂奮民族感情，也應該看到它的背後潛行著的巨大矛盾。在日據期曾是台灣農民組合的成員，光復初擔任新竹縣縣長的劉啟光（本名侯朝宗），在《台灣評論》創刊號（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的《反省！覺悟》一文，就如此提醒過：「因為我已切實體會到蘊藏在狂歡之後的危險因素。我回故鄉的途中，更坦白地告訴熱烈歡迎我的幾十位嘉義地方的新舊朋友，要他們認識國情，放低期待，以免希望高失望亦大……。可是狂熱的潮流，仍然驅使全省的同胞，對祖國政府抱著過高過大的期待，終至釀成以

後的失望和反感。」

這種矛盾逐漸表現在陳儀政府接收體制的貪汙腐敗和顛預無能上；生產停頓、物價高漲、失業恐慌、言論出版的限制，以及因為文化差距和人事不公平而造成的省內外隔閡等等。這樣的矛盾終至顯現到，使楊逵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五日的《新知識》上，寫了《為此一年而哭》，高喊道：「哭民國不民主」；作家賴明弘也在同期上寫了《光復雜感》，感嘆到：「人人正因為刺激太大，動搖太大，隨之而狂歡而失望了，而痛哭了甚至而排斥了」。雖然如此，當時台灣的進步知識人，並未只停留在感情論，而是以社會科學的態度來分析認識問題。他們認識到，這些矛盾的根源之一，是由於台灣帶著特殊的殖民地的社會歷史驟然復歸於仍處於半封建而帶著官僚主義性格的國民政府所造成的；另一方面，他們也認識到，這個矛盾也非台灣獨有，其實它是國民政府在全中國範圍實施的接收體制、進行的國共內戰以及獨裁貪汙腐敗等因素所造成的與全中國人民間的普遍矛盾的一特殊部分。台灣詩人、評論家王白淵，在《台灣歷史之相剋》（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政經報》二卷三期）中，就很清楚地指出：「台灣之光復，實係五十年來未曾有的激變，因此亦難免經過種種波折……但其根本原因可歸於從前的中國（亦即舊中國，筆者按）和台灣的社會範疇之不同。總理曾說過殖民地和次殖民地之別，恰似科學上亞硫酸和次亞硫酸之別……。但這個問題係全國性的問題，不能只在台灣解決，和整個中國歷史發展階段有關。因此我們須

要把眼光放大，看看全中國歷史之進軍，而凝視全世界歷史之演變，然後才對台灣的現實，一步一步加以改革。「賴明弘也在前述的《光復雜感》一文中，如此說：「台灣的問題既然是中國問題中的一個問題，當然應該要有一個明確的基本態度，那就是台灣的問題應該要放在中國問題上去評論它。」

可見得，面臨光復以後逐步激化的矛盾，絕大多數的台灣知識人仍是站在中國民族國家的全範圍來理解問題，認為「台灣的問題應該要放在中國問題上去評論」，從未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來看。至於，往後的五〇年代白色恐怖，以及漫長的冷戰內戰的雙戰結構下的反共戒嚴，則是另一歷史階段，另一歷史範疇的問題。基本上，它已屬於中國民族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和國際階級矛盾的範疇；就和戰後世界，脫離殖民統治獨立後的眾多民族國家所經歷的烽火不斷的荊棘之路一樣。對於這個階段的問題，陳芳明也不得不誠實面對的，希望他敢於出面論辯。

（四）「去殖民」——作家們的台灣「光復」

陳芳明認為台灣作家在「光復」中所面臨的最大考驗是：「從大和民族主義的思考調整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思考」，並認定這兩種民族主義都是「官方的民族主義」、「作家必須在兩者之間做一抉擇」。亦即，他把台灣作家面臨台灣「光復」時的民族認同，描繪成一幅歪曲圖像。該歪曲圖像企圖呈現：台灣作家在日據期都是大和民族主義的思考，在面臨「光復」帶來的與大和民族主義相同的官方中國民族主義時，不

不得已只有在兩者間做一抉擇；好像台灣作家是被迫面對台灣的光復，是不得已才同外來的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妥協一樣。實際上，像陳芳明所描繪的台灣作家，除了極少數台灣人皇民作家如周金波等之流外，在台灣的文學史上是找不到的。如果說，在台灣光復時真有這樣的作家存在，那就是日據末期的皇民文學頭頭，日本人作家西川滿；這個在日據末疾言厲色為日本殖民當局推動皇民文學的大和民族主義者，在日本投降和台灣光復後，心生恐懼，竟然「把自己的家系譜拿給楊雲萍看，辯明自己的祖先也是中國人，自己原本是自由主義者」（池田敏雄遺稿《敗戰日記》II，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記事），來為自己脫罪。

關於民族主義，列寧曾科學地把它區分為二種：一種是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另一則是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並且指出，一定要把它「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來分析（列寧《論民族自決權》，一九一四年）。由此可知，把所有的民族主義都視為相同性質的東西，是錯誤的。民族主義實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的壓迫的民族主義（如希特勒的日耳曼主義或日本的大和民族主義），另一種是反帝、反殖反壓迫的民族主義（如泰戈爾的思想，如甘地、蘇卡諾、孫文、恩克魯瑪等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而中國的民族主義，正是從近百年來反帝、反殖、反壓迫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中成長起來的；在台灣，日據期的台灣抗日運動，從它的性質和目標來看，也可說是在台灣的特殊歷史中所表現出來的中國民族主義反帝反殖的一

部分，一特殊的形態。更具體地來看，面臨台灣的光復，台灣人民所表現出來的唾棄長期壓迫他們的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並且歡天喜地地迎接帶來殖民解放和復歸祖國的歷史變革，這樣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認同是很鮮烈的，一點也不曖昧的，其本身不就是在台灣的中國民族主義的自然表現嗎？

作為台灣人民感情的詠唱者以及黑暗時代的批判者，台灣作家在日據期也鮮明地表現了這樣的民族精神；譬如，賴和一生著唐衫堅持用白話文寫作，楊逵在小說《模範村》中所突顯的主角阮新民，甚至巫永福在日據末寫的詩《祖國》，也熱烈呼喚：「還給我們祖國呀，向海叫喊／還我們祖國呀」。從這些作家的精神和感情可以看到，原來中國民族主義的感情並不是光復後國民政府從外面帶來的，早在日據期的台灣文學中就已存在，只不過在殖民壓迫下隱而不顯；在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並復歸祖國後，這種感情就像地底的岩漿般噴湧出來。譬如，日據期的重要作家賴明弘，在光復不久的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就在上海出版的《新文學》雜誌第二期上發表了題為《重見祖國之日——台灣文學今後的前進目標》的文章，他說：「這樣在此半個世紀中，台灣與祖國的政治、經濟、教育等一切關係，雖然遭受日寇嚴格的截斷，但是貫穿文化思想的民族精神之火把，終熊熊地被承繼，這重要的一線終至被堅守著，所以今日整個的台灣民族仍然是活在中國民族的大海裡」。讀了這文章，真不知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要如何論下去了？在日據中期展開的「台灣鄉土文學」論爭中，

與賴明弘站在不同觀點立場的作家郭秋生，也以筆名「芥舟」，在前述的《前鋒》雜誌的光復專刊上，寫了詩歌《台灣光復歌》，他詠唱道：「可恭喜／出頭天／莫非是天有理／也是祖國大犧牲所致。」

作家張文環，在光復當初，雖然正埋頭學習中文，但仍以日文寫了一些評論，清楚地表現了他當時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認同，譬如發表在《和平日報》（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二日）上的《給台灣青年》一文，說道：「我們的青年期，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在生活上，除了為餬口而煩惱外，還不斷受到暴虐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從後面踢屁股驅趕，一些寧作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的本省人高等刑事不斷進出我家；然而，當時我們都盼望祖國的復興，四億的漢民族，果真如帝國主義者所宣傳的將成為他們的奴隸嗎？我隔著鐵窗這樣地想著……」。在《和平日報》上的另一篇用日文寫的文章《關於台灣文學》（一九四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他流露了這樣的真情：「今天的新生報台中分社主任吳天賞（他是東京時代以來的文學同志），光復當時，在眾人面前指揮練唱國歌時，不禁落下了眼淚。真是連作夢也沒想到，這麼快就獲得了自由，而且大家都還活著，真想一起跪在青天白日旗的前面痛哭一場……」。

光復的歷史變革所激發出來的澎湃民族感情，也表現為對殖民歷史和大和民族主義的全面對決與清算。譬如：龍瑛宗在光復後發表的一篇文章——《文學》（《新新》創刊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廿日），就表達了對殖民時期文學的自我否定與再出

發的痛切心情，他寫道：「回頭看看台灣的情況吧！無疑地，台灣曾為殖民地；世界史上，從未有過作為殖民地又文學發達的地方，殖民地與文學的因緣是很遠的；即便如此，台灣不是有過文學嗎？是的，曾經有過看似文學的文學，但那並不是文學，知道了嗎？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只有戴著假面具的偽文學。總之，我們非自我否定不可，我們一定要再出發，一定要走上正大的道路」。從這裡，我們看到，在看似悵鬱、猶豫的龍瑛宗的文學形像下，卻燃燒著鮮明的精神燈火；這短短的文句，應該成為台灣文學工作者的自惕。再看看作家呂赫若；他在光復不久，馬上投入台中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加入「台灣文化協進會」的行列；在不到一年，就用剛學會的白話文創作了批判日本殖民統治的《月光光》、《一個獎》和《改姓名》，這不是對大和民族主義的全面批判和對決是什麼？

光復初期，對大和民族主義的清算和對決，不但表現在台灣作家的身上，也表現在尚未被遣返的有良心的日本文化人身上。《民俗台灣》的池田敏雄、金關丈夫教授等，在光復初期就熱心幫忙楊逵的《一陽周報》，提供有關三民主義的理論書籍資料，張羅接洽代售書店等等工作。另一個例子，就是日據末期曾是一個狂熱的大和民族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與西川滿並列的皇民文學旗手濱田隼雄。他在一九四七年寫的《木刻畫》一文，便描寫了他在台灣光復初與大陸來台木刻家黃榮燦的交往中受感動而自我反省的經過，文中有一節如此寫道：「我的驚訝變成了一種羞恥，我反省了

自己單以好奇的心情與他交往的過錯，也反省了自己曾嘲笑來台中國士兵背著棉被和雨傘的愚昧，接著，日本終於給中國打敗了的實感第一次衝擊著我的心。」據說，濱田先生回日本後，終生從事和平運動，成為一個和平主義者。

由上可知，在光復的變革中，台灣作家自然流露了高昂的民族感情，對大和民族主義做了徹底的決算，表現了真正的「去殖民」精神；連日本文化人也反省了大和民族主義錯誤而走上新生之路。從這些歷史的事實中，便可知道，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是如何地用他的意識型態來取代真正的歷史了。

是的！

「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

請陳君銘記龍瑛宗先生五十年前的肺腑之言。

本文刊載於《聯合文學》，一九五期，二〇〇一年一月號

從《奪還我的們語言》到《台灣將會怎樣？》

——台灣光復初期之去殖民意識和祖國意識

台獨的歷史論述有兩大部分，一是「日本殖民有功論」，另一則是「唯族群對立論」。「日本殖民有功論」，就是把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合理化」，甚至「美化」；說日本殖民台灣帶給台灣「現代化」、「文明化」；李登輝甚至說「台灣精神」就是「日本精神」。

另外一個部份，就是「唯族群對立論」。它把台灣光復後的歷史問題全部簡化為所謂的「族群問題」；或者，把所有的問題全部化約成「中國人」與台灣人之間的族群矛盾。完全抽掉了複雜的歷史脈絡，把原本只是階級不平等的問題，或者是政治腐敗、官僚主義、獨裁集權等的問題，或者內戰、冷戰體制的問題，全部曲解成「中國人」壓迫台灣人的問題，或者歪曲為「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再殖民」。相對於把台灣光復後的歷史化約為「唯族群對立論」，獨派對於日本殖民台灣的歷史卻刻意淡化日本人對台灣人民族壓迫的本質，把真正的民族壓迫問題，轉移焦點成了日本人對台灣「現代化」、「文明化」的功績。

從歷史的眼光來看，這是二戰後，台灣曲折、複雜、荒謬的歷史的結果；從文化層面看，它是台灣人在意識、文化上「去殖民」的徹底失敗。

古人說「物必自腐而後蛆生」，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藤井省三，也是趁著今日台灣在意識上的「腐敗」，毫不客氣地大潭壑謬論，說日據末期的皇民化運動達成了高日語普及率，因此造成了台灣人的「公民意識」，且亂套安德森的想像共同體論，說這就是「台灣民族主義」的根源。

後面選刊了五篇台灣前輩作家在光復初期的作品，希望通過這些史料對上述的台灣獨論述有一點「矯枉」的作用，替當今台灣蔽塞的歷史意識打開一扇光明的窗。

一一

實際上，日本戰敗後，在陳儀還未來台灣接收以前，日據期受日本殖民者壓迫的台灣抗日者，很快地重新集結，先後成立了「台灣農民協會」、「台灣人民協會」、「台灣學生聯盟」等團體，從各方面展開了自主的解放活動。在文化上也以各種方式展開了台灣的歷史、文化、語言的復原運動，也就是「去殖民」運動。譬如，光復後，最早創刊的報紙，是由林茂生任社長，原台共成員許乃昌、陳旺成擔任主編的《民報》。該報於十月十日創刊，是一份純粹的中文報紙。該報堅持使用中文，就是表明了去殖民的立場。

民報社論主張「須推行廢用日文運動」，認為「日文和日語，於學者作種種的研究上或者還有存在的價值。至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上，需要拂拭淨盡，才有新鮮的氣象可觀。」可見得該報在語言上的「去殖民」態度是十分堅決的。另外，在這《民報》創立之前，楊逵也在九月初創刊了《一陽周報》，積極宣揚孫文思想和三民主義理論。還有，在各種報刊雜誌上，也紛紛刊載了在日據期無法公刊的文學作品；如在《民報》上，由楊雲萍主編的「學林」副刊刊出了賴和的《辱》；《政經報》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以及王白淵的《我的回憶》等等。

這些可說是台灣文化界文化人自主的「去殖民」運動。

這次我們選刊了楊雲萍的《奪還我們的語言》以及《民報》的社論《提議編纂「台灣史」》，這兩篇是當時台灣文化人「去殖民」和「台灣歷史復原運動」的代表作。一篇是要從日本殖民者手中奪回自己的語言，另一篇是要奪回「歷史」，該文說：

把日人所湮滅的，使他甦生，日人隱藏的，使它重見天日。

這些六十年前寫下的字字句句，和這字句所顯示的觀點，不恰是對今日台獨的「日本殖民有功論」的最強有力的、最嚴正的批判嗎？

台灣光復不滿一年，台灣的文化人復歸祖國的熱潮，隨著現實的惡化而逐漸冷卻。各報刊雜誌出現了許多不滿的聲音，對政府施政進行尖銳的批判。譬如，楊雲萍在《台灣文化》第一卷第二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的「紀念魯迅專輯」上，為文《紀念魯迅》批評道：

台灣的光復，我們相信地下的魯迅先生，一定是在欣慰的。只是假使他知道昨今的本省的現狀，不知要做何感想？我們恐怕他的「欣慰」，將變成哀痛將轉為悲憤了。不過我們確信著，要使魯迅先生，在地下得著永遠的欣慰，卻是我們的責任。

楊逵也在台灣光復一週年的八月十五日，寫了《為此一年而哭》，尖銳地批判了一年來政府貪污、腐敗、不民主的現象。

許多獨派論者都把這些光復初期令人失望的惡化現象，歪曲成「外來政權」對台灣人的族群壓迫，亦即，前述的「唯族群對立論」。實際上，當時的台灣文化人，對現實的不滿和批評是對民主的期望，是十分自然的；其中當然有省籍隔閡的成分，但絕非省籍矛盾，更沒有所謂「族群對立」，更不用說有民族國家的認同的問題了。

詩人、評論家王白淵的《給青年諸君》一文，對陳儀政府和中國戰後混亂現實的批評是尖銳的；然而，它卻不是以感情論，而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性質觀點來辨

析台灣的現實。他認為台灣剛從殖民地社會解放出來，而中國也剛從半殖民地社會解放出來才剛剛踏上現代國家的門檻，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殘渣仍然纏繞著現實，光復初期台灣問題的總根源即在此。像王白淵一樣，跳脫感情論或唯心論，以左翼的世界觀、社會觀來看問題，是光復初期台灣文化人的普遍傾向，絕對不是今日獨派胡說的「唯族群對立論」。王白淵為數不多的評論文，可說是這一傾向的代表。

雖然王白淵對現實的批判十分嚴厲（譬如，在《政經報》上的《告外省諸公》，在《新生報》上的《所謂「奴化」問題等》，但他的祖國認同是堅定的；他的批評、他的辨析總是把台灣現實問題放在全中國的範圍來看；他的理想是「朝向建設民主主義中國的大道邁進」。

抗戰勝利後，通過「雙十協定」和政治協商會議，國共之間維持了短時期的和平局面。然而，進入了一九四六年六月，國共內戰爆發，中國人民對「和平、民主、建設」的梦想再度破滅。國共內戰戰火直接或間接的地影響了台灣，但由於資訊不足，在台灣很難感知知道遙遠大陸的戰火。另一方面，世界局勢也隨著美蘇在德國佔領問題以及東歐問題上的分歧，而逐漸走上對立的局面，一九四七年二月美國國務院「計畫研究室」主任肯楠初次提出「冷戰」一詞後，美蘇兩陣營恐怖平衡的對立，支配了二十世紀下半期近五十年的世界。在光復初的一九四六年誰都不會想到，台灣在一九五〇年後，會淪為國共內戰和世界冷戰的「雙戰基地」長達半世紀之久。

在這樣的中國和世界的變局中，一向被視為纖細、敏感、抑鬱、內向的作家龍瑛宗，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二十四兩日，也就是報刊雜誌禁用日文的前夕，在他主編的《中華日報》日文「文化」副刊「再見吧！日文版」專輯上，卻不談廢止日文問題，而寫了短詩《停止內戰！》和雜文《台灣將會怎樣？》。

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當時的龍瑛宗所深深憂慮的問題，遠遠超過了廢用日文欄的問題（雖然，廢日文欄等同於他將失業），也不是語言轉換的問題，而是受美蘇對立的世局所制約的國共內戰，以及國共內戰對台灣的重大影響。他說：

台灣的命運是受到中國全體的政治所制約，而且中國的命運也受到美國和蘇聯所制約；因此台灣問題的解決，實際上是受世界政治所影響的。

如果和談破裂內戰長期化的話，不但台灣同胞，全國同胞將面臨更悲慘的黑暗日子。

從這二篇作品，我們可以看到龍瑛宗對現實世界的深刻認識，其真知灼見已遠遠超過了同時代的人們。在爆發二·二八事件的前五個月，他就深深感知道冷戰和內戰爆發的徵兆，而且把這個問題聯繫到台灣的命運上。他的深刻認識，對許多經歷過內戰、冷戰「黑暗日子」的人而言，以及對今天的我們來說，都有相當的啟示性。或許，對獨派的「唯族群對立」論，更有振聾發聵之效吧！

完稿於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發表於《人間思想創作叢刊》二〇〇五年春季號

附錄（一）

《奪還我們的語言》

楊雲萍

日本明治二十八年、台灣總督樺山資紀率領軍隊來佔領台灣的時候、一行中有位伊澤修二。他就是所謂「學務部長」得〇〇（〇〇內文字原件模糊，無法辨認，下同。——編者註）負著台灣的教育方面的〇〇、伊澤在當時、是日本有數的、或許也可說是數一數二的教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得他著有「教育學」一書、頗得時譽。可見得他們是何等重視台灣的教育。此後五十年間、我們台灣的人們所不得不忍受「教育」、就是由他規模的。

對台灣的教育、伊澤第一的「大精神」就是決定用日本語來教育、不或者說只為教授日本語才教育的、這「大精神」、五十年間不但沒有更改、而且變本加厲。凡是

他們的關於台灣教育的著述、言說、如《台灣教育史》、《芝山巖史》或其他的文章講演之類莫不誇耀這點、而特說大書。

在這裡、筆者想起一則「故事」。同年的十月、伊澤隨伴樺山到台南、是想要調查過去的台灣的教育、和設法○台南地方開始「新教育」的事宜。那時伊澤去訪問英國宣教師巴克禮博士。巴博士不只是敬虔的宣教師而已、他是位篤學的學者。他關係台灣的文化頗大、細詳擬在別稿再說。他同情著劉永福將軍、所以對於伊澤的來訪、疑他是偵探、不很願意會他。因為伊澤說他自己在日本、以聞及博士的事業、此次是意要親自受教的云云、○○巴博士才會他。會談中、巴博士主張對台灣的教育、切不可用日本語、要用台灣語才行、至於漢字因為難於學習所以台灣語要用羅馬字「白話字」伴寫。對此意見、伊澤說雖感謝巴博士的忠告、可是他老是不改變他的決心和主張。這則「不改變」的故事、總又得到後來他們的教育家、教育史家們讚賞了。（參看井川直衛氏著《巴克禮博士之形容》和載在《語言與文學》第三輯的志保田、國府兩氏稿《在台灣國語（日語）教授之變遷》等。）

對於巴博士和伊澤之意見的是非、我們沒有縷縷的必要。原來伊澤等根本本地就沒有想到要教育台灣的人們、使之完成人格、只想消滅台灣人們的語言、隨之消滅一切的歷史和文化、使其成為「大日本帝國」的順民、奴隸而已。

伊澤的「大精神」、後來不只沒有更改、而且變本加厲、已如上述。今日有受過

「公學校」（後改為「國民學校」）以上的所謂教育的人們、一定經驗過「日語」教授的何等地嚴重、何等地沒有視學習者的人格。在學校裏、除去初入學的少數以外、一切不得使用台灣語。偶一不慎、說出一句或半句的台灣、普通立即被記過一次、有的受肉體的制裁。還有些喪心病狂的教師、製作「犯罪章」、強制使不慎說出台灣語之兒童掛在胸間以辱之。

然而此不僅在學校裏而已、他們的所謂「社會教育」、也是以教授、普及日語為第一的宗旨、最高的目標。試翻開台灣總督府文教局社會課所梓行的《台灣社會教育概要》（日本昭和九年二月刊）看罷。「總說」之後、第一大書特書的就是「國語（日語）普及」的事項。此書說、「本島國語教育（即教育日語）的濫觴是在芝山巖學堂對本島兒童及青年施以國語（日語）的教育始。爾來一切之教育施設、即以國語（日語）的教育為教育之中核」云云。所以社會教育、不消說也以教育日語為中核。只看他的社會「日語講習所」、「簡易日語講習所」等千百個所的施設以外、還有種種的施設。例如「全島日語講演會」（有時總督閣下竟惠○臨席）、「日語普及的廣播」、「日語普及功勞者的表彰」、「愛語章的受與」、「日語日的制定」、「日語常用家庭的表彰」（後來制訂所謂「國語家庭」、對此認定之家庭、予以種種恩典。）、「日語村的建設」及其他等等、真是更僕難數了。以上是日本昭和八九年的狀態、爾後的變本加厲、自不待言。直至這次大戰爭起、因忙於戰事、種種施設有些放

鬆、可是根本的，全沒有絲毫的變改。（後來不僅一切中國文的定期刊物禁止、此一二年來連中文的書籍、雖歌他們的功頌他們的德、也大部分不許出版。）

至於社會上、因不會說日語、而受了非道的待遇、我想不論那一位的小百姓、沒有不飽嚙的。我敢說、日本統治台灣的五十年間、一切的教育施設、文化施設の百分之九十五、政治施設之百分之五十以上、皆為著教授、普及、強制日本語而存在的。你們或者以為我說的過勁嗎？那麼你們試想一想、在今日他們算是已「完了有終之美」了、而殘留下的有甚麼嗎？

事實上、日本統治台灣的最大成績、就是造成許多的兒童和青年、忘記了他們的「母語」最少忘記了一部份。台灣光復、河山依舊、而事物有全非者。全非的事物之中、要算這件「語言問題」為最嚴重、最利害的。試舉一個例罷，有一回、某大學和某高等學校的學生之集會上、有人提議十分間禁止不許說日語、要一切用台灣語發表意見、可是不至五六分間即紛紛請求寬禁。再舉一個例罷某中等學校的高級生、不能正確發「不」字和「知」字等最通行的字音者、比比皆是。語言學者說、人們任是怎麼學習、除去「母語」之外、是不能充分學習到的。而且人們用「母語」發表意見、表現感情時、才得真實的愉快。何況此問題、不僅是所謂「語言」的問題而已、實關於「民族精神」之問題。

我們要奪還我們的語言！

原載《民報》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二、二十三日

附錄（二）

《提議編纂「台灣史」》

《民報》社論

龔定庵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墮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
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定庵續集》卷
二）。日本帝國主義的五十年間的台灣統治、可以說是這些話的最好的「樣本」。
尤其是所謂「皇民化運動」以後、變本加厲、對台灣的歷史（當然是我國歷史的一
部）、不只加以侮蔑、逆宣傳而已、直想要把它湮滅無遺、這政策似有些少的成功。
你看、現在的青壯年的省民、幾人紀念著鄭氏父子的可歌可泣事蹟、幾人還不忘去偉
大的政治家劉壯肅公劉銘傳的事業嗎？不過、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終於不會夠消滅
我們漢民族的民族意識、這已用了事實證明過了。只是他們的想要湮滅我們的「歷
史」政策的惡毒和些少的成功、我們是不可忽視的。

台灣光復、現在已將近四箇月了。各項的接收、聽說是很順利的在進行中、被日本帝國主義所掠奪的事物、我們已著著地把它收回、奪還了。物質方面已不消說、就是精神方面、聽說也已有相當的成果。可是對於日人的「湮滅歷史的政策」、換句話說、就於「歷史的接收」卻還沒有甚麼具體的行動、除去普及國史云云之聲以外。這是我們以為遺憾再沒有的事情。

要掃蕩日本帝國主義的「湮滅歷史的政策」要接收我們的光榮的「歷史」、我們最先要做的就是調查、研究、編纂就是把日人所湮滅的、使它甦生、日人隱藏的、使它重見天日。

台灣固非無「史」也，府縣誌之類且不說、如西人李氏的《台灣島誌》、○氏的「台灣島之過去與現在」、日人伊能氏的《台灣文化誌》、和我們的劍花連雅堂先生的《台灣通史》、皆一時名著。只因限於時勢、才幹、方法、各有短長。老實說、現在我們還沒有一部綜合的「台灣史」。這是多麼可憐的事呵！而我們以為現在確是「台灣史」要出現的時期。第一、已如上述、我們現在是要遂行「歷史的接收」、從日人的手裏奪回我們的「歷史」。第二、日本已倒、我們可立在自由的立場批評、研究。第三、在此遷變○瞬間、史料出現的出現、可是消滅的也要消滅、不可不為之保存了。

我們希望當局、及早組織「台灣史編纂委員會」、或是「調查委員會」、已應此

重大的時期、以遂行「不朽的事業」！雖然、台灣省民個個各有任責。

原載《民報》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附錄（三）

《給青年諸君》

王白淵

有一位任職麥帥總部的中國通副官，曾在東京批評了中日兩國及其國民，他說：「今日的日本，在國家上是四等國家，而其國民則仍然屬於一等國民之列；與此相反的，中國在國家上雖然名列一等國，但國民卻依然是四等國民。」

這位友邦人士辛辣的批評，像寒天潑水使人寒顫入骨。每當看到有些人仍然沉醉於戰勝的餘榮而忘我，只顧追求名利無以寧日的情景，誰不憂心，只要是關心國家民族前途的人，對於這位副官的說法，有誰不沉思默考呢？而且，只要虛心地捫心自問，到底有多少人敢於反駁這位副官的說法呢？況且歷史也很清楚地顯示我們還未脫離危機的狀態，因此，如果我們自己不尋求自救之路，恐怕一切都會功虧一簣。

中國好不容易才從長期的半殖民狀況解放出來，台灣也剛從典型的現代殖民地解放出來；歷史地來看，我們只不過剛踏進現代國家的門檻。今日的為政者和國民閉口都說民主政治，然而不管從那方面來看，我們的現實狀況並不俱備實施民主政治的社會條件。對我們來說，民主政治仍然是屬於理想的層次；現實中，半殖民地的或殖民地的殘渣仍然深深地盤根錯節地纏繞我們，造成沉重的空氣，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現實。譬如，政治機構缺乏橫的和縱的有機聯繫，混亂的人事制度，緩慢和繁瑣的行政，中央與地方的不統一，不明確的財政狀況，可恥至極的貪污橫行，公私不分，沒有議決權的民意機關，官僚主義的公文行政等等，這些對一個受過現代國家洗禮的人來說，都是奇異的現象。

現在，我們雖居於台灣的一隅，但見一斑而知全豹，今日台灣的現實正是中國的縮影及其斷面。大凡人類的理念及制度，都是該民族歷史的產物，是不斷變動的；其中，有進步也有希望。青年應是時代的前驅，歷史的原動力。我深深寄望青年人不要血氣方剛意氣用事，而是要高舉理想，深究現實，進而清楚地認識歷史的方向，妥善對應，朝向建設民主主義中國的大道邁進。

原載《新新》第七期，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

曾健民譯（二〇〇〇五年二月十九日）

附錄（四）

《停止內戰》

停止內戰

如果內戰 老百姓會更困苦
瘦巴巴瘦巴巴瘦到死翹翹
沒有了老百姓國家算什麼

停止內戰

可憐的老百姓
含著淚含著淚
盼望著安居樂業

停止內戰

如果內戰 老百姓
在黑暗中出生也在黑暗中

彭志遠（龍瑛宗）

急赴墓場

停止內戰

和平、奮鬥、救中國！

在自由與繁榮之上

給我們美麗的新中國

原載《中華日報》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文化」副刊

曾健民譯（二〇〇〇五年二月十九日）

附錄（五）

《台灣將會怎樣？》

龍瑛宗

我們台灣將會怎樣？決定台灣未來命運的，有二個要因；一是外在的要因，另一個是內在的要素。外在的要因是什麼？那就是，不依台灣本身意志而變化的外在力

從《奪還我們的語言》到《台灣將會怎樣？》

量；具體地說，台灣的命運是受到中國全體的政治所制約，而且中國的命運也受到美國和蘇聯所制約；因此，台灣問題的解決，實際上是受世界政治所影響的；譬如在美國，華萊士的動向對全世界的命運有很微妙的影響，全世界的情勢依美國的伯恩斯政策和華萊士政策兩者的消長而變動。

另外，內部的要素是什麼？那就是，本省人自身對歷史起作用的意志和力量；如果本省人自己沒有能動地創造歷史的意志和力量，台灣一直被他者所創造，不得不服從於他者。我們不可忘記，人雖然總是被歷史所創造，但同時，人也創造歷史。

現在，台灣應該前進的道路，可能有下面三條，那就是：

- 一、朝向維持特殊狀態的路
- 二、朝向與國內各省同等的政治狀態的路
- 三、朝向愛爾蘭化的路

第一條，是現在台灣所走的路；第三條道路，我想，當今的台灣不管在歷史條件上或者環境上都還未成熟。

因此，為了全中國也為了台灣好的道路，應該是第二條。而在實現第二條路的可能性上，必將來臨的國共和談應是重要的關鍵。如果和談破裂內戰長期化的話，不但台灣同胞，全國同胞也將面臨更悲慘的黑暗日子。屆時，中國將面對有史以來空前的危機。

我們再度想起偉大的國父孫中山先生的話：

「和平、奮鬥、救中國！」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原載《中華日報》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再見吧！日文版」

曾健民譯（二〇〇〇五年二月十七日）

從《奪還我們的語言》到《台灣將會怎樣？》

打破魔咒化的「二二八論述」

日本人宮澤繁在他的著作《台灣終戰祕史》中曾談到，當他看到台灣脫離殖民統治光復後不久便浮現「省籍隔閡」，不同省級間以「阿山」「蕃薯仔」互為戲稱的情形時，曾十分難過，痛陳：「分析兩者間產生這樣的情感分裂，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應當是最主要的原因；當然日本和日本人使兩者分裂的元兇。在台灣的日本人一想到這問題便羞愧得無地自容，真恨不得鑽到地下去」。

這是一位有良知的日本人，眼見台灣脫離日本統治不久，就出現許多省籍間的紛亂時的肺腑之言。他指出了一個簡單而大家經常忽略的道理，那就是：殖民後出現的諸多問題，其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要是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所造成。殖民的傷痕並未隨著殖民統治的結束而結束，它遺留給殖民地人民的惡果是巨大的且深遠的。

一、看不到歷史的歷史論述

實際上，這也是近年知識界盛行的「後殖民論述」的中心議題。雖然後殖民論述在台灣已成了時髦的東西，學術界開口後殖民閉口後殖民，但是，當落實到台灣實際的殖民後歷史、文化問題時卻完全變了調；有些論述不但看不到日本帝國主義殖民者的真面目，反而把台灣脫離殖民後復歸的「祖國」當作新「殖民者」看待，真正的帝

國主義、殖民者，卻消失了！這種顛倒是非的荒唐後殖民論，與其說是文化或歷史論述，倒不如說，只不過是政治論述吧！

當然，這種現象也集中出現在「二二八論述」上，實際上，兩者經常是混同的。仔細算來，今年已是二二八事件的五十九週年，明年將是第六十年，早已超過半個世紀。在這已超過六十年的戰後世界，人類文明有驚天動地的進展。台灣戰後初期的歷史論述，特別有關二二八的研究、論述已超過二百種，這種對於單一歷史事件投入如此龐大的著述，在世界上也是少見的。依據補償基金會資料，事件傷亡人數不超過二千人，如此規模的歷史事件，竟然出現了如此龐大的論著，真是匪夷所思。

而且這些龐大的「二二八論述」大多數出現於八〇年代以後，特別集中在九〇年代李登輝政權轉向以後；可以說，基本上它是與台灣的分離主義政治勢力同步急速膨脹的，因此這些論述普遍帶著濃厚的分離主義的政治意識型態。

譬如，陳芳明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台灣人國殤事件的歷史回顧》就是其代表作。從它的書名就可以知道，作者早在八〇年代末已把二二八事件定位成「台灣人的國殤事件」，把二二八事件「建構」成「外來政權——國民黨政權——外省人——中國人——鎮壓——台灣人」的論述；說二二八事件就是外省人、中國人屠殺台灣人的事件，以激起省籍矛盾，呼喚台灣民眾的悲情意識，強化所謂「台灣人主體意識」。由於類似廉價論調的反覆炒作，政權輪替後，果然二月二十八日取代了十月

二十五日的「光復節」成為「國定紀念日」——陳芳明所說的「台灣人的國殤日」。由於二二八論述日益成為台灣現實政治鬥爭的工具，因此歷史論述普遍出現了「非歷史性」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去歷史脈絡的問題。這使二二八史實遠離了「歷史」，成為分離主義意識型態的一部分。在其中完全看不到二二八歷史的前因後果，看不到事件與當時的世界潮流或中國局勢的關聯，看不到島外的歷史世界。這種被囚於孤島的井蛙式的歷史論述，只有所謂「外來的」與「本土的」「族群」鬥爭，完全障蔽了「民主」的問題、「民族」的與「階級」的問題，以及「社會公義」的問題。因此成了分離主義政治勢力絕佳的政治鬥爭魔咒，且無往不利。而且，由於它模糊了台灣資本主義化過程中的階級矛盾，而成了台灣新興壟斷資本的最愛。

要打破這種政治魔咒化的二二八論，唯有跳開現在為止的論述邏輯，把二二八事件重新放回歷史的現場，盡量還原其「歷史」的本貌。

就像前述宮澤繁所揭示的：日本殖民統治就是台灣光復初期諸多紛亂的元兇；更具體地說，首先，要追究、搞清楚日本殖民末期嚴苛的戰爭動員體制，諸如經濟榨取、人命動員、皇民化運動等等，到底對日後的台灣造成了怎樣深刻的精神上和經濟上的遺害；而這樣的殖民遺害當然與解放後一年半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怪不得如宮澤般有良識的日本人，看到在台灣的中國同胞相殘的情形會羞愧得無地自容。然而，台灣的分離主義素來只熱衷於宣揚日本殖民給台灣帶來多少現代化、

文明化，還盡力去擴大殖民者遺害的傷口；更有甚者，近年還陸續去參拜入祠侵略元凶的靖國神社，這種認賊作父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可視為六十年前殖民歷史的遺害，所帶來的精神上無法自立的重大傷殘。

總之，要認識到日本殖民統治歷史是二二八事件的重要「前因」，把這問題弄明白，自然是打破魔咒二二八論述的重要一步。

一一、打破井蛙式「唯族群對立論」

當今魔咒化的二二八論述的另一特徵，就是把台灣從中國局勢和世界潮流孤立出來，在時代與歷史的真空中論述二二八，井蛙式地不斷虛構複製外來與本土的「族群對立」。這種論述造成了台灣社會感情意識不斷退化的悲哀；為了符合現實的「唯族群對立論」的政治要求，只有不斷陷入這個窠臼。實際上，二二八事件並不是台灣獨特的孤立事件，它還是當時全中國混亂局勢的一個突出部份，也與戰後世界新的美蘇對立，亦即東西冷戰息息相關。譬如，當時朝鮮半島也動盪不安，一九四八年爆發了「濟州四·三事件」，死者三萬人。

一九四六年年末，也就是爆發二二八事件的半年前，台灣早已出現了各種紛亂，台灣的人心呈現不安焦慮。當時的知識人也已經深刻地認識到台灣的問題與中國的政局、世界的新對立有密切的關係。

作家龍瑛宗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廿四日，也就是在告別他所主編的日文版文化欄時，寫了《台灣將會怎樣》一文，表達了他對台灣前途的憂慮。他認為決定台灣未來命運的，有「不依台灣本身意志而變化的外來力量」，「具體地說，台灣的命運是受到中國全體的政治所制約，而且中國的命運也受到美國和蘇聯的對立所制約」。他更是深刻地預見到「國共的」「和或戰」牽動台灣的命運，他說：「必將來臨的國共和談應是重要的關鍵；如果和談破裂而內戰長期化，不但台灣，全國同胞也將面臨更悲慘的黑暗日子，屆時，中國將面臨有史以來空前的危機。」

在發表這篇文章的前一天，龍瑛宗也寫了一篇短詩《停止內戰！》，詩末他疾呼道：

停止內戰

和平、奮鬥、救中國

在自由與繁榮之上

給我們美麗的新中國

詩人、評論家王白淵，也在同時間（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發表了《給青年諸君》，面對台灣混亂的現實，他鼓勵青年人說：「現在，我們雖居於台灣的一隅，但見一斑而知全豹，今日台灣的現實正是中國的縮影及其斷面……要高舉理想，深究現

實，進而清楚地認識歷史的方向，妥善對應，朝向建設民主中國的大道邁進。」
可見得，爆發二二八事件前夕的台灣知識人，他們的認識和認同是很清楚的，他們是立足於作為中國一省的台灣觀察世局；早已認識到台灣的前途繫於中國的命運，而中國的命運是與戰後新的美蘇對立息息相關，而事實證明，他們的這種主觀認識是與客觀的歷史進展相契合的。可悲的是，六十年來的大多數知識份子不但無法認識到這種歷史的真實，近年來還淪落入像二二八論述似的歷史論述而不自覺。脫離或違背這種客觀的歷史事實的二二八論述，除了是為當下現實政治需求的虛構之外別無其他。

就如當時台灣知識人所憂慮的，在二二八前夕，中國已陷入混亂的局面；經濟崩潰，到處爆發反蔣反獨裁的抗爭事件與鎮壓事件；國共和談破裂，和平、民主的希望破滅。也同在二月二十八日那天，國府下令駐在上海、南京、重慶的中共代表團限期撤離國統區，宣佈中國共產黨為非法政黨，關閉了國共和談的大門。香港《華商報》的社論《半個中國黑暗了》痛指：「國民黨一口氣吞滅了，被視作和平民主希望的燈塔……正式宣布今後的政策是反共、內戰、反人民、獨裁……國民黨統治區現在完全是一片黑暗了。」

在台灣，十二月爆發抗議「澀谷事件」的大遊行；二二八事件的前一個月，爆發了與北平、上海全中國各地同步的抗議美軍暴行（沈崇事件）的大遊行示威行動。這

時，台灣與全中國各地一樣，「反美、反內戰、要和平要民主」已經是共同一致的願望和行動。要論述二二八事件，怎麼可能與這些切割呢？怎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呢？

三、「二二八」的本質是「反獨裁爭民主」

由此可知，二二八事件的歷史本質是「反獨裁、要民主、要和平」，更具體的說就是要求「高度自治」、「台人治台」。

楊逵在事件中發表的《二·二七慘案真因——台灣省民之哀訴》文中，除了痛陳獨裁、官僚、腐敗的現象之外，也清清楚楚地指出二二八的真因，他說：「我們認為這些都是國賊漢奸行為。這次民眾的義舉，並非要反抗國民政府，也不是要叛離祖國，更不是要做那一國的殖民地，正是要捉奸拿賊而已。」

可見得二二八事件的本質，是民主起義；是台灣最早的民主運動，絕不是魔咒化的二二八論述所反覆虛構的「族群矛盾」。

在二二八民變中領導二七部隊進行鬥爭，失敗後潛行上海的謝雪紅，在七月十七日寫就的《告同胞書》，對二二八民變做了一次政治總結，對二二八民變的歷史意義有正本清源的作用。首先，他對當時戰後的世界形勢作了鮮明的敘述，她說：「戰後世界充滿了和平、民主的歡聲……世界上數世紀被壓迫被榨取的弱小民族和殖民地人

民，到處都在爭取獨立、民主和自治。」

然而另一方面，美國帝國主義卻「在世界上到處霸佔，和建設了無數的軍事基地，另扶植德、意、日和中國的殘餘法西斯份子。」使「整個世界變成人民與反人民，民主與反民主的兩大陣營。」，而「國民黨獨裁政府的延長統治，對台灣政治經濟的壓榨，與對全國人民的進攻根本是一樣的。」

謝雪紅在做了這樣的世界與中國的根本形勢分析後，強調二二八民變的基本性質是：「完全是和全世界與全中國的反獨裁爭民主的自治的路線相符合的。」

不管從二二八處委會提出的三十二條要求看，或從楊逵的「捉奸拿賊」論來看，乃至謝雪紅的「反獨裁爭民主自治」看，都明明白白顯示了二二八民變的基本歷史性質就是「反獨裁爭民主」，是台灣民主化運動的先聲。

四、「反美、反蔣、爭民主」——二二八後的新路線

謝雪紅在《告同胞書》中也提及，經過檢討後「今後要進行的路線」，就是「為著新台灣的建設……要求最徹底的民主自治，反獨裁、反內戰、反對封建的保甲制度，反對連保聯坐，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實施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擊滅日本對台灣的野心，打倒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台灣的國際託管，反對任何某一國對台灣有特殊權利。」

這代表了二二八後，實際參與並領導二二八「反獨裁爭民主自治」的運動轉進了新的時期，有了新的組織和目標。當年十一月十二日，來到香港的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人，共同籌組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繼續朝新的目標推進。

「反獨裁爭民主自治」的運動，並沒有因事件遭鎮壓而消失；在新的時局下，留在島內的有許多人轉入地下，投身中共「省工委」，在台灣島內為紅色祖國奮鬥；而直接轉往大陸的人士，便以「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為中心朝新的目標前進。直到五〇年代韓戰爆發，東西冷戰尖銳對立，台灣自此進入了冷戰和內戰的雙戰時期，完全籠罩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時代中。

二〇〇六年二月九日

原載《人間思想創作叢刊》「二二八：文學與歷史」二〇〇六年春季號

打破刻板印象·重回台灣語言問題的原點

在台灣，語言問題往往超出語言本身的意義，而帶有高度的政治性；不但在文化思想界是一個具有論爭性的議題，甚至連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場合，說國語或說台灣話都帶有一定的政治意味。台灣的語言問題，主要是指國語與方言（台灣話）的關係問題（這並不是說同屬台灣話的閩南話、客家話和原住民語言之間就沒有問題，而是這些問題都屬於次要的問題）。兩者本來是同一民族的不同地方語言，只不過一個成了全國性的共同語，而一個是地方性的共同語，彼此之間在大陸的福建閩南地方並不構成問題，但在台灣居然形成敏感關係，可見得問題的本質並不在語言本身，而是在使用這語言的台灣社會歷史的問題。究其因，其中固然滲雜著日本殖民統治期所遺留的語言意識的影響，但主要還是由於一九五〇年以後，國際冷戰與國共內戰所造成的兩岸長期隔絕和對峙的大環境下，台灣島內的國民黨國家與台灣社會之間的政治權力消長歷史所造成的。

在國民黨政府的反共戒嚴時期，主要由外省籍人士掌控的獨裁政治，採取了偏向的獨尊國語而壓抑方言的政策；譬如，學校教育實施了過火的標準國語教學，限制廣播電視方言節目的播出時間、內容等等，使方言與國語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因而造成了語言上的省籍不平等關係和政治上的省籍不平等關係的嚴重重疊；語言成了身份

符號，代表了個人的省籍與政治位置。因此，形成了以語言為辨別的二重社會價值標準；說國語的就是外省人、都市人、有權力的人、優越的人；相反地，說台灣話的人，就是本省人、鄉下人、沒有權勢的人、很「土」的人。當然，造成這樣的社會成見，其中也包含了一般發展中國家所共有的問題，亦即在急劇的現代化過程中，全民追求「菁英化」、「優等生化」、「都市化」，所產生的城鄉不平等問題的共同語和方言之間的不平等關係；換言之，就是一個現代「公民社會」形成的歷史過程中，所常有的特殊的語言不平等現象。

進入七〇年代，在反西方、反國民黨政治獨裁的回歸鄉土社會思潮中，唱台灣歌謠說台灣話，曾經成為反抗體制的象徵之一，也出現了許多批判國民黨獨尊國語壓抑方言政策的言論。八〇年代初，黨外民主化運動進入了高潮，語言問題成為民主化訴求之一，政見發表會上，使用台灣話的演講往往吸引許多聽眾人潮，這時期，至少在民間社會，台灣話與國語已取得了平等的地位。但是，進入了八〇年代中後期，本來共同為反抗國民黨獨裁政治的黨外運動，有了新的變化。民進黨成立後，逐漸傾斜向反中國的運動，台灣話隱然成為其陣營內區別忠誠度的尺度，因而出現了福佬沙文主義的現象，同時，台灣話也成了台灣的族群政治（其實體是省籍政治）動員的最有效工具，一種萬靈丹。今日，更有一些獨派學者，為了建構「台灣是多民族國家」論，而誇大稱台灣話（河洛話）與中國話是不一樣的，是各自獨立的民族語言；在他們眼

中，台灣話已是「準國語」，是將來的新而獨立的國家的「國語」。這種論調，已超出了「國語」與「方言」關係的範疇，而成了語言的「兩國論」了。還有，做為台獨運動精神領導的台獨史觀，也不斷誇大渲染台灣話受中國話（國語）壓迫的悲情歷史；特別是有關台灣光復初期的語言問題，原本是屬於一般殖民地解放後都必經的，由殖民者語言（日語）轉換成民族語言（國語或台灣話）所遭遇的困難和苦惱，台獨史觀卻刻意把它扭曲成國民政府對台灣的語言「再殖民」。

語言的泛政治化現象，隨著獨派勢力的執政，已悄悄地、迅速地擴散到台灣社會的公共空間。譬如，在國語普及率幾達百分之百的今天，台北市捷運局好像不知道事實，如脫褲子放屁似地，不計成本在捷運車廂以四種語音廣播，似乎想向公眾宣示台灣已是「四大族群」的「國家」。這樣的公共廣播，就是在打造一種新的「國民語言意識」，是政治意識型態凌駕語言的惡例，非常不民主也不科學，與國民黨獨裁統治時期的「國語政策」，僅五十步與百步之差。正如美國語言大師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說的：「所有所謂的語言運動，本質上都是一種政治運動」。當今，「國語」與「台灣話」的關係，在許多場合，已成了政治上「統、獨」立場的標記，許多獨派的朋友已不稱「國語」，而稱「中國話」或「北京話」了，他們的「國語」指的是「台灣話」。這已不僅是民族內部問題，而是國際問題了；只要美國繼續維持利用台灣來牽制中國大陸的戰略，國語與台灣話的關係，就很難回復到它的原貌。

為了打破語言問題的刻板印象，阻止語言泛政治化現象的擴張，使大家能更客觀地、科學地理解台灣的「國語與方言」關係的原貌，本欄特別選刊了六篇光復初期有關「國語與方言」的專論。這六篇專論的三位作者，是魏建功、何容、陳文彬。魏建功先生是光復後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的第一任主委，何容先生是副主委，何先生來台前曾在北平長期從事「國語運動」，他們兩人於一九四六年二、三月間來台，四月二日創設了隸屬長官公署教育處的「國語推行委員會」。陳文彬先生是高雄燕巢人，年輕時因為反抗日本殖民統治，赴上海、日本兩地求學，後畢業於日本法政大學，是著名的語言學家以及進步的思想家，光復後曾任台大、師院教授、建國中學校長、《人民導報》主筆，一九四九年五月間因為躲避國民黨軍警的追捕而逃往大陸。

這六篇語言專論最有價值之處在於：它代表了台灣光復後，面對日本殖民統治遺留的語言問題（殖民者語言——日本話壓迫漢民族語言——台灣話的問題），在語言的去殖民化、民族化的時代任務中，從事語言運動的外省和本省籍語言專家們的主要思考和實踐。它與五〇年代以後國民黨高壓的「國語政策」和八〇年代以後的「台灣話政治運動」，乃至今日的泛台獨勢力悄悄推動建構的「台灣話準國語」工作，有根本的不同。相較之下，他們的觀點是科學的、民主的，是台灣語言問題的原點；同時，這個原點，也繼承了中國白話文運動中誕生的，由錢玄同、劉半農等推動的「國語運動」的精神。七〇年代，夏威夷大學東亞語言系教授鄭良偉先生，在《大學》

雜誌第六十八期（一九七三年九月）上發表的《論雙語式語言統一的理論與實際》文中，就曾提及：「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第一一六二頁，有下列的聲明：『統一國語並非消滅方言之謂』，『狹義的國語為標準語……廣義的國語則凡中國之各種方言均為國語。現在標準語為北平語是亦方言之一』……同文中規定研究方言以便學習國語，鼓勵方言文學以便充實國語的文學」。這才是國語與台灣話（方言）關係的原貌，是合乎科學、民主精神的語言政策，與這六篇專論的中心觀點是相近的。

接著下面將綜合介紹評述這六篇專論：

首先，這些專論扼要地點明了台灣話和國語的根本性質。它說：台灣話是中國話的一種，完全是中國話，是一種有「國魂」的中國話；而國語本身也是一種方言，只不過因為它所使用的的人最多且分佈最廣，因此從一個北平的地方方言（土白話）擴大到全國，而成為全國共同的語言。實際上，這個道理和世界上所有「現代國家」的形或歷史中的「國語運動」是相同的。發生在民國初年的「國語運動」，其本質就是在創建中國的現代國家過程中，追求「言文一致」的統一運動。關於國語與方言（台灣話）的關係，這些專論都強調，方言（台灣話）與國語是同系的語言，是同一種語言演變而成的不同支派；彼此間，文字、語法相同，語彙、語詞也大致相同，在語音上差別雖大，但也有演變的規則可循。兩者同是祖國的語言，因此，光復後的台灣，從「方言學國語」是學習國語的最佳捷徑；而且，保存方言能幫助國語的推行，推行國

語也能幫助方言的保存，彼此相輔相成。同時，它還強調了，「一種方言在它自己的本區域內，應該是日常生活中的用語」，這樣的一個淺顯明白但至關重要的觀點。但是這個觀點，在國民黨政府的「國語政策」中，長期間被抹消了，以致於對一般人來說是陌生的，因為他們一生下來就接受了國民黨政府的中央集權式的國語教育，對國語與方言的關係形成了刻板印象，無法以科學的、民主的態度去看待語言問題，因此，這些專論有語言的再啟蒙作用。

在上述的認識基礎上，這些專論認為，初脫離殖民統治復歸祖國的台灣，台灣話雖然還沒有完全被殖民語言的日本話消滅，但受到日本話的壓迫，已經有些變質，而且與我國其他地區的方言相比，已經喪失了它在台灣社會應有的方言地位。因此，何容特別主張，首先「應該設法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怎樣恢復台灣話的方言地位呢？在原則、作法上，他認為：凡是可以台灣話的時候都用台灣話，不用日本話；而且從外省來的不會說台灣話的人應該學習台灣話，「因為台灣話同大陸各地的方言一樣，有被學習的資格」。其次，對於學習國語的方法，他強調要「重拾『從方言學國語』的這把金鑰匙」，決不可用學外國語的方法去學國語，並糾正說：要用方言的思路寫文章，不可用日語的思路寫文章，只要恢復了方言（台灣話）的能力，用台灣話對照學習國語，自然水道渠成，「三五年後，我們就可以收拾行李向本省同胞告別了」，何容肯定地說。

對於當時在台灣推行的「國語運動」性格，在《新生報》由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主編「國語」副刊創刊號上（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有這麼一段話說明道：「國語運動在我國還算是一社會運動，始終沒有得到政府徹頭徹尾的，用政治力量嚴厲執行過」，也就是說，一直到台灣光復初期，「國語運動」仍然是一種「社會運動」，還未成為政府權力強力執行的「國語政策」。事實上，當時的「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是一個人力、物力很小的機構；各縣市雖設有「國語推行所」，但全省總共只有四十幾位國語推行員，曾在北平甄選了四十多位（預定二百位）國語推行員，但願意來台工作的只有三十多位，而且二二八事件後，各縣市的國語推行所被裁撤，使得四十多位國語推行員一度居無定所。總之，當時在台灣推行的國語運動，主要的目的，在去除壓迫台灣話的日本話，恢復台灣原有的民族語言（包括台灣話和國語），特別是致力於恢復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這就是台灣光復初期「語言的去殖民」和「語言的民族化」的真精神。由此可知，如陳芳明等的台獨學者所說的：「光復後國民政府用「國語」壓迫、歧視台灣人的語言、思惟，完全是虛構的謊言。至於「國語運動」採用的方法，則是鼓勵「用台灣話學國語」，「用方言的思路寫文章」，這是相當務實的科學態度。主委魏建功還更進一步指出，學習國語不是一個單純的語言訓練，而是關聯到「文化和思路的光復問題」，他說：「不覺得國語普及不普及成問題，日夜焦心的是，如何使得教育文化上促進精神復原的工具，完善而敏捷

的使大家能自由運用起來」。由此可知，當時的國語運動，也是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後的台灣文化重建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原刊於《人間思想創作叢刊》二〇〇一年秋冬季號

台灣光復期歷史「辯証」

——可悲的分離主義文學論

有朋友問說：最近為什麼專搞歷史來了？不搞現在的問題，卻去搞過去的問題，不是太脫離現實了嗎？我回答說：因為歷史問題經常也是現實問題；譬如：日本的靖國神社參拜問題或日本歷史教科書問題，雖然是過去的事，卻與日本的現實動向、與日本右傾化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問題有很深的關係；李登輝當政時，大力推行的，便是一國中「教科書《認識台灣》——「歷史篇」，下台後推動的，就是日本人小林善紀的《台灣論》，兩者都企圖通過台灣史觀打造今日台灣的「新國民意識」。所有的統治者都深知，掌握歷史的詮釋權與維持或強化統治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都熱衷於湮滅歷史或虛構歷史，使被統治者不瞭解歷史真實而喪失反抗的能力，作為意識型態的歷史觀的統治，其實就是現實統治的基礎，我們怎麼可以不重視歷史問題呢？

特別是，台灣的歷史問題更是如此。

百年來，台灣經歷了曲折複雜的歷史，歷史也數度被權力者所扭曲、湮滅；再加之台灣今日過於早熟的後資本主義文化，個人已被零碎化、社會聯繫斷裂，虛擬的和形象的世界取代了真實的世界，誰在乎歷史？因此，普遍存在著對歷史的虛無感。

但是，歷史問題並不因此而消失，當今台灣的新當權者，就是利用這普遍的歷史虛無感，千方百計地建構他們的歷史論，用所謂的台灣史觀，來打造台灣的新「國民意識」，以維持、強化其在歷史意識型態上的統治。

它就是分離主義的台灣史論；這種史論，不是排除台灣歷史中的中國本質，就是捏造中國人如何壓迫台灣人，或誇大中國人與台灣人對立的歷史，把台灣完全孤立於中國與世界之外，以此打造「反中國」或「去中國」的國民意識。

這就是當下台灣的統治性歷史觀。

它是當權者強化台灣現實統治的一部分，我們怎麼可以把歷史當做過去的問題呢？歷史問題的鬥爭，正是現實問題鬥爭不可分的部分，這個道理，現在的統治者清楚得很。

而，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史觀，一向就是分離主義歷史論的急先鋒，因此它是台灣的歷史問題中最尖銳的部分。

揭露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欺妄性，不只是為了歷史的工作，更是為了現實的工作。

其中，陳芳明的台灣文學史論，就是這種分離主義文學史觀的代表之一。

去年，針對陳芳明的《台灣文學的建構和分期》一文，筆者寫了《戰後再殖民論的顛倒》，指出它的「戰後再殖民論」背離了社會科學的常識和台灣歷史事實，是

「以意識型態取代歷史」，並且在文末引用了前輩作家龍瑛宗說過的一句話：「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間接奉勸他，既然要搞文學就不能有謊言，謊言與文學是不能並存的。

最近，他在《聯合文學》上又連續刊出了二篇文章，一是《戰後初期文學的重建與頓挫》（二〇〇〇一年三月號）、另一是《「二·二八」事件後的文學認同和論戰》（二〇〇〇一年四月號），洋洋灑灑數萬字，專論了台灣光復期（一九四五—一九五〇）的文學歷史。這段文學史的研究，至今可說仍處於空白狀態，史料也嚴重不足，不要說一般讀者，即便是文學研究者，恐怕也不易判別它所運用的史料的對錯、立論的虛實，因此是最容易被虛構、作假、扭曲的一段歷史。恰好筆者數年來專研這段文學歷史，有一點心得，發現該二篇文章，作偽、捏造史料嚴重。陳芳明為了繼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不但延續了我在前文已批評過他的「用意識型態取代歷史、取代社會科學」的問題，更變本加厲地恣意把史料截頭去尾斷章取義，扭曲前輩作家的作品和思想，可說到了公然竄改史料、史實的地步。

下面本文將依據客觀史料，逐步揭露它「作偽造假」的真面目；並借此對台灣光復期歷史的一些基本問題做一番辯析、澄清，打破台灣分離主義者長期以來獨擅的偽歷史觀點。

一、再談台灣「光復」的意義——是「主權復歸」，不是「行政接收」

就如所有的台灣分離主義者的戰後史論，必定是從塗消或扭曲「八·一五」——日本投降台灣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意義開始一樣；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也是從塗消、扭曲台灣「光復」的歷史起頭的。他文章一開始便如此寫道：

太平洋戰爭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結束，日本帝國政府宣佈無條件投降，台灣正式脫離長達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依照開羅宣言的約定，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

他的這段歷史敘述，似是而非，若不深究，必定受其矇蔽一眼帶過。其實，其中深藏玄機，是典型的分離主義的「台灣戰後史觀」。前半段的敘述，把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完全歸因於太平洋戰爭的終結，刻意不提它與日本侵華戰爭、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關係；也就是，排除了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動力中的中國要素，把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與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因果關係脫鉤，為他的「台灣主權未定論」預埋伏筆；後半段敘述，更刻意避《開羅宣言》明記的：「日本竊自中國的……台灣、澎湖應歸還中國」的內容，而以「依《開羅宣言》的約定，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的杜撰更替。只要稍加對照就可看出，開羅宣言明記的「台灣應歸還中國」與陳芳明杜撰的「中華民國負責來台接收」，兩者之間的歷史意義是天差地別的；所謂「負責來台接收」，意指日本投降後中國政府（當時是「中華民國政府」）的來台接

收，與戰後美軍「負責」接管日本、南朝鮮和琉球一樣，都是受盟軍的命令進行暫時的軍事和行政「接管」，並不是一「收復主權」；這與《開羅宣言》中明記的台、澎主權歸還中國的意義，當然是天壤之別。陳芳明一面說「依照《開羅宣言》的約定」，一面卻掏空宣言中「台灣歸還中國」的重要內容，說中華民國只是「負責來台接收」，這就是想以「瞞天過海」、「陳倉暗渡」的手法竄改史實，想以這樣的敘述來達到台灣主權未定論的看法。說明白了，就是企圖從根本上否定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進而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實際上，像陳芳明這樣的篡改論調，其總根源，來自於戰後美國在冷戰中對華戰略的陰謀。一九四七年初，美國發表了「冷戰」宣言之後，為了它在東亞的冷戰戰略的需要，企圖把已歸還中國領土的台灣置於其勢力支配之下，而開始鼓吹「台灣地位未定論」，否定《開羅宣言》以及台灣已復歸中國的歷史事實。源自於美國對華戰略陰謀的這種論調，日後便成了台獨分離主義勢力的基本的歷史教義之一；李登輝政權後期，用日本右翼慣用的「終戰」史觀來取代「光復」史觀，也可視為同一脈絡。

至於日本投降後，台灣是不是已復歸祖國（中國），這只要看看當時台灣人民如何歡天喜地慶祝復歸，或者台灣的知識人如何評價台灣光復便可知了，不是陳芳明等分離主義者或美國霸權，憑強權或強詞就可以塗改的。譬如，光復後，一向對陳儀政府的弊病批評最力的台灣作家王白淵，在《民主大路》（《新新》第三期，一九四六

年三月二十日）一文中便曾如此說到：

台灣業已光復，從殖民地的桎梏，回到祖國的懷抱，與中國打成一片，踏入民主主義國家之門，這是歷史的飛躍，又是民族起死回生之春。

王白淵的這段話，簡單有力地記錄了當時台灣知識人對台灣光復的看法；如果台灣的戰後真如美國霸權鼓吹的「台灣地位未定論」，或者如陳芳明所虛構的中國「再殖民」台灣論，那麼，王白淵所說的「台灣光復！回到祖國的懷抱……這是歷史的飛躍」，豈不成了胡言謊語；如果，從今日陳芳明等台獨分離主義者的尺規來看，王白淵的言論豈不成了不可救藥的「大統派」。實際上，王白淵的看法，代表了光復初期的全台灣人民，包括台灣全體文化知識界的看法；「二·二八」事件後，第一位從事台獨分離主義運動的廖文毅，在光復當時也曾熱烈地表示：「台灣光復了，台灣的版圖歸還祖國，我們的國家自強，國權自主，國土重圓了。」（《光復的意義》，《前鋒》創刊號，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

因此，不論從歷史事實來看，或者從當時的台灣知識人的言論立場來看，日本投降後，台灣已復歸祖國（中國），這是鐵的事實，不是陳芳明等可以篡改的。

一一、駁行政長官公署「再殖民」論

否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主權復歸祖國（中國）的歷史事實後，陳芳明為了繼續虛

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便把光復後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描述成是「日本台灣總督府的翻版」、「不脫殖民統治的變相延續」、「對台灣社會進行帝國式的控制」、「比殖民權力支配還要嚴苛的體制」、「迫使台灣社會淪為『再殖民時期』」等等；用一種沒有具體內容、沒有客觀論據堆砌起來的斷定語句，把行政長官公署比做與日據的台灣總督府一樣，同為殖民政權。

（一）殖民政權與民族政權的不同

光復後陳儀主政的行政長官公署，施政上集權、腐敗、貪污又無能，積累了深厚的民怨，終至爆發了「二·二八」事件，是一個失敗的政府，這已是公論；不管是以集權政府、腐敗政府或「劫收」政府來形容它也好，或說它如何地「比殖民權力支配還嚴苛」也好（何況這還值得商榷），都沒錯，也都符合事實。然而依社會科學上的「國家論」，在政權的民族性質上，行政長官公署絕對不是什麼「殖民政權」，而只是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當時是「國民政府」）的地方政府，一個集權又腐敗的「民族政權」。譬如德國的希特勒、日本的東條英機等法西斯政權，不管它如何專制、獨裁、進行軍國法西斯的統治，對德國人民或日本人民而言，它仍是一「民族政權」，絕對不會是「殖民政權」；如果因為獨裁、極權的統治而把希特勒說成是對德國人進行殖民統治，那真是天大的笑話。這是社會科學的常識，只有一個社會科學知識的低能兒，才會胡謔把獨裁、腐敗的政權等同於「殖民政權」。

那麼，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與復歸中國後國民政府（陳儀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在本質上有什麼不同？

一般而言，殖民統治最明顯的特徵，就在異民族殖民者對被殖民者在法政上的「民族專政」，殖民者完全剝奪了被殖民者的政治權，殖民者（宗主國）的國家憲法和法律決不涵蓋殖民地，因此殖民地人民並不具有宗主國「國民」的身份；所謂「國民」，就是指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憲法和法律所涵蓋的人民，具有以參政權為主的各種政治上的權利和義務，而殖民地人民是完全沒有的，這就是殖民地人民與一般民族國家的「國民」，最大的不同之處。

日本對台灣五十年的殖民統治，日本帝國憲法從來就不曾涵蓋台灣，當然，日本本國的法律也不曾直接施行於台灣，在台灣施行的法律，只是屬於「委任立法」。法學家黃靜嘉先生的大作《日據時期之台灣殖民地法制及殖民地統治》一書，提到所謂「委任立法」的意義，它就是：

日本本國法（內地法）之制定，須依憲法所定經議會議決之程序；而在外地（殖民地），原則上系分別由殖民地長官發佈代替法律之命令（在台灣稱為「律令」、在朝鮮稱為「制令」），或由（日本）中央政府以天皇名義發佈之敕令，以（日本）本土之法律（部分或全部）施行之（括弧系筆者所加）。

簡單地說，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法律，與其國內經議會立法產生的法律在性質上完全不同，它是依殖民統治機關——台灣總督府，對台灣的殖民統治需要而以行政命令頒佈的。

實際上，所有的殖民統治者都是一樣的，為了實現宗主國的壟斷資本在殖民地的壟斷利益，它必然在法政上採取「民族專政」的形式，剝奪被殖民者的政治權和法律權，以便進行經濟上的剝削。同時，為了進一步維護和擴大政治、經濟上的殖民利益，對殖民地的文化，包括語言、宗教信仰、感情意識等，也進行「去民族化」，亦即「殖民地化」，這也是殖民統治的重要手段。

台灣光復就是打倒了這樣的日本對台灣的殖民統治。

至於台灣的光復帶來了什麼大的變化，有什麼巨大的變革？

簡單地說，就是使台灣人民從「殖民地人」的地位，躍進到中國「國民」的地位。

前輩作家王白淵在台灣光復後說：「台省之光復，在其本質上，是徹底的民族革命」（《告外省人諸公》、《政經報》二卷二期，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所謂「徹底的民族革命」，就是指台灣人民在民族地位和民族關係上有了革命性的變革；由於全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戰爭得到了最後的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也打倒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政權，造成了台灣殖民地的解放，使台灣人民從上述日帝的政治、

經濟和文化的民族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復歸為祖國（中國）的一省，台灣人民當然也復歸為中國「國民」，得到了作為「國民」的各種政治權和政治地位。因此，對台灣人民而言，它等於是一次如王白淵說的「徹底的民族革命」。

它具體地表現在，台灣光復同時，國民政府的憲法和法律立即涵蓋台灣。

雖然，當時國民政府仍然處於訓政時期，尚未頒佈憲法，但台灣光復復歸祖國後，當時全國施行的「約法」與法律立即施行於台灣，台灣人民與全中國各省人民一樣，都處於相同的政治、法律地位。一九四六年底，台灣也選出了國民參政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南京的制憲國大。

這就是台灣人民在復歸祖國（中國）後，與被殖民時期的最大不同。

台灣人民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最具體的內容，就在獲得了平等的參政權上。光復後，行政長官公署立即在台灣實施普選，選出各級民意代表，創設了台灣的各級民意代表機關。

（二）光復後台灣人民的參政權

陳儀來台就職不過半個月，就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五日的第一次紀念周上，發表了《建立民意機關，給台胞參政的機會》的施政報告。接著，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公佈了《台灣省各級民意機關成立方案》，開始推動台灣人民的參政權；翌年（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五日開始辦理「公民宣誓登記」，接著，經由普選成立了村

里民、鄉鎮民代表大會、縣市參議會和省參議會，並於五月一日召開了第一屆的台灣省參議會。對於這台灣歷史上首次的普選，當時的《台灣新生報》稱之為台灣「民主的第一聲」。

光復後，台灣人民除了獲得並實現了台灣省內的參政權之外，作為中國「國民」的一員，也選出了中央民意代表，參加了全國性的政治活動。

就如長官公署官員張皋在《新台灣的政治建設》（《現代週刊》，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一文中所說的：

台灣人民今後不僅是台灣的主人，不僅要參加台灣一省的政治，而且是中華民國的主人，將參加整個國家的政治。

因此，在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八位「參政員」，參加了在南京召開的「國民參政會」；另外，也經由省參議會選出了十八位元台灣地區代表，參加了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南京召開的「制憲國民大會」；並經由普選，於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選出了三十名台灣地區的職業及婦女團體的「國民大會代表」，參加了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全中國行憲後的第一屆國民代表大會，依憲法行使國民參政權。

單從上述台灣人民在光復後行使的參政權來看，就明白了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

論」是欺世之論，有那種從地方到中央都有參政權的「殖民地人民」嗎？

(三) 辟陳芳明對行政長官公署體制的幾點訛論

陳芳明又以「陳儀政府掌握了行政、財政、司法、軍事大權」、「實施與當時大陸各省有別特殊化體制」為由，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

這必須從國民政府為什麼會在台灣光復後實行高度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問題來看。

專研光復初期政治史的鄭梓先生，在《國民政府對於「收復台灣」之設計》一文（新化圖書出版，一九九四年《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中寫道：

戰後台灣的接收與重建，乃是全中國復員計畫中被劃為兩個特殊的光復區之一（另一光復區是東北，其餘皆劃為收復區與後方區），因此採取單獨派遣大員全權綜合接收的方式。

因此可知，採取集行政、軍事大權於一身的行政長官體制，目的在求「事權統一」，使甫脫離殖民統治的台灣的接收與重建得以「順利完成」，基本上，它只是一個臨時性的過渡性的政治體制。因為當時的台灣，是一個剛經歷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以及曾被日本軍國主義高度動員成南侵基地的地方；並且，由於日本帝國的崩潰，使原本高度依賴日本帝國經濟圈的台灣殖民地經濟也將全面崩盤，再加上戰後必

然出現的世界經濟蕭條，可預見台灣經濟的重建將萬分困難；還有，由於日本的殖民軍國教育和皇民化運動，所遺留的意識毒害甚深，台灣社會心理的重建也將十分艱巨複雜；況且，雖然日本已投降，但現實上台灣仍有十七萬的日軍駐留、二十九萬的日本人居留，各機關產業仍在日本人手裡，行政、治安仍由日本人維持，而且這些近五十萬的日軍日僑還有待遣返。由於上述種種困難的任務有待解決和完成，非有強有力的行政組織是無法竟其功的。

這就是為什麼國民政府在戰後重建期，不得不採取集權的行政長官體制的現實原因，與「殖民」不殖民一點關係都沒有。

陳芳明等台獨分離主義者，經常用似是而非的說法，把行政長官公署等同於日本在台殖民機關台灣總督府，說「行政長官公署的組織是總督府的翻版」、「行政長官公署掌握行政、司法、軍事大權，權力超過日本總督」等等。這完全是以訛傳訛，瞎說！

就行政機關的組織來看，日本殖民台灣的總督府分五局二部；而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則下設九處三委員會，兩者差異甚大；行政長官公署根本不是什麼「總督府的翻版」；實際上，行政長官公署組織與當時中國各省的省政府組織較相近，只不過，行政長官公署為了適應台灣的特殊情形，因地制宜而做了一定程度的調整而已。

至於，陳芳明說行政長官公署掌握「司法大權」，那也是瞎說！

不錯！行政長官公署為綜理行政得制定「署令」，但這「署令」與日本殖民機關總督府的「律令」權是完全不同的範疇，「律令」是等同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署令」只不過是台灣省的單行規章，屬於行政範疇，且它不能與國家法律抵觸。況且，當時這種行政權限也並非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所獨有的，而是中國各省政府都有的權力，一點也不特殊。至於，台灣的司法權，本來就屬國民政府中央的司法行政系統，完全超然於行政長官公署之外，長官公署並無司法權；至於監察權，則有中央派出的閩台監察使駐台行使。

因此，不論從台灣人民的政治地位、法律地位來看，還是從行政長官公署的「政制」來看，光復後，台灣已完全復歸中國，台灣人民已是百分之百的中國國民。至於復歸後所產生的省籍矛盾、集權與民主的矛盾、階級矛盾等等，全都屬於中國民族國家的內部矛盾，絕對不是異民族間的矛盾。陳芳明的「再殖民論」，就是矇騙，想把中國民族內部的矛盾扭曲為異民族間矛盾和對立，虛構他的「戰後再殖民論」，建構他的台獨史觀。

（四）歪曲新聞社論，捏造陳儀政府實施「省籍區隔」、「歧視台灣人」

陳文不惜以篡改史料、歪曲史實的手法，來捏造事實，誣指行政長官公署採取了「省籍區隔」、「公然歧視台灣人」、「排斥台灣人」的政策。誤導讀者，以為光復後的政權對台灣人進行了「再殖民」的統治。

譬如，他以變造了當時《民報》的社論《金融人才的登用》（一九四六年七月八日）的內容，以此誣指陳儀政府對台灣採取了「省籍區隔」的政策。

該社論原文的大意是：首先回顧了日本殖民者如何壓迫台灣金融的歷史，並稱讚光復後各銀行的接管要員都是內行人、逸材，接著才提出了批評說：「現狀很少有不採用本省人才的銀行……何獨台銀仍如日人時代一樣，本省人受重用的，寥如寒星」。社論的原意，主要在批評台灣銀行的用人政策，並呼籲「台銀」要像其他銀行一樣多多採用本省人。然而，陳芳明卻把該社論的這種原意扭曲成說：「社論呼籲陳儀政府不要排斥原來在銀行有辦事經驗的台灣人，起用人才也不能只限於來自中央的人員」，好像社論原意在批判陳儀政府政策性地排除了所有原任職銀行的台灣人，起用外省人，實際上，社論完全沒有這樣的內容，這內容完全是陳芳明自己杜撰的。社論明明是說：全省各銀行都採用本省人，為何惟獨「台銀」不重用本省人才；它是批評特定的機關台灣銀行用人不當的問題，而陳芳明卻把它扭曲成社論在批評陳儀政府排除台灣人起用外省人的「省籍排除」政策。

雖然，陳儀政府治下，確實發生了許多如該社論所批評的，外省人「牽親引戚」的惡風，或者「排他思想」的惡習，但是這是屬於政治「腐敗」的問題，決不是陳芳明所誣指的陳儀政府施行了一「省籍區隔」的政策，或政策性排斥台灣人的問題。

接著，陳芳明為了捏造陳儀政府「公然歧視台灣人」的謊言，更加露骨地篡改

《民報》社論《為什麼裁員》（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的內容。

該社論的原文是從風聞政府機關要裁員說起（實際上只是傳言並非事實），進而呼籲政府要防止「動輒發生優越感」、「輕視本省人」、「敢以亡國奴暴言相侮辱」的「貪污腐化之徒」，並要求在這個剛復歸祖國的過渡期，登用人才的標準不要太重視國語文程度，以免本省人才有向隅之泣。

像這種十分常見的批評時弊的社論，陳芳明居然可以把它篡改成與原社論完全不同的內容，說該社論：

指出陳儀政府有計劃把本省人排除在公眾機構之外；認為對台灣人進行裁員的主要原因，在於執政者公然歧視台灣人。

只要把社論原文拿來比對就知道，該社論完全沒有說過這樣的話，遍讀社論原文，也找不到類似的內容或意指，這完完全全是陳芳明借該社論之名，憑空捏造的。

又，該社論也建議了，為了不使本省人才向隅，在錄用人才時不要太重視國語文的程度。陳芳明卻扭曲原意，把它誇大成：「為達到排斥台灣人的目的，陳儀政府更是以使用『國語國文』的程度做為用人的標準」；把光復後的語言過渡問題，無限上綱成：「語言已經成為檢驗政治立場的惟一標準，排除異己的有效工具」。一個本來就屬於過度偏向以「國語」程度為用人標準的「時弊」，陳芳明卻把它極端化成陳儀

政府用「國語」來「檢驗政治立場」、「排斥台灣人」。真是「居心叵測」。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陳芳明是如何的以篡改史料，把台灣光復初所產生的種種社會矛盾現象，如人事問題或語言問題等等，全部上綱並捏造成異族政權才可能採取的，政策性的「族群」區隔、「族群」歧視的問題。

（五）刻意曲解台灣前輩作家的作品和思想

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特點之一，就是反復虛構陳儀政府對台灣的歷史、文化、語言進行壓迫和歧視。因為找不到直接的事證（實際上也沒這事實），只好把台灣前輩作家的作品斷章取義，扭曲文意，把作品曲解成好像作家們都在批評陳儀政府對台灣文化的壓迫和歧視。譬如，他就把蘇新的《也漫談台灣藝文壇》一文，曲解成該文在「駁斥台灣受到『奴化』的官方觀點」；把龍瑛宗的《文學》，牽扯到「在抗拒戰後官方的表態文學」；把呂赫若的小說《月光光》，硬拗成在批判陳儀的「中國化的國語政策」。

實際上，陳芳明有關台灣光復初期文學歷史的論述，幾乎都是用這種手法虛造出來的。

為了誇大光復初期官方的「奴化」失言問題，陳文扭曲台灣左翼運動家蘇新在《台灣文化》上的一篇題為《也漫談台灣藝文壇》（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的文意。

蘇新文主要是針對署名「多瑙」的外省作家，發表在《人民導報》上的《漫談台

灣藝文壇》的文章，批駁該文對台灣藝文壇的許多錯誤的觀點。陳芳明居然把它說成，蘇新的文章在「駁斥台灣受到『奴化』的官方觀點」。

實際上，蘇新近萬字的文章中，「奴化」二字只不過出現過二次，一處是說：「或者因為多瑙先生認為本地人均被日人奴化了，不必多接觸……」，另一處是說：「結局，在光復之台灣紀念魯迅的，還是被認為『奴化了』的台灣人」。從整篇文章來看，「奴化」不但不是主要議題，連次要議題都談不上，甚至於只不過是該文許多形容詞中的一個而已，全文完全與陳芳明所謂的駁斥官方的「奴化」觀點無關。

這樣的，在蘇新全文中偶然出現的「奴化」二字，陳芳明竟然可以把它千百倍地放大成，蘇新全文都在「駁斥台灣受到『奴化』的官方觀點」；甚至於把它無限上綱，推論到：台灣作家「已在進行去殖民的工作」，「抗拒中國式的殖民」。這種手法無以名之，只有暫稱之「硬拗」。

在論及龍瑛宗的部分，陳文也顯露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硬拗」習性，更暴露了不做研究的怠慢。

他斷章截文了龍瑛宗發表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新新》創刊號上的短文《文學》的後半段，全然不顧該文全文的主題、文脈以及寫作的時代背景，而妄斷說，該文有「相當黯淡的心情」，透露了「強烈的絕望與虛無」。然而，恰恰相反，龍瑛宗在寫作該文時，正處於台灣光復始初，對台灣與全中國的前景抱著光明的熱烈期待，因

此該文也表露了對文學的無比信心。這只要看看被陳芳明抹消的該文前半段的內容便知，而原文前半段的內容是這樣的：

文學本來就是榮盛於安定的社會和黃金的時代，現在中國已進入了建設期，不久也將進入安定期，因此，談論文學並不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談論文學不是無意義的，那麼，該怎樣才能使文學有意義呢？那就是參加新中國的心理建設。

我們看到，在蘇聯，文學是如何光輝燦爛地參加了建設工作，因為，藝術是從事知性與感性之間的架橋的工作隊伍，文學也是如此。

短短數句，表明了，龍瑛宗既不「黯淡」也不「絕望與虛無」，而是對文學抱著光明的願景，並把文學的意義完全寄望在參加新中國的心理建設工作的熱望上；意思清清楚楚，勿須多論，文章本身就有力地駁斥了陳芳明的謊言。

在遮蔽了前半段的文脈後，陳芳明又開始「硬拗」。依文脈，龍文後半段中，說到「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這句話，分明是在批判日據殖民期的文學，陳芳明卻把它硬拗成，龍瑛宗「在抗拒戰後官方的表態文學」、「在反諷當時政治支配文學的畸形現象」；意思是指，龍文是在批判陳儀政府的「表態文學」、「政治支配文學」。只要稍有腦筋的人一定馬上可看破陳芳明的「膽大妄論」；從《新新》雜誌的

創刊日來推算，龍瑛宗寫作此文應是台灣光復之日（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的前後，當時，陳儀政府初抵台灣（或還未到台灣），怎麼就會出現了陳儀政府「政治支配文學」、「官方表態文學」的問題呢？陳芳明的虛構未免太離譜了。何況，龍瑛宗在該文的前半段，已很清楚地表明了，惟有一「參加新中國的心理建設」才會使文學有意義，對光復後的中國文學充滿信心的，怎麼突然又一「反諷當時的政治支配」、「抗拒戰後官方的表態文學」呢？這叫做憑空捏造、顛倒是非。

另外，陳芳明竟然把龍瑛宗發表於一九四七年一月《新新》雜誌上的《台北的表情》一文，誤為發表於一九四六年一月，先後差了一年。這如果只是日期的誤植，還情有可原，但是從他行文內容可知，完全不是誤植，而是一無所知。因為，陳芳明居然接著說「龍瑛宗書寫這段文字時，距離台灣光復才三個月而已」，可見得，他一直以為該文是龍瑛宗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寫的；即便如此，如果熟知龍瑛宗文章內容是描寫光復一年後的「台北表情」的話，也必定不會接著又寫「距離光復才三月」。顯然，陳芳明根本沒有讀過原文，否則決不會如此胡扯，不然，就是閉著眼抄研究生論文，才會這樣亂說。

作家呂赫若在光復後短短的一年間，克服了語言轉換的困難，發表了四篇白話文小說，分別是：《戰爭的故事——改姓名》、《戰爭的故事——一個獎》、《月光——光復以前》以及《冬夜》。這四篇小說的主題是很清楚的，前三篇是在清理與

批判日本的軍國殖民體制和皇民化政策，《冬夜》則是對光復後逐漸顯露的社會惡化現象提出了深刻的暴露與批判。

對過去的日本殖民體制的批判與反省，是光復後台灣民眾的共同感情；呂赫若作為一個優秀的作家，努力學習白話文，很快地寫出了中文作品，用文學藝術真實地反映了當時台灣人民清理日本殖民歷史的心理圖像。對這幾篇主題明確的作品，陳芳明居然也企圖混淆黑白，用他的分離主義的心態來污染呂赫若的作品和思想，指說呂赫若寫這些作品，是「在中國化的強勢要求下」、「為自己過去的文學活動辯護」；這完全是陳芳明為了虛構「戰後再殖民論」，而無中生有的卑劣說法。

離譜的是，他甚至把呂赫若批判日本皇民化「國語政策」的小說，《月光光——光復以前》的主題，扭曲成「批判陳儀政府的霸道」；並舉小說人物的話：「我們是台灣人，台灣人若老不可說台灣話，要怎樣過日子才好呢？」為例，說呂赫若也在批判「中國化的國語政策」。

這完全是強詞奪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呂赫若在小說篇名下，還明明白白地加了一個副題——「光復以前」，怎麼會是在批評「光復以後」呢？而且，呂赫若本身在光復後，積極投入台中的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工作，並努力學習中文，在光復不到半年就發表了第一篇中文小說，怎會自打耳光，自己批判自己努力追求的「中國化的國語政策」呢？

而且，只要曾稍微研究光復後的「國語政策」的人就會知道，當時國語推行委員會的魏建功、何容等人，所推動的國語運動，是主張先恢復被日本話所壓迫的台灣話應有的方言地位，來推行國語的；也就是說，主張台灣人應先通過學會被日本殖民者「國語政策」所壓迫的台灣話，來學習國語，並非以壓迫台灣話來推行國語。陳芳明不從事研究，只以他的意識型態來看問題，一看到小說人物批判壓迫台灣話的皇民化「國語政策」，以為光復後的「國語政策」也是以壓迫台灣話來推行國語，就不分青紅皂白地誣指呂赫若的小說也在批判「中國化的國語政策」。

三、「奴化」問題真相

陳芳明虛構「戰後再殖民論」的另一手法，便是把光復不久發生的官員「奴化」失言問題，誇大成所有的官員或外省人，都「以『奴化』或毒化思想來指控台灣人」、「以『奴化教育』來概括台灣知識份子所接受過的日文教育」等等；就是把陳儀政府或外省人描寫成，都指控台灣人「奴化」，指控台灣的殖民歷史、日語、思想、教育、習俗已完全「奴化」，據此塑造陳儀政府蔑視台灣歷史、欺凌台灣人的形象。因為它一直是分離主義者用來挑撥「省籍對立」的重大問題，有必要深入辯析。

(一)「奴化」發言真相

依報刊紀錄，當時關於「奴化」發言問題，曾經有過二次正面的議論；第一次是

作家王白淵以「讀者投書」方式，在《新生報》上發表了短文《所謂「奴化」問題》（一九四六年一月八日）；第二次，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召開的第一屆省參議會上，引發爭議的教育處長范壽康的「奴化」發言問題。

陳文也以這兩次的例子，大談「奴化」問題。但可笑的是，他居然把史料的日期和順序完全搞錯了！首先，他把實際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初發生的教育處長范壽康的「奴化」發言問題，錯搞成在一月發生；接著，他又煞有其事地把王白淵在一月八日刊出的《所謂「奴化」問題》一文，編造成說該文是在回應范壽康的奴化發言。實際上，范壽康的發言（五月）是在王白淵（一月）之後，兩者一點關係都沒有，陳芳明卻自編自導，硬把兩文的刊出日期順序顛倒；並把毫無關係的兩文，編造成關係密切，這就是捏造史實。

不知是抄襲研究生論文抄錯了，還是虛構史實太多了，以至於完全搞不清，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了！

當時這兩次有關「奴化」發言問題的議論，其實際情形如下：

作家王白淵在《所謂「奴化」問題》一文中批評說：「光復後來台的大小官員，每個人都認定，日本對台灣施行的『皇民化』完全失敗，但是繼之開口就說台胞奴化，這樣論理的矛盾，非常使我們感覺到莫名其妙」。接著，他以台胞在甲午割台後成立「台灣民主國」，繼續武裝抵抗日軍入台，且「沒有一個人反對光復，個個慶

祝光復」為例，認為「台胞此種堅強的民族意識，雖受日本五十年的奴化政策，但是台胞並無奴化」。另外，王白淵同時發表在《政經報》上的一篇《告外省諸公》（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文中也如此說：「台胞有許多地方日本化，這當然毫無異議，但是，這種現象雖不可輕視，究屬枝節問題……而奴化不奴化是嚴肅的本質問題」，因此他建議「自此以後，不可再用『奴化』兩字，而以『日本化』代之」。王白淵的「奴化」問題批判，雖然沒有引起其他人的回應，但顯示了光復後的「奴化」發言問題確實存在。

而教育處長范壽康的「奴化」失言風波的經過，是這樣的：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民報》報導了范處長於四月二十九日在省訓團的演講，稱演講內容批評了台胞有獨立思想、以台治台的觀念、排擠外省人、完全奴化等，有侮辱台灣人之處。這報導引起了一些正在開會的省參議員的反彈，並在議會提出了對范處長的強烈質詢，特別是郭國基參議員，他強調說：從鄭成功以來兩百七十年間，台灣沒有一日忘記祖國，台胞有台人治台的觀念是事實，因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愛台灣是自治精神的表現，是當然的，我們排擠的是為升官發財而來的外省人，絕對不會排斥為服務台灣建設台灣而來的外省人……我敢大聲說，台胞不奴化，台胞雖然受了日本五十年的奴化政策，在世界上最殘忍的日本員警的壓迫下，尚能持續與之鬥爭，並未奴化……（以上郭國基的發言內容，乃參考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新生報》

的中文版和日文版的記載綜合而成)。

根據五月二日和八日的《新生報》報導，我們可以知道，事實上，范處長在省訓團的演講題目是《復興台灣精神》，內容大略是說：台灣過去有崇高光榮的歷史，那就是鄭成功的身在台灣志在中國，愛台灣更愛中國的精神，希望團員把這種「台灣精神」發揚光大，不過，本省一小部分人士因受日本五十年間的宣傳與欺騙，難免有不正確之思想，例如主張台灣獨立或台人治台等等……惟此種錯誤的產生，責任不在台胞，而全在日本帝國主義者身上云云。

根據上面報導的內容可知，范壽康並沒有直接說出「台胞奴化」之語，只說了「本省一小部分人士因受日本五十年間的宣傳與欺騙」等語。或許是說者無意聽者有心，再加上語言的隔閡，才把它報導成范壽康說「台胞奴化」吧！真相如何，就像羅生門一樣，不會有明白的一天。

然而，並不是說當時「奴化」發言問題不存在，就如王白淵在《告外省人諸公》之中說：「許多外省人，開口就說台胞受過日人奴化五十年之久，思想歪曲，似乎以為不能當權之口吻」，由此可知，光復初，外省籍人士的「奴化」發言問題的確是存在的，但它絕對不是如陳芳明所誇大的，說陳儀政府或所有的外省人，都「以奴化或毒化來指控台灣人」，而只是部分「不肖外省人」，或為發奇財而來台者或由於抱有優越感，或因為對台灣實情的無知，才會有一「奴化」的發言。

(二) 事實上台灣人「奴化」了沒有？

雖然，王白淵和郭國基都說：「台胞雖受了日本五十年的奴化政策，但是台胞並不奴化」，但是，王白淵在這句話下面多加了一句話說：「可以說一百人中間九十九人絕對沒有奴化」，可見得，他並不是說全體台灣人都未奴化，還是認為仍有極少數台灣人「奴化」了，否則他不會在《告外省人諸公》一文文末呼籲：「不法日人，當然要剷除，腐敗台胞，應該要打倒，而不屑的外省人，更須要趕他回去」，他還是把一些「腐敗的台胞」列為「應該要打倒」的對象，這些「腐敗台胞」就是「奴化」了的台灣人。

當時，台籍知識人林萍心，發表在《前鋒》雜誌創刊號上（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文章——《我們新的任務開始了》，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說：「大多數的台灣同胞受盡了五十年日本奴隸教育，他們中間大部分已成了『機械的』愚民，而小部分已成為了極危險性的『準日本人』……我們最難對付的，應是那班受著了普通中等學校教育的又在社會上混過的人，他們是具備了最毒最深的頑固日本精神，他們血液裡流著了無數『天皇』、『大和』等等不可救藥的毒」。林萍心所指的最難應付的那班人，實際上，就是王白淵心目中的百分之九十九之外的已「奴化」的台灣人。

關於「奴化」問題，說明得最好的，當數楊逵的《「台灣文學」問答》一文（《新生報》「橋」副刊，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該文視野開擴地以辯證的思

維回答了問題。特抄錄原文如下：

問：你看，台灣人民奴化了沒有？

答：部分的台灣人是奴化了，他們因為自私自利，願做奴才來升官發財，或者求一頓飽。但這種人，在今天原是一批奴才，他們的奴才根性，說因教育來，寧可說是因為環境。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控制下的這個孤島上，自私自利的人都得做奴隸才得發其財。託管派、拜美派當然也是這一類的人。但大多數的人民，我想未曾奴化。台灣的三年小反五年大反，反日反封建鬥爭得到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是明證。奴化教育是有的，但不僅在日本帝國主義下，所有的帝國主義，所有的封建社會，封建國家都大規模地從事著奴化教育。有人說美國很民主，但它對黑人，對第三黨的華萊士是不是民主？它在中國養成了一大批的買辦，它在扶殖日本帝國主義，想利用它來壓服日本人民，甚至東亞諸國的人民。所以，輕重就說台灣人民受日本奴化教育的毒素作祟，這樣的說法沒有根據。

這就是有關台灣「奴化」問題的最科學的回答。

四、看到台灣的「殖民化」和「皇民化」， 也看到台灣的「民族性」和「現代性」

陳芳明為了把光復初期的政權塑造成「外來的」「殖民政權」，行文中不斷強調

說：「長官公署的當權者，一直把台灣社會的殖民經驗當做是『奴役化』、『皇民化』」。

也就是說，他反復渲染：長官公署的官員或外省人完全否定台灣社會的價值，認為台灣社會只有奴役化、皇民化，無一是處。

這種說法不僅背離史實，甚至可說是刻意的醜化，惡意挑撥省籍矛盾。

依據史料，光復後大陸來台的官員，雖然有人因台灣的被殖民歷史與地理的隔絕，而對台灣的社會歷史有不正確的看法，但整體來看，大多都有客觀公正的看法；特別是對於台灣的殖民歷史，他們不但看到台灣社會中所謂的殖民化、皇民化的部分，也看到台灣社會中的現代性和中國民族性的部分。

(一) 看到台灣的中國民族性也看到它的變質

譬如，魯迅的至友，專研法國文學的黎烈文先生，他在年初來到台灣，任職長官公署機關報《台灣新生報》的中文總主筆，他在一篇題為《對於台胞的幾點希望》(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文中，對於台灣的一切，就有如此的看法：

剛從內地過來的人，看到經過異族五十年統治的台灣同胞，仍能不屈不撓，保持祖國的方言和一切風俗，特別在農村方面，從住宅以至種種生活工具，幾乎和閩粵一帶富裕的農村所見到的無甚差別，更不能不欽佩本省同胞，過去五十年內對祖國

文物執著之深和對異族奮鬥之勇。

在此，黎烈文高度肯定了台灣人民，在殖民高壓下仍固守中國傳統的語言、文化、生活；亦即，他在台灣的殖民歷史中看到了台灣的堅強的中國民族性。然而，他也指出了「殖民化」所造成的隔閡部分，他說：

日本人使用了種種方法，使得台灣同胞漸漸地和祖國生疏、隔絕，以便達到所謂「皇民化」的目的，而中國本身在這五十年內也有了種種變革，同時在學術思想方面也有了重大的改革，這一切使得劫後相逢的弟兄，雖然滿懷欣喜，但總不免有著幾分隔膜。

另外，光復不久，由省內外人士共同組成了半官半民的文化團體——「台灣文化協進會」，在該協會的成立大會宣言中，對台灣的殖民歷史，也表現了辯證的看法；它一方面指出在台灣的殖民歷史中堅強的中國民族文化的抵抗精神，它說：

五十一年間的異族的統治，終是壓迫摧殘不了我們的文化的本質；不，不，我們竟反把異族的壓迫和摧殘，當做一種的「刺激劑」，當做精進練磨的「契機」，在含垢忍辱裡默默地培養著我們文化的成長。

然而，另一方面，該宣言也指出了，民族文化受到「破壞」而「變質」的事實：

不過，五十一年來的歲月，和日寇的設心苦慮，卻也發生過相當的「效果」，我們的文化，一部分變了質，一部分受過了嚴重的破壞，這我們要坦白地承認的。

這裡所指的，就是受到日本的殖民政策和皇民化政策的影響而「變質」的部分，也就是台灣社會中「殖民化」、「皇民化」的部分。

對於這問題，台灣出身，後赴大陸長期投身抗日戰爭第一線工作，光復初時任教育處副處長以及《人民導報》社長的宋斐如先生，在《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人民導報》，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一日）一文中，就指出，這是台灣文化的一畸形發展」，該文分析道：「台灣是漢明的正統，只因為離開祖國五十年的結果，致使文化正統起了變化」，由於「日本奴化政策所干涉壓抑禁絕之下，漢明的正統文化自然滯於五十年前的地步，所以沒有趕上祖國五十年來的進步」，並且「日本對於台灣採取殖民地文化政策，殖民地以上的學問和事物，是不能給台灣人民學習的，所以世界五十年來的進步，台灣並沒有充分吸收進來」，受上述因素的影響，他認為：「即令我們不能說台灣五十年來的文化完全停頓了，至少可以說台灣的文化確是一種畸形的發展」。

（二）發揚抗日民族運動精神

就像黎烈文的發言，和「台灣文化協進會」成立大會宣言一樣，他們對於台灣的

殖民歷史，不但看到它的「殖民化」、「皇民化」，也高度評價了它的「中國性」和民族文化的抵抗；這樣的觀點，在光復初期的時論中並非特例，而是極為一般的看法。而且，它不僅只表現在「時論」或「評論」上，也表現在官民的具體活動上，亦即，為日據期的抗日民族運動舉行了各種紀念活動，對抗日民族精神給予高度的頌揚。

譬如，光復翌年，一九四六年的五月二十五日，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和行政長官公署，便發動了一次由省內外人士，千餘人共同參與的「台灣民主國五十一周年紀念會」，紀念台灣民主國的抗日民族精神。另外，官民共同成立了「台灣革命先烈調查會」和「台灣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著手調查在台灣抗日民族解放運動中犧牲的鬥士名單和事蹟，並對遺族給予生活照顧。該會也將原來是日本殖民政府「始政日」的六月十七日改為「革命日」，該日在新竹縣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奉安典禮，將抗日英靈入祠桃園忠烈祠，並且在台北第一大劇場舉行了「台灣革命先烈追悼大會」。

實際上，台灣光復的意義，就是打倒了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使台灣復歸祖國，這正是台灣五十一年殖民歷史中，無數的台灣人民前仆後繼地投身抗日民族解放行動，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他們的精神，當然地成為台灣光復的新時代精神，而代表民族政權的行政長官公署，盛大紀念台灣人民的抗日民族解放運動和表揚它的精神，是理所當然的。官民共同高揚這種精神和活動，可說是台灣光復後精神上一「去殖民」

的具體表現。我們也可以說，所謂的「中國化」，並不專指「大陸化」或「國民黨化」，當時的「中國化」，也包含了發揚台灣歷史中的抗日精神和民族精神。單就這一點來說，長官公署是以恢復包括台灣歷史中的民族精神來「去殖民」「去皇民化」的，因此可說是一個「去殖民」的政權，決不是如陳芳明等所咒念的「再殖民」政權。

譬如，當時的教育處長范壽康，就曾寫了《發揚台灣精神》一文（《現代週刊》，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文中所指的「台灣精神」，並非今日台獨口號中的與中國對立的「台灣精神」，而是指，在台灣歷史上，與「中國民族精神」辯證統一的「鄭成功的精神」。再有，台籍人士張兆煥在《新生報》上發表的《發揚民族精神》一文中（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所指的「民族精神」，就是指台灣歷史上，郭懷一的抗荷、鄭成功反清驅荷、丘逢甲的台灣民主國運動、武裝抗日運動以及近代政治上的民族解放運動……等所表現出來的中國民族精神。

可見得，陳芳明的「長官公署的當權者一直把台灣社會的殖民經驗當做是『奴役化』、『皇民化』」的說法，完全是一派胡言。

（三）怎樣看台灣中的「現代性」

當時的長官公署或國民黨省黨部的官員，對於台灣的殖民歷史，不但看到它的「殖民性」，也看到了它的相對的「現代性」。譬如，當時的國民黨中宣部台灣特派

員盧冠群（此人後任《中華日報》發行人），在《新生報》上發表的《台灣文化重建之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就如此說道：

說到台灣文化，一般人的觀感，見仁見智，各有不同，有的說台灣文化很進步，有的說台灣文化很落後，這兩種看法都沒有錯。因為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文化，表現了兩種不同的現象，一方面相當進步，另一方面相當落後。

行政長官陳儀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六日，長官公署的第二次紀念周上，在提到要注意民主精神與科學的發展時，如此說道：

日本過去對於台灣在政治方面雖採用殖民政策，使台胞精神方面感著痛苦，但在物質建設方面，卻已有相當基礎，固未可一概抹煞。

在說到要注重學術研究時，他說：

本人到台後感到滿意的，是台灣的學術，工作做得很好，學術是為人類謀幸福的，本來沒有國界，因此，吾人對於日本學者的努力，亦應加以重視。

因此，陳儀才留用了大批日本的學者和技術人員。

魯迅至友，當時應陳儀之邀來台灣任台灣省編譯館館長的許壽裳先生，在《台灣

省編譯館的設立》一文（《現代週刊》，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中，對於台灣的學術文化程度也有很高的評價，他說：「要發揚台灣文化的特殊造詣，因為本省的學術文化，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可以有為各省模範的資格」。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六日的《新生報》社論——《建設台灣新文化》，也提到了台灣的「世界性文化」，它說：

台灣之民族文化雖不如祖國，但其世界性的文化絕不低。至於世界性的學術，我們須設法保留，不僅保留，還要使它發展。科學無國界，我們反對的是侵略，是奴役，不是科學及應用技術。

由此可見，陳芳明說的：光復後的「中國化」反對「日文思考」，這是天大的謊言。應該說，「中國化」反對的是「侵略的、奴役的、皇民的日文思考」，而不是「現代的、科學的日文思考」。

可見，陳芳明所指控的「長官公署及當權者」，他們不但看到了台灣社會的「殖民性」，也相當務實地評價了它的「現代性」。但是所謂的「現代性」，並不是中性的，它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不同的歷史主人下，有不同的意義；在殖民統治下，「現代性」是為了強化殖民剝削的「現代性」，是殖民者的現代性；惟有脫離殖民統治，在獨立的民族國家的條件下，「殖民地的現代性」才會成為「民族的現代性」，

亦即全民族的現代性：如此才能顯露出現代性的積極意義。光復後，台灣已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並復歸了祖國，台灣原有的為了殖民者的現代性，已成了民族的現代性，在這種歷史條件下，得到了積極的意義。

五、台灣文化的重建

對台灣民眾而言，台灣的光復，實際上包含了三種大歷史變革：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禍的結束，其次是脫離嚴酷的日本殖民統治以及復歸祖國。光復後，甫從戰爭和殖民的雙重壓迫下解放出來並復歸祖國的台灣，文化活動呈現了空前的熱烈，當時稱之為台灣文化的重建。「文化重建」的內容是多面而豐富的，它包括了對日據歷史的批判與整理，追求中國化、民主化、世界化等，因此也是複雜的。

然而，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關於光復後的文化活動，只虛構一個「中國化」與「奴役化」的對立與衝突，完全抹煞這些豐富的內容；在他的虛論中，光復後的文化活動，似乎只有行政長官公署或外省人，以「中國化」指控台灣人「奴化」、「皇民化」，而「台灣知識份子無不感到悲憤」，「紛紛予以反擊」等，貧瘠不毛的內容而已。

本來是充滿變革熱情的文化活動，卻被虛構成只有歧視、荒廢和斷裂；本來是多面豐富的，卻只剩下中國化霸權指控台灣人奴化皇民化的族群對立；本來是「文化

重建」，卻被他扭曲為「文化殖民」；原本充滿了「去殖民」的動力，卻被他顛倒成「再殖民」的壓迫。這就是台灣分離主義文化論的悲哀。

下面，將根據史料，分幾部分討論台灣光復後文化重建的實際情況。期冀通過呈現史實，來戳破陳芳明的虛論。

（一）文化官員的台灣「文化重建」

首先，讓我們先看看，被陳芳明指為「專以『中國化』來指控台灣人奴化、歧視台灣文化，來造成文化霸權」的長官公署文化官員，他們對台灣的文化重建的看法如何。

前面也介紹過的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他在《如何改進台灣文化教育》之中，分析了經過殖民歷史後的台灣文化的「正體」，他認為「台灣的文化確是一種畸形的發展」；因此主張台灣文化教育的改造，要循三原則出發：首先是一本質的改造「原則，要教育台胞變成「主人翁」，學習「做主人」，亦即，從沒有參政權、自主權的殖民地人學習做一個有參政權的國民；其次是要「正統的接續」原則，要教育台胞學習國內各方面的學識常識，使「歸宗」二字名副其實，並且要跟祖國進步而進步；最後是，灌注「世界新文化」的原則，應該培養台胞成為「世界人」。因此，他鼓勵大家要學習「做人、做主人、做中國人、做世界人」。

宋斐如的真知灼見，即使拿到今天台灣的文化環境來看，仍然如雷貫耳，具有高

度的批判性和啟示性。

統籌台灣的教育重建的教育處長范壽康，在《今後台灣教育的方向》（《現代週刊》，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文中，具體地說明了他的教育方向，他說：「過去五十年間台灣同胞所受到的教育，乃是地道的殖民地人民的教育，不是真正獨立國家國民的教育……是不平等、不合理的……，而現在台灣光復，台灣同胞都回到了祖國，自然應該徹底推翻不平等、不合理的皇民化教育，用最經濟科學的手段，使台灣教育完全中國化」。

而對於今後台灣教育的具體方向，他舉語文和思想兩方面。在語文方面，他認為今天台灣同胞不會講中國話或不懂國文，是當然的，並不需要負責任，這一完全是日本政府的罪惡」，但是，任何國家的國民應該說本國話懂本國文，這是很明顯的道理，因此，教育的第一個方向，便是使台胞人人會講中國話寫中國字。至於思想方向，他說：「台灣光復了，過去被日本政府強迫灌輸的帝國主義思想，應該剷除淨盡，我們今後要積極灌輸與培養的，乃是現代中國的三民主義思想」（此處的三民主義思想，內容與往後戒嚴期的國民黨制式三民主義思想是大不同的）。

由上可知，范壽康對台灣的教育方向的見解，重點在：徹底推翻日本的皇民教育建立真正獨立國家國民的教育，以及剷除日本帝國主義思想建立現代的三民主義思想。這就是教育上的「去殖民」，重點在除去日本的殖民、法西斯思想和體制，建立

獨立國家的國民教育。這種針對日本殖民者的「去殖民」，卻被陳芳明扭曲為針對台灣人的「再殖民」，其顛倒是非之甚，真是無以名之。

為了一促進台胞的心理建設，提高全國性的學術研究」而設立的「台灣省編譯館」，是光復初期的文化重建的重要機構。對於編譯館的工作重點，館長許壽裳在前述的《台灣省編譯館的設立》文中，提到有兩個方面；第一點，在「使台胞普遍獲得精神食糧，充分接受祖國文化的教養」，因此，設立了「學校教材組」、「社會讀物組」和「名著編譯組」，計畫提供中國通史、地理、文選、法令解釋等國民教養書籍，以及民主教養、民生教養、科技教養、國際政經情勢等書籍；第二點，是「發揚台灣文化的特殊造詣」，因此設立了「台灣研究組」，致力為台灣歷史、文化的學術研究。

任職公署機關報《新生報》總主筆的黎烈文，在前述的《對於台胞的幾點希望》文中，他提及要去掉「隔膜」，並寄望本省及其他各省同胞要共同努力的目標有：作為一個國民的條件，要儘快學習國文及中國歷史，同時，作為一個現代人，也要儘快學習政治、經濟、法律、國際問題等各方面的知識，還要「發揮自治精神、參與建國工作」，更要「知道棄舊取新，創造新的文化」。

從上述內容來看，長官公署負責文化教育工作的官員，他們對台灣的一文化重建」的觀點，大概有下列幾個特點：

一、他們都是站在，如何使「台灣同胞」從一個日本殖民地的人民轉換為獨立國家國民的立場出發的。

二、因此，他們主張首先必須從本質上去改造，脫離「殖民地人」的思想，確立獨立自主的精神，不但要變成「人」而且要「做主人」，不但要發揮自治精神也要參加整個中國的政治建設。

三、做中國人，培養作為中國國民的教養，儘快學習國文、中國文化歷史，以接續正統，並且要棄舊取新創造新文化。

四、培養作為現代人、世界人的教養，學習民主、民生、科技和政經、法律、國際問題等各方面的知識。

(二) 台灣歷史的整理、台灣文學的傳承和發展

為了把「中國化」抹黑成「殖民化」，陳芳明憑空虛構說：陳儀政府加速「中國化」，使得「戰後台灣知識份子沒有餘裕對日據期的歷史經驗與文學傳統從事整理與評價」，以致於傳承「斷裂」、「荒廢」、「空白」云云。

恰恰相反的，光復初期有關台灣歷史、文學的整理，評價和傳承的工作，不但沒有「斷裂」、「荒廢」，甚至還呈現了蓬勃健康的發展。其盛況，不但五十年代以後的反共戒嚴時期不能相比，八十年代以後的紛紛攘攘的台灣研究，在視野的廣度和觀點的進步性上，也難以企及。

下面簡單地列舉一些史實便可明白：

1、對台灣歷史進行了有系統的龐大的研究和整理

在光復不久，《新生報》有一篇社論《認識本國與認識台灣》（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它如此說到：「至於認識台灣，遠在去年四月，政府即在中央設計局成立一個台灣調查委員會，做了許多重要調查、研究和翻譯的工作」。這裡所指的「台灣調查委員會」，就是一九四三年《開羅宣言》確定了日本投降後台灣復歸祖國的事實後，「國府」成立的統籌收復台灣事宜的組織；該委員會在一年多的時間內調查、研究、編輯、翻譯、出版了數十種的台灣資料叢書，總共數達兩三百萬字，對台灣的歷史進行了一次龐大的有系統的調查研究和整理。

該文接著呼籲，為了增進國人對台灣的認識，完成新台灣的建設，最好設立「台灣研究所」、「編輯台灣叢書」。實際上，行政長官公署的三大文教機構之一的「台灣省編譯館」就扮演了這樣的工作；在許壽裳的策劃主持下，積極推動了對台灣文化、台灣歷史的研究。許壽裳曾在《台灣省編譯館的設立》（《現代週刊》，一九四六年九月三日）一文中表示說：「要發揚台灣文化的特殊造詣，來開創我國學術研究的新局面」，可見得他十分肯定台灣文化的特殊成就，主張發揚台灣文化來拓展中國學術研究的成果。因此，該館的四組中的一組便是「台灣研究組」，該組由台灣前輩作家楊雲萍主持，根據許壽裳在上文中的說明，「台灣研究組」的初步工作計

畫就包括了：台灣文獻目錄編纂、善本書印行、刊行日本專家著作，日據時代文獻檔案的整理研究以及刊行《台灣學報》。

另外，屬於行政長官公署機關報的《台灣新生報》，便由台灣先輩歷史家黃玉齋主持，集合了王白淵、吳漫沙、孫萬枝等十多位台籍文化人，共同研究整理並出版了共達一百三十萬字的《台灣年鑒》；書共分政治、經濟、產業、教育、文化……抗日運動等二十八章，不但包括日據歷史，更上溯到荷據的早期台灣史，可說是一部台灣歷史的百科全書，是台灣知識份子第一次自力自主共同合作達成的文化成果，不但是空前的創舉，恐怕連囂囂嚷嚷十數年的所謂「本土派」，也難望其項背吧！這些工作，正是陳芳明所指控的，以「中國化」來殖民台灣的行政長官公署所屬的文化機構所推動完成的。

2、整理和紀念日據期抗日反殖的民族運動歷史

光復初期，台灣掀起了全面清理日本殖民統治歷史的風潮，街頭到處張貼著「打倒三腳仔」、「打倒五十年壓政」的標語，報章雜誌也都站在民族的觀點批判日本的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特別是，在殖民統治下受到殘酷鎮壓的台灣民族運動的歷史，終於從日本殖民的黑牢中解放出來，受到新的民族時代的頌揚。譬如，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舉辦了一次紀念「台灣民主國」五十一周年的大會，有千餘人參加，並且在報刊上展開了許多有關「台灣民主國」的歷史回顧。還

有，過去每年的六月十七日，原為日本殖民者的「始政紀念日」，但光復後第一年（一九四六年）的該日，由台灣政治建設協會主辦、台灣省黨部協辦，舉行了一場「台灣革命先烈追悼大會」，並將該日改為「台灣革命日」；另，由日據期台灣的泛左翼人士，和積極抗日的民族運動者共同組成的「革命先烈遺族救援會」（該會副總幹事就是著名的人民作家、社會運動家楊逵，他到處奔走聯繫抗日犧牲烈士的遺族），也於該日在新竹縣忠烈祠舉行了台灣抗日先烈的奉安典禮，並在《人民導報》上刊登了近百人的、包括賴和在內的「台灣革命先烈芳名及事蹟介紹」，同時原台灣共產黨的蕭友山，也在同報上用日文連載了《台灣革命運動的回顧》，於九月結集成《台灣解放運動的回顧》一書，由三民書局出版；當日，《和平日報》也刊載了署名楊達輝者的《憑弔台灣革命先烈》一文，條理清晰地介紹了台灣抗日反殖的民族運動歷史，與該文並列的是台灣作家賴明弘的一篇《六·一七有感》，賴明弘一開頭便說：「六·一七是台灣人最傷心痛哭的日子，不僅是台灣的恥辱，而且是我們中國的國恥日」，他感歎道：「台灣在悲哀與苦悶的交集中，復歸中國了，總算找到了分手久別的兄弟了，正在這欣忭流淚的興奮中，迎此『國恥紀念日』，有心的人，那裡不會有『感』呢？」

台灣的光復，可說是實現了這些數以萬計的，為抗日反殖的民族運動而拋頭顱灑熱血的台灣革命先烈的遺願；也只有台灣的光復，這些被《日本員警沿革志》稱為

「匪徒」的台灣人民，才得恢復了他們應有的「烈士」之名；只有「光復」的歷史大變革，才得將日帝的「始政紀日」改為「台灣革命日」或「國恥紀念日」，才終於將日本的「神社」改為民族「忠烈祠」，為台灣的革命烈士舉行追悼大會、奉安典禮。而這些，正體現了台灣光復的民族革命的意義，顯示了台灣光復在台灣社會歷史中的進步意義。然而，在陳芳明的「戰後再殖民論」的虛構中，光復後，這些歷史都遭到荒廢呈現一片「空白」；當然，他的「台獨」意識型態是看不到這些的，在他的史觀中，這些歷史將永遠被刻意「失憶」，永遠得不到平反。

3、對日據期的台灣戲劇、美術、音樂等文化活動的回顧

由於光復帶來的時代變革的新生力量，再加上與大陸的文化交流的刺激與帶動，光復初期的文化活動可說是呈現難得一見的蓬勃氣息；只要翻開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台灣文化》月刊中的文化動態記事，就可以感覺到熱鬧非凡的各種各樣的文化活動，這與當時戰後全世界普遍處於經濟蕭條文化停滯的情況，形成強烈的對比。譬如，《台灣文化》一卷三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號），就刊載了兩場文化座談會的記錄，一是《音樂座談會》，另一是《美術座談會》，王白淵也在該刊的二卷三期（一九四七年三月號）發表了《台灣演劇的過去與現在》，都對台灣過去的音樂、美術、戲劇等文化歷史，做了深入而詳實的回顧。

4、對日據期台灣新文學的回顧與評價

光復後，第一位對日據期台灣新文學做了全面論述的，並非台灣省籍作家，而是上海有名的編輯家、作家范泉先生。他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上海出版的《新文學》雜誌上，就發表了《論台灣文學》一文，對台灣文學的歷史做了全面的評述和深刻的分析，他把過去、現在到將來的台灣文學分作三個時期：草創期、建設期與完成期，並指出日據期的「台灣文學始終在它的草創期」，並在結論中前瞻地說道：「重入祖國懷抱以後的台灣文學……已進入建設期的開端了，我們將眼看著台灣文學站在中國文學的一個部位裡，盡了它最大的努力，發揮了中國文學的古有的傳統，從而建立起新時代新社會所需要的，屬於新中國文學的台灣文學」。這篇文章立即得到台灣作家賴明弘的熱烈回應，賴明弘很快寫成了《重見祖國之日——台灣文學今後的前進目標》，發表在《新文學》第二期上，對范泉的《論台灣文學》一文表示了一極大的敬意與感謝」。范泉的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也曾以《台灣文學的回顧》的題目，被重刊於台灣出版的《民權通訊社》刊物上（一九四七年一月一日）；同時，在一九四八年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台灣新文學論爭中，歐陽明和楊逵也都引用了范泉的觀點，可見得，該文廣被台灣作家閱讀，大大地鼓舞了台灣的作家。

楊逵在他主編的《和平日報》副刊「新文學」第三期（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四日）上，發表的《台灣文學停頓的檢討》一文，也簡明地回顧了日據期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其他，如楊雲萍在《台灣文化》創刊號（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五日）上的《台灣

新文學運動的回顧》，詳細介紹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史料。甚至在「二·二八」事件之後，這種討論也未曾停頓。譬如，王詩琅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〇年之間，就連續發表了幾篇有關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史料性文章。及至一九四八年前後，發生在《新生報》「橋」副刊上的「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其中心論題之一，就是有關台灣新文學的歷史評價。正如范泉在《論台灣文學》文中所說的，台灣光復使台灣新文學從草創期進入了建設期的開端；在這特殊的時期，回顧、檢討、總結日據期的文學歷史，自然是建設期再出發的前提。

5、在精神上、語言上復歸為民族文學

原來在日本殖民者的文學和「皇民文學」壓迫下的台灣文學精神，光復後，得到了復權與傳承，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和地位。最有象徵意義的，莫過於台灣新文學開拓者賴和精神的父歸；與光復同日創刊的《政經報》第二期上（該刊於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光復創刊，由陳逸松、蘇新等主編，是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進步期刊），便率先刊出了賴和的《獄中日記》（連續刊載了四期）。該日記是賴和先生，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翌日（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八日）突被日本憲警拘捕，在獄中所寫。就如他在最後一篇日記寫道：「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賴和先生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前的最瘋狂最黑暗的一九四三年一月，竟未能看見「大時代的完成」而過世了；該日記也在「大時代未

完成」前，一直被幽禁於日本法西斯的黑牢中，最後，終於在日本軍國殖民統治崩潰、台灣復歸祖國的同時重見天日，重回了台灣文學的史冊。除此之外，楊逵也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文化交流》上，編了《紀念台灣新文學的開拓者——林幼春、賴和》的專輯；並且台中的民眾出版社亦出版了賴和作品《善訟的人的故事》；可以說賴和的文學精神，從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開始壓迫台灣文學以來，再度的復活。還有，在光復後不滿一年，楊逵也出版了《鵝媽媽出嫁》和《送報伙》；更具有時代意義的是，吳濁流先生在日據末期日本軍國主義的黑暗統治下，偷偷寫成的長篇小說《胡志明》（後改為《亞細亞的孤兒》），終於在光復後得以出版，代表著台灣文學抗日精神的勝利。這些都象徵著台灣文學精神的光復。

除了在精神上從殖民地的文學復歸為民族文學之外，在語言上，白話文創作也恢復了一九三七年以前的主流地位，日據期作家楊雲萍、黃得時、賴明弘、王詩琅、王白淵、蘇新、吳新榮……等都回復用流暢的白話文寫作；最令人欽佩的莫過於呂赫若，這位以日文創作而成名的作家，在光復後不足四個月便開始用白話文創作，在《政經報上》連續發表了兩篇短篇小說《故鄉的戰事》之一和之二，痛烈地嘲諷了日本的殖民統治，不管在語言上或小說主題上，都徹底地批判了殖民統治，表現了「去殖民」的文學精神。即使在光復的第一年，仍然用日文創作的龍瑛宗，在文學精神上也表現了「去殖民」復歸祖國的熱情；譬如，發表在《新新》雜誌創刊號（一九四五

年十一月二十日)上的《汕頭來的男子》，便是描寫一個熱愛祖國的台灣青年周福山抵抗日本和死亡的故事，在小說結尾，龍瑛宗寫道：「現在，台灣已歸還中國，大家正洋溢在光復的喜悅中，現在台灣正需要一個純情又熱愛中國的人才，然而，在這樣的時候，失掉了像周福山一樣值得敬愛的青年，真令人惋惜……他一直相信中國的光明，但卻無法恭逢『光復』這個人類史上難得的盛典，這使我相當落寞……每思及光復的喜悅就不禁思念起周福山來。」透過描寫周福山的形象，龍瑛宗表達了他強烈的對祖國的認同感。

由此可見，光復後的台灣新文學，不但沒有如陳芳明所捏造的，由於「中國化」而「空白」、「荒廢」、「斷裂」，反而因為光復的歷史大變革，而使台灣文學由殖民統治高壓下解放出來，不管在精神上或語言上都恢復了它民族文學的原貌。

六、誣衊「橋」論爭的分離主義文學論

發生在一九四七年底到一九四九年初的《新生報》「橋」副刊上的文學論爭，被稱為台灣新文學的三大論爭之一，它處於台灣剛從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台灣文學正與祖國民族文學匯合的關鍵期，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共同熱烈議論了「如何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顯示了當時的省內外作家，都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同時，也主張台灣文學要走「大眾文學」、

「現實主義文學」的道路。由於這次論爭，含有濃厚的祖國文學基調以及左翼進步文學的傾向，長期以來，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不是想隱蔽論爭史料，就是不斷歪曲解釋，想把它塑造成外省作家打壓本省作家、與本省作家的文學衝突。

把台灣的一切問題，都化約成中國對台灣的壓迫、與中國的對立，是台灣分離主義的特徵；而排除台灣新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與進步文學的成分，則是分離主義文學論的特點。分離主義文學論者陳芳明，當然也跳不出這樣的窠臼，甚至更為嚴重。他把「橋」論爭扭曲成是「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的激烈對話」，且虛構「本省作家與外省作家處在極為不同的政治位置」，抹黑外省作家「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而刻意誇大台灣作家「處於一個被指控、被迫辯護的位置」。

只要翻閱過論爭史料的人，就會知道，它的論調完全是憑空捏造的。

「橋」論爭中，由於省籍觀點的差異，而引發針鋒相對的爭論，也只有雷石榆和彭明敏兩人，在關於台灣社會中殘留的「日本毒素」問題的一小部分。這四篇文章，在整個論爭中（約有五十篇）所佔的比率相當低，只可算是小插曲。陳芳明等分離主義文學論者卻把它放大，把小插曲當做主調，而真正的主調則完全被消音了。

光復不久的台灣，經歷了「二·二八」事件後，立即籠罩在中國全面內戰的暴風雨陰影下，物價狂漲、失業等現實生活壓迫沉重；甫復歸祖國文學的作家們，面對這現實，在全國新民主主義的大思想浪潮影響下，急於尋求文學的出路，於是「如何建

設台灣新文學」便成了共同論議的主題。論議的內容大致可分下列幾個部分：

1、對於日據期台灣文學的定位和評價——所有的作家都認為它是「反帝反封建」的，是民族解放運動的一翼。

2、關於台灣文學的特殊性和中國文學一般性的辯證關係——不管外省作家或本省作家，都認同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個前提，同時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這個問題前面已談過很多）。

3、關於台灣新文學的路線、方向和創作方法——基本上，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走人民文學、大眾文學的方向，是論爭中的主要文學主張。

4、對於台灣文學所面臨的具體問題和解決之道——不論省籍，許多人都呼籲要克服對時局的不安、恐懼而生的文學停滯；要加強省內外交流，並通力合作以消除省籍隔閡；要共同組織民間的、自主的文學團體，以克服語言問題、發表園地問題、以及前述的諸問題。

可見得，陳芳明等把「橋」論爭扭曲並矮化成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的省籍對立，完全是分離主義文學論者的意識型態的「想像」，背離史實，不！結果就是否定史實。

可悲的是，因為完全是「虛構」，所以也說不出什麼具體的名堂來。只得把楊逵、林曙光等省籍作家在論爭中提到的，要重視台灣的特殊歷史的發言，曲解成對

「台灣認同」（「台灣的特殊性」與「台獨」的「台灣認同」之間，有根本的不同，前面已討論過）；又，面對論爭中台籍作家都說「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陳芳明無法直接否認，就狡辯說：這些作家「無非在恐懼陰影下不得已的保護色」，「以免受到羅織而罹禍」；實際上，這種狡辯方式，早已是所有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在否定光復後省籍作家表現出強烈的祖國認同時，經常使用的「標準」手法。

至於，「橋」論爭豐富的進步文學論述，陳芳明不但無膽去面對，也無識去研究，只有不斷地以誇大省籍作家遭到壓迫恫嚇，以詆毀外省作家形象的方式，企圖轉移論爭重點，矇蔽論爭的真義。可以說，他不但不討論「橋」論爭，根本就是在湮蔽「橋」論爭的真義。

下面將針對他的幾個重大「謬論」，分別予以駁斥：

（一）不可救藥的「省籍歧視」

陳芳明說：外省作家與本省作家不同，都「站在高壓統治者的立場」，「不必承擔被迫害、被鎮壓的歷史經驗」，是這樣的嗎？

抗戰勝利後，在半封建半殖民性性格的國民黨政府統治下，特別在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的時局下，全中國的基本矛盾，不分省別，只有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進步與保守、民主與反民主之別。復歸為中國一省的台灣，自然也不例外；在台灣的外省作家，有各種各樣的背景和來歷，並非全都是統治者，有親國民黨政府的，也有反國民黨政府

的，更有從大陸就受到國民黨政府壓迫的。當時，參加「橋」論爭的外省作家，可以說全都是進步意識的作家，論爭中，他們高呼要到民間去，要文章下鄉，並提倡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反映台灣社會現實等等；同時，他們也呼籲要突破死寂的風氣為苦悶的現實樹立說話的水準，不要害怕和畏懼不前，可見得他們也同樣受到國民黨政權壓迫的威脅；而且，從結果來看，一九四九年，被新民主主義革命勢力打敗的國民黨政權，開始從大陸潰遷台灣，並著手肅清台灣的進步力量。當年四月六日發動了對學生、文化人士大肆逮捕的「四六事件」，「橋」副刊被迫停刊；從此以後，參加論爭的作家，不分省籍，幾乎全遭國民黨政府的鎮壓，跑的跑、關的關；楊達、何無感（張光直）、歌雷、孫達人（浙江）、姚隼（福建）遭投獄關押；朱實、吳阿文（周傳枝）、陳大禹（福建）、駱駝英（雲南）、楊風（四川）、蕭狄（上海）先後逃亡大陸；還有，雷石榆（廣東）被放逐到大陸，籟亮（賴義傳，高雄人，台籍青年文學雜誌《潮流》同仁，台灣師院畢業）則遭白色恐怖刑殺。

上述事例在在說明了，論爭作者，因為他們在文學上的進步傾向，不分本省人或外省人都受到國民黨政府白色恐怖的壓迫；也就是說，他們受到國民黨政府的迫害，是因為他們的進步傾向的關係，而非他們的省籍關係。陳芳明說外省作家是「站在高壓統治者的立場」，「不必承擔被迫害、被鎮壓的歷史經驗」，這種觀點和說法是混淆是非，無血無淚的「冷血」說法，完全是台灣分離主義者不可救藥的「省籍歧視」，

與法西斯的「種族主義」、「血統論」沒有兩樣。

陳芳明還用他的「省籍歧視」的煽動語言，詆毀參加論爭的外省作家說：「外省作家在論爭中大放厥詞，一旦政治風暴來臨仍還可逃回大陸……無需承擔任何重建工作，便揚長而去……」，還說：「台灣作家絕對不可能有任何退路……在往後的新文學發展過程中，仍然扮演受難者……擔任領導者的角色」。這種語調，與媚俗欺世的政客何異？

從前面談到的事實可知，「四六事件」（陳芳明所謂的「政治風暴」）前後，逃亡大陸的不只是外省作家，也有本省作家；並且，也不是所有的外省作家都逃亡大陸，也有許多「不可能有任何退路」而留下來的外省作家（實際上，四六事件前後國民黨對台灣出入境管制已十分嚴格，要逃亡談何容易？），如歌雷、孫達人、姚隼等人。而且，「四六事件」後，馬上進入了兩岸隔離對峙時局下的白色恐怖的五十年代，省籍作家籟亮就如千千萬萬進步的本省外省青年一樣，被送上馬場町刑場或被送往綠島，人人俯首如偃草，台灣的文學也進入了「反共戰鬥文學」領導一切的年代，陳芳明還說台灣作家「在論戰之後，仍然必須為台灣新文學的重建而努力」，這不是太「超現實」了嗎？至少，在整整的五十年代，葉石濤、林曙光、彭明敏以及包括在綠島的楊逵，有什麼人「仍為台灣新文學的重建而努力」了呢？況且，作家逃亡大陸，也不是如陳芳明飛往美國帝國的樂土一般逍遙，而是投入了更大的中國新民主主

義革命的浪潮中去。

陳芳明為了詆毀論爭中的外省作家，竟然睜眼說瞎話，誣指：「外省作家都不在討論台灣文學，都在藉題發揮，空洞地討論『大眾文學』、『新現實主義文學』」。

這樣荒唐的說法，表示他不但沒讀過論爭的文章，甚至連論爭文章的題目都未曾過目；實際上，大多數論爭的文章題目都與「台灣文學」有關，隨便舉例子，如姚筠的《我的新台灣文學運動看法》、陳大禹的《「台灣文學」解題》、田兵的《台灣新文學的意義》……，只要看看這些題目，就知道它都是在討論台灣文學，怎麼會是一都不在討論台灣文學呢？而且，依陳芳明的台灣文學論，好像談到「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就不是談「台灣文學」，似乎台灣文學中從來就沒有「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大眾文學」、「現實主義文學」都與「台灣文學」無關一樣；當然，在他的分離主義台灣文學論的標準中，只有「省籍問題」和「中國人、台灣人」的問題才是台灣文學的重心。這樣的台灣文學論，不但自絕了文學之路，事實上，從根本上就否定了「台灣文學」。

（二）抹黑論爭的「前奏曲」

為了抹黑「橋」論爭，陳芳明先把被稱為「橋」論爭前奏曲的，何欣主編的《新生報》「文藝」週刊（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到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止，接著便是歌雷主編的「橋」副刊）予以汙名化。

他用一貫的伎倆，挑出一篇文章中有利他發揮的隻字片語，切斷這隻字片語與全段的文脈關係，再以他的意識型態去扭曲、放大，完成抹黑的創舉。

譬如，他先截取何欣的《迎文藝節》（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文中「掃除日本思想餘毒」這一句，接著便予以扭曲、轉化、栽贓說：「在清鄉運動之後，何欣仍然堅持事件前官方的霸權優勢，亦即把『台灣的日文思考與書寫』劃入『日本思想遺毒』的範疇」，好像說「掃除日本思想餘毒」，就是官方霸權思想，就是掃除「台灣的日文思考與書寫」，完全不顧何欣文章的前後文脈。事實上，何欣在說「掃除日本思想餘毒」這句話之前，是這麼說的：

台灣離開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魔掌，重歸民主自由的祖國，就台灣本身而論，這是不亞於「五四時代」的巨大變化，在思想上，要「消除法西斯的餘毒，吸收進步民主思想」，同祖國的文化合流，這是新的革命……

何欣的主要意思是說：「在思想上，要消除法西斯的餘毒，吸收進步的民主思想」，這不但是台灣光復後文化重建的主要思潮，更是二戰後全世界的政治、思想的風潮；當時，無條件投降後的日本，也曾如火如荼地進行了解體軍閥、財閥，放逐軍國主義時期的政府官員，廢止軍國主義時期的教科書等等一連串的「清除法西斯的餘毒，吸收進步的民主思想」的全國性行動；光復後第二年，官民共組成的「台灣文化

協進會」的成立宣言，也是高呼要「科學、民主、肅清日寇遺毒」。可見得何欣說的「清除法西斯餘毒，吸收進步的民主思想」，不止是光復後的台灣的時代任務，也是戰後世界共同的時代要求。陳芳明卻故意無視何欣的主要思想，切頭切尾，緊咬住何欣「清掃日本思想餘毒」的一句話，硬是把他扣上用「官方的霸權優勢」，指控「台灣的日文思考與書寫」的大帽。

「二·二八」事件之後，在一片沉寂中，外省作家沈明在何欣主編的「文藝」副刊上，率先發表了《展開台灣文藝運動》（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五日），呼籲要盡速推動台灣的文學運動。文中，他分析了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施行的文化思想教育時說：「就文化教育上，則是『普及而低落』……他們在思想上，竭力『注入法西斯的毒菌』，對客觀世界的歷史發展則竭力地予以扭曲和矇蔽」。這是一段對日據末期歷史相當公允的評析；陳芳明卻故意切去文中「普及」二字，篡改為「教育低落」，然後說沈明指控：「受到日本殖民的台灣人『種下了法西斯毒苗』，而在文化教育上『低落』」。日據期教育「普及而低落」是事實，但「低落」則是蔑視，陳芳明故意把沈明公允的評價，抹黑成對台灣人的「歧視」。

於是，何欣和沈明兩人便被陳芳明抹黑成，都「站在官方霸權」指控台灣人有「日本思想餘毒」且「文化教育低落」。而從何欣主編的「文藝」副刊吹出前奏曲，後來由歌雷主編的「橋」副刊接棒，積極推動的「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則被陳芳

明誣指成：「這種高姿態指導式的文藝運動，並不是從民間出發，而是站在高壓統治者的立場，並且是依恃血腥屠殺的陰影，由上而下發動的思想改造運動」。

陳芳明不但完全否定「橋」論爭的意義，甚至把它定位為「依恃血腥屠殺」的「官方」的「思想改造運動」，這是他自絕於台灣文學，自絕於真理，這是他的分離主義台灣文學論先天註定的悲哀！

「橋」論爭發生當時，國民黨機關報《中華日報》的「海風」副刊上，也曾經出現過一些對「橋」論爭的誣衊攻擊，攻擊「橋」論爭「鼓吹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分離」，「是含有毒素的把戲」，「要大家聯合起來撲滅那少數人散佈的毒素」云云。陳芳明等則為了一鼓吹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分離，而否定並誣衊「橋」論爭。二者相隔近五十年，雖然在政黨、時代、內容、形式上不同，但在否定「橋」論爭的進步意義上，本質上是相同的；一個是國民黨的法西斯文工，一個是民進黨的「台獨」文工。

（三）否定本省作家都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只要看過「橋」論爭文章的人，都明白，論爭中清清楚楚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有本省作家也有外省作家。這本是一目了然，不成問題的事，但是陳芳明偏偏就要以「文學的族群主義」來歪曲事實，公然否定事實，明目張膽地「硬拗」說：「真正這樣主張的都是出自外省作家筆下，本地作家沒有一位是附和或支持

這種論調的」。

真的只有外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而本省作家沒有一個人主張嗎？

多說無用，讓我們用史實來戳破陳芳明的謊言，揭露他強暴本省前輩作家思想的蠻橫態度。

被陳芳明篡改並誣指為只有「台獨」的「台灣意識」、「台灣認同」的楊逵，其實是最明白最積極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作家；在許多篇文章中，他都直接地表達這個觀點。譬如，作為引發「橋」論議的關鍵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一文文末他就說：

因此，我由衷地向愛國憂民的工作同仁呼喊，消滅省內外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

在《「台灣文學」問答》中，楊逵清楚明白地說：

台灣是中國的一省，沒有對立，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當然不能對立。

另外，楊逵在他主編的《和平日報》「新文學」副刊上，寫的《台灣新文學停頓的檢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文末他便建議，台灣的文藝工作者可以參照

大陸的文藝團體「文聯」的模式，團結起來與「文聯」匯合，並且期望說：

我認為，這是將台灣新文學發展為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大工作之一，希望同志們深切思考這問題。

台灣前輩作家張我軍先生的次子張光直先生，當時雖是台北建國中學高中二年級的學生，卻已用「何無感」的筆名參加了「橋」論爭，在《致陳百感先生的一封信》中，他批評了陳百感「有意無意地把台灣和中國隔離」，他說：

台灣在地理環境上，雖然是一個孤島，但就社會經濟基礎而言，它是中國的一環，台灣文化也正是中國文化的一環……可是先生您忘了台灣文學正作為中國人民文藝運動之一環而鬥爭，在克服發展中……

當時的台灣師院學生籟亮，在論爭中的一篇《關於台灣新文學的兩個問題》，文中談到台灣文學的特殊性與中國文學的普遍性時，如此辯證地說道：

台灣新文學當然是和祖國文學一樣站在同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上的，不過這裡躺著可惡的「澎湖溝」——五十年的距離——這就是台灣新文學的立場——特殊性……那麼「台灣新文學」是和「大陸文學」對立的嗎？不是的，「澎湖溝」是站在和祖國同一新歷史階段上，才可以看出它的特殊性。因此，這一個特殊性是以同一歷史

階段為前提的，所以「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當時也是台灣師院學生的林曙光，在文壇上十分活躍，在論爭中他寫了《台灣文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關於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問題，他說：

所以最好還是打破一切的特殊性質，做中國文學的一翼而發展，今日「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需要放在「如何建立台灣的文學使其成為中國文學」才對。

另外，林曙光也在當時上海出版的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發表了《台灣的作家們》（一九四八年十月十五日）；在文章開頭，對於台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的關係，他便如此說道：

但是在本質上，它始終追求著五四以後的中國新文學的傾向，也可以說，它是發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主流中的一個具有光榮的傳統與燦爛的歷史的支流。

今日已成為台灣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師祖，並且率先扭曲「橋」論爭意義的葉石濤，在論爭當時也寫了《一九四一年以後的台灣文學》一文，在文章一開頭他說：「由於過去台灣殖民經濟所決定命運的台灣文學，在抗日反帝的現實的鬥爭過程中，所產生的作品，樹立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傳統性」，在文末他還振振有詞地說：

我們必須打開窩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分離主義的文學論者們，對於這白紙黑字，總不能再以「無非在恐懼陰影下不得已的保護色」來狡辯了吧！

上面列舉的，只是一部分，其他如「橋」論爭的最後一篇文章，署名吳阿文（本名周傳枝，後改名周青，光復前後與朱點人共同從事文學活動，光復後曾任《民報》記者）的《略論台灣新文學建設諸問題》文中，也簡潔地表示：「毫無疑義，台灣是中國的，台灣新文學就是整個中國新文學的一部分，台灣新文學運動也就是整個中國新文學運動的一環」。

可見得，在「橋」論爭中，幾乎所有的省籍作家都表示了「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看法，這是明明白白的。況且，除了「橋」論爭外，當時的省籍前輩作家，如賴明弘、楊雲萍、王詩琅等等都分別在其他刊物上發表了同樣的看法（在此不一一贅列）。這種觀點，實際上已是光復後，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前提和出發點。陳芳明想一手遮天，以為握有文化霸權，便可以把省籍前輩作家不符合他分離主義文學標準的言論思想統統「閹割」；然而，「肅清」只是一時的，歷史終究會以它的方式撕破霸權的假面，這是亙古不變的鐵則。

(四) 否定台灣新文學中的「大眾文學」

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觀，除了否定光復初期的台灣文學中，本省作家都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這個建設台灣新文學的前提和出發點之外；更嚴重的是，他又否定了構成光復初期文學最重要的文學思潮——大眾文學，他非常無知地說：

在那樣的政治環境下，提倡大眾文學是非常虛偽而虛構的。

或許從他的分離主義（或族群主義、省籍主義）的文學觀來看，因為有許多大陸來台的作家都主張「大眾文學」，而予以否定，把「大眾文學」的思潮從光復初期文學中排除，說它非常虛偽而虛構；那麼就讓我們舉個本省作家主張大眾文學的實例，來看看大眾文學的主張是「虛偽而虛構」的嗎？

台灣光復後，第一個提出要走大眾文學路線的本省作家，就是日據期最重要的文學團體「台灣文藝聯盟」的推動者賴明弘先生；他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上海出版的《新文學》雜誌第二期上，發表了《重見祖國之日——台灣文學今後的前進目標》；文中，他先強調了：「我們今後將要努力的台灣新文學，亦即是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台灣的文學工作者也就是中國的文學工作者」（賴明弘的這個主張，也是陳芳明的分離主義的文學觀極力想肅清的），接著，他指出了台灣文學今後應走「大眾文

學」的路線方向，他說：

文化藝術的分野自然也不能例外，尤其是文學必須加緊地指向寫實主義的大眾文學之路走了……。今後我們的文學精神，必須傾注在這個意義上的工作，台灣文學今後的目標，亦應循此路邁進。

另外一位被陳芳明塗抹成「絕望而虛無」顏色的作家龍瑛宗，實際上，在他主編《中華日報》日文欄副刊時，也是主張大眾文學路線的，在該副刊的編輯室寄語中，他曾說過：「今天的文藝，已不是星啊雲啊的時代，為了建設更好的社會，文藝也應發揮更大的力量……文藝應從頹廢與傷感中站起來，開始健康地吸收。文藝不是少數人的玩具，是大家的東西，是與大眾共悲喜的東西」。

在光復期的文學中，不但高呼提倡，並且身體力行實踐人民文學、大眾文學的代表作家，就是楊逵；他教導同仁文學刊物《潮流》的青年作家們，要用「腳」去寫作，意思就是不要在書房，在自己的觀念中寫作，而且要到社會中，到人民大眾中去寫作。在他主編的《力行報》「新文藝」副刊上，他寫了《人民作家》一文，他說：「人民的作家應該是人民的一員，要靠自己的血汗和人民生活在一起」，他認為人民的作家除了說明人民提高認識之外，「也應該把人民的生活體驗來充實自己，追求理論與實踐的配合」。當時，楊逵自己也用人民的語言（台灣的土白話）、人民的形式

（台灣的民間歌謠）創作了許多政治諷刺詩，批判和揭露不公不義的時代現實，反映了人民的心聲，喚醒人民的覺醒。

實際上，大眾文學早已是日據期台灣新文學的主要潮流，光復後，這個潮流與大陸新文學的進步潮流匯合，再加上現實情況的惡化，而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並且，他不僅是文學潮流，還是光復初的文化潮流，譬如前引的《新新》雜誌第七期的一卷頭語」，便如此地主張：

總而言之，反對民主，離開大眾生活的一切文化活動，在現在的台灣，已經是沒有意義了，所以我們主張台灣文化運動的民主化和大眾化。

而同期上刊出的一場《談台灣文化的前途》座談會的紀錄中，當時十分活躍的左翼運動家蘇新也說：

今後文化的前進方向，抽象而言，就是朝向民主主義的路線，而文化的民主主義路線明白說，就是文化一定要成爲大眾的東西。

由上可知，追求文化的大眾化或主張大眾文學，是光復後台灣作家的重要思潮，一點也不虛偽、不虛構；虛偽而虛構的正是陳芳明自己。

陳芳明質疑大眾文學的理由，竟然是說：既然主張大眾文學，事件後爲什麼本省

作家或外省作家都沒寫出反映台灣社會大眾的作品呢？也就是說，他認為光復初期並沒有反映大眾生活的文學。

是這樣嗎？這種質疑，暴露了他根本沒有真正地研究過光復初期的文學，沒有研究過而居然要寫文學史，這不是很「虛偽而虛構」嗎？只要稍微用心閱讀，不難發現，當時有許多反映台灣社會現實，大眾生活中的困苦、不平、矛盾的作品。譬如以楊逵來說吧！楊逵自己就創作了許多政治諷刺詩，不但反映了大眾的感情，還使用大眾的語言，大眾的藝術形式，是百分之百的大眾文學。還有楊逵主編的《力行報》「新文藝」副刊上，就刊出了許多本省青年作家的作品，例如蕭金堆的《轉學生》就反映了當時一般人省籍感情隔閡的問題；施金秋的《腐魚群》描寫了腐敗官員的生態。楊逵主編的《台灣文學》叢刊，揭示以「認識台灣現實，反映台灣現實，表現台灣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動向」為文學信條，在第一輯上，他轉載了外省作家鄭重原發表於《新生報》「橋」副刊一三五期上的小說《摸索》，這篇小說描寫了一個煤礦場年輕管理員與小女工高笑之間微妙的互動，作者以年輕管理員的自省自責，深刻地批判了知識份子的自私、虛偽；「橋」副刊有署名田兵的作家，對這篇小說評論說：「我認為這個短篇是到『民間去』實踐的第一課」。《台灣文學》第二輯，轉載了外省青年作家歐坦生，原發表在上海全國性文藝雜誌《文藝春秋》上的小說《沉醉》，這篇小說描寫了「二·二八」事件後大陸來台青年與台灣女子之間的戀情，楊逵稱

讚它是「台灣文學的一篇好樣本」；接著，歐坦生又在《文藝春秋》上發表了《鵝仔》，深刻地批判了大陸來台官員的傲慢嘴臉。其他各報副刊上出現的，反映台灣大眾現實生活的作品比比皆是，譬如公論報的「日月潭」副刊第二四二期，就有署名「艾那」的作家寫的短篇小說《買米》，生動地描寫了台灣物價高漲，物資匱乏排隊買米的困苦現實；新生報「橋」副刊上也有許多優秀的大眾文學作品，如潛生（龔書森）的《覺悟》、邱媽寅的《叛徒》等等不勝枚舉。

由此可見，並不是光復期的台灣新文學中沒有大眾文學的作品，實際上，大眾文學的作品俯拾皆是；而是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從根底就把「大眾文學」排除在「台灣文學」之外，或者是，根本就從未研究過這時期的文學歷史。

（五）企圖塗改、否定楊逵的文學思想

光復初期的文學史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就是楊逵。他的文學活動力最強，他的思想和精神就是光復初期進步文學力量的總代表。他從日本投降後行政長官公署還未成立之前，就立即起身投入台灣的文學和思想重建運動，一直到一九四九年的「四六事件」被國民黨投獄為止，在「二·二八」被捕了數個月，但跌倒了又馬上站起來，發揮了一個人民作家的戰鬥精神。他積極主張到民間去、「用腳」去寫的人民文學、大眾文學，鼓勵報告文學的創作；他是那個時期的省籍作家中，最積極呼籲要消滅省籍隔閡，並身體力行推動省內外交流的作家；他比誰都熱心提倡要趕快組織民間的自

主的文藝團體，並主動親近指導年輕作家，提供年輕作家文學園地；他明白地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也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他是光復以後作家中，在政治上最早警覺到美國和日本勢力介入台灣問題的嚴重性，並明白批判文學上的「託管派」、「拜美派」和「日本派」，稱他們是「奴才文學」。

這麼清楚明白的楊達的文學思想與精神，陳芳明也要明目張膽地歪曲；這麼值得寶貴的楊達的進步精神，陳芳明卻也要盡力去消滅，這就是他的分離主義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譬如，陳芳明說：楊達「介入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對於部分抱持優越意識的外省作家進行強烈批判，更可顯現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的追求」。

首先，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發生在《新生報》「橋」副刊上的論爭，從它的論議主題、內容來看，絕對不是他所說的什麼「鄉土文學論戰」，根本與鄉土文學的討論沒有一點關係，正確的說法，應稱為「建設台灣新文學」論爭，或簡稱為「橋」論爭。陳芳明故意稱之為「鄉土文學論爭」，是有意把論爭的性質扭曲成為本省與外省作家之間的省籍文學論爭（或族群文學論爭）。

接著，他便把楊達在論爭中的主要思想精神，扭曲成對外省作家進行強烈批判，追求「台灣文學主體性」。事實如此嗎？如果說，楊達在論爭中曾批評過所謂外省作家，那麼，也就只錢歌川「一人」而已，哪裡有如陳芳明所說的「一部分」外省作家；

而且，這個外省作家錢歌川，也並不是如陳芳明所指的「抱持優越意識」，而只是因為他當時對台灣的歷史、現實認識不足，而以為「台灣文學」這個用語有語病，事實上，錢歌川是積極主張台灣作家應從事「鄉土文學」創作的人，在《如何促進台灣的文運》一文中（中華日報「海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三日），他就奉勸台灣作家「決不要向外界去找材料，只要利用本省的故事，寫出本省人的性格，鄉土藝術是值得提倡的，地方色彩也是文學作品上一個重要的因素……應該把寫作的範圍縮小到自己的鄉土，把發表的範圍擴大到全國去」。這種態度，有一點「優越意識」嗎？何況，首先對錢歌川的「『台灣文學』有語病」的發言，著文批判的也是外省人作家陳大禹（《「台灣文學」解題——敬致錢歌川先生》），接著批評他的也是外省作家姚隼。可見得，問題的本質不是在本省人批評外省人的問題，而是在對「台灣文學」的歷史、現實性格的認識問題；同理，楊逵批評錢歌川，也決不是在批評如陳芳明所扭曲的什麼外省作家的「優越意識」，而是在批評他的認識不足。

並且，楊逵在光復後省籍隔閡成為社會大問題的情況中，不時為文呼籲要「消滅省內外的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之一環的台灣新文學」，積極推展省內外文化交流，並呼籲省內外作家共同攜手合作組成文藝團體。楊逵在文學活動上，自然地主要與大陸來台文化人來往共事，共同從事文學活動，譬如，他與《和平日報》的外省作家王思翔、周夢江等人合作，主編「新文學」副刊，共同創辦《新知

識》、《文化交流》雜誌；與《力行報》的副刊外省同仁合作，主編「新文藝」；他主辦的《台灣文學》叢刊，選刊了許多外省作家的優秀作品。因此，楊逵認為：「切實的文化交流是今天在台灣本省外省文化工作者當前的任務，為達到這任務的完成大家須要通力合作，到民間去」（「台灣文學」問答）。

對於楊逵這種對省籍問題的光明磊落的態度，陳芳明等人卻千方百計地想要把它抹消，把楊逵扭曲成偏狹的省籍主義者，真是居心叵測。

對於楊逵在「橋」論爭中的最重要一篇文章《如何建立台灣新文學》，陳芳明也把楊逵的觀點顛倒到「反楊逵」的地步。譬如：

楊逵文中明明表示，讀了歐陽明的《論台灣新文學運動》一文（該文是歐陽明發表在「橋」副刊的《台灣新文學的建設》的再訂稿），對於歐陽明翔實地回顧了台灣文學在過去日據期曾擔當民族解放鬥爭任務的內容，有所感悟，才寫了這篇文章；依文脈，楊逵高度肯定了歐陽明的歷史認識，陳芳明卻把它顛倒成一楊逵非常清楚，歐陽明並不理解台灣的史實」。事實上，只要讀讀歐陽明的原文，就知道該文對日據期的台灣文學史的敘述翔實完詳，至今仍大有參考價值，楊逵決不可能認為它不理解台灣的史實。

接著，楊逵讀了歐陽明的文章有所感悟，是因為感悟到過去曾扮演過轟轟烈烈民族解放鬥爭角色的台灣文學界，今天卻處於「不哭不叫、陷於死樣的沉寂」的停滯

狀態，而直接批評了台灣作家有「共同的毛病」、「要反省」、「不要逃避責任」、「太缺乏信心」；陳芳明卻可以把它顛倒成，楊達「並不是在譴責台灣作家，而是反諷當時的高壓統治」，真是強詞奪理。

楊達明明在文中呼籲要：「消滅省內外的隔閡，共同來再建，為中國新文學運動一環的台灣新文學」；陳芳明卻可以顛倒成楊達「不認為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支」。對於陳芳明顛倒楊達的「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一環」的主張，前面已論列，不再贅言。

陳芳明說「從這篇文章來看，楊達的『台灣認同』極為強烈」，但查遍楊達全文，不但沒有「台灣認同」的字眼，文意上也找不到楊達說了什麼「台灣認同」的意思。如果說楊達有所謂的「台灣認同」，它應該是站在「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前提，強調台灣的特殊性，這樣的「台灣認同」；根本不是陳芳明們以「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對立為前提的「台灣認同」。而且，不止以楊達為主的本省作家，論爭中的大部分外省作家，如雷石榆、歌雷、蕭狄等也都強調台灣的特殊歷史經驗。強調一方面要加強省內外交流，一方面要理解台灣的歷史，到台灣民間去，「去瞭解他們的生活、習慣、心情」，而與台灣人民站在一起的「台灣認同」；絕對不是陳芳明等以製造「台灣人、中國人」的對峙矛盾為主要內容的、分離主義的「台灣認同」，這種「台灣認同」，正是與楊達的「台灣認同」相對立的。

陳芳明為了閹割楊逵的「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的主張，居然連楊逵在文中引述了上海作家、編輯家范泉先生在《論台灣文學》一文中，主張「屬於中國文學的台灣新文學」的一段話也要加以質疑；說這段引述「是否譯者代為潤筆綜合寫成？還有待考證」云云，企圖「空洞化」楊逵的思想。陳芳明太小看楊逵的中文能力了；楊逵在一九三〇年就能夠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書籍翻譯成白話文出版，光復後，雖無法以流暢的中文寫作，但是他的中文閱讀能力絕無問題。雖然這篇文章是孫達人先生參考了楊逵的日文稿和中文稿兩方綜合完成的，但完稿後一定有經過楊逵過目，孫達人先生決不可能擅自加入那麼一長段非楊逵原意的引用文章，孫達人又不是陳芳明！真是一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還有，陳芳明認為文中引用了在上海的「中國作家」范泉的話很突兀，這是他以為在台灣的楊逵不可能閱讀到「中國」的雜誌，因而猜疑是來自「中國」的孫達人擅自插入的，如果是這樣，這就暴露了陳芳明從根底就不瞭解光復初期的歷史，用他的分離主義眼睛看世界，還以為當時台灣和大陸仍是分離隔絕的呢。實際上，光復後，台灣與大陸早就處於同一歷史潮流，大陸報刊雜誌在同一國內的台灣省流通是當然的，楊逵從光復後一直閱讀大陸的刊物，並受其影響，這也是當然的；這也說明了光復後台灣文學復歸中國文學的事實，否則他主編的《台灣文學》叢刊，為什麼會轉載外省作家歐坦生發表在上海范泉主編的《文藝春秋》上的小說《沉醉》呢？從這點來看，楊逵閱讀過並引用了范泉發表在上海出版的《新文學》

雜誌上的《論台灣文學》一文的內容，是完全合理的。

企圖塗改、否定楊逵思想的分離主義文學論者，是枉費心機了！

綜上可知，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關於台灣光復期的文學論的特點是：先虛構一個中國人殖民台灣人的政治社會歷史，在這樣的虛構的歷史中，再捏造一個中國作家與台灣作家對立的「橋」論爭；為了「虛構」和「捏造」，他貶損了台灣文學和台灣作家，掏空了台灣新文學中最可貴的精神，因為：

- 1、他指責，主張台灣文學的「反帝反封建」，是外省作家的濫情口號。
- 2、他否定，台灣新文學中的「大眾文學」和「現實主義文學」。
- 3、他說，沒有一個本省作家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
- 4、他小看，台灣作家的氣骨！把台灣作家矮化成畏畏縮縮的形象，不斷強調台灣作家

「非常拘謹束縛」，被迫「敷衍與讓步」，在恐懼陰影下常用「保護色」，害怕受「羅織入罪」等等。

這是他的分離主義文學論的可悲之處！

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它的核心是以排除台灣文學中的中國文學要素，來「建構」他的台灣文學「主體性」。但是，客觀地、歷史地來看，台灣文學的「主體性」的基礎，卻是在其中普通存在的「中國性」；排除了「中國性」的台灣文學，其

實只是一個空虛主體，或虛假主體，不得不靠「虛構」來維持。

這就是陳芳明的分離主義文學論的悲劇根源！

這使他的歷史觀成為「反社會科學的」，必然表現為：

1、孤立的歷史觀：不但切斷與中國歷史的關係，也切斷與世界歷史的聯繫，更切斷了與台灣歷史本身的聯繫。

2、抽象的、空洞的歷史觀：沒有台灣社會的變化、也沒有台灣社會的具體內容，當然只是分離主義意識型態的作用。

這種文學論，對台灣文學的最大傷害在於：

- 1、排除了台灣文學中的左翼文學思潮。
 - 2、再度阻斷了台灣的「去殖民論述」的發展。
 - 3、使台灣文學史再度「失憶」。
- 只剩下依「叢林法則」建構的「台灣文學史」。

原載《反對言偽而辯》，人間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八月

《文學台獨批判》，台海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台灣「皇民文學」總清算

——從台灣文學的尊嚴出發

張良澤先生（以下簡稱為張氏）分別在二月十日的《聯合報》副刊，五月十日的《民眾日報》副刊，以及六月七日的《台灣日報》副刊上，連續以《台灣皇民文學作品拾遺》為名，輯譯了十七篇所謂的「台灣皇民文學作品」，另外寫了三篇他對「台灣皇民文學」看法的文章。暫且不論他的台灣皇民文學觀的三篇文章，單從他所輯譯的十七篇「台灣皇民文學作品」的內容來看，雖然其中有幾篇尚可稱得上「皇民文學作品」，但其他不是一般的中小學生作文，就是在戰爭體制下酬應時局的文章，實無從歸類為「文學作品」。倒是在頌揚日本的「大東亞聖戰」、高唱「皇國精神」或誓言「為天皇赤子、一心報國」的內容上，這十七篇所謂「作品」有著高度的一致性，將之視為日本侵略戰爭時局下的「皇明文宣」更為切題。

身為第一所台灣文學系系主任的張氏，應該不會不懂得「文學作品」的基本條件。然而，他卻「精心」選譯了這樣內容與主題的文章，全冠之以「皇民文學作品」之名，在日報副刊上大大刊載；其著意，似乎不盡在「文學」的一面，而有「文宣」的一面；在偏向的所謂「台灣意識」當道的時潮下，它不僅僅是一般文學史料的輯

譯，而有突出打造「意識型態」的現實作用。這不是筆者個人的臆測，在他同時刊出的三篇關於「台灣皇民文學」的論述中，已清清楚楚地表達了。對於張氏的台灣皇民文學觀的謬誤，筆者將另文批判。但無論如何，張氏如此處理「台灣皇民文學」的作為本身，已對台灣文學造成了嚴重的淆惑與傷害。針對這一點，首先必須提出來討論與批判。

一、對台灣文學造成了淆惑與傷害

由於日文閱讀的障礙以及對台灣日據歷史知識的不足，一般人（包括文學研究者）對日據末期的台灣文學狀況的認識幾乎是一片空白，更遑論對皇民文學的認識了。在這樣的土壤上，張氏所輯譯的十七篇所謂「皇民文學」作品在報紙大幅刊載，再加上他強調「日據時代的台灣作家們，或多或少都寫過所謂皇民文學的歷史事實」，這樣的內容在大報章上的出現，對社會造成了極為不良的後果。它誤導了一般讀者，以為日據末期的台灣文學的內容都與張氏輯譯的皇民文宣一樣，充滿了歌頌日本大東亞聖戰、皇國精神的作品；且被誤導認為當時的台灣作家全都屈服在日本的殖民與軍國體制下，積極配合日本當局的皇民文學政策，曲志節而阿權力地寫了像那樣的「台灣皇民文學」。結果，使一般人錯以為在日據末期，台灣文學就等於皇民文學；甚至認為，台灣皇民文學就是當時的台灣文學的全部。

這不但對日據末期的台灣文學造成了甚大的淆惑和傷害，同時對於當時處於日本軍國法西斯高壓的文學環境下，憑著民族與文學的良知，以各種方式抗拒台灣文學淪為皇民文學的台灣前輩作家來說，勿寧是再度的羞辱。

一一、為皇民文學的復辟鋪路

另一方面，張氏的作為與謬說使當年原本以打壓台灣文學而樹立起來的台灣皇民文學，再度輕易地僭替台灣文學的地位，從而掩蓋了推動皇民文學的日本殖民與軍國當局和在台日本人御用文臣的罪行，最終是替當時積極地站在日本當局和日本御用文臣陣營的台灣皇民作家們塗脂抹粉，僭取他們在台灣文學史上的正當性。張氏的作為，與葉石濤先生最近發表在《民眾日報》的一篇文章——《皇民文學的另類思考》¹有異曲同工之妙；葉文說：「周金波（按即皇民文學代表作之一《志願兵》的作者）在『日治』時代是日本人，他這樣寫是善盡做為一個日本國民的責任，何罪之有？」

如果說張氏如此輯譯台灣「皇民文學」作品，其居心，是想把所有的台灣前輩作家都貼上皇民文學作家的標籤，來壯大皇民文學聲勢，使所謂的台灣皇民文學正當化的話；那麼葉文的「思考」，就是為台灣人皇民文學作家脫罪。顯然，兩者都是與當年以打壓台灣文學來推動皇民文學的主體者——日本軍國殖民當局和在台日人御用文

1 參閱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五日的《民眾日報》。

臣——的立場沒有兩樣；都是以當年的「台灣文學奉公會」的意識型態，來淆惑台灣文學，試圖為台灣皇民文學在台灣文學史的復辟鋪路。

本文認為，如果想要批判張氏皇民文學觀的謬誤和澄清張氏所造成的對台灣文學的淆惑，揭穿其為皇民文學的復辟鋪路的意圖，首要之處，不是在觀念的打轉，而是回到史實本身須揭開日據末期，日本的殖民與軍國體制及其扈從者如何打壓台灣文學以建立皇民文學的歷史真相，以及在這壓力下台灣作家所表現的抗拒與屈從的歷史真貌。據此，才能辨識到底誰才是台灣皇民文學的主體，從而認識到台灣皇民文學的性格；重新認識在這樣的歷史中台灣前輩作家對皇民文學的可貴抗拒，進而確認台灣文學的主體尊嚴。

必須在此說明的是，本文所指的「台灣皇民文學」，實際上包括三個組成部分：一是作為日本軍國當局思想戰一環的「皇民文學政策」，其次是日本右翼文人的皇民文學思想與作品，其三是對前二者積極扈從的台灣皇民作家的思想與作品。三者也可稱為「真性皇民文學」。至於如張氏所輯譯的那些東西，實際上大都是在嚴酷的殖民軍國高壓下無自覺的學生作文或是自覺性的酬應、陽奉陰違之作，因此像那類性質的文章只可稱之為「假性皇民文學」，本來就不應將之歸類為所謂的「台灣皇民文學作品」之列。應該批判的是真性皇民文學，而不是後者。

下面，將依據歷史材料，來探討所謂的「台灣皇民文學」是在怎樣的時代背景下

產生的？推動皇民文學的主體是誰？這主體又是如何透過打壓台灣文學來建立皇民文學的支配？而在這過程中，台灣前輩作家又是如何抗拒皇民文學的支配來維繫台灣文學的氣脈？同時，我們還要分析皇民文學的性格，並指出皇民文學到底是為誰的文學——是為台灣人民？還是為日本殖民軍國體制的「文學」？

三、世界法西斯主義對思想、文藝的支配與台灣皇民文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日、義的法西斯陣營，都把對文化、思想、教育的控制，當作推進法西斯戰爭的重要工具。文學與音樂、戲劇、美術、電影一樣，作為文化的主要部分，曾遭受到各國法西斯政權的全面摧殘；取而代之的，是充滿宣揚和鼓動法西斯思想和感情的文學、藝術支配一切。譬如在德國，就有「德國文化總會」，統制全德的思想、精神活動，使所有的文化活動都符合德國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並且有計劃地迫害、驅逐所謂「製造和傳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科學家；超過五千名以上的科學、文化工作者被迫流亡，其中包括著名的愛因斯坦、托馬斯曼、布萊希特等人。其他留在德國的人則拒絕寫作或寫作而不發表，採取內心流亡的抵抗態度²。

在日本，一九三〇年前後軍國主義崛起，原來在二〇年代蓬勃發展的左翼勢力全

2 參照朱庭光編著《法西斯體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面潰滅。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原日本左翼作家被迫紛紛拋棄信仰，或轉入內向的純文學世界，或順應軍國主義的「國策」，因而形成了所謂的「轉向文學」。一九四〇年，日本成立直屬內閣總理的「情報局」，並以此為中心，日本法西斯推動對日本文化界的全面統制。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的一九四二年六月，在情報局的指導下，成立了「日本文學報國會」，其章程規定是：「本會的目的在於……，確立並發揚皇國傳統與理想的日本文學，協助宣揚皇道文化。」同年，又成立「大日本言論報國會」，宣稱：「不受外來文化的毒害，確立日本主義的世界觀，闡明並完成建立大東亞新秩序的原理，積極挺身於皇國內外的思想戰。」日本軍國法西斯的思想核心為：攻擊西方啟蒙時期以降的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唯物主義等，主張發揚以「皇國精神」「國體精神」為實質內容的日本主義，以及高倡「建設國防國家」，建設「大東亞秩序」，實現「八紘一宇」等等口號的對亞洲的侵略主義。依此，日本軍國法西斯對文學的要求就是：以這些法西斯思想為指導，在作品中反映這些思想，並以作品的思想性高於文學性，作為評價文學藝術的指標，視文學為強化國民的軍國法西斯意識的手段。這種「國策文學」構成日本侵略戰爭中的思想戰的一環，不但施行於日本本國，而且普遍地強制施行於朝鮮、台灣殖民地以及「滿州」半殖民地和所有的日本佔領地區。這就是台灣「皇民文學」產生的時代和思想根源，同時也是構成台灣皇民文學性格的核心思想。

四、產生台灣皇民文學的時代背景及推動台灣皇民文學的主體

一九四〇年，歐戰全面爆發，日本為了從泥沼化的中國戰場脫身，以及為了乘隙奪取西歐列強在東南亞殖民地資源，開始採取「武力南進」政策。以「驅逐歐美勢力解放東亞」的大義名分，用「建設大東亞秩序」的口號，發動對東南亞的侵略戰爭。在這種局勢下，殖民地台灣的角色，由原來的日本「米倉糖庫」一變而為「日本南方的玄關子」（小林總督用語，就是指日本南進基地之意）。於是，日本殖民當局開始進一步強化在台灣戰爭總動員體制；以「皇民奉公會」為皇民化運動的核心組織，徹底動員台灣的財富、人力和人命供其侵略戰爭的消耗。一九四二年一月，也就是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次月，在台皇民文學運動的頭號御用總管西川滿，在他主持的《文藝台灣》扉頁上，用黑體大字表明了他用文學向日本軍國主義國家交心的決意，其大要謂：

為了建設大東亞的國家的心

我們文學創作的心，只有呼應這「國家的心」才能躍動。新的國家文學的理想，並非達到抽象的美的理想；而是應具體實現現實上的「國家的理想」，以作為國民

生活的指標。³

同年，台灣總督府開始對台灣的電影、戲劇、演藝進行了法西斯統制。在這前後，西川滿領導的「台灣文藝家協會」和機關誌《文藝台灣》以及「日本文學報國會」台灣支部，共同積極扮演了以文學協助推動日本大東亞戰爭的角色，並培養符合「呼應國家的心」文學觀的作家，於是所謂的台灣皇民文學開始登上舞台。台灣皇民作家周金波的《志願兵》的出現，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一九四三年，日本在東亞的侵略戰爭開始呈露敗象，從東南亞戰場節節敗退，台灣處於日本的絕對國防圈內，因而台灣進入所謂的「決戰期」。同時，第一批台灣人陸軍志願兵被送往南洋戰場，台灣開始成為日帝的兵源供應地。此時，台灣的文學和電影、戲劇一樣，成為強化台灣人決戰意識的宣傳和鼓動工具。一九四三年四月底，在「皇民奉公會」指導下由西川滿等主導，將「台灣文藝家協會」改組為「台灣文學奉公會」。此後，「台灣文學奉公會」與「日本文學報國會」台灣支部、在台日人御用文臣的雜誌報刊，以及其背後的總督府保安課、情報課、州廳警察高等課、日本台灣軍憲兵隊等在台殖民軍國主義機關，共同構成了推動台灣皇民文學的主體。

這個日本法西斯文學機關用各種方式打壓台灣人民的文學，開始將台灣文學轉變

成受日本軍國殖民當局統御的文學和思想部隊，千方百計，以高壓企圖將台灣文學皇民文學化。

五、對台灣文學的打壓，以及台灣作家的屈從與抗拒

實際上，日本軍國殖民當局對台灣文學的打壓，早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一九三七年就已開始。彼時，日本殖民當局逐步對全台灣社會進行戰時統制；為了改造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以及為了清除抗日思想，日本殖民當局展開如火如荼的皇民化運動。皇民化運動的重要一步，便是禁止報刊雜誌用漢文（中國白話文）。這對向來以中國白話文為文學表現工具而成長起來的台灣文學界而言，不啻是致命的打擊。當時，台灣文學的兩大園地——《台灣文藝》和《台灣新文學》被迫在那前後相繼停刊。台灣文學的開拓者賴和、楊守愚、陳虛谷等人，為了抗拒以殖民者的語言寫作，轉而寄情舊漢詩文；有些失去文學園地的作家，離開故鄉遠赴大陸、南洋；而吳漫沙等人則繼續刊行無關時局的白話文雜誌《風月報》、《南方》，一直到一九四三年為止。直到一九四一年五月，才由張文環、王井泉、黃得時等人創辦了《台灣文學》季刊，與日本御用文人西川滿主持的《文藝台灣》分庭抗禮。

如前所述，一九四三年，台灣進入了日帝的決戰期，於此前後，在軍國殖民當局和日人御用文臣加緊對台灣文學進行皇民文學化的環境下，出現了一批年紀較輕、同

時在皇民化運動中成長正逢思想形成期的所謂「戰中派」作家，他們積極創作了呼應日帝國策的作品，產生了所謂的「台灣皇民文學」。但是，絕大部分經歷過二〇年代到三〇年代台灣的民族運動、社會運動和新文學運動的作家們，以及繼承了台灣文學精神的年輕作家，他們即使無力正面反抗，在生活表面上與日本軍國殖民當局虛與委蛇，但是，在實際的創作上卻仍然秉持文學與民族的良知，堅持台灣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繼續創作，頂住來自當局御用文臣皇民政治的高壓。

六、「狗屎現實主義」論爭

對於台灣作家不屈從於文學皇民化的態度，日人御用文臣們早就極為不滿。這種不滿的爆發，出現在「台灣文學奉公會」成立前後；西川滿在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出版的《文藝台灣》上寫了《文藝時評》，對主要以《台灣文學》為園地的台灣文學，展開了猛烈的攻擊。他批評台灣文學的主流是「狗屎（日文原文為「糞」）現實主義」，是拾歐美文學的牙慧，不重視日本精神，無視台灣的「勤行報國隊」、「台灣志願兵」的熱烈現實，只會寫些虐待繼子或傳統台灣家族糾葛的舊習俗等等。

對此，呂赫若在五月七日的日記上如此寫道：

西川滿的《文藝時評》所表現的低能格調，突然間引起了各方的非難。總之，西川氏是因為無法以文學的實力壓倒別人，所以就用那樣的手段陷人於奸計，真是一

個文學的陰謀策動家。記得金關博士曾經說過這樣至理名言：妨害台灣文學成長的東西就是文學家也。

針對西川滿對台灣文學的攻擊，有一位以「世外民」為筆名的台灣作家，在五月十日的《興南新聞》上也寫了一篇《狗屎現實主義與假浪漫主義》，予以反駁。他批評西川氏的文章，在醜陋的惡罵方面令人驚訝；如果本島人作家的作品是「狗屎現實主義」的話，那麼，自稱為浪漫主義者（指西川滿）的作品，也無法免於被指責為「假浪漫主義」。隔週，年少的葉石濤站在為西川滿辯護的立場，寫了一篇《給世氏的公開書》；批評世外民為狗屎現實主義的信奉者辯護，不懂得日本文學的傳統，是受外國文學不良影響的自由主義者；葉石濤寫道：「以無限幸福、光輝和至正的建國理想建設起來的當今日本文學，正是清算明治以降來自外國的狗屎現實主義，回歸古典雄渾時代的絕好機會。」葉石濤接著寫道：「對於裝出一幅不識時代潮流的嘴臉，得意地吶喊著什麼『台灣的反省』啦！『深刻的家庭爭議』啦！抬出讓人想起十年前的無產階級文學的大題目而沾沾自喜的那伙人來說，給予當頭棒喝，也不為過。」

葉石濤還舉張文環的作品《夜猿》、《閹雞》和呂赫若的作品《合家平安》、《廟庭》為例，洵洵然地質疑道：

4 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七日《興南新聞》學藝版。

到底在張氏或呂氏作品中的什麼地方，有（類如西川滿作品中的——作者按）皇
民意識呢？

在那樣的時代空氣中，被公然指為沒有皇民意識，可說是等於被戴上了不小的政治帽子，與被指為「非國民」一樣嚴重。受到葉石濤公然質疑的呂赫若，在同年五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如此記道：

在《興南新聞》的學藝欄，有葉石濤者，以張氏和我為例子，斷定本島人作家沒有皇民意識。他的文章不管在論脈或頭腦上都屬低格調，不足為論；但在人身攻擊上，則令人憤怒。

對於西川滿的攻擊，楊逵也以「伊東亮」的化名在七月三十一日出刊的《台灣文學》秋季號上，寫了一篇《擁護狗屎現實主義》予以反擊。他說：「即使浪漫主義者（實際上，不是什麼浪漫主義者，而是現實逃避主義者）掩面搗鼻不想看，但現實還是作為現實存在的，被掩蔽隱藏的不是現實，而只是人的眼睛、鼻子而已。……然而，到西方淨土遊玩、耽溺於與媽祖的戀愛故事，那到底是什麼？只不過是癡人說夢罷了！（作者按：指西川氏作品）……浪漫主義決非是與現實主義相對立的，就只有站在現實主義的立場，才會綻放出浪漫主義的花。不排擊現實主義就無法存在的浪漫主義，那只是空想，荒唐無稽的東西。只是不搭飛機而搭筋斗雲的癡人之夢，只不過

是類若媽祖得戀愛故事那樣的東西而已。「楊逵說理深刻，氣魄凜然，今日讀之，猶然肅然起敬！

七、在「決戰文學會議」上，皇民文學勢力對台灣文學的壓制

皇民文學勢力與台灣文學作家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以及皇民文學勢力挾其背後的日本軍國殖民當局的威嚇對台灣文學的打壓，隨著日本戰局的頹敗，而日愈為緊迫。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由台灣文學奉公會主辦，台灣皇民奉公會、日本文學報國會、總督府情報課協辦召開了「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在這會議席上，以西川滿為代表的皇民文學勢力，藉著決戰態勢的壓力，逼迫《台灣文學》廢刊，因而爆發了雙方面對面的鬥爭，在現在殘存的決戰文學會議紀錄中，關於這部分的記載，大要如下：⁵

首先是西川滿的發言：他表示對台灣作家只在表面上裝出「總親和」的態度十分不滿。接著，他以獻出他所主導的《文藝台灣》雜誌給日本決戰體制為手段，要求其他文藝雜誌也一齊跟著進入「戰鬥配置」，逼使不積極配合決戰態勢的文學雜誌廢刊（作者按：實際上是針對以台灣作家與非法西斯的日人作家所組成的《台灣文學》）。對西川的提議，在會議當場引發了一場針鋒相對的、勇敢的鬥爭：

5 刊載於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出刊的《文藝台灣》也是它的終刊號。

黃得時起身反駁道：「沒有必要進行對文學雜誌的管制，就像廣告一樣，愈多愈有人看，雜誌也一樣愈多愈好。」

濱田隼雄警告黃得時說：「不要把對物質的經濟管制和對文化的指導統制混為一談。」

楊達贊成黃得時的意見，說道：「抽象的皇民文學理論與雜誌的統合管制問題，完全是兩回事。」

神川清憤慨地批評楊達的發言道：「理念與具體實踐是不可分離的。」並提醒楊達道：「假若在政策上兩者分離的話，國家將會滅亡。」

（會後，神川清另外寫了題為《刎頸斷腸之言》的文章，批判楊達的發言，他認為：「這是本次會議中最不幸的事（作者按：指楊達的發言）」，也許是由於楊達不努力而生的無知；但是，以這樣的態度從事文學的人，居然仍然可以在台灣安居築巢，真是太遺憾了！」）

黃得時再起身說：「我並不反對西川滿將《文藝台灣》獻出來。如果真想把《文藝台灣》獻出的話，這是他個人的自由；但是其他的雜誌並沒有跟著配合的義務。」

接著，西川滿又提出了要求日本軍國殖民當局撤消文學結社，把作家全部納入「台灣文學奉公會」，進行文學管制的動議；甚至贊同在台灣文學奉公會下另設「思想參謀本部」，對作家進行思想控制。充分暴露了西川滿在唯美主義的外表下，毫不

保留的文學法西斯本質。

會議在總督府保安課長的講話中結束。他說：「對決戰態勢無益的都不要；文學作品也一樣，只有對決戰態勢有助益的才可發表。」這等於宣告了皇民文學取代了台灣文學，日本軍國殖民體制完全支配了台灣文學。

會後，河野慶彥寫了一篇決戰文學會議的感言——《朝向思想戰的集合》，文中對於台灣作家「陽奉陰違」的態度（張恆豪先生語），如此批評道：

從會場的空氣中感覺到，（台灣作家們）只是把頭探出來，說些諸如皇民文學、戰鬥文學的漂亮話，但雙腳卻依然原地不動。……使人嗅到台灣文學的「體臭」，感覺到泥巴和口水到處亂噴……我們非克服這些內含的矛盾不可。……台灣文學已到了非「脫皮」不可的時刻了，不要只在表面上裝出總親和的樣子，而是要真正成爲一隻受統御的思想部隊。

河野以台灣人的「體味」、「泥巴」、「口沫」為言，毫不客氣地表現了他對台灣人的種族主義歧視和憎惡，躍然紙上。由這些紀錄我們認識到，以西川滿為首的在台御用文臣和皇民文學勢力，如何試圖以逼迫《台灣文學》廢刊、撤消文學結社、利用台灣文學奉公會對作家進行統制、甚至提議設立思想參謀本部等來對台灣文學進行法西斯控制，推進皇民文學；其目標就是要消除仍散發著台灣人民主體的「體臭」、

「泥巴味」與「口水」的台灣文學，使台灣文學「脫皮」成受統御的法西斯思想部隊——皇民文學。因此，所謂「皇民文學」，其本質是台灣文學的對立物，是扼殺台灣文學精神的。

八、台灣文學的烙痕

呂赫若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日記上如此寫道：「今天當局下達《台灣文學》廢刊的命令，真叫人感慨無量……。」自此，台灣文學完全被置於台灣文學奉公會的一元控制下，在軍國主義的高壓下虛與委蛇，等待黑暗時代的結束。

一九四四年，盟軍攻陷塞班島，開始對日本總反攻，日本本土和台灣處於盟軍軍機猛烈的轟炸之下，台灣進入「要塞化」時期。日本在台軍國殖民當局對台灣文學的至上指令由「決戰文學」進入「敵前文學」。台灣文學奉公會的機關雜誌——《台灣文藝》六月號，刊出了名為《台灣文學界總蹶起》的專題，其中，呂赫若寫了一篇題為《寧為一個協和音》的文章，他表示在決死戰爭的大交響樂中，寧願扮演一個小小的協和音——而不是主調。實際上在小說創作上，他避開了皇民文學喧囂狂亂的戰爭和大和主義的主題，致力寫趨頹敗的台灣封建家族以及陽奉陰違的增產文學作品。同專集中，在極嚴酷的高壓下不得不交待的楊逵，也寫了短短的近似自白書的《解消首陽之記》；其強忍錐心泣血之痛又不得不委協的內容，令人憶起賴和在一九四一年末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夜被捕後，在獄中所寫的《獄中日記》。在日本軍國法西斯瀕死的狂暴脅迫下，寫下的屈辱文字，是台灣文學最深、最為難忘的傷痕。

九、對台灣皇民文學勢力的歷史總結算

從上述產生台灣皇民文學的歷史過程，發生於一九四三年的「狗屎現實主義論戰」和「決戰文學會議」席上的鬥爭，以及一九四四年台灣進入「要塞化」時期的《台灣文學界總蹶起》專題中，我們可以看出下列歷史事實：

1、皇民文學勢力對台灣文學的鎮壓。

2、在「決戰」局勢下，台灣前輩作家仍然憑著文學的良知，抗拒台灣文學的皇民文學化。但是進入了「要塞化」時期，台灣作家已經不得不委屈求全虛與委蛇，不過那已經是距日帝敗亡不足一年的時候了。

3、皇民文學勢力，實際上包括台灣皇民作家，日人御用文臣以及其背後的日本軍國殖民體制，構成三位一體，用「文攻武赫」來推進台灣文學的皇民化。

4、因此，西川滿代表著這三位一體的皇民文學勢力，對台灣文學發出總攻擊，逼迫台灣文學就範於皇民文學體制。

5、從少年葉石濤和西川氏攻擊台灣文學的內容來看，它們的皇民文學思想特徵包括：排斥西方文學、反對現實主義文學、無產階級（普羅）文學和自由主義，甚

至反對反映台灣社會風土的本土主義；主張回歸復古的日本主義和宏揚日本的建國理想，以及強調描寫台灣的勤行報國隊、志願兵熱等，強化台灣人決戰意識的文學。這不單是台灣的皇民文學勢力的文學思想特徵，同時也與當時的日本軍國主義在其本國、在偽滿州國、在朝鮮、在中國淪陷區普遍推行的文藝政策，有著共同的特徵；它們的思想總根源就是日本的軍國法西斯主義。

6、台灣皇民文學體制（包括台灣文學奉公會等），是日本殖民主義、軍國主義在台灣施行戰爭總動員體制的一環，是通過打壓台灣文學而樹立起來的。它與當時如火如荼地在台灣推行的軍需工業化、強制儲蓄運動、皇民化運動、軍伙、志願兵運動是一體的兩面。

十、台灣皇民文學的性格

台灣皇民文學的性格主要決定於它的產生過程，和推動主體的指令。歸納起來，包括下述的三方面：

（一）皇民文學的戰爭文宣性格

在一九四三年底舉行的「台灣決戰文學會議」席上，台灣文學奉公會會長山本真平如此說道：「後方戰士的責任，是在擴大生產以及昂揚決戰意識；亦即與武力戰結為有機一體的生產戰、思想戰……在思想戰方面，諸位文學者正是承擔著增強國民戰

力的任務。」

而關於所謂「皇民文學」，他說：

文學家既蒙皇國庇佑而生活，當然應當與國家的意志結成一體……。今天的文學不能像過去一樣，只在反芻個人感情，而應該是呼應國家的至上命令的創作活動，當然，文學也一定要貫徹強韌有力、純粹無雜的日本精神來創作皇民文學。以文學的力量，激勵本島青年朝向士兵之道邁進，以文學為武器，激昂大東亞戰爭必勝的信念。

(二) 皇民文學的日本法西斯思想性格

當時，推動台灣皇民文學的主體，除了像台灣文學奉公會這樣的組織之外，最重

要的就是有一批狂熱的在台日人法西斯文臣；他們除了積極創作一些表現日本法西斯思想的文學作品之外，還積極地發表一些具攻擊性的日本法西斯文學言論，與當局的皇民文學施策共同形成了濃厚的法西斯文學環境，對台灣作家造成極大的威脅。

譬如，以台灣代表的身分，參加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在東京召開的「第一次大東亞文學者會議」的濱田隼雄，和自命為「皇民文學理論家」的神川清，就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他們也與西川滿同伙，是皇民文學勢力的中心人物。只要概括他們幾篇文章的思想內容，就可以清楚地理解到，所謂台灣皇民文學中的日本法西斯思想特徵。

在文化思想上：

排斥啟蒙哲學以降的西歐近代文化；反對文化至上主義；認為主知主義、理性主義和唯物主義是「敵性文化」的土壤。高舉復古的日本主義，強調皇國精神與直觀精神混合的盲目愛國主義，並且高倡所謂「八紘一宇」的侵略主義。這種思想與當時的世界法西斯思想有共通的部分，也是日本法西斯的精粹。這種思想使千萬以上的亞洲人民人頭落地，生靈塗炭。

在文學思想上：

它極端攻擊文學的相對自主規律，把文學只當做體現上前述日本法西斯思想的工具。現在不妨擷取他們文章中的一些句子看看他們的觀點：

即使文章的技巧有多好，但是如果忘了忠於天皇之道，如果把作為文人的自覺擺在作為日本人的自覺之上的話，我認為他除了是國賊或不忠者之外，什麼都不是。

文學批評的基準就在日本精神。

在皇國體的自覺中發現文學的始源，要求貫徹皇國體思想，把作品與國體結合在一起。

在終極時的精神燃燒——天皇陛下萬歲，是一個文學者的描寫達到的最高境界。

在決戰下，我們思想決戰陣營的戰士們，務必要撲滅「非皇民文學」，要揚棄「非決戰文學」。

在文學實踐上：

就如當時西川滿所主持的「皇民文學塾」的同人訓所揭示的頭二句話：「我等為皇國的文臣、文臣之道在用筆劍擊倒敵人而後已。」就是把文學視為實踐皇國之道的武器和工具，把文學家當作遂行大東亞聖戰的思想部隊。

(三) 皇民文學的皇民化性格

前面說過，當時的台灣作家是處於日本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因此，台灣皇民文學的性格並非單只是上述日本法西斯文學思想的簡單翻版；它還具有日本殖民主義現實的另一面。亦即，它除了要表現日本軍國主義的文學要求外，還必須擔負反映日本殖民者對殖民地台灣人民進行皇民化的文學要求，這又構成了台灣皇民文學的另一特異性格。

以處女作《道》而讓西川滿感動得「熱淚盈眶」，被濱田隼雄讚譽為最傑出的皇民文學的陳水泉，在決戰文學會議上發表了《談皇民文學》一文，他如此說道：

「現在，本島的六百萬島民正處於皇民鍊成的道路上；我認為，描寫在這皇民

鍊成過程中的本島人的心理乃至言行，進而促進皇民鍊成的腳步，也是文學者的使命。」這句話要約地指出了《道》和周金波的《志願兵》以及王昶雄的《奔流》等皇民文學的代表作的共通性格。這些作品的主题，大致都在表現殖民地台灣的知识份子如何積極地自我鍛煉成標準皇民的心理與言行；所謂「皇民鍊成」，簡單地說就是戰爭期間的皇民化運動，也就是在文學上表現如何拋棄台灣人的漢民族語言、習俗、價值觀，徹底地成為與「內地人」有同樣神經感覺的日本人，這樣的主题。然而，這裏所指的「日本人」並非一般意義的普通日本人，而是在這特殊的歷史時期，日本軍國法西斯體制所要求的標準日本人「樣板」；它有著熱烈的日本法西斯思想，有狂熱的為皇國殉身為大東亞聖戰奉公的決心，是具有這樣的成分的所謂「日本精神」的日本人。這與德國法西斯所要求的，具有德意志精神的標準日耳曼人一樣，都是法西斯體制下的樣板人。

既然台灣皇民文學的重要主题之一，就在表現台灣人皇民化的問題，因此，皇民化性格是其重要的部分。

十一、總結算

由上可知，所謂台灣皇民文學，是日本軍國殖民者對台灣文學的壓迫與支配的產物；首先它扼殺了文學精神，因此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對立物；它更扼殺了台灣文學

的精神，是台灣文學的對立物。它也是日本軍國殖民體制在台灣施行的戰爭總動員制的一環，以文學的假面，宣揚日本的軍國殖民法西斯理念，來動員台灣人民的決戰意識，為日本侵略戰爭獻身的東西，所以更是台灣人民的對立物，同時，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的對立物。這是所謂台灣皇民文學的本質，必須先認清楚。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在日本軍國殖民體制高壓下，雖然有些台灣人作家積極地向日本戰爭體制靠攏，站在皇民文學的陣營為體制效勞；但絕大部分的台灣前輩作家，有人拒絕寫作，有人憑良知抵抗，有人陽奉陰違虛與委蛇，總之，都以各種方式表現了維繫台灣文學氣脈的可貴精神。對於前者的奴隸、機會主義者，和後者的以艱難的抵抗維護了人的尊嚴捍衛了台灣文學尊嚴的作家，兩者之間，必須辨識清楚，不容淆惑。

以上是對所謂台灣皇民文學的總結算書；自命真正愛台灣、疼惜這塊土地的人，是應該宣揚皇民文學理念呢？還是應該彰顯台灣文學威武不屈的精神呢？不要吞吞吐吐遮遮掩掩，是應該把話說清楚的時候！

面對張氏如此淆惑與傷害台灣文學尊嚴的作為，平日開口「台灣文學的尊嚴」，閉口「台灣文學的主體性」的所謂「台灣意識文學」論者，怎麼都鴉雀無聲了呢？是不是所謂的尊嚴或主體性只對中國有效，而對日本軍國殖民者或其扈從者無效呢？

刊登於《人間思想創作叢刊》創刊號一九九八年冬季號

略論「皇民史觀」

近幾年，關於台灣的論述大量湧現，台灣論甚有成顯學之勢。書坊大多闢有專櫃陳列，可見其甚有市場價值，反映國民關心自己的社會、歷史，甚為可喜。然而，綜觀其內容，可說有分量的作品不多，尤其令人憂慮的是或多或少有意無意間，對台灣五十年的殖民史流露出一「皇民史觀」。最近出版的第一百期《日本文摘》，其編輯意圖或部分文章圖片就是「皇民史觀」的最典型代表。從日本殖民地解放，經過五十年發展的今日台灣，出現印刷精美「始政紀念」式的「皇民史觀」大展，真是觸目驚心，不知今夕何夕了！只有引用李登輝的名言「台灣人的悲哀」，聊以自嘲吧！若將這精美的圖文給日本國民看，他們必然會「又錯愕又驚喜」，就像又發現了一個從南洋熱帶叢林中出來的「舊日本兵」一樣。但，它絕不只是「叢林中出現日本兵」的軼事珍聞，它代表了台灣現實社會的一部分，而且有其市場價值，所以我們不能像李總統一樣，在日本通俗週刊誌上與裸女醜聞同列向流行作家訴說「台灣人的悲哀」就了事了。我們必須嚴肅地分析其內容及形成原因。

一、台灣的「皇民史觀」與日本的「戰後總結算」

綜觀《日本文摘》的皇民史觀，其內容大約如下：

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定，日本正式入主台灣，為台灣歷史再注入一股新的內涵與氣象……其所締造出來的成果是：建立近代法制、教育制度，在台灣民間普遍建立「守法」觀念，將台灣從半自足的落後經濟建設成近代化資本主義經濟，很受東方各國讚美。與貧窮、落後、動亂的近代中國相比較，台灣有幸成為日本殖民地，才有今日與中國迥不相同的國家。若拿戰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人均所得與現在日本人均所得比較，其差距比殖民期的差距更擴大的事實來看（從一比零點六擴大到一比零點三），台灣脫離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是禍是福頗值深思（意謂若繼續為日本殖民地，應當有更大的發展）。

這種史觀完全無視所謂建設背後的殖民地化掠奪過程，把殖民者掠奪的成果當成全台灣人民的成果。它代表公益會、皇民奉公會等依附日本帝國的地主仕紳史觀的擴大與延續，同時也代表了戰後新生的粗淺的經濟發展主義者的史觀。

記得日本首相曾數次發表過「對過去的殖民、侵略造成鄰國莫大的災難」等內容的道歉聲明，而今日台灣竟然仍存在盛讚殖民統治功績的復古勢力，相比之下令人汗顏。但，它又是與日本國內近年盛行的「戰後總結算」論調若合符節。這一戰後總

結算」論調將日本的侵略轉換成進出，將大東亞共榮圈美名下的東亞侵略正當化為幫助東亞各國驅逐歐美殖民勢力，為解放東亞各歐美殖民地的正義之戰，而且建設現代化基礎……。今日台灣的「皇民史觀」與日本國內的「戰後總結算」論調是一脈相傳的，其共同的意圖是將「侵略與殖民的歷史」正當化、美化。所不同的是，日本的「戰後總結算」是為日本進一步的擴張做基礎準備，而台灣的「皇民史觀」是台灣分離主義史觀的一部分。

一一、殖民地化掠奪過程的本質

針對「皇民史觀」的殖民現代化論，下面指出台灣殖民地化掠奪過程的本質：

一、所謂「現代法制體制的樹立」其本質，是以根源於六三法的總督律令權及警察制度、保甲制度為權力基礎的。就是殖民地法。

二、佔領初期的所謂近代資本主義化基礎施政如土地調查、廢大租權、林野調查、金融貨幣制度……。一方面是為了確立殖民統治的政權，一方面是為了日本資本進入殖民地發展鋪路，並不是為了台灣本土的資本主義化，而且是在保留傳統地主制上的殖民資本主義化。

一九〇五年後糖業的發展，是在總督府國家權力強力的干涉扶植下，迫使傳統糖廊沒落，台灣本地糖業資本被併吞從屬化（由於資本的民族差別），以及台灣蔗農的

奴工化（甘蔗採集區域制），在殖民權力庇護下，使日本糖業資本壟斷台灣蔗糖原料及生產，才得以快速發展。其產品絕大多數輸往日本國內消費，造成日本糖業資本的快速積累。

一九二二年後，蓬萊米為中心的稻作發展。由於台灣發達的地主佃農制，使稻米生產及島內的流通階段由本地地主與土壟間掌握。由於台灣蓬萊米生產成本低，又與日本市場同一關稅保護下價格競爭力強，同時與日本米的口味差小，大量輸往日本，使蓬萊米對地主稻農來說為高利益商品，因此產量大增，與糖業共成為台灣二大出口日本商品。雖其島內生產流通掌握於本地地主與農民，但總督府仍透過對水利的控制間接控制稻作生產，同時為糖業資本解決米糖相剋的問題。一九三九年為了軍需工業化的發展，強制實施「台灣米穀輸出令」，由總督府強制收購輸出米賺取差價、壓低米價，側面支援以日本壟斷資本及國策資本為中心的軍需工業化發展。台灣稻米的增產及流通是受日本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所規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空前景氣，米食需要大增，台灣稻米扮演了補充國內日本米食不族的生產基地，生產量的百分之五十出口日本（蓬萊米佔百分之八十），與糖業成為台灣典型的殖民地商品。一九三〇年，日本資本主義被捲入世界性經濟恐慌中，為解決這矛盾，開始採取政策性通脹及對外擴張，至此，殖民地台灣除了扮演米糖生產基地外又加上必須為日本資本主義本身矛盾的轉嫁地，開始承擔軍需生產與南進基地的角色。總督府透過財政膨脹及信用膨脹等政策性膨脹及米穀管制、專賣手段等增稅手段，再加上動員儲蓄及繳出黃金運動動員本地人資金，供其支援軍需工業發展，還將百分之

二十的財政收入上繳日本母國政府，支援殖民母國的戰爭財政支出。

二、經過五十年殖民地化的結果：

(一) 據一九四一年的數字，全台企業總資本額中，日本資本佔了百分之九十一，本地資本只佔了百分之八，而其中日本壟斷資本如三菱、三井、日產等就佔了一半以上。可見殖民地式資本主義化的結果，是以日本國內壟斷資本為頂點，統合糖業資本與被弱體化依附於日本勢力下的台灣地主仕紳資本；是騎在台灣殖民地人民頭上的金字塔形發展，以遂行日本壟斷資本積累及對外擴張。殖民地人民處於日本壟斷資本、總督府及封建地主制的三重掠奪壓迫下。與所謂近代資本主義建設或發展一點關係都沒有。

(二) 到一九四〇年，日本殖民勢力總共已控制了台灣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耕地。包括糖業資本社有地、租借地以及勸業銀行、農村信用組合的貸款抵押地。

(三) 一九四〇年，台灣農家的負債戶數已高達百分之八十八，平均每戶負債七百三十三元，等於一年的工資收入。而債主則百分之七十五為日資或日人控制的金融系統（普通銀行、勸業銀行、產業組合，及各金融買辦），其他的百分之二十五為傳統的地主高利貸。

因此，所謂太陽旗下的台灣近代資本主義發展，並不是一般的資本主義發展，而

是殖民主義式的資本主義發展。以殖民地人民為掠奪基礎，保留封建地主制，運用殖民政府強權促進日本壟斷資本與國家資本在台灣的積累與發展，供應日本資本主義發展各階段的需求，補足其資本的擴大再生產運動。其過程與結果，必然發展出有系統的近代殖民式資本主義社會關係，如法制、治安、教育、商業產業經營……等，也必然發展出龐大的物質建設如水利、交通、工農業……等為代表的生產力。但是，這些生產力與近代社會關係是為了替日本帝國、日本資本服務的，所謂建設成果是吸取殖民地人民血汗以遂其資本積累、資本擴大再生產運動及帝國擴張侵略的工具。若沒有一九四五年殖民地解放台灣光復，這些永遠是日本帝國日本資本的發展和成果，連一滴也不屬於殖民地人民。有了殖民地解放它才成為台灣社會的一部分，為台灣人民、資本服務。

在殖民者享用殖民式資本主義建設成果的反面，在殖民地的資本及土地快速向殖民者集中的過程，殖民地人民則漸漸貧困化、負債化。

三、產生「皇民史觀」的政治經濟基礎

一、必須從台灣戰後歷史的發展中來認識。它經歷了（一）抗日勝利國民黨全盤接收日帝遺制和遺產並將其公營化，（二）二二八事件，（三）世界冷戰體系下台灣反共至上經濟發展至上的政經結構形成，（四）白色恐怖和土地改革，（五）導入僑

外資，發展公、民營企業、納入三環經貿結構的依附性、經濟結構擴大再產出。

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外部力量，解放了台灣殖民社會，也就是殖民地解放勢力並非台灣內部形成。因為，反殖民運動的內部解放勢力，在一九三一年已被鎮壓分裂；隨著日帝侵略戰爭的加劇，活躍在殖民期政治舞台的只剩下依附日本勢力的以辜、林為首的公益會及後期的皇民奉公會。這些本土地主仕紳階級的買辦雙面性格，使其雖經過戰後初期的二二八及國民黨政府的土地改革，但並未衰退，仍然在反共及經濟發展的結構下，以民間產業資本的形態迅速壯大，在日台美三環循環結構中終至在台灣取得政經支配力量。因此「皇民史觀」的力量遂得以保留發展，終至今日躍上舞台確立其發言權。

三、國民黨政權的仇日親日雙重性格。由於國民黨抗日的悲慘經驗，在感情上極端仇日，再加上為統治本土社會的需要，於是在島內便施行極端样板的仇日教育、宣傳及社會政策。強行割斷社會上的殖民歷史聯繫，將台灣重塑成「為中華民國政府反共及經濟服務」的社會，斷決了台灣社會對殖民期歷史的正常反省思維能力，使殖民歷史記憶冰封保留在五十年前的狀態。再加上對國民黨極權統治的不滿，因此更促進了台灣社會對殖民期的懷舊心情。另一方面，國民黨的現實政經運作，又不得不採取親日政策。在戰後初期，經濟上對日輸出米糖換取肥料及六十年代美援終結後的對日借款、日資導入乃至日台美三環循環經濟的形成與發展，使其在冷戰結構及後冷戰結

構中不得不在經濟上依賴日本。在如此結構下的親日政策，就反映在放棄政府對日要求戰爭賠償，無視民間對日索求賠償，乃至打壓客觀的主體的對殖民史研究與批判言論。總之，國民黨政權為其本身的存立，採取了對內仇日對外親日的兩手政策，也破壞了台灣社會發展出正確的殖民史觀的能力。

四、今日對日經濟文化依賴的結果，在社會意識型態中產生了日本第一、模範日本的現象，再加上新生的粗淺的經濟主義學者在論述上的推波助瀾，乃使崇拜日本的社會意識向後延伸投射到殖民期，使「皇民史觀」得以獲得一定的社會市場價值。

完稿於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日十一時

刊登於《海峽評論》第四十二期，一九九四年六月

台灣殖民歷史的「瘡疤」

——評葉石濤最近在日本的發言

最近，日本的《新潮》月刊九月號上，刊出了台灣年長作家葉石濤於今年六月十五日在日本東京大學演講的全文——《我的台灣文學六十年》；同時，另外一份日本雜誌《尤里卡》（Eureka 古希臘語）九月號，也刊出了同在六月十五日由日本學者山口守訪問葉石濤的文章——《訪問葉石濤》。這兩篇文章再度呈現了近年葉石濤以「台灣主體」為名，實際上用選擇性的、機會主義的歷史回憶和搖擺不定的觀點的論述特點；葉石濤的這種特點是大家都已熟知的，本不足為奇。然而，這次發言在性質上卻與他往常的言論有極大變異的成分；對於這個部分，他自己也在文中得意地形容說：「將在台灣引起文化大革命」、「像地震一樣」。那個他自誇「將引起文化大革命」的觀點不是別的，概括而言就是：他認為如果以「台灣主體」去評斷台灣的前輩作家，楊逵和龍瑛宗都「不合格」，因為他們都是「大中國主義者」，「必須重新檢討他們在台灣文學上的地位」。

一、有良知的人怎麼可以不說話？

這個「大中國主義者」的意思，就像所有的「大××主義者」一樣，就是指對方

有霸權、壓迫性、強迫性的意識型態，是一個基於對抗心態具敵意的惡涉詞；它是所有的民族分離主義者或反華勢力慣用的政治宣傳語，這是很清楚的。楊逵一生站在台灣勞苦大眾立場，在日據期獻身反日反殖民的社會解放、民族解放事業；光復後，又力行省內外作家團結合作的文化事業，國共內戰中提出「和平宣言」而長期坐國民黨黑牢。對於這樣的台灣前輩作家，葉石濤竟然指他是一個「大中國主義者」，這種作法與其說是文學的評論，倒不如說是政治性的指控。有良知的人怎麼可以不說話？至於他據以評斷的所謂「台灣主體」又指的是什麼呢？其實九月五日的《中國時報》藝文版，也曾以極大的標題刊出了有關葉石濤這次發言的報導。報導寫道：「葉石濤說，如果『台灣獨立建國』，他相信楊逵的地位會被徹底改變，又譬如張我軍的成就也會被重新看待」；報導中，雖然沒有提及葉石濤說楊逵是「大中國主義者」這句話（實際上，至今台灣仍極少人知道他說過這句話）；但是，葉石濤又進一步把日據期台灣新文學的開創者張我軍也拉下了水。由此可知，葉石濤在日本人面前所說的「台灣主體」，其實就是指「台灣獨立建國」，這在文學上，簡單地說就是「台獨文學論」。這是以「台灣獨立建國」的政治標準來評價文學價值的文學觀。葉石濤認為依據這種文學標準，楊逵、龍瑛宗以及他在台灣記者採訪中再加進去的張我軍，都是「不合格」的，因為他們都是「大中國主義者」。

可以說，葉石濤已經開始用「台獨」的政治標準來對台灣新文學的前輩作家進行

思想檢查，清算、歸類和排除。然而，如果連楊逵、龍瑛宗、張我軍等也都要被歸類為「不合格」的「大中國主義」者的話，那麼，台灣新文學的前輩作家中，極少數不是「大中國主義」者的；甚至，恐怕連葉石濤自己的大半生都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大中國主義」者哩！（關於這個部分，後面將會舉證討論）。如果依照葉石濤這個標準去排除的話，所謂「台灣主體」的台灣文學將會空無一物，而成為空洞主體的文學論。

葉石濤的這番發言果然如《中國時報》所形容的，「在文學界扔出一顆炸彈」；它雖比不上李登輝最近暴言：「釣魚台是日本的領土」的「喪心」程度，但已差可比擬。雖然一則是文學上的發言，另一則是有關中國領土的發言，但兩者都是政治性的，都顯示了當今台灣的一個另人憂心的動向，那就是：台獨的政治勢力正「處心積慮」地在社會各領域推動去中國化的「一邊一國論」，而且是「得寸進尺」地推動。只不過，這兩人都都是高齡長者，都在青少年期受了日本皇民化運動的深刻影響，因此，「皇民化意識」便成了他們的台獨論的最重要的思想和感情基礎。

一一、「皇民意識」的幽靈

從葉石濤這兩篇文章的內容來看，可以清楚知道，他以「台灣主體」為名的「台灣文學論」，其底流實際上就是「皇民意識」。

雖然他的演講題目定為《我的台灣文學六十年》，但絕大部分的內容都在細述他二十歲以前，也就是他在日據末的皇民化運動時期的文學經驗，好像這短短的四、五年的青少年的文學入門期，就是他六十年的文學活動的全部。而關於台灣光復以後，也是他在台灣文壇上最活躍創作和發表作品最多，成為一個真正的作家的時期，卻隻字不提，避而不談。為什麼避而不談呢？或許是因為他在這期間，不論在評論、小說或生活方面，都是不折不扣的、像他自己在這兩篇文章中指責楊逵的「大中國主義」者吧！也許在日本人面前說這些，不但不光彩還有自打耳光的味道。也或許是，面對這麼多的日本人聽眾，而情不自禁地回到了他自己曾說過的「日本是我心靈的故鄉」的心態，而忙著傾訴自己「二十歲以前也是日本人」的文學經驗吧！

在演講的起頭，他便忙著先說明：「二十歲以前我是作為一個日本人長大的；並非我想成為日本人，而是一出生便是日本人」。這句話，和李登輝在七、八年前跟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話時說「自己在二十二歲以前是日本人」，如出一轍。這就像一個印度人向英國人說他在英國殖民時期是英國人，或一個印尼人說自己在荷蘭殖民時期是荷蘭人一樣，是令人臉紅又可笑的「表態」。更何況這話是出於一個開口閉口「台灣主體」的台灣領導人和台灣文學界的「大御所」（泰斗）之口，更令全體台灣人尊嚴掃地。他們兩人在日本人面前，怎麼所謂的「台灣主體」統統不見了，馬上轉化為「日本主體」去了呢？原來所謂的「台灣主體」只是對付自己兄弟的態度。這也

顯示了台灣的後殖民問題的嚴重性和複雜性，五十多年前的日本殖民者的意識型態居然仍深刻地支配著一些台灣人的心靈。

也許有人會認為筆者這種說法是「民族主義」作祟。實際上，與民族感情完全無關，這種說法完全是從客觀的歷史事實和世界史的常識出發的。誰都知道世界的殖民歷史中，從未有殖民宗主國把殖民地人當做自國國民的，否則它就不叫做「殖民」了！所謂的「殖民主義」，主要表現在宗主國國民與殖民地人民的在政治、經濟、文化地位上的差別和絕對不平等，這已是普通的常識。譬如，在法國殖民統治下的越南人只是「法國的殖民地人」，絕對不會是「法國人」；在英國殖民下的泰戈爾是印度的詩人，絕對不是英國詩人，如果說他是英國的詩人，那是莫大的羞辱。再回到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史實來看：如果從法政層次來看，當時，日本帝國憲法或法律所涵蓋的所保護的日本國民（日本人）和只適用殖民地異地法的日本殖民地人（台灣還有朝鮮人……等）的地位，是絕對不同和不平等；因此，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人民只可說是「日本的殖民地人」，而絕對不是什麼「日本人」。說自己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二十歲以前是日本人」，這種說法和想法不是在知識上對自己的歷史命運認識不清，便是在精神上，殖民者的意識型態已「內化」為自己的主體意識而喪失了真正的主體，即成了後殖民主義常說的「移入主體」。

五十多年前，日本的法西斯主義、殖民主義早已被世界歷史前進的力量所埋葬

了，可悲的是，它的幽靈卻內化為一些台灣人的主體識意，仍在台灣的現實中作怪！

三、「三腳仔」再現

認同殖民者身份的另一面，當然就是否定自己的身份。自認為自己在日本殖民統治下是「日本人」的葉石濤，至今仍站在日本殖民者的觀點，去看待當時絕大多數台灣人民過的傳統漢民族生活。在他的這兩篇文章中，就提到他出生中小地主家庭，父母親雖會說、會寫日語，但在家中絕不說日語，堅持過著傳統漢民族的生活。對於父母的這種生活態度，葉石濤批評道：「我認為父母親有民族的尊傲，然而它卻是錯誤的尊傲」。顯然，他否定了一般台灣人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表面妥協內裡卻是抗拒日本殖民統治的傳統漢民族精神；而這種精神也正是日本殖民者在台灣施行的皇民化運動想消滅的對象。

事實上，葉石濤今天的說法完全背離了他二十年前的說法。他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文學回憶錄》中有一篇《日據時期文壇瑣憶》，文中就曾提到他今天譏為「錯誤的尊傲」的台南老家庭，當時他以這樣的充滿民族意識的筆調寫道：

爲什麼在日本殖地的軍國主義教育下成長的我，尚能保有明銳的批判精神，這應該歸功於我的「民族意識」呢：我的台南老家一向過著我國傳統家族制度的生活：所以我很少被日本生活方式污染：我們這一群台南府城的老居民既不是四腳仔派，

也不是三腳仔派，是道地的兩腳站立的頂天立地的傳統派。

就像葉石濤在這篇文章所說的：當時的台灣人民身受日本殖民的壓迫，對自己漢民族的身份認同是毫不含糊、清清楚楚的。因此自認為自己是兩腳站立的頂天立地的漢「人」，而巛稱在台灣的本殖民者為「四腳仔」的「狗」，更卑稱受日本御用的台灣人或裝著是日本人的台灣人為「三腳仔」。而五十多年前，日本戰敗投降，歷史正義的力量已經使在台灣的「四腳仔」倒台，「四腳仔」又回復到一般日本「人」的身份而在台灣絕跡了；然而，也許是歷史的嘲弄，從二十年起，本來隨著日本「四腳仔」絕跡的台灣「三腳仔」，卻在台灣再現，並逐漸群聚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政治力量。

四、沒血沒淚的「『皇民化』就是『現代化』」論

一個自認為「二十歲以前是日本人」、完全站在日本殖民者觀點的人，當然也會為日本殖民者在侵華戰爭末期，也就是日據末期在台灣推動的「皇民化運動」辯護。

葉石濤在這次的演講中居然放言：「皇民化」就是想使台灣人「日本人化」；「皇民化」就是使台灣「現代化」、「近代化」。葉石濤還自信滿滿地說：

「只要檢證一下台灣總督府發布的這個『皇民化』中的每個條項就知道！」那麼就讓我們先拿出當年台灣總督府的《皇民奉公運動規約》，檢證檢證「皇民

化」到底是什麼東西吧！

它的第一條說：「本運動是台灣全島民的『臣道實踐』運動」。

第二條又說：「本運動是基於『國體本義』，全力貫徹『皇國精神』：以確立『國防國家』的態勢，朝向建設『東亞新秩序』為目標」。

大家都知道所謂「臣道實踐運動」，就是要台灣的殖民地人臣服為日本天皇的「赤子」、奴才，為日本天皇國家犧牲；而所謂「國體本義」、「皇國精神」，就是要台灣殖民地人盲目地崇拜日本的天皇和信仰日本的神道，因而狂熱地為日本帝國主義獻身犧牲，並以此（皇民化運動）來建設日本的「國防國家」（軍國主義國家）；而所謂「建設東亞新秩序」，其實就是以「大東亞共榮」為號召，日本對亞洲的侵略主義的美稱。簡單地說，所謂的「皇民化運動」，就是當年日本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侵略主義的思想和國策在殖民地台灣翻版的。

當年，「皇民化」運動在台灣的具體措施還包括：（1）改姓名（拋棄漢姓名改日本式姓名）。（2）廢止台灣人拜廟宇拜祖先的傳統信仰，改拜日本神道。（3）禁止漢語和台灣方語，改說日本話。（4）在台灣募徵兵源。其實，「皇民化」運動就是企圖禁絕台灣人傳統的漢姓名、宗教、習俗、價值，從根本消滅台灣人的漢民族意識，改造台灣人成為日本軍國主義所要求的、具有狂熱「皇國精神」的「法西斯式日本人」。為日本的侵略戰爭交出財富、物資、人力，為日本帝國主義犧牲，為日本

的大東亞「聖戰」殉死。事實上，在維持政治經濟的殖民統治的同時，還要台灣人在精神上「皇民化」，亦即要台灣人在精神上更加效忠皇國日本。台灣人不但在政治、經濟上仍舊處於殖民地人的地位沒有絲毫改變，在精神上卻被改造為有「皇國精神」的日本人。也就是，身體仍舊是殖民地人，而頭腦精神上卻被改造成了所謂的皇國式「日本人」。處於「身首異處」的狀況。

簡言之，「皇民化運動」的本質，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在殖民地台灣榨取更多的物力、人力供其侵略戰爭當砲灰，而實施的精神動員運動。是整個日本殖民者在台灣的戰爭總動員體制（包括經濟、產業、金融、社會、軍事）的一環。

這樣的「皇民化」，絕不是如葉石濤所讚美的「現代化」，而是要把台灣「戰場化」。不但是反現代化，摧毀「現代化」，更要使台灣人在精神上成為「法西斯式日本人」，為日本「皇國」「賣命」，絕不是如葉石濤所稱美的要把台灣人變成「日本人」。

這樣的「皇民化」，榨光了殖民地台灣人民的物資、財富、人力和人命，在日本的侵略戰場上化為煙硝。有二十多萬的台灣青年被送往戰場，其中三萬名成為日本侵略戰場上不歸的亡魂。日本戰敗後，留下一個經濟崩潰、資源枯竭和精神深層殘留皇民意識的台灣社會；復歸中國後，不得不跛躓地走上戰後的歷史。

請問！有血有淚的人會說這是「現代化」嗎？有自尊的台灣人會認為這是「日本

人化」嗎？「皇民化」是企圖使台灣人「鬼畜化」呀！是要毀滅台灣人呀！開口閉口說「台灣主體」！「台灣主體」！原來它只是以日本殖民者的皇民意識為底流的「台灣主體」。

五、站在「當道者」那邊的文學論

文中，葉石濤把楊逵、龍瑛宗打為「大中國主義者」，並認定他們在台灣文學的地位上「不合格」之後，卻把呂赫若、張文環評定為台灣文學的「代表作家」，因為他認為他們是「台灣主體主義者」。然而，葉石濤先生！您似乎忘了，或者不知您有沒有讀過呂赫若在台灣光復初用白話文寫的兩篇小說——《改姓名》和《月光光》。這兩篇小說正是痛切地批判了「皇民化」的小說。如果呂赫若是所謂的「台灣主體主義者」的話，的「主體」也是「反皇民化」的，與葉石濤讚美「皇民化」的「台灣主體」是剛好相反的，有天壤之別的。何況，二二八事件以後，呂赫若更投身台灣的中共地下黨，獻身於紅色祖國的民族民主解放事業，有著鮮紅的中國意識，絕對不是如葉石濤一般滿腦子只有「去中國化」的「台灣主體主義者」。葉石濤先生！您也似乎忘了，在日據末的皇民文學時期，您為了護主曾寫了一篇《給世外民的一封信》，文中曾責備過張文環、呂赫若，說他們沒有「皇民意識」（在「皇民化」時期指別人沒有「皇民意識」，是一種

政治羅織——筆者按）。如果你指責的是事實，那麼呂赫若就是沒有「皇民意識」的台灣作家囉！可是依據你今天讚美皇民化的台灣主體論的標準，怎麼又把呂赫若評為台灣文學的代表呢？

如此看來，在台獨文學論當道的今天，葉先生指責楊逵、龍瑛宗是「大中國主義者」，真像極了六十年前「皇民化」期他指責呂赫若、張文環「沒有皇民意識」的作為，都有政治羅織的味道。然而，葉石濤的思想故事還在異變呢；也就在皇民化時期的當事人都已物故的六十年後的今年，葉石濤居然又出面否認說：《給世外民的一封信》不是他寫的，他沒有指責過呂赫若，而是「西川滿用葉石濤之名寫的」（參閱《文學台灣》第四十二期，二〇〇二年四月）。這使我們記起龍瑛宗在台灣光復初寫的一篇短文——《文學》，文中龍瑛宗自省自勵地說：「有謊言的地方就沒有文學」，力言謊言與文學不能並存。如此看來，今日的台灣是不是又變成「沒有文學」的地方了呢？特別是被捧為台灣文學界泰斗的「葉老」，到底那一個葉石濤是真，那一個是假的呢？

六、與當年國府入罪楊逵有何不同？

葉石濤是在兩篇文章中的「訪問記」，指責楊逵、龍瑛宗是「大中國主義者」。指責的標準是什麼？依文脈可知他是以所謂的「台灣主體」為準的；而所謂的「台灣主

體」的具體內容是什麼？他也沒有說明。就像所有站在「當道者」立場的「指責」都是不需要說明的，只要是一頂「大帽子」，大家都知道。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重新溫習大家已熟知的楊達的文學活動和文學精神的特點，來逆推論葉石濤據以指責楊達是「大中國主義者」的「台灣主體」文學論是什麼東西吧！

大家都知道，楊達在日據期是反日、反殖、反壓迫的社會運動和民族運動的實踐者，這反映在他的創作上就是他的文學精神。這種實踐與精神，在當時的日本殖民者眼中，當然是「非皇民的」、在文學上也是「不合格」的、要排除的；同樣地，今天自稱「在二十歲以前是日本人」、讚美「皇民化」就是「現代化」，可以說實質上就是以「皇民意識」為主體的所謂「台灣主體」文學論者，當然會視楊達在文學上是「不合格」的要排除的，因此把它冠上今天台灣當道者慣用的「大中國主義者」是最方便的。

更何況，楊達在台灣光復初期，在日漸深化的省籍矛盾中，曾大力呼籲並力行省內省外作家的交流、團結和合作；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也強調台灣文學的特殊性；並批判托管派、日本派、美國派的文學是「奴才文學」；在國共內戰日漸進展到台灣海峽的一九四九年，他勇敢地提出《和平宣言》，呼籲國共與兩岸的中國人應和平相處、要求台灣自治，並言明反對台獨；直到他逝世的前二年，仍然不斷主

張「中國與台灣要『統一』，但不要『一統』」（《追求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的社會》），《前進廣場》雜誌第十五期，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像楊逵這樣的務實的、理性的看待兩岸關係的主張和精神，在今日分離主義基本教義派眼中，仍然是不夠「純血」的，在台灣文學上是「不合格」的「大中國主義者」。這和當年國民黨政府入罪楊逵，把他打入黑牢的作法有什麼不同？

由上可知，葉石濤在這兩篇文章中的「台灣主體」文學論，其實質就是「皇民意識」和「民族分離意識」的混成物。他就是依據這種文學論來臧貶台灣作家的。

七、恰好指責了六十歲以前的他自己

然而，「葉老」似乎有嚴重的健忘毛病。因為他似乎都忘了，至少在他六十歲以前（當然要扣除自稱為「日本人」的前二十年）所寫下的白紙黑字，大多是以今天他所指責的大中國主義的「中國民族意識」為基調的。如果以他今天指責楊逵為「大中國主義」者的標準來看，這個標準恰好也適用於他自己吧！

讓我們抄錄幾段他六十歲以前的文章來「溫故而知新」！

在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七日，由《聯合報》副刊所主辦的一次「光復前台灣文學座談會」上，葉石濤的書面發言是這麼寫的：

光復前的新文學運動是屬於抗日民族新文學運動中的重要一環……那便是推翻日

本人的殖民統治，獲得解放和自由，重歸祖國的懷抱。因此，台灣新文學運動始終是中國文學不可分離的一支流……。

該文後面還有一句比他今天所指責的「大中國主義」還要「大中國主義」；他竟然說：「光復前的台灣新文學是實踐三民主義的文學」哩！這完全是當時國民黨政府當道的、肉麻的「大中國主義」論。

也許葉石濤會不平的辯白說，那是國民黨政府正在恐嚇鄉土文學派的氣氛下不得已的「表態」。那麼請問，當時有那個鄉土文學派作家這樣表態了？當時，總還有保持「沈默」不說話的權利吧！

那麼，讓我們再看看他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一本叫《文學回憶錄》的書，其中有一篇文章《「文藝台灣」及其周圍》；這篇文章有一部分談到在「皇民文學」時期他寫了一篇《給世外民的一封信》，指責了台灣文學的「現實主義是「狗屎現實主義」的問題，文中他深深地自我反省自我批評道：

這種見解的錯誤，來自我的意識型態的不明確，那時我還未確立堅定的世界觀，我的思想裡充滿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遺毒。一直要到台灣社會發生巨變，即台灣光復，回歸祖國懷抱，擺脫殖民地的枷鎖，接受來自大陸的各種思想形態，讀破了五四文學運動以後豐富的文學作品以後才扭轉過來。

這段話正恰如其分地批判了今日的「葉老」。請問「葉老」！你說這段話時，沒有國民黨政府的恐嚇吧！應該不會不是「由衷」之言吧！

把時間拉大來看，這段話也似乎印證了葉石濤在回答前述《中國報報》記者採訪時，自圓其說的文學觀，他說：

文學歷史的觀點，是隨政治環境的空間與時間改變的，我認爲，我自己的文學定位也是需要檢討的。

原來葉石濤的文學觀是隨著政治「當道」的變化而變化的；換句話說，原來他的文學觀就是「政治正確」的文學觀。結果，所謂「台灣主體」文學論又有了另一個面貌，那就是，它只不過是「當道者主體」的文學觀。不過，不知道他會不會擔心，這種文學論將淪落為一個沒有主體或虛假主體的文學論。

八、哀衿勿喜

這是台灣百年來殖民歷史的「瘡疤」，也是中國百年來在列強欺凌下民族自求解放的掙扎歷史中遺留的「傷痕」。只不過，這個「瘡疤」和「傷痕」在今日新的歷史條件中，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再度發作，隱隱作痛，牽扯著全民族的健康發展。

然而我相信，不管它是瘡疤也好，是傷痕也好，都是我們身上的一塊肉，是我們身體上生病的肉；只要我們身體自立自強，它總會好起來的。我們只有用科學的方法

去認識它，「辨症論治」，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用最大的愛心和寬容、最堅強的耐心去呵護它、調理它。同時，更要講究整個身心的健康發展，才是調理身上疾病的根本之方，這是「不可或忘」的道理。

有批評才有進步，但「哀矜勿喜」卻是筆者內心的真意。

原發表於《左翼》第二十七期，二〇〇二年九月三十日
後經改寫，曾刊載於中國作協《文藝報》，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本文依據《左翼》原版

告別一個皇民化的作家及其時代

——蓋棺論定葉石濤

二〇〇八年，不管對世界或對台灣而言，是一個激變之年。百年罕見的金融風暴橫掃西方資本主義世界，搖撼著戰後以來的美國霸權秩序，並繼續深遠地影響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中國大陸則在川震後以及在西方反華勢力的包圍中，成功地舉辦了京奧，同時近三十年來急馳的改革開放列車也正面臨世界金融風暴的大考驗。而處於美中歷史巨浪交匯的蕞爾小島台灣，更處於動盪與激變之中，金融經濟問題自不待言，政治層面的變動更是二十年來未曾有過；上半年經歷了有驚無險的政黨輪替，接著下半年，貪腐的扁一家遭到偵辦和起訴，同時圍繞著兩岸和平與交流問題上前進與保守兩勢力爆發了嚴重的衝突，終至兩岸大三通實現。李登輝、陳水扁主政的分離主義時代將步入歷史；兩岸關係將脫去六十年來世界冷戰的枷鎖。基本上，台灣將回到一九四九年的真實面貌。對台灣而言，二〇〇八年的重大歷史意義，就像一九四五年的「台灣光復」、一九五〇年內戰和冷戰「雙戰年代」的起點、以及一九八七年「解嚴和民主化」的開始一樣，將是一個巨大變革時代的開端，新的歷史列車正啟動著巨輪。然而，另一面，新舊時代的鬥爭也是激烈的，特別在意識型態文化領域。

又聞一片阿諛聲

在新的歷史列車正開動著巨輪的時刻，十二月十一日，二十年來被封上「台灣文學大師」榮冠的葉石濤，以八十四高齡去世了！文藝界依舊是一片哀悼兼吹捧之聲；單從《中國時報》的版面來看，就有歌頌葉石濤為「文學良心」（蔡詩評）、「代表風骨文人的離開」（林懷民）等等的發言。吹捧之餘，還不忘再批評過去曾批評葉石濤的聲音為「藍綠惡鬥」、「政治口水」、「扣上意識型態的帽子」、「貼上本土論述文化霸權的標籤」等等，繼續為葉石濤辯護，其實，暗裡也為自己的文化政治立場辯護。其實葉石濤正是過去二十年台灣的統治勢力在文學文化歷史等意識型態上的代表性人物，他的去世與李、扁政權的結束以及兩岸大三通的啟動是有同等意義，都昭示著舊時代將要結束，新時代將要來臨。只不過文學文化屬潛移默化層次的問題，更形複雜；因此有必要對葉石濤一生言行作一評述，讓大家能更總體地掌握歷史脈動和時代方向。

大體而言，文學有作為一種思想的層面和作為一種藝術的層面的兩重性，孰輕孰重，當視時代、民族、地區的不同而不同。一般來說，受過帝國主義侵略或殖民的地方，文學作為一種思想的方面更受到重視，譬如在中國或台灣，特別在受過殖民統治與內戰冷戰長期支配的台灣，文學上的民族認同問題一直是重要的問題。葉石濤被封為「台灣文學大師」並非由於他在小說創作上有什麼高藝術成就，而是由於他對台灣

文學的論述，亦即，是因為他對台灣文學的民族觀點和立場；並非因為他在文學原理或觀念上有何進步或啟發性的論述，而是因為他從一九八六年以後在台灣文學上的「本土論述」，主張台灣文學的「台灣主體論」。具體地說，就是主張台灣文學不是中國文學，積極地配合政治的兩國論，主張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一邊一國論。譬如，他說：「中國文學與日本、英、美、澳洲文學一樣，是屬於外國的」、「大學裡的中文系應該是屬於外國文學……」等等「兩國文學」論。只是因為在分離主義的台灣意識高漲時敢背棄自己長年的主張而改唱文學的兩國論，「台灣文學大師」、「文學良心」、「風骨文人」的桂冠就榮寵加身。批評者就被戴上「政治口水」、「意識型態」的大帽。葉石濤不斷配合台獨政治勢力的演出，不斷將「本土論述」極端化到「台灣主體論」，甚至把真正的本土作家楊逵、龍瑛宗都排除在他的本土論，台灣主體論的文學標準之外，貼上「大中國主義者」的標籤。

葉石濤的三次轉向

一九二五年出生的葉石濤，在關於台灣文學的民族立場上經歷過三次的大轉向，前後互相自我否定。第一次是在日據末的皇民文學當道時期，青少年的他擔任日本皇民文學總管西川滿的左右手，是一個皇民，曾幫西川滿打擊《台灣文學》上的台灣作者。台灣光復後，他馬上轉向成「大中國主義者」，除了中間十數年的白色恐怖時

期保持了緘默外，一直到一九八六年都主張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環。從六十一歲起，他又再次轉向否定自己大半生主張的「大中國主義」，轉而主張與中國對立或排除中國的「本土論」乃至「台灣主體論」，明白說，就是文學台獨論。他的所謂「主體」，只不過是一個沒有主體的「移入主體」；是「統治者主體」，隨著統治者更替而轉變。

一九四三年初，日帝「大東亞戰爭」在太平洋戰場上節節失利，進入所謂「決戰期」。日本軍國殖民者為了進一步加強控制台灣文學界，於五月一日成立了「台灣文學奉公會」。皇民文學總管西川滿也於同一天，寫了《文藝時評》，厲聲責罵台灣文學的主流是「狗屎現實主義」；遂引起了台灣作家的反駁，爆發了一場「狗屎現實主義論爭」。當時擔任西川滿助手的葉石濤，只是一個十八歲的「紅顏美少年」，竟提筆為西川滿幫腔，指責張文環和呂赫若的作品中，「到底有沒有像西川作品中的『皇民意識』」當時被人質疑有沒有「皇民意識」，在日本軍國主義的「決戰期」是相當嚴重的一件事。為此，呂赫若在日記中寫下：「有葉石濤者以我和張文環……沒有皇民意識……在人身攻訐上令人憤怒。」

對於日據末的這件文學公案，葉石濤在台灣光復轉向「大中國主義」後，於一九八〇年前後的一篇《日據時期文壇鎖憶》中表示了「心裡至今仍覺慚愧。」在同時期另外一篇《《文藝台灣》及其周圍》文中，他更明白地坦承：「這種見解的錯

誤，來自我的意識型態的不明確，那時我還未確立堅定的世界觀，我的思想裡充滿著日本軍國主義教的遺毒，一直要到台灣社會發生巨變，即台灣光復，回歸祖國懷抱，擺脫殖民地的枷鎖，接受來自大陸的各種思想型態，讀破了五四文學運動以後豐富的文學作品以後才扭轉過來。」

「台灣新文學就是三民主義的文學」？

然而，就在痛切反省的告白後不到十年，當民進黨台獨政治勢力日漸奪得台灣統治地位之時，葉石濤又再度改口；否定那篇指責呂赫若「沒有皇民意識」的文章是他寫，而推說是西川滿寫的。葉石濤為了符合台獨「本土論」的政治正確，居然可以自打嘴巴，無視過去的滿口振振之詞；且在當事人都故世後，企圖掩飾不名譽紀錄而公然說謊。

由此可見，葉石濤不但不是「風骨文人」，說「軟骨文人」還太恭維了。否定了又再否定，這樣的「言而無信」就是「文學良心」嗎？

其實，扣除自稱是「日本人」的前二十年，葉石濤在六十歲以前所寫下的大量有關「台灣文學」的文字，大多是以六十歲以後他厲聲指責的「大中國主義」為基調的。

首先，台灣光復後不久，在《新生報》的「橋」副刊論戰中，葉石濤發表了

《一九四一年以後的台灣文學》。這是他在日本投降台灣光復後有關台灣文學的試啼新聲，他說：「無疑地，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彈壓下，台灣文學走了畸型的成熟的一條路。我們必須打開窗口，自祖國文學導入進步的、人民的文學，使中國文學最弱的一環，能夠充實起來」。

一九七七年《聯合報》副刊主辦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座談會上，他的書面發言也侃侃而談：「光復前的新文學運動是屬於抗日民族新文學運動中的重要一環……那便是推翻日本人殖民統治重歸祖國的懷抱。因此，台灣新文學運動始終是中國文學不可分離的一支流。」

進入八〇年代上半年，葉石濤主張「大中國主義」的台灣文學論更是不勝枚舉，譬如他說：「台灣文學是整個中國的一環，我們的主權在大陸，惟有統一的、強大的中國出現，台灣文學……才能獲得歷史性的歸宿與意義」。（一九八三年）

「台灣……在血緣上、地緣上、歷史上、社會結構上為中國不可割裂的一部份。……台灣文學為中國文學的一支流，殆無疑問了。」（一九八一年）

這些鮮活的論調是如何慷慨激昂的「中國主體」的「台灣文學論」！他還更肉麻地諂媚當道說：「光復前的台灣新文學是實踐三民主義的文學！」這種「三民主義台灣文學論」任誰聽了都汗顏。蔣介石過世時，當大多數有「骨氣」的作家拒絕配合當道寫悼念文之際，他欣然寫了！

絕大多數在日據時期即從事文學活動的台灣作家，終其一生莫不認同台灣文學乃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楊逵、龍瑛宗如是，楊雲萍、黃得時、王詩琅、吳漫沙莫不如是。惟少有人醜表功到連「台灣新文學就是三民主義的文學」那樣的話也說得出來。

文學陣地的史明

九〇年代後，李登輝和民進黨裡應外合，致使政治上泛獨勢力統治台灣。以省籍意識和反中國為內容的所謂「台灣意識」幾乎成了「國民意識」；在文化上，本土論、台灣主體論也逐漸確立其「霸權」地位，而作為其核心的就是所謂的「台灣文學本土論」。透過國家的力量，教育部在各大學濫設台灣文學系所。來自文建會、國藝會、文總會乃至國科會大量政府金錢的挹注，遂急速形成了一個包括學術、學者、校園、論客、各種團體基金會、媒體出版業所構成的「台灣文學圈」，一個龐大的文化利益集團。在這過程中葉石濤被捧了起來，成了台灣文學宗師，人人口中的「葉老」。葉石濤也在眾人簇擁中陶陶然積極配合演出，把他的台灣文學論日益極端化。

第二度轉向是在一九八六年之後，葉石濤把他原在《文學界》上連載的《台灣文學史綱》中隨處有關「台灣文學是中國文學一支流」的論述全部刪除或竄改，刻意貶低或抹消台灣文學中中國文學的存在，而大力強調台灣文學已脫離中國文學的獨立性、主體性，而於一九八七年結集出版了《台灣文學史綱》。這一抹一唱，自然使他

的《台灣文學史綱》與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並駕齊驅，成為台灣分離主義在台灣文學、歷史上的兩本聖書；其文學、歷史的意識型態成為分離主義者在台灣文化霸權的中心論述。把葉石濤高高抬起據以維護自己的文化利益者，有如張良澤、陳芳明、彭瑞金、游勝冠、日本右翼「學者」星名修宏、中島利郎、若林正丈等，到處造神吹捧葉石濤是台灣文學的礎石、巨木、旗手、火炬、典範、宗師……等等。除了獲得各種各樣的文學尊稱之外，一九九九年還召開了「葉石濤文學國際學術研究會」，二〇〇〇年成功大學文學學院頒贈給葉石濤「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並在該校台文所任教。最後，還獲得最高政治名位，榮任陳水扁政權的「國策顧問」和文總會副會長。榮登台灣文學宗師大位的葉石濤，陶陶然如坐雲端睥睨現實，其言行如高登皇座的陳水扁政權一樣，忘我地走向極端，終至自曝其短。

二〇〇〇年葉石濤應日本右翼學者之邀，在日本東京大學用日文以《我的台灣文學六十年》為題演講，同時又接受了日本雜誌訪問，發表了《訪問葉石濤》。在這次日本的演講和訪問稿中，葉石濤掏心掏肺地傾訴了他六十年來的文學感情認同的原點。

「日本是我心裡故鄉」？

第一、演講內容，明白印證了他曾說過的「日本是我心裡故鄉」的話。面對日

本聽眾，演講一開始葉石濤便急著表態說：「二十歲以前我是作為一個日本人長大的」。這種表態像極李登輝向司馬遼太郎的傾訴。接著他明言：「皇民化就是想使台灣人日本人化」、「皇民化就是使台灣現代化、近代化」。他竟然露骨地宣稱自己已被人類文明歷史唾棄的日本法西斯主義和殖民主義站在一起。顯然，心智急速退化到六十年前皇民化的荒廢年代。這還不夠，葉石濤還在演講中站在日本人殖民主義和皇民主義的意識型態立場，批評絕不說日語堅持過傳統漢民族生活的父母親是「有民族尊傲，然而卻是錯誤的尊傲」。

第二、退化到六十年前日本殖民主義和皇民主義意識型態去的葉石濤，突然又跳到「台灣主體」論來，大力批評：「如果按照台灣主體的標準，楊逵和龍瑛宗都不合格，因為他們都是大中國主義者，必須重新檢討他們在台灣文學上的地位」。由此可知，葉石濤大肆宣揚的台灣本土論乃至台灣主體論中的「本土」、「主體」，其基礎就是日本人殖民主義和皇民主義意識的亞流；如果依日據時期絕大多台灣民眾的素樸倫理來說，就是「三腳仔」的「主體」。

葉石濤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用皇民意識去質疑台灣作家呂赫若、張文環「沒有皇民意識」；在台獨分離主義當道的時代，又用分離主義的「台灣主體論」去審查楊逵、龍瑛宗，並稱他們不合格，冠之以「大中國主義者」。這種言行，與他人人生大半所處的反共戒嚴時期，以反共的「大中國主義」來審查台灣的文學心靈與思想，有什

麼不同嗎？

都同是站在台灣統治者的立場，用統治者的意識型態去審查文學的心靈與思想。六十多年來，統治台灣的意識型態，一個是皇民主義，接著是反共主義，再來就是分離主義，而貫穿這三者的本質就是反共與反中國的複合意識。這種複合意識存在於日本右翼法西斯的思想和歷史脈絡中，也獨霸於戰後冷戰與內戰的時代中。在政權輪替的今天，這種愚昧的複合意識仍舊統治著絕大部分人的心靈。在葉石濤的冥日，寄望大家早日告別那樣愚昧的意識和時代。

在新舊時代交替之際，客觀世界的鬥爭必然是激烈的，在精神領域的矛盾更是深刻的。葉石濤去世了，對其人的物故，我們祈其冥福；惟對以其為代表的意識，我們要清楚的認識其本質與其今日或未來在台灣可能的動向；站在兩岸和平民族統一的立場，毅然向它宣戰吧！

《海峽評論》第二一七期，二〇〇九年一月一日

別把「奴隸根性」當做「台灣精神」

——評李登輝的《台灣精神和日本精神》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的「日本李登輝之友會」成立大會上，李登輝得意忘形地在日本人支持者面前，以《台灣精神和日本精神》為題發表了演講，把裝扮成台灣精神的奴隸根性暴露無遺。從一九九三年遮遮掩掩地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開始，一路到二〇〇〇年失去政權後在小林善紀的《台灣論》中的謬言，及至最近主張「釣魚台是日本領土」的「賣台」瘋言，李登輝始終慣於在日本人面前吐露心聲，似乎只有日本人才「星星知我心」。而且，內容一次比一次變本加厲，這回的演講終於把他近十年來的各種言行背後的核心思想供訴了出來。

這個核心思想是什麼？簡單地說，就是以「武士道」為內容的日本精神。演講中他認為，台灣人和日本人所共有的精神特點和優點就是「武士道」或「大和魂」，換言之，他講題所指的台灣精神和日本精神就是指「武士道」。他還進一步宣揚，這「武士道」是包括日本、台灣在內的全亞洲現代化建設的原動力，更是克服當前昏迷、腐化、道德淪喪的世局的救命丹，因此是「人類最高的指導理念」。

由此可知，李登輝的精神原鄉、最高理念，原來就是日本精神的「武士道」。十

年來他口口聲聲要台灣人民「心靈改革」，原來就是要大家用日本精神來改革，把「武士道」的「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當做最高的國民精神指導和理念。

這樣的最高精神理念，不禁使人聞到，曾經充塞於上世紀三〇年代到四〇年代空氣中，令人窒息的腐朽的和血腥的味道。

一、新渡戶稻造的「台灣糖業意見書」與《武士道》

李登輝文中自承，在思想上受到日本明治維新後的官學兩棲學者新渡戶稻造的「巨大影響」。這位新渡戶稻造是一位農經學者也是當時日本「殖民政策」的專家，曾在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六年間任職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課長，後升任糖務局長。在任中曾提出了對日本殖民台灣有深遠作用的《台灣糖業意見書》，這意見書成了日本對台灣進行殖民地剝削的中心——台灣糖業的基本藍圖。依據這意見書，日本的台灣總督府以軍隊、憲兵等殖民暴力為後盾，強力消滅台灣人原有的民族製糖業——糖廊，驅使台灣農民為日本資本的新興製糖業種蔗，以極不平等的條件提供製糖原料；通過這樣的榨取方式，使日本殖民者在短期間從製糖業獲取了巨大的殖民利益。而這種榨取體制的設計者，便是李登輝的精神導師新渡戶稻造，是一位殖民主義者，也是一位有自由主義傾向的保守主義者，曾被日本天皇敕選為貴族院議員。

同是這位新渡戶，在來台灣任官之前的一八九九年，為了向西洋人介紹日本文化

而在美國用英文寫了《武士道》一書。因為新渡戶本人並非日本歷史、文化的專家，再加上他本來只是面向西洋人而寫的日本文化入門書，因此對「武士道」的介紹難免有過於簡單化，以偏概全的問題。當時就有日本學者批評過這本書，認為這本書會引起許多錯誤的理解；也有一位日本學者西義之在一篇研究論文《武士道考》中，指出《武士道》書中的一大堆錯誤之處。雖然這本書在歐美暢銷一時，但可以想像，它充其量只不過提供了歐美人一種後殖民論述所說的「東方主義」式的皮毛的、扭曲的日本人觀而已。

而實際上，「武士道」只是日本傳統文化中的一種特殊文化。

一一、李登輝的武士道觀

新渡戶在《武士道》書中也說：「武士道是日本武人階級身分上的義務」，原本是日本封建社會中的一個特權階級的特殊行事規則和道德規範，新渡戶認為它接近西洋的「騎士道」(Chivalry)。事實上，日本的傳統文化中，除了「武士道」這個特殊階級的特殊文化之外，還有佛教文化、儒教文化、神道教文化、職人文化、下町(庶民)文化……等等。況且，日本的武士思想也分為「士道」和「武士道」兩派，「士道」受儒家思想影響，強調以人倫之道的自覺為根本，「武士道」則強調以死的高潔覺悟為根本。由此可知，「武士道」並非全日本人的共同精神特點，充其量只是

日本人精神文化的特殊部份。把「武士道」當做全日本人的精神特點，就像把「騎士道」當做全歐美人的精神特點，或把「武俠」當做全中國人的精神特點一樣，是令人啼笑皆非的。

然而，李登輝卻自稱受到新渡戶的《武士道》這本書的「強烈衝擊」，並認為「武士道」正是日本人的共同精神特徵，譽之為「人類最高的指導理念」，尚自命將傾其餘命為它發揚光大。

李登輝觀念中的「武士道」與歐美人的當然不同，後者是「東方主義」式的，而前者則是日本殖民地菁英式的理解，是接受殖民者教育灌輸後的想像和觀念。另一方面，李登輝視為日本精神特點的「武士道」也與新渡戶的有所不同，新渡戶只是把它當做日本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介紹給歐美人，而李登輝卻把它當做全「日本精神」，認為它是全世界最優越的精神，是「人類最高的指導理念」，紛亂世局的救星，近乎一種政治信仰。

二、李登輝的「日本精神」論

眾所周知的，從明治維新迄今的日本近現代史，產生了許許多多的文化思潮，有進步、進取的思想，如民主主義、自由民權思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也有保守、侵略的思想，如國粹主義、國體論、殖民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特別在

二〇年代的大正民主期，其文化思潮是多采多姿的。今天我們使用的一些現代語彙有許多也是日本人首創，被轉用於中文白話的，如科學、哲學……等不勝枚舉。包括孫文、魯迅、郭沫若、楊逵等中國現代史著名進步人士，其思想也曾受到日本思想風潮的大影響。在二〇年代之前，日本的進步的與保守的潮流是並存的，譬如，同是研究「殖民政策」的新渡戶稻造和矢內原忠雄（兩人也都是基督徒），兩人的立場就不同；新渡戶是專門研究如何強化殖民地的支配與剝削，而矢內原則相反，他是站在被殖民者的立場，專門研究殖民地人民如何受到剝削。

然而，進入了二〇年代末期，隨著日本走上軍國法西斯主義的道路，這些繽紛一時的思想 and 運動，開始受到壓制；取而代之的是，以皇道、神國為中心理念的「國體論」支配一切，「武士道」的「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的規範成為統合國民意識效忠天皇制國家的利器；自此，國體論和「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的規範，統稱為「日本精神」，成為日本軍國法西斯主義的精神理念。一九三二年，日本的文部省（教育部）設置了「國民精神文化研究所」，由國家動員研究和出版有關「日本精神」的刊物，宣揚國體精神（亦即皇道精神）和日本精神，並且積極批判包括自由民主的外來思想。一九三三年，日本內閣成立了「思想對策協議會」，其任務是「向社會所有階層徹底普及『日本精神』」。這個「日本精神」，就是動員了無數的日本人民和殖民地人民走上侵略戰場，大量破壞了亞洲的土地和社會，使千千萬萬亞洲人民犧牲、流

離失所的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惡靈；它與當時法西斯德國所宣揚的排外的「德意志文化」論是一模一樣的，是人類歷史上最殘暴的意識型態。

今天，李登輝的「日本精神」論，可說是與六十年前的那個意識型態的惡靈遙相呼應，近乎它的「現代版」。

這只要看看李登輝的演講中有關「日本精神」論的幾方面特點更可知：

一、主張「日本精神」的特點是「忠君愛國、義勇奉公」的武士道。

二、宣揚「日本精神」的優越論，「是人類最高的指導理念」。

三、到處以這個「日本精神」蔑視中國，敵視台灣的「中國化」。

四、為日本右翼的「自虐史觀批判」幫腔，學舌地模仿日本右翼批判日本的自由民主史觀。（戰後日本人民基於民主主義和對過去侵略戰爭的反省為主軸的歷史觀，一直是社會的主流，然而，近年隨著政經情勢的變化，在政界、學界、文化界產生了一股復辟的右翼勢力。他們攻擊這種反省的歷史觀，並抹黑稱之為「自虐史觀」。就這一點，李登輝也曾要日本人不要向中國道歉，這也是另一種對日本的反省的歷史觀的批判，替日本右翼的「自虐史觀批判」幫了腔。）

雖然李登輝在演講中並沒有說「皇民臣道實踐」這類的話，但是在文中他也推崇了本居宣長、吉田松陰等，而這兩人是日本的皇國史觀、八紘一宇的「國體論」的始祖。

可見得，李登輝的「日本精神」論，在基本性格上，與六十多年前的惡靈相彷彿；雖然是「現代版」，但仍飄浮著濃厚的腐朽味和血腥味。

如此的「日本精神」的效忠者，在他眼中，「台灣精神」當然只不過是「日本精神」的延伸，這是不難理解的。

四、變本加厲的「奴隸根性」

記得台灣的反殖抗日詩人、文化評論家王白淵先生，在台灣光復後還不到三個月（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就在當時的《政經報》上寫了一篇《起用台灣人才應有的認識——帝國主義支配下五十年來的政治淘汰》，他這樣說道：

過去的台灣人為著適應環境是需要精神上的保護色——假面具，而這種保護色最初不過是一種假面具而已，但是到後來帝國主義的淘汰的力量加強而生存競爭更呈苛烈的結果，久而久之，這種保護色便和心臟部輸送出來的血脈相通而成為一種惡劣的卑鄙的奴隸根性了。

當時他呼籲道：「趕早將過去半世紀間在日帝國主義的苛烈的政治淘汰下被培養出來的奴隸根性切除淨盡。」

然而，由於台灣光復後崎嶇不平的歷史進展，使得這「奴隸根性」不但沒有切除淨盡，反而有變本加厲的趨勢，甚至到了把這種「奴隸根性」當做「台灣精神」到處

鼓吹的可恥地步！

完稿於二〇〇三年一月二十一日
《海峽評論》第一四六期，二〇〇三年二月一日

別把「奴隸根性」當做「台灣精神」

「老」台獨與日本「新」右翼的大合唱

——對小林《台灣論》的批判與自省

一、從漫畫書說起

過去的時代，漫畫書幾乎就是兒童讀物的同義詞，因為漫畫書把思辯的複雜的事物，以簡單化、圖象化、趣味化的形式表現出來，這個特點，使它適合心智未熟但想像豐富的少年童稚閱讀。曾幾何時，它居然也成了今日青少年乃至成年人的流行讀物。因為，今日的漫畫書把上述的特點發揮到了極致；它可創造一個誇張的、煽情的、詼諧的非現實世界，滿足人們在理性的現實世界中無法實現的夢幻，同時得以宣洩被壓抑的原始情緒；它亦可把現代社會中爆滿的知識速食化，簡單又快速地解消現代人對知識或資訊的焦慮心理。因此，漫畫書竟然成了現代人老少耽讀的東西，它對國民的感情意識和價值觀起著重大的影響。特別是，當有人利用它易於製造誇大、扭曲、煽情觀點的特性，有計畫地進行政治性的宣傳的時候，它的影響力更是不容忽視，小林善紀的漫畫書《台灣論》，就是屬於這類。

它不是一本普通的漫畫書，而是一本漫畫化的政治文宣；說它是一本「文宣」一點不誇張，因為它的內容完全在宣傳特定的政治觀點，並且這個政治觀點也並不完全只是他個人的，而是一個政治勢力的政治觀點的代理。所以小林的《台灣論》的出現，可以大膽地說，是一個橫跨台日的政經勢力精心企劃的結果。它所宣揚的政治觀點，明白說，就是「老台獨」加上日本「新右翼」的政治觀點。它利用漫畫中的登場人物如李登輝、蔡焜燦、金美齡、許文龍……等老台灣人的嘴巴，來美化日本帝國對台灣的殖民統治、誇大台灣人保有一「日本精神」等，並借此（題）發揮，強化日本右翼的論述，進而批評日本的政治、教育、文化。這本漫畫主要是針對日本的年輕漫畫層，借台獨的《台灣論》來增強日本右翼的聲勢；利用漫畫潛移默化的功能，達到在日本宣揚日本右翼觀點的目的。

如果這本漫畫書只在日本發行並廣為銷售，那把它當做日本的一則政治消息也就罷了；它竟然打算在台灣發行中文版，台灣媒體還敲鑼打鼓，替它開路助陣。台灣出出版社並想把它原來的日文標題——「傲慢主義宣言」改成「傲骨宣言」，企圖「獨」化台灣年輕人。那麼，站在維護台灣人民尊嚴的立場就不得不說話了。

一一、《台灣論》背後的政經勢力

使小林得以目中無人地、如入無人之境地，以一副帝國主義殖民地主人的傲慢嘴臉，對台灣的歷史、政治、社會以及台灣人民的感情大放厥詞的原因，主要在背後有

一批掌握了台灣的政權和金權人物在「牽勾」撮合拉攏，並推波助瀾。小林的《台灣論》只是他們最近的傑作之一。回顧幾年來他們在日本的出版紀錄，就有脈絡可循，譬如下列幾本書就是：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台灣紀行》 司馬遼太郎

一九九九年六月《台灣的主張》 李登輝

一九九九年七月《台灣人與日本精神——日本人啊，挺起胸膛來！》 蔡焜燦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新·台灣論》 小林善紀

二〇〇〇年十一月《敵人就是中國——日本應該與台灣締結同盟》 深田祐介

金美齡

從上面的出版順序來看，我們可以看出，日本右翼與台獨的所謂「台灣論」，在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以及他與李登輝的對談就已出現；只不過那時的「台灣論」仍然以日本的知識分子為對象，不敢放膽高談闊論。到了一九九九年蔡焜燦的書就開始公然主張所謂台灣人的「日本精神」，並以此來鼓動日本人應回復「日本精神」（這「日本精神」是什麼？實際上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的「精神」）；它已開始以日本一般大眾為對象，公開主張「老」台獨與「新」右翼所同有的「日本精神」了！到了最近，金美齡更提高聲調，宣稱「敵人就是中國」，呼籲日本應與台灣結盟對抗共同敵人——中國；這種政治主張已經到了公然叫囂的地步，也就是「老」台獨要拉

「新」右翼共同對抗中國人了！小林的《台灣論》可說是集上述的各種「台灣論」的大成，針對日本四十歲以下的漫畫讀者，進行政治宣傳。

小林本人思想右傾（這從他的漫畫系列「傲慢主義宣言」中的《戰爭論》一書，肯定日本的大東亞戰爭就可知，《台灣論》是他的系列中的最新一冊），也是日本右翼團體「制定新歷史教科書之會」的發起人之一，極力主張日本人應拋棄日本右翼所謂的「自虐史觀」（實際上，它是一般日本人基於對日本侵略戰爭的深刻反省的歷史觀點；日本右翼指責、嘲諷，指它是自我虐待的史觀），可說是日本右翼的意見領袖。但他既不懂中文，過去也從未涉獵台灣問題，對台灣的知識充其量只來自一些日文的報導，他的《台灣論》的偏向知識究竟來自何處？到底是什麼人提供的？這從他書中的描寫就可以看出端倪。從《台灣論》中的登場人物和這些人物近年在日本台灣之間的作為，就可以看到他們在小林的《台灣論》幕後晃動的影子。首先出現的是，在背後斡旋促成小林《台灣論》的金美齡。她是現政權的國策顧問，據說是萬華人，早年畢業於北一女和淡江英專，後入日本早稻田大學英文科就讀，是早年在日本的台灣團體成員，現在在日本經營日本語學校，經常以評論人身份出現在日本TBS電視節目；從她最近寫的《敵人就是中國》一書，就可以知道她的立場。其次，登場的是，書中稱之為「老台北」的蔡焜燦，他似乎是一個稱心如意的的大資產家；在書中，蔡放懷高唱日本軍歌、童謠、日本神話以及明治天皇的歌，是一個出神入化的台灣老皇

民，使小林感動得似乎見到老祖宗一般。由金美齡陪同小林來台灣的第一場晚宴上，出席的還有現政權駐日代表羅福全、日本交流協會的日本駐台代表山下等日台高官，甚至小林到金門參觀還有新聞局官員陪同，可見得小林為寫《台灣論》來台，受到日台官方高級的接待。由此可知，小林寫《台灣論》似乎有為「官方」工作的味道，為誰的「官方」？是不言而喻的。

實際上，所有的這些人物只不過是在周邊忙碌的人，他們都環繞著一個中心人物——李登輝。他才是從一九九三年的司馬遼太郎的《台灣紀行》到今日的小林《台灣論》的主角。小林的書中描寫了第一次晉見李登輝時的情景，兩人會面的情節精彩絕倫，道盡了《台灣論》的中心政治內容。謹大略摘錄如下，供大眾觀賞：

當小林恭維李登輝偉大的成就時，李回答說：「這全都是日本的遺產！」（作者按：李把他自己所有的成就都歸功於曾受日本殖民統治。）

李登輝向小林說：「有必要使日本的年輕人認識『日本』……我要說的是，有必要讓他們知道，在日本統治時代『日本在台灣作了什麼』，『日本在這裡做了大事……』啊。」對於李的這番話，小林自言道：「嗯！就是這樣，此番來到這裡才想到，我可以用『讓大家知道台灣』的方法來使大家知道日本！」（作者按：就是利用美化日本殖民統治啦、宣揚台灣人的日本精神啦、台灣人如何對抗中國啦……等等題材，在日本宣傳日本的右翼思想。）這清楚地說明了小林的《台灣論》創作動機乃

是來自李登輝，原來小林主要的目的就是想藉《台灣論》在日本宣揚右翼的「日本論」，這對小林來說真是一箭雙鵰。對「老」台獨來說也達到了宣揚台獨的「台灣論」的目的，兩方皆大歡喜。

李登輝意猶未盡地，又把小林從會客廳請入較私密的客廳，對小林諄諄指點。小林自言道：

「他對我懇切叮嚀，詳細指點我要怎樣描寫台灣。」

李又向小林說：「要向大家說：如果台灣沒有成為日本的領土，現在的台灣一定比海南島還糟！」小林聽後自言道：

「嗯！李登輝的想法，真是與我的期望完全一致。」

李登輝還得意地說：「跟你說，小林！不掌握軍隊不行的哦」，他更憂心忡忡地向小林建議日本也應該實施總統直選。

在以上的各場景中，我們可以看到，推動小林《台灣論》登場以及提供其老台獨的《台灣論》的思想資料的政治經濟勢力，已逐漸鮮明浮現出來。所以說，小林的《台灣論》不是一本他個人的單純的政治漫畫，而是由一個日台政經勢力所推動的政治文宣。

三、「老」台獨與「新」右翼的共通思想

從《台灣論》，我們可以看出「老」台獨與「新」右翼的共通思想，它包括下列

幾個方面：

(一) 讚美日本在台灣殖民統治

對日本殖民統治的頌美，已被台獨朋友誦念過千百遍，幾乎已成了台獨的商標「樣板」。譬如：他們不厭其煩的反覆讚美日本人建嘉南大圳的偉業，移植蓬萊米的功勞，衛生教育的普及等等，總之，他想說的只是：日本在台灣實施了「世界上最良心的統治」。

(二) 讚美陳水扁政權

他們說，這次大選台灣壓倒多數的民眾「拒絕大陸中國」，追求「作為台灣人的認同」，從「中國秩序脫出」。台灣現在正是處於「國家誕生」的「神話時代」。半年來，事實說明了這只是一廂情願的看法。

(三) 反華反中國

為了否定戰後台灣復歸中國的史實，他們否定《開羅宣言》，污衊台灣光復後的教育是「反日」、「中華民族化」的「洗腦教育」。稱中國為「支那」，嘲笑「支那人」比日本人沒規矩、寒酸、襤褸，甚至極端地說：韓國人反日是因為未能擺脫「中華思想與華夷秩序」。反正世界上只要是「反日」的，都是未擺脫「中華思想」之罪，那麼「反日」的美國人或者菲律賓人也算是未擺脫中華思想囉！

(四) 歧視亞洲人民

特別是對朝鮮人民的汙衊，對南北韓領導人金大中、金日成的攻擊，甚至對慰安婦問題表現出來的輕蔑態度。

(五) 反右派

(六) 外表裝著「反美」的樣子

以上這些思想的特徵，再加上他們齊聲讚頌的「日本精神」（實際上也就是以李登輝為典型代表的「皇民精神」），任誰都知道，它完全是舊日本帝國主義亡魂的復活。

四、批判

這個亡魂，曾經殺戮了多少台灣人民、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曾經榨取了多少台灣人民的膏血，撥弄了多少台灣人民的命運？多少的台灣前輩為了反抗它推翻它，從一百年前開始就前仆後繼，誓死對抗，有多少台灣青年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驅使下冤死戰地。今天自稱追求台灣獨立、自主、尊嚴的台獨朋友們，居然與曾踐踏台灣人民的亡魂苟合，試圖一起吹著號角再度君臨台灣。他們痛恨國民黨，罵它是「外來政權」，卻高聲讚美百分之百的外來日本殖民政權；他們齊聲歡頌日本殖民建設偉業（實際上，在這偉業下他們也只不過是次等人，還不是日本人呢！），卻絕口不提自

已實際上是戰後國民黨一手推動的台灣資本主義化的最大受益者，在國民黨政府的羽翼下成為台灣社會的主人；他們像咒語般念念不忘二二八，卻對於日本鎮壓殺戮台灣人民的史實視而不見；他們對同民族的中國人咒唸「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卻對於日本異族的統治禮頌不絕。這是什麼獨立？什麼自主？什麼尊嚴？為了反中國為了與中國為敵，連日本的軍國主義也好嗎？有那種依賴帝國主義的獨立自主嗎？到頭來不但無法使台灣人「出頭天」，反而可能給台灣人民帶來一場浩劫吧！

五、自省

對於這些在小林的《台灣論》幕前幕後出現的「老」台獨或老皇民以及他們的思想，我們應該要有正確看待的態度。天可憐見，它們並非台灣人民自主歷史的結果，而是日本殖民歷史的可悲結果。但是，為什麼這個日本殖民政權僅僅十五年（一九三〇—一九四五）的軍國主義皇民化統治的後果，經歷了台灣光復後五十年漫長的歲月，並且經歷了國府強權下的資本主義化翻天覆地的變化，它的幽靈還會再度復活呢？它的復活，甚至於它的復權，我們不能僅以感情道德的層次去批判它；不管怎麼說，它也是台灣社會歷史內生的一部分。首先應該在民族內部自我檢討，要檢討反省自己的光復後五十年的歷史，要用社會科學的客觀的冷靜自省的態度來分析它。它也是台灣光復後（殖民後）的「去殖民」歷史的問題，亦即光復後如何清除殖民統治歷

史遺害的問題。這個問題，與國府的統治歷史性格，中國民族的內戰，以及戰後美國的東亞冷戰有深刻的關聯。下面簡單地提出一點對這個問題的分析看法：

(一) 因為台灣的殖民解放，也就是日本在台殖民統治的垮台，並不完全是由台灣人民自己雙手鬥爭而來的；而且，台灣社會內部的殖民解放鬥爭力量，基本上在三四十年代以後都被鎮壓下去了，抓的抓跑的跑四處零落。因此，光復後台灣社會內部沒有形成一個有自主性且堅強的抗日反殖隊伍和文化社會意識。

(二) 光復後，初期，雖然台灣人民曾歡天喜地的回歸祖國，陳儀政府也在教育文化上強力推行了去殖民的民族政策。但是在政治經濟施政上卻再度起用殖民時期的御用地主仕紳（皇民階層）；同時，由於國府的半封建性格，貪汙腐敗橫行，施政顛預無能，以致引起了深刻的省內外隔閡，以及國府與台灣社會之間的矛盾。以致引發了令人痛心的二二八事件，造成了深刻的民族內部裂痕，傷害了台灣人民初茁的民族信心。大多數的在日老台獨朋友，都是受到這事件的刺激而思想轉變投身獨立運動。

(三) 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把台灣的進步勢力全部肅清，同時也把台灣人民的真正的反日力量滅絕了。自此，台灣只剩下國府的「官式」反日，殖民統治所遺留下來的殖民者意識（包括所謂的日本精神），沒有任何反省地、無所制約的，原狀成為台灣社會意識的一部分。

(四) 戰後美國在東亞的冷戰戰略，一手製造了包括日、韓、琉、台、菲、澳的

對中蘇圍堵的東亞島嶼基地鏈鎖。另一手也扶植了以日本為頂點的東亞經濟圈（另一種意義的大東亞共榮圈）。經濟上，台灣從一九四八年以後便重新恢復與日本的經濟關係，六〇年代以後，在金融、貿易、技術上全般依賴日本，台灣成為日本的加工基地，再度回到日台垂直支配的經濟關係；在政治上，日本的右翼政客（如吉田茂、佐藤榮作……等）與蔣政權高層如膠似漆，支持了蔣政權對台灣的獨裁統治。隨著台灣與日本的垂直分工的資本主義快速發展，在消費、流行文化上的「哈日化」，自然，在精神上、價值觀上便形成了一股「媚日」風潮。像這次在小林《台灣論》中登場的哈日杏子和謝雅梅，便是典型的「媚日」年輕世代。這種年輕的哈日風潮又與老台獨的所謂「日本精神」互相激盪，成為小林《台灣論》所宣揚的「日本精神」的社會意識基礎。

（五）在長達三十七年的戒嚴狀態下的台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雖然在經濟上快速肥大化，但國民思想和社會意識因受到反共戒嚴的桎梏並沒有跟著發展，反而退化（退嬰）。因此，台灣的社會意識仍停留在幾十年前的傳統半封建意識以及日據遺留的皇民意識，再加上一些美國價值和日本流行。這也就是說，長期的反共戒嚴阻礙了台灣社會意識的進步，因此抑制了社會意識的自我變革，而使得皇民意識得以溫存，冰封了下來。待台灣的本土資產階級當政後，它便冰融而出，成為台灣本土資產階級思想意識型態的本源，以及打造台灣國家意識的原型。

總之，今天像小林《台灣論》這種東西的登場，究其因，絕大部份是台灣光復以來五十年間曲折又悲哀的歷史所造成的。因此五十年來每一個居住在島上的人都有責任，不要把責任推諉給別人，說別人的不是，說自己只是受害者，別人是加害者。只有當每一個人從受害者意識中走出來，只有當每一個人也都深切地反省自己是否也曾參與了（不管直接或間接）加害者的行列，才可能中止悲哀歷史的進行。

小林的《台灣論》的堂堂登台，所顯示的「老」台獨與「新」右翼的合作，一方面驗證了從來高舉「獨立自主」、「民主進步」、「台灣人出頭天」口號的台獨運動，它的本質與它的口號恰恰相反，事實上它是依附帝國主義者的、是保守右傾的、是把台灣人民帶上危禍之路的；另一方面，最近出現的美日安保新指針以及日本的周邊事態有事立法等警訊，顯示了日本正無聲無息地介入台灣問題，企圖打台灣牌，我們不可不看到這些新事態與小林《台灣論》的表裡關係。不過，希望它只不過是李登輝企圖透過《台灣論》在日本製造輿論以便實現他訪日的宿願，而小林想借《台灣論》擴大日本右翼思想的宣傳，這樣的單純目的而已。然而，真的只是這樣而已嗎？

完稿於二〇〇一年一月十八日

《海峽評論》第一二二期，二〇〇一年二月一日

著紅衫的「公民社會」列車的向路

——「反貪倒扁」運動的初步街角觀察

一、百萬人民凝聚的岩漿

九月九日，施明德領導的反貪腐倒扁運動在滂沱暴雨中開鑼；原本擔心暴雨可能使參加人數銳減，沒想到，身著紅衫的二十萬市民，居然不畏風雨從四面八方自動聚集到「總統府」前的凱達格蘭廣場來。不論黑髮白髮、男女老少、本省外省，不論職業身份，心中都燃燒著相同的倒扁怒火，雙手都不斷比著相同的「倒扁」手勢，口中喊著相同的口號，「阿扁下台！」的怒吼響徹台北的天空，透過電視的畫面震撼著全島的人心。紅衫群眾就像岩漿的鐵流，以景福門為中心的大道上湧流著，不顧運動總部原先規畫的「和平·安靜」為基調的靜坐活動，群眾自己以自己的方式動了起來，反貪倒扁運動一開始就有了它自己的生命、呼吸和方向。

第二天，雨下得更凶更猛，仍然澆不熄人民的熱情，大家還是打著傘穿著雨衣回到廣場來，表達心中積悶已久的願望。許多人乾脆夜宿廣場，在大雨中裹著雨衣曲捲著身子就這麼在廣場過夜，是什麼力量使他們表現出這樣堅決的態度？特別是，運動中有許多中年女性參加，態度十分堅決，甚至有人帶著孩子，就這麼不走了，寧願大

夥一道在大雨中夜宿凱達格蘭大道；有母親說要坐到扁下台才會離開。當母親們站出來時，這告示了舊的時代將退場，新的時代將來臨。

接著不再下雨的幾天，各種各樣不同身份和年齡的人又加入了。高中生來了，大學生加入了，連小六的學生也上台朗誦自己創作的倒扁詩，許多年輕的面孔連新潮辣妹也加入了；律師、醫師、藝人也都紛紛站出來了，給整個運動注入了新的活力，取得了政治上的正當性，彷彿成了一個「全民」運動。穿紅衫綁紅帶作倒扁手勢喊「阿扁下台」，蔚為風潮，已成了一種新流行。在群眾高昂氣勢的衝擊下，運動總部終於決定在九月十五日夜發動圍城行動，把「總統府」和「官邸」團團包圍起來，要阿扁下台。當夜，有近百萬的熱情市民參加，揮舞著螢光棒呼著口號，個個流露出認真又興奮的表情，人人展現出解放的熱氣。全長五公里的大道擁入了近百萬的市民，前導車到達了目的，後面的隊伍卻還未出發。穿紅衫的百萬群眾，像火山爆發流出來的灼熱岩漿，湧動著淹沒了中山南路、公園路、中華路……。這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壯觀雄偉的景像。今夜的台北城燃燒著久不見的解放的新氣勢；今夜，台灣民眾掙脫了長期間受獨派和扁政府在精神上和政治經濟上的玩弄和壓抑，高舉著「人民主權」的理念走上街頭，向扁政府說「不！」；共同前進創造一個新的台灣社會。至少是一個與扁政府統治不一樣的社會。

在圍城遊行結束前的講台上，大受百萬群眾的熱情所感動的施明德，竟然率領幹

部向群眾下跪感謝，並四次高呼：

「台灣人民萬歲！」

不管有人稱它是充滿妥協的中產階級運動或都會市民運動，或者嘲諷它只是三一九藍營群眾的再集結也好；但是，媽媽出來了！帶著孩子來了！青年加入了！學生加入了！再看看每一張堅決熱情的表情，每一個人渾身投入的身姿和嘶喊，台灣社會動起來了，開始掙脫舊的束縛，向前邁進！

一一、在「倒扁」和「挺扁」的潮頂上

大家都知道，這個運動的主導者，從施明德以下的幾位重要幹部，在國家和民族的認同上，都屬於台獨，一直未改變；一開始，施的「倒扁」運動原本只是獨派內部的矛盾，還不是屬於外部的敵我矛盾。這性格決定了運動一開始成立之初就表現的侷限性，反映在運動策略上便是：一開始就決定走「安靜、和平、理性」的基調，想以最小的代價最小的損失清除台獨陣營中的「貪腐」毒瘤。但是，出乎施明德意料之外，民進黨上上下下整個黨居然都堅決「鞏固領導中心」，顯示出全黨「阿扁化」，全黨宣示「挺扁」，連基本教義派的長老教會亦同，無人不「鞏固貪腐」中心。整個形勢成了：如果要動手術割除民進黨內的貪腐毒瘤，非動全身手術不行，結果刀口必然會割到包括整個獨派在內，已嚐到執政甜頭的全體民進黨人；倒扁運動勢必成倒民

進黨運動。因此，民進黨全力反撲，視施的反貪倒扁運動為敵我矛盾；盡全力打擊、污衊施明德的私德，甚至策動施的兩位前妻、女兒以及以前一起坐牢的政治難友出來，辱罵施貪財好色、求官不成、台奸等；其外籍前妻艾玲達還公然把施的運動抹紅，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想從毀滅施明德的個人政治道德形象，從根本上撲滅施領導的「反貪倒扁」運動；與國民黨戒嚴時期打擊異己的手段如出一轍。由於民進黨這種視施如讎寇的作法，使施的「反貪倒扁運動」在性格上起了很大的變化。

同時，施提出的百元捐款運動，得到全體社會的熱烈支持，群眾踴躍捐輸，一週內就募到一億元，還欲罷不能。這些無名的百萬人「倒扁」群眾的熱情支持，也使施明德起了變化，暫時放下獨派理念，全力把運動營造成反貪腐的全民代表。在「倒扁」和「挺扁」的政治力一推一拉之間，把施明德推到了台灣現階段「反貪倒扁」運動的潮頂上。

再加上刻意營造「和平、開放、理性」的運動形象，更擴大了群眾的參與，不分黨派、不分「族群」、不分「階級」、不分「統獨」只要反貪反扁都歡迎參加。非綠的政治人物，以馬英九、宋楚瑜為首，也都以個人身份參與了這運動，等於集結了當前所有「反貪倒扁」的政治力量。透過數家媒體全天報導了第一天、第二天的運動現場，向社會大眾呈現了堅忍、和平、秩序、安全的運動形像後，更吸引了大批青年、學生和保守的市民加入，於是台灣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市民運動於焉誕生。

三、從「族群政治」的泥淖跨出了一大步

一年來，扁個人及其家人和扁政府的各種弊端、弊案，經媒體揭發和爆料後，由於司法機關無法彰顯公義昭信於民，引起了全民公憤；扁政府以及執政民進黨的政治正當性和誠信受到了大眾的質疑，政治氣勢急速崩潰，支持率跌到只剩二成左右。雖然國親兩黨在立法院聯手提出了罷免案，但受到泛綠勢力的抵制且泛綠把罷扁行動轉移為藍綠鬥爭的問題上，而功敗垂成。接著所謂「親綠學者」們也跳出來發表批判，要求扁下台，但由於其論述仍拖著本土論的尾巴，所以無法撼動民進黨上下一鞏固領導中心」的決心，以及泛獨勢力「保衛本土政權」的力量。施領導的「反貪倒扁」運動，就是吸收並繼承了前述的「倒扁」運動的總民意，成功的避開了被抹黑為爭權鬥爭、統獨鬥爭、藍綠對決以及暴力團體的政治陷阱，取得了和平、民主、人權、反貪腐的政治道德制高點。凱道廣場上風起雲湧，母親們站了出來，從小學生、初中生到高中生、大學生還有年輕人也加入了行列；身披法袍的律師群也站上了舞台高喊「阿扁下台！」，這種抗爭場面在台灣前所未見，展現了充滿活力的新的市民運動形態。「反貪倒扁」的政治訴求凝聚了台灣蓄積已久的各種矛盾的政治力量，正朝向火山口一舉噴出。

當然，「反貪腐」和「倒扁」是這個運動最鮮明、最直接和最終的政治目標。但進一步觀察，可發現在反貪倒扁的裡面有一股強有力的新的社會意志，它有多重的

新政治內涵，這才是使這運動沛然莫之能禦，可能將成為時代主流的力量。它是什麼呢？首先，施明德在九月九日的開場白和九月十五日夜的圍城行動後的致辭中，都清楚說到了這個運動的基本論述，那就是：反對用族群問題撕裂台灣社會（要超越藍綠、統獨，互相幫助）建立台灣公民社會的核心價值（包括禮義廉恥）。直接引施明德的說法就是：「掃除貪腐、捍衛民主、自由、人權、公義（雖然施第一次說了「捍衛主權」，但馬上重覆說一遍，把「主權」改口成「公義」）。這個論述或主張，相對於挺扁的民進黨和獨派，還在使用二十多年來的「奧步」（閩南語，意為用下三濫的手段），以挑撥「族群問題」，煽動台灣反共、反中國的「本土意識」，來應付倒扁危機；無可否認的，有其相對的進步性，單單這一點，他代表了當前大多數台灣民眾的要求。不管他說的「民主、自由、人權、公義」等「公民社會核心價值」有多麼含糊，其階級內容也不清楚，甚至其「國族」認同仍未解決，但是，對於仍然處在「族群問題」這個屬於前現代的落後泥淖中打滾的台灣社會而言，可說跨出了一大步。

四、運動的「文化」作用

從實際的政治鬥爭層面來看，施領導的「反貪倒扁」運動會成功嗎？可以把阿扁拉下台嗎？

依據民調，有八成以上的人認為它無法使扁下台。從當下民進黨上下和獨派仍堅定「鞏固領導中心」的形勢來看，只要民進黨不分裂，辦案檢察官沒有突破性的作為，或美國沒有介入，單靠這「和平、理性」的運動，的確不容易達到把阿扁拉下來的直接政治結果。

但是，卻不可忽視這運動所造成的政治性的文化效應，也就是市民運動的文化蔓延；它在改變人民的政治認識，人民的社會感情和意識，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在全民的「民主教育」上，影響必將深遠。從長遠來看，在反民進黨、反台獨運動上，這是一個重要而不可或缺的階段。

或許，會有人認為它華而不實，只是一個充滿妥協性的市民運動或只是資產階級的政治美學……等等；這些批評都有它的部分道理，站在終極的理想主義來看，也的確是如此。但是從政治運動的實踐來看，所謂「運動」，就是怎樣推動現實的社會開始行動往前走，既要「運」也要「動」；要區分終極「理想」和現實「策略」，當然也要辯證的運用。首先要客觀認識現實社會，務實面對社會條件和歷史階段；運動策略落後於社會現實當然不行，太超前於社會現實也不行；「太前衛」「太超前」就成了唐吉訶德，太落後那就不必說了。倒扁和挺扁的政治鬥爭，就是一個掌握政權以操弄並依靠所謂族群意識、本土意識的泛綠政治力，與一個極力衝破所謂「族群」和「本土」的政治束縛，追求「公民社會」的市民階級之間的鬥爭。現在的台灣社會仍

然處於真正的資產階級政治誕生的前夜。

我們不可忽視這個運動所造成的「文化」作用。在中國革命歷史中，「文化戰線」曾被視為與軍事戰線並進的「第二條戰線」；以孫文先生的說法，就是「如何喚醒民眾」，如何打破民眾的舊思想，改變民眾的感情意識和價值觀，它是政治運動成敗的關鍵。這次施明德領導的「反貪倒扁運動」，在「文化」上的作用，譬如有：

一、重新喚起了「人民主權」的意識，人民走上街頭行使民權以及人民不服從的權利等。

二、大膽使用紅色，作為運動的標誌。它顛覆了台灣六十年來對紅色的政治禁忌，大大祛除了台灣社會大眾對紅色的政治過敏症。把紅色從台灣社會中「除魔化」，使紅色回到它原有的位置，也就是紅色的正名化。長遠來看，這對台灣的社會主義運動有很深遠的影響。另一方面，紅色對原本就內含反共性格的白色台獨來說，是有極大挑戰性的；而且紅色不但代表著動態的運動，而且只要紅色存在的地方，即使只是懸掛的紅絲帶，都會產生一種無言的吶喊和抗議，給阿扁或挺扁者極大威脅，無以寧日。還有，在台灣的政治光譜中，除了向來的藍綠之外，似乎又多出了紅色，藍綠的兩大政治板塊之外，忽然浮現了巨大的紅色板塊。據《中國時報》的民調，最近挺藍者有百分之二十三，挺綠者只有百分之八，因此不藍不綠者高達百分之六十九，這似乎意味著紅色在將來的台灣政局中將舉足輕重。

三、由於阿扁及其親屬家臣乃至整個扁政府的貪腐無能，再加上阿扁「大總統」的專權獨大、藐視民意、無「法」無「天」的作風，致使誠信道德淪喪。使民進黨以及挺扁台獨勢力，長年自誇的「民主」、「本土」、「愛台灣」的政治形象和文化霸權，不但光環盡失且快速崩解。各地基層支持者顏面盡失，紛紛抱怨在地方抬不起頭、大聲不起來。「反貪倒扁」運動的登場，更突顯這一窘境，可以預見，阿扁集團的頑抗和反撲越大，挺扁、反扁的對決拖得越久，越暴露其欺騙的本質；使人民看得更清楚，其政治形象和文化霸權的潰滅會越徹底，乃至引起民進黨的分崩離析。

五、「母親」走上街頭——運動的原動力分析

實際上，這個運動剛成立時是用「倒扁總部」的名稱，後來不知什麼原因竟改名為「反貪腐總部」；雖然如此，大家都習用「反貪腐倒扁」運動稱之。為什麼把「倒扁」改稱為「反貪腐」呢？運動總部到底有什麼政治考量？這不得而知，但不管從運動的真正內容和目標來看，或從實際活動中群眾共同喊的口號比的手勢都是「阿扁下台」來看，這運動的政治訴求本來就是「倒扁」，這是很清楚的；大家都是為了倒扁集結，參與群眾的共同政治目標就是「倒扁」，「反貪腐」只是「倒扁」運動的原因之一而已。民進黨把「倒扁」運動說成是泛藍的「政治惡鬥」，是黨爭，是泛藍不甘選輸、是三一九運動那批人作亂。問題在，為什麼施明德登高一呼「阿扁下台」，馬

上得到百萬人民的支持呢？施本身的政治形象（獨派大老，坐過二十五年戒嚴政治大牢），當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真正促使群眾走上街頭的原動力，還是來自對扁的施政所造成的生活壓迫以及民眾普遍對前途失去展望，誇大地說幾乎已到了「與汝偕亡」的程度，非把你拉下來就無從改變現況。而且，這些走出來的群眾不是經過政黨的組織動員，而是一個人一個人放下個人正常的社會生活，從各個社會角落走上街頭的；他們寧願雨淋日曬，忍著疲憊夜宿街頭、靜坐街頭、列隊示威，盡力揮舞手勢，竭聲嘶喊「阿扁下台！」，基本上，這是一個自發的群眾運動。

雖然大家共同的政治目標是「倒扁」，但其背後的動機和政治的驅動力則不盡相同；並不是單一的原因而是多重的原因造成百萬人一齊走了出來。從黨派角度看，這是一次施明德領軍的「倒扁」聯盟或者更接近一個倒扁「統一戰線」，但運動總部卻要各方遵守共同規約，不准舉自己的旗幟喊自己的口號。運動的主要領導幹部是泛綠的，但宋楚瑜也幾乎全程參與，還自稱是靜坐活動的「夜間部主任」；馬英九雖刻意與運動保持最大距離，但也曾與施全體幹部和宋一起站在台上高呼「阿扁下台」。參與群眾的黨派背景，當然有藍有黃也有綠。只不過大家都統一在紅色之下。運動經過十天的實踐，紅色成了「倒扁」的政治顏色。

從社會層面來看，參與群眾的政治感情構成也是複雜的；其中當然有基於黨派理念的，也有很大部分是出於道德的憤怒。譬如運動總部打出「禮義廉恥」的標

語，就最集中反映了大眾對扁政府誠信淪喪道德敗壞的憤怒；「禮義廉恥」雖然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產物，但當今的台灣市民社會原本屬於資本主義社會上層建築性質的政治、法律、文化規範已很薄弱，再加上社會公共領域（特別在教育、政治、文化）中最基本的價值受到扁政府極大的破壞，產生了道德文化上的集體焦慮和不安，因此「禮義廉恥」代表了社會大眾的共同文化期望。雖然仍然是禮義廉恥四字，但它已被注入了現階段台灣市民社會的新期望。這次的運動與過去任何一個運動最大的不同之處，是有很多女性、青年、大學生甚至高中生、初中生、小學生參加；許多人是基於道德的義憤，對「總統」阿扁的貪腐不德感到憤怒。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小六的學生不但自作打油詩諷刺阿扁，還批評說：「如果教育部長不懂禮義廉恥，我來教他」。

即便如此，不管黨派的理念或道德的憤怒有多強，如果沒有經濟生活上的深刻壓迫感和無望感，是絕不可能激起百萬人上街頭的。十年來台灣的整體經濟環境快速惡化；國民所得原地踏步（被原來落後於台灣的韓國甩到後面），但貧富差距卻急速擴大，國民負債成倍擴大（特別是卡奴問題），失業問題嚴重。因經濟困境而自殺或攜子自殺者、全家自殺者快速增加，據說扁當政以來，自殺者有萬人以上。弱勢家庭如此，中產階級家庭也面臨荷包縮水，家計日愈窘迫的狀況。再加上社會環境日愈惡化，飢寒起盜心，治安問題嚴重，社會失序道德敗壞。教育環境更加混亂沉淪，家

長、學生都無所是從，對未來失去了信心。這就是為什麼這次運動出現的新特徵，有許多作為母親的女性加入運動行列的重要原因。這些母親有勞工階級，有中產階級，還有人攜家帶眷，可以說是「全家上街頭」了，這在街頭運動歷史上，是極罕見的景象。當母親們從家庭、從廚房走上街頭時，當母親帶著孩子上街頭時，表示社會矛盾已普遍到每個家庭廚房；也預告了人民怒火已燒到了家庭、客廳，燒到了廚房。因此，人民要求變革的感情已到了臨界點，已到了不可逆轉無法遏止的狀況。這個大潮流將衝破一切障礙，只有達到目的才會休止，在這歷史過程中新的台灣社會或將誕生。

六、是什麼造就了「民選皇帝」——用「民主」包裝的「族群政治」

造成今天百萬民眾上街頭要「阿扁下台！」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再怎麼經由輿論、司法或正常體制內的程序，也無法制衡阿扁「大總統」濫權；因此只有回到民主的原點，使用「人民主權」的集體力量，經由這種體制外的方式改變政府現狀，把阿扁拉下台，這是台灣民主的一大前進。

然而，到底是什麼原因，到底是什麼東西使阿扁成為權大責小、位重權傾又專制的「大總統」呢？是什麼使阿扁膽敢藐視民意、操弄民意，又貪贓枉法呢？其根本原因有二：一、是九〇年代李登輝「修憲」後在法制上造就的「大總統制」，二、是泛綠民眾根深蒂固的所謂「本土意識」、「台灣意識」。

一、九〇年代初，身兼國民黨主席（有一個玩笑說：李登輝白天是國民黨主席，晚上

是民進黨主席)和「總統」的李登輝，集大權於一身；由他一手主導的「修憲」，但沒有改變過去國民黨長期主政的威權體制，還假借民意賦予總統更大的權力。他還進一步主導「總統直選制」，使台灣的「總統」不但繼承了過去的威權，還經過直接選舉，得到了「民意」的擁戴。這種「總統」，其掌握的大權超過世界上的任何國家領導人；譬如，單單「總統」所能夠掌控經濟權，以幣值來估算，就高達五兆之多，幾乎等於台灣國民總生產的一半；這是由於歷史因素使台灣政府擁有龐大的公營事業，其生產毛額幾乎高達國民生產毛額的四分之一。再加上，台灣的司法機關仍然無法獨立於行政系統，且「總統」直接掌控的國家暴力機關，包括警、檢、調、憲兵和國安局國防部等情治特務系統，在數量上不但不少於國民黨政府的戒嚴時期，且更加大擴張；這還不算，「總統」還身兼「三軍統帥」直接控制軍隊。這樣的「天下第一」的「大總統」，還有什麼力量可以制衡它呢？立法院雖然有質詢權（最多可質詢行政院長，無法質詢總統）和預算審查權、立法權，但「大總統」制下，行政院長不過是「總統」的行政長官，立法院最多可以制衡行政院長，卻無法牽制「大總統」。因此，「大總統」躲在民意不可及的「深宮大院」中，天威莫測，號令天下，萬民歸順。如果用「民選皇帝」來形容它，一點也不為過。這就是使陳水扁貪腐枉法還「硬拗」抵賴，沒有任何體制內的力量可以制衡他的根本原因。

二、從八〇年代起，黨外運動和以後的民進黨，為了抵抗國民黨政府的壓迫以及

為了取得民眾的支持，就慣以操作台灣社會特有的省籍情結，且百試不爽。到了九〇年代，深知操作省籍情結政治妙味的不只是民進黨政客們，連投機的學術界、文化界、官僚界也大批投入進行所謂「台灣意識」、「本土意識」、「四大族群論」的論述炒作，以強奪私利；還有「大總統」李登輝也搭上順風車，使用政權的力量，透過教育、教科書、文建會影響民意民心。一時以「四大族群」論為核心的「本土意識」、「台灣意識」成為所向無敵的霸權論述。在人口比例佔百分之七十絕對多數的閩南人，當然成為「四大族群」的代表，「本土意識」的主角；因此，也出現了一閩南沙文主義」的風潮。

不管是「省籍情結」、「四大族群」論或是「本土意識」論，都是過去被歪曲的歷史的產物和遺留物。其社會歷史的根源是：過去台灣冷戰內戰支配的歷史悲劇中，經過長期的戒嚴和快速的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過程，造成省籍的權力、資源分配不平等的結構，佔人口多數的省籍同胞產生了相對不平等的感情和劣等感；這種歷史感情本來可以通過實質的「民主化」逐漸矯治和弭平。然而，投機的民進黨人和國民黨的李登輝「們」，卻不道德的利用這種台灣的不幸歷史所留下的社會感情和意識，並加以擴大、激化、煽動甚至理論化、學術化、教科書化、「文化」化；使之成為一種集體的政治意識和認同，更擴大為準「國民意識」。進一步再用「民主」的外裝加以修飾修詞，於是一個用「民主」包裝的「族群政治」便逐漸被培養起來了。民進黨和李

登輝「們」便長期據為私有的政治資產。這種族群政治不但掩蔽了台灣的階級問題，阻礙了實現歷史正義的進行和兩岸關係的進展，有礙台灣真正的「民主化」和「文明化」。

而使這種「族群政治」成為台灣政治主流的最大關鍵，還是在於九〇年代初期李登輝主導的「總統」直選制。道理很簡單，在台灣社會仍停滯在「族群意識」為主流，且「民主意識」薄弱的社會條件下，採用人民直接投票選舉總統的制度，所選出來的總統必然是人口佔絕對多數的「族群」——「閩南人」，也就是所謂的「咱台灣人！」。只要用閩南話（經常等於「台灣話」）喊喊「咱台灣人！」、「愛台灣！」，不管政策如何，必然當選無疑。而由「族群政治」所選出來的「總統」，必然要依賴社會的「族群意識」來鞏固其權位，當然會使用其大權來進一步培養、灌溉這塊「族群政治」的政治良田，使它更為壯大，也更為欲取欲求。遇到政治難題便煽動「族群意識」，保衛其「本土政權」渡過難關。

七、將被拋在時代列車後面的保衛「本土政權」論

在「反貪倒扁」的政治風暴中，是什麼保衛了阿扁呢？他靠動用什麼來防衛自己呢？

首先，是「大總統」的重重制度保護傘，以及他還能操作的各種國家暴力機器和

宣傳機器。其次，便是嚐到了「執政」甜美滋味，成了阿扁的「本土政權」利益共同體，害怕失去政權而宣誓「鞏固領導中心」的民進黨和特定獨派團體，可稱之為現代「保皇黨」。第三，就是民進黨的忠誠支持群眾。這些有濃厚政治化的族群意識、本土意識的群眾，是長期間民進黨培養出來的基本政治力；佔總選民人數的比率最高曾達三成以上，最近因阿扁政府的貪腐弊案連連而急速消退到二成左右。這些群眾是狂熱的族群意識和本土意識者，自認為自己或贊同自己信仰的才是「台灣人」，只有自己做的事才是「愛台灣」，只差一步就可稱之為「台灣主義」了！從這種前現代的「意識」出發，自然會衍生出一系列過度簡單化的邏輯、價值觀和道德觀，容易產生強烈的排他性和攻擊性。

從這次的「反貪倒扁」風潮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阿扁政府、民進黨和獨派，怎樣扔掉「民主進步」的外衣，捲起袖子重操舊業；用可能連自己都不相信的，最激烈的、最挑撥性的政治語言，煽起支持者的族群狂熱和「他我」的對立意識，以鞏固其權勢，反制「倒扁」運動。譬如民進黨主席游錫堃說：倒扁運動是舊勢力企圖結合中國，想搞垮台灣「本土政權」……是中國人要糟蹋我們台灣人……是紅色恐怖……台灣人不要給人家「看衰小」。

有名的長老教會牧師高俊明，竟然謾罵施明德：是「賣台集團」第一勇夫。民進黨散播一種說詞：「台灣人總統作不好，由我們台灣人來『教示』，輪不到

中國人來管。」

「要阿扁下台必須我們六百萬台灣人同意。」

「你們不要欺負我們選出來的台灣人總統。」

「囡仔壞，我們自己會教示，輪不到你們來教！」

九月十六日，由台灣社出面主辦，實際上由民進黨進行總動員，在凱道發動的挺扁大會，也只有用「挺台灣」的總標題，來掩飾其「挺扁」的目的；脫離不了用「台灣」的濫調來模糊問題的本質，煽起集體的「族群」激情。

最近經常上叩應節目的政論家楊憲宏，針對這樣的問題，曾笑著說：「毛澤東說『階級問題一抓就靈』，現在是，族群問題一抓就靈。」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挺扁」者們的「奧步」。

可見得，上從阿扁本人、扁政府一直到民進黨和獨派，面對反貪倒扁風潮的危機，也只有依靠煽起支持群眾的「族群」激情，以及以反外省人反中國人為實質內容的所謂的「本土意識」、「台灣意識」；甚至反共意識，來保衛其政權和既得利益。這顯示民進黨已失去了掌握社會潮流，領導新論述開創大局的能力，它將逐漸逐漸地被拋在時代的後面。

八、著紅衫的「公民社會」列車將駛向何方？

而施明德領導的「反貪倒扁」運動，在台灣當前的政治社會困局中，在政治、法

律、道德都失效的泥淖中揭竿而起，它帶領著百萬紅衫隊，舉著建立「公民社會」核心价值的大旗，正向前方走去。現在無人知道它會不會拉下阿扁，但是這已不是那麼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後扁時代」，著紅衫的「公民社會」列車將走向何方。我們隱然看見，一個以市民（或公民）為主體的新的台灣社會將來臨；它將踩過前現代的族群意識向前走。在這過程中，資產階級的民主意識將得到釋放，同時，階級意識才得以浮現而成為台灣社會意識中的重要成分。真正火紅的社會主義才有落地生根滋長的社會條件。

後扁時代已來臨，後族群政治也必將來臨。政局混沌中，如果希望不要再出現一個沒有反省能力又堅持白色理念的國民黨政權，這班著紅衫的「公民社會」列車的向路是決定性的力量。早已著紅衫（舉著紅旗）的同志們，在這歷史的關鍵時刻，我們能做什麼？

完稿於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一日

《人間思想創作叢刊》二〇〇六年秋季號

揭開帝國主義幽靈的假面

一、新帝國主義統治世界的方式

很多人以為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沒什麼關係，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就民族理論來看，帝國主義就是以獨佔資本為主體的民族國家對外擴張對異民族壓迫的民族主義。是從十九世紀中葉至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了其本民族的資本積累與擴張的目的，掠奪了全世界的資源，掀起了無數戰事、殺害了無數生靈的最凶惡的民族主義。因此，被壓迫民族覺醒的民族主義當然是他的最大的敵人，是它要不斷掃除的對象。二十世紀上半葉以前，帝國主義是用機槍大砲、用直接的高壓殖民統治、用露骨的歧視、用發動侵略戰爭、用直接的掠奪來進行世界統治，來對付被壓迫的民族主義的。

二次戰後，產生了新帝國主義。它本質上與過去的帝國主義上並沒有什麼兩樣，但在手段策略上，卻有很大的不同；更高明了，把它最凶惡的民族主義巧妙地隱藏起來，戴上慈善又進步的假面，高唱「普世價值」遂行掃除、軟化被壓迫者被剝削者的民族主義反抗。它不再自己直接去統治殖民地，因為那會引起直接的反抗，而在各地各國各民族培養代理人實行間接統治；使被統治民族自己內鬥，他坐收漁翁之利，還贏得被統治民族的景仰。他不再直接掠奪，而用市場經濟、世界分工、金融操作、

IMF、WTO、World Bank，不費吹灰之力，世界的商品和資源就自動流到他那邊；他不再用船艦大砲等暴力手段迫使其他民族屈服，而是用傳播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發展理論、市場理論、自由民主人權、消費生活樣式、惡魔化民族主義，甚至用左的論述，……等思想體系，不知不覺地改變被壓迫人民的價值、意識，喪失了民族的主體，成為帝國主義意識型態的俘虜而不自知。

當今，戴著各種假面的新帝國主義的幽靈，正在全世界的各意識領域活動，已佔著文化霸權的地位；它也許在你的身邊，甚至已成了你腦子的一部分。他也會戴著全球化理論的面具，也有可能戴著低碳、環保、性別、人權的面具、人道主義的面具，甚至戴著民族的或左翼的假面具。總之，它是新帝國主義用資本全球化來統治世界的同時，在意識型態領域統治世界的新方式。

一一、何六九的「民族論」

何六九批評說：「台灣左翼，只問階級不問民族」。說得對！

他說：「無產階級應有自己的民族立場」。說得好！

又說：「要迎戰台灣的民族問題！」。說得勇！

然而，當他落實到台灣的具體現實，談論台灣的「民族問題」時，卻與上述的原則論完全相反，全部走了樣。憑空吆喝還不算，根本就是走到了左的對立面去了，還

當了新帝國主義的喇叭。借用他說的話，那就是：刮去了左翼的皮，發現原來是一個台灣民族主義者。

洋洋大作《當幽靈徘徊不走的時候》，就是他的「民族論」。該文思路混亂，反覆覆浪費了不少《左翼》的寶貴篇幅。清理一下該文囁語般的內容，可以發現，何六九想說的就只有下面兩點：第一，他認為台灣的「民族問題」（也就是民族矛盾），主要在中國民族與台灣民族之間的矛盾；第二，因此，當前台灣左翼的首要任務就是打倒「漢」民族主義，並且高度評價台灣民族主義（雖然他對這論題還是為了保住左翼的皮，而遮遮掩掩、閃爍其詞，不敢正面說出來）。

對於他吆喝要打倒的這個「漢」民族主義（實際上，他想打倒的是中國民族主義，漢民族主義只是一個代罪羔羊），他是怎麼說的呢？

他一口咬定，「漢」民族主義就是「血緣」民族主義，也是「種族」民族主義；是仍盤旋兩岸上空的幽靈，咻咻作響，隨時要掀起腥風血雨；是野蠻的、嗜血的、退化的、貪婪的、違反「文明世界常規」的；他說，漢民族主義仍然牢牢掌握台灣的文化霸權，興風作浪，不斷製造民族矛盾、嚴重痲痺台灣工人階級意識的提升，不但是台灣工人階級的敵人，也是中國各民族的敵人。

至於他是如何高度評價台灣民族運動（或主義）的呢？他說：台灣民族運動是國民黨壓迫的台灣民族認同、又是漢民族主義的對立體、是民主運動、是現代文明社會

的民族認同、有新興事務的特質……。

二、是站在什麼人的立場的「民族論」？

是這樣嗎？讓我們來檢驗檢驗他的「民族論」的真假，看他到底是站在什麼人的立場的「民族論」吧！

首先，何六九咬牙切齒恨不得除之而後快的「漢」民族主義，在台灣、在大陸的現實中，是不是仍盤旋兩岸上空興風作浪呢？很遺憾的，今日的中國，不管台灣或大陸，早已不存在他所謂的「漢」民族主義。自從一百年前孫文放棄了「排滿興漢」、「驅除韃虜」的口號以來，它就不再出現了。何六九大張旗鼓地批判「漢」民族主義，只是策略性地把落伍過時的漢民族主義說成是中國民族主義，而得以更盡情地污衊中國民族主義。而且，當今台灣的上空佔文化霸權地位，且咻咻作響，不斷製造民族矛盾，麻痺台灣工人意識的，當然不是漢民族主義，更不是中國民族主義，而是已取得政權的台灣民族主義。何先生！請走出幻覺，看看現實的世界吧！

孫文先生在一九二四年的民族主義新講中說過：中國民族對外自求解放，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這就是百年來中國民族主義的真義。他所說的「中國民族」就是指：原來的封建中國民族，在近代的反帝反封建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包括漢民族等五十六個大小民族（或族體 ethnic group）所共同組成的現代民族；這個中國民

族，是在近百年來抵抗帝國主義的民族運動中所產生的。至於，關於追求中國民族的自主獨立、建立統一的中國民族國家以及各民族平等的理念、立場和理論，便是中國民族主義。它與二十世紀初以來，在亞、非、拉等一系列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出現的民族主義相同，在理論上繼承了西方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上升期的民族主義革命的進步內容。實踐上，它在反帝反殖民統治爭取本民族獨立與解放的民族運動中，扮演一個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在性質上，它同屬於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

戰後至今，在美國新帝國主義圍堵中國，介入台海，製造並維持了兩岸長期隔離和對峙的民族分裂狀態的歷史中，中國民族主義是抵抗新帝國主義以及克服民族分離主義的力量；它維護並追求中國民族國家的獨立及領土完整。在台灣，它的目標主要是反帝並追求民族的統一。它是新帝國主義及其扈從者的對立物；是他們的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何六九戴著左翼的帽子高喊打倒「漢」民族主義，跟著新帝國主義攻擊中國民族主義，無異於在意識型態上幫助新帝國主義圍堵中國，強化中國民族的分裂構造，這不是戴著左的假面的帝國主義幽靈是什麼呢？

何六九為了攻擊中國民族主義，還狡猾地把中國民族主義抹黑成種族主義。

從民族發展的理論來看，以共同的血緣或血統作為特徵的族體（狹義的民族），早在原始時代末期，人類的兩次大分工，並且在私有制形成之前，就已不存在了。然而，從歷史來看，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在西方的資產階級經歷了上升期的民族主

義，進入到對外殖民對外擴張的民族主義時期之後，一種以血統、種族作為民族區分和差別的種族主義才突然興起。它是一種思想體系，認為各種族在智力和道德能力上是先天不平等的，種族的先天差異決定著各種族的歷史發展和文化水平，並主張優秀的種族應凌駕於劣等種族之上。這種邪說，是帝國主義在民族問題上的思想體系，在政治上替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鋪路，當辯護士，譬如社會達爾文主義、條頓主義、德國納粹主義，大和主義……等都是。中國民族主義是在白人的種族主義歧視和壓迫下成長起來的，深受其害，這是任誰都知道的；它當然是全世界反種族主義的重要力量。何六九居然把這樣的中國民族主義誣衊成種族主義，這種作法是新帝國主義的新手法，譬如，美國在侵略科索沃時，所啟動的意識型態攻擊，便是大肆宣傳南聯盟是種族滅絕主義者。然而，到底誰才是種族主義者？

四、要從台灣的社會歷史中來談民族問題

民族和階級是人類最大且最重要的兩大社會群體，兩者既有關聯也有區別。對於民族問題的觀點，有資產階級的民族觀，也有無產階級的民族觀；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是不是有具體的社會歷史分析，是不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

在何六九的「民族論」中，我們看不到台灣的歷史，也看不到台灣的社會，更看不到世界的內容。該文除了反覆使用一些左翼的名詞外，完全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的社

會歷史分析，只有空洞名詞的叫囂，這註定它必然是假的左翼民族論。

要想從左翼的立場談台灣的民族問題，絕對不能離開台灣的具體社會歷史來談；也就是說，台灣的民族問題必須放在台灣社會歷史的基本性質（規定性）中來談，否則都是空談。

五、怎麼看在台灣的帝國主義與民族主義

自從台灣登上了近代世界史的舞台不久，就成了中國封建國家的領土，以及中國封建社會的一部分；這是台灣社會歷史的大前提，所有談論台灣的民族問題絕不能離開這個前提。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在西方帝國主義壓迫、剝削、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台灣作為封建中國的一部分，也一起淪為半殖民地。但甲午戰爭後割台，使台灣完全淪為日本帝國的殖民地，而大陸則繼續著如孫文當年所面對的「日本駐兵於南滿，俄人駐兵於蒙古，英人駐兵於西藏，法人駐兵於滇黔，日思瓜分」的悲慘的半殖民地狀態。台灣在殖民地條件下的反帝反殖民族運動，與全中國的半殖民地條件下的反帝民族運動，雖然在歷史條件上有不同之處，一個是殖民地，一個是半殖民地，當然在形態上也不同，但性質上都是屬於中國民族範圍的民族解放運動，而且運動的理念目標也都同屬中國民族主義的範疇。台灣的抗日反殖民族運動，從早期的反割台鬥爭、反日佔武裝抵抗，及至有近代性格的抗日政治運動、社會運動和戰爭末期的「光

復運動」，它的目標，或隱或現地，都是朝向復歸中國的方向，而不是獨立建國，可說是全中國的反帝民族統一運動的一個特殊形態。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台灣以「光復」的形式復歸中國，而不是像朝鮮以一個民族單位獨立建國，就是一個明證。它是台灣社會歷史在民族問題上的必然歸趨。

戰後初，兩岸曾有一個短暫的統一的民族國家。但由於民族內部左右鬥爭的國共內戰擴大，再加上美國新帝國主義的介入，在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即將完成全民族的統一前夕，美國新帝國主義出兵台灣海峽，把國共內戰以海峽為界長期固定化起來；自此，台灣成為美國在東亞冷戰中，圍堵大陸社會主義中國的反共前哨基地。美國一方面全方位強力支持國民黨的反共獨裁政權，透過反共獨裁政權的手，對全民戒嚴，並發動白色恐怖全面肅清台灣的反蔣反美進步力量；另一方面，用美援著手改造台灣的社會經濟以及社會意識，創造了一個依附美日的資本主義發展條件，使台灣成為資本的樂園，美日的國際加工基地。這就是美國在台灣的新殖民主義支配的真相。美國新殖民主義的支配，捏造、維持並強化了台灣與大陸同民族間的分離與對峙的構造，成為五〇年代以後台灣社會性質的主要規定性。這是諸如國民黨反共獨裁政治與依附型資本主義經濟的雙重構造，以及在意識型態領域如何六九所指的官方「漢」民族主義（實際上是國民黨黨意的中國民族主義）和民間的唯一「美」是從的價值觀的並存現象，以及其他社會諸問題等結構性問題的總根源。至於階級問題、

民族問題更不用說了。沒有看到這一點，就無法掌握戰後台灣社會歷史的本質，容易落入空論，甚至滑向帝國主義者的觀點。

對這樣的台灣社會歷史規定性的認識，在七〇年代的思潮以及鄉土文學論戰中，曾被觸及也有類似的討論。可惜，進入八〇年代以後，卻被洶湧而來的「台灣本土論」、「台灣意識論」所淹沒。在新的歷史時期，分離主義的台灣意識論取代了國民黨的反共意識論，成了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最愛，以及在台灣的意識型態代理商。

新的歷史階級始於一九七九年。在政治上，中美建交、台美斷交、大陸提出「和平統一」以及美國《台灣關係法》出台的變動，搖撼了國民黨反共獨裁政權存立的基礎；在經濟上，以一九八五年七國高峰會為象徵的、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壟斷資本所發動的「新自由主義」世界戰略，啟動了台灣資本主義的所謂自由化、國際化。經過一連串股、匯、房地市的金錢遊戲，台灣的本土資產階級快速資本積累，掙脫了國府的胎衣，登上了台灣的政經舞台；在意識型態領域，分離主義的台灣本土論、台灣意識論乃至何六九讚美的台灣民族論也紛紛躍上舞台。在這背景下，原本在七〇年代隨著台灣本土資產階級成長起來的，親美、反國民黨獨裁的民主化運動，在國民黨瘋狂的壓制下，也走上了嗜用省籍矛盾以台灣人對抗外省人的訴求來擴大政治力量；在蔣經國解除戒嚴和李登輝體制鞏固後，終至於完全質變為反中國的政治力量。把自己的階級和集團的利益冒充為全台灣人民的利益，甚至有人炮製了一個「台灣民族論」，把

台灣人民戰後以來在美國支持的國府獨裁政權與資本的雙重壓迫下的歷史怨憤轉化為對中國人的仇恨，對異民族的仇恨；把台灣人民獨立自主的願望導向獨立建國，並誇稱它為「台灣民族主義」，以對抗中國民族主義。它是八〇年代以來美國的《台灣關係法》體制的產物，也是美國新的牽制中國戰略下的產物。它一貫主張的「台灣地位未定論」、「公投論」、「自決論」、「金馬撤軍論」……等，是執行美國對台政策的代理人；它美化日帝殖民歷史、贊同日美安保條約、希望日本把台灣列入日美安保範圍、爭取FND……等等，都暴露了它並不是如何六九所誇讚的那樣「有新興事物的特質」、「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民族認同」。而是取代了並進一步承續了國民黨的反共主義，把美國新帝國主義的意識內化為台灣人意識，繼續執行美國圍堵、牽制中國的任務；維持兩岸民族分離和對峙的構造，並保護了美國在台灣的利益，保持了美國在台灣人民心目中的慈愛又進步的假面。

六、帝國主義與台灣的階級意識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它是以反共戒嚴意識鎮壓了台灣工人的階級意識；今日，在台灣本土資產階級的統治下，就是以這個台灣「民族意識」（或稱為「主義」也好）麻痺了台灣工人的階級意識，阻礙了台灣工人階級對遺留的反共意識的清理，延滯了台灣工人早日對新帝國主義、新殖民主義的認識。沒有認清這個問題，沒有超克新帝

國主義、新殖民主義、反共主義，乃至這些主義在當今台灣的總代理——台灣民族主義，則台灣的工人階級意識是不可能茁壯的。

當今的中國民族主義，仍然也必然是一個以反新帝國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民族主義。在台灣的現實中，民族主義（或運動）應以反帝與否作為判定真假的依據，沒有反帝內容的民族觀點（運動或主義也好），就會滑向帝國主義那一邊成為買辦而不自知。中國民族主義及其統一運動必然是以反帝為前提，只有這樣的中國民族統一運動，才會消除新帝國主義意識及其在台灣的代理意識對台灣工人階級意識的長期統治，台灣的工人階級意識才會茁壯起來。而揭穿帝國主義假面的工作，更是一個長期艱巨的工作。

《左翼》第十六號，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八日

左的「幻視」

——就教於《連結》諸君

一、右細胞異常增生的左

台灣，從一九五〇年起成了國共內戰的「反共基地」以及美國在東亞的「冷戰前線」以來，整個社會就像中了風一樣，半邊癱瘓了！當然不是右邊而是左邊癱瘓了；不但癱瘓了，甚至整個左半邊都幾乎被內戰與冷戰雙結合的暴力所截除了，只剩下右半邊起著功能。這剩下的右半邊，又在美國的新殖民主義政策的影響下，進行右邊單細胞的繁殖而不斷肥大，遂轉化成世界史上罕有的，從頭到腳都由右邊的單細胞組成的有機體，一個反共的資本主義經濟體。這個有機體上，雖然在七〇年代由於反國民黨或受著世界反西方潮流的影響，自發地長出了一點素樸的左的細胞，但這些細胞進入了八〇年代以後又被從右的軀幹上長出來的新的右的細胞所抑制了。

因此，這個全身都是由右邊單細胞（不管是舊的或新的）增生的台灣社會中，很難長出左邊細胞來，即使長出來了，也常先天不足後天失調。現在，自認為左翼的朋友人數，不瞞你說，可能不超過「同志社」的人數；取得的市民權可能還遠不如「同志們」呢！況且彼此之間在思想上仍有許多歧異！

這就是台灣社會中的左翼歷史和現實。是從極端嚴酷的歷史中走來，和在困難的現實中生存的群體，這是我們首先要認識到的前提——這些雖與本文主題無關，但提醒左翼的朋友們不要忘了這前提：我們是幼嫩而弱小，連市民權都沒有的。

一一、重視台灣社會性質論辯

在這樣困難的環境中，有一群朋友在倉促中成軍順利推出《左翼》雜誌，造行動本身就值得喝彩；它提供了一個互相學習、爭論的園地，而這正是現階段左翼陣營成長的必經之路。從兩期的《左翼》諸文看來，我認為觸及台灣左翼陣營的根本問題而且有必要繼續論辯下去的文章，就是黎建江的《左翼社會運動的展望》（以下簡稱「黎文」）和針對「黎文」提出批評的《連結》雜誌社的《幾點意見》（以下簡稱「連結文」）這兩篇。因為它們都已意識到認識「台灣社會性質」和「政權性質」問題的重要性，而且也或多或少就此提出了各自的觀點，因此我對它特別感興趣。

是的！科學地認識社會性質是改造社會的前提，一個自詡推動社會進步的人，沒有社會性質的認識是走不出去的。特別是一個第三世界的左翼知識人。任何一個左翼團體，沒有經過社會歷史的學習、社會調查、社會分析以及做為總括的「社會性質」的論辯、定性，運動是很難展開的。經過它，才能使所謂左的觀點，不再是空洞教條，開始有血有肉，有具體的內容，有動人的說服力，才會產生社會動力，才談得上

改造社會。因此，對於「黎文」和「連結文」很快就意識到這個問題並提出討論，基本上是讚賞的。不過，對於他們的看法則有一些意見，想提出來討論，也順便激發大家對這問題的重視，熱烈來討論。不管說的對不對，熱烈討論總是對的。只有熱烈的討論才有進步，才會產生「連結」！

三、「連結文」對「黎文」的質疑

《連結》諸君對「黎文」做了很快的回應值得肯定，但是對「黎文」的質疑，本人認為犯了一點毛病，所以借貴刊一角提出我的看法。

「連結文」對「黎文」的質疑，大概有兩部分；其一是質疑「黎文」把兩蔣政權性質定為「威權式半封建半殖民政權」，而忽略了台灣社會半世紀來的發展和特殊性；其二是質疑「黎文」的「台灣目前形勢的宏觀考察」，太著重在對李政權的台獨作為的批判，指責「黎文」說：「統獨這條分界線深刻地影響了作者的判斷宏觀分析」，意為黎文作者把李政權的台獨性格擺在第一位而資產階級性格卻擺在第二位，太注重統獨問題而忽略了左右問題。

本人也深感「黎文」有一些易招誤解之處，譬如定了兩蔣政權和李政權的性質（這是真正的問題處，需要深入討論）卻未加闡釋說明；在目前形勢的宏觀分析中也只突顯李政權台獨作為的方面，卻忽略了它快速推動資本壟斷、惡化國民生存環境、

無視勞工死活等大資產階級作為的方面等等。但是，本文認為這只是屬於一般倉促為文常患的疏漏毛病的範圍，並無大礙。「連結文」基本上也都指出了這些疏漏之處，但是它卻不僅止於此，還進一步質疑、推演、論斷到超出「黎文」原意的地步，這就不得不提出來討論了！還好，連結諸君文章的態度基本上是誠懇的，所以對諸君只是「請教」而非打「筆仗」了！

四、「社會性質」並不等於「政權性質」

連結諸君看到「黎文」把李政權之前的兩蔣政權定位為「威權式半封建半殖民政權」，馬上就照字面推演，認定「黎文」所說的「半封建半殖民」的意義，完全和三○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爭的內容相同，或和毛所「領導的」（最好不要用「為首的」好不好呢？）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一樣，並據以推斷「黎文」作者認為兩蔣統治期的台灣社會仍處於與四分之三世紀前的舊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社會」完全相同性質，進而評斷「黎文」作者忽略了台灣社會半世紀來的資本主義發展，忽略了台灣的特殊性。這種推演、論斷是不是太過頭了呢？太簡單化了呢？

首先，我們要理解到，所謂的「政權性質」雖然與「社會性質」有重疊的地方，但政權性質並不一定等於社會性質，兩者有一致的地方（時候）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時候）。也就是，「黎文」所說的「半封建半殖民政權」並不一定就是指「半封建

半殖民社會」，它只是指兩蔣「政權的性質」並不是講台灣「社會的性質」，也並沒有說兩蔣統治時期的台灣社會是與舊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社會」相同。我們只能就「黎文」所指的兩蔣政權性質是不是「半封建半殖民政權」這問題來討論，絕不能擴大解釋到台灣社會是不是「半封建半殖民社會」的問題，而且也不能照字面把「半封建半殖民」就等同於舊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或許，「黎文」所說的「半封建半殖民政權」是指：失去了大陸的社會下層建築的國民黨政權，到台灣後仍舊維持其在大陸時期的上層建築——「半封建半殖民」的體制性格，有這樣的意思吧。如果是這樣，他所提出的看法也並非全無道理，有必要繼續討論，不要把話說死。（在此必須先說明，本文作者並不同意「黎文」的這種看法，最好「黎文」作者能再一次說清楚他的原意，似促進大家熱烈討論。）

五、左的「幻視」

如果說「黎文」中的「台灣目前形勢的宏觀考察」一節，其內容太偏重於對李政權的民粹式台獨作為的批判，而太忽略了對李政權表現在維護資產階級的作為（如大力培植壟斷資本、壓制勞工……等）的批判。對於這樣的指摘，本文作者也是同意的。但是，如果據此擴張解釋，說「黎文」認為：「李登輝的最重大罪過，是搞民粹主義式的台獨；因為李登輝要搞台獨，所以才會加強資產階級與民粹主義的力量……」

才會與美國日本帝國主義勾結……才會嚴重地阻礙了左翼社會運動的發展。」（參看「連結文」），那就誤解過頭了，十分不恰當。也就是說，「連結文」過分推斷了「黎文」作者的原意；認為「黎文」作者只在乎李政權的台獨性格；推論「黎文」的原意是認為李政權為了走台獨路線才會走資產階級的路，其台獨性格是本質，資產階級性格只是次要的衍生的；最糟的是，竟然斷定「黎文」把左翼運動發展的主要障礙歸究於李政權的台獨作為而非其資產階級性格的作為，這種說法已從根本上懷疑了「黎文」左的知識水平。上述「連結文」的所有推論，隱約有一中心觀點在起作用，那就是一開始就質疑「黎文」的「統獨」味太濃（其實常常在意的是「統」而非「獨」）左的太稀，是不是這樣呢？（有些左的朋友患了「統的過敏症候群」，只要一聞到有人罵台獨就過敏起來，就劃清界線，但是對台獨的作為卻有相當免疫性，視而不見若無其事。）

奇怪的是，連結諸君對「黎文」的一句「威權式半封建半殖民政權」的話，獨有所鍾，作了一大串的演譯；但是對於「黎文」中稱李政權為「民粹式資本主義半殖民政權」的部分卻推諉「黎文」「完全沒有解釋」，視而不見。矇頭就認定說：「統獨這條分界線如何深刻地影響了黎文作者的判斷。」實際上，「黎文」既然已把李政權的性質定為「資本主義半殖民政權」，並且也接著說了「政權的資產階級性格更加凸顯」這句話，「黎文」作者不是已很清楚地表明了李政權是資產階級政權的看法了

嗎？既然如此，怎麼會看不到李政權的主要性質是資產階級性質呢？怎麼可能會認為李是唯心的想搞台獨才扶植資本家勾結美日帝國主義走資產階級路線呢？怎麼可能簡單地認為左翼運動發展的主要障礙是李政權的台獨作為，而不是其資產階級作為呢？（這些在在都表現了連結諸君對「統獨」的過敏體質。）我們只可以就事論事說：「黎文」的「宏觀考察」認為，李政權的台獨作為所挑動的兩岸戰爭危機是「台灣目前形勢」的最大危機最大的社會矛盾，這樣而已（戰爭不是人民的最大危機是什麼？難道統獨戰爭與左翼無關嗎？），不能過度解釋說黎文看不到現實的經濟矛盾階級壓迫的問題，否則他不會提出李政權是「資本主義半殖民政權」的說法吧！

還有，「連結文」對於「黎文」批評李政權特意邀請日本的大右翼政客石原來台「刺激中共、製造兩岸緊張」的觀點，也頗不以為然；認為「黎文」批評的重點只放在「刺激中共兩岸緊張」，而不放在批判石原的「右翼」政客立場；換句話說，「連結」認為對於石原訪台之事可以不要以統的觀點、中國民族主義的觀點來批判他的製造兩岸緊張反華言行，而應該只用左的觀點批判他的「右翼」行徑；言下之意：是左派觀點應該只管左派的事，不要管統的事，也不要管中國人的事。這又把前述的「統的過敏症」發揮到極至了。李政權邀石原訪台，其目的是在利用石原的「右翼」來對付「左翼」嗎？不是的，是利用石原的反華反中國的日本法西斯形象來對付「中國」的，這也是眾所皆知的。如果石原訪台的政治意義在他的「右翼」，那麼當天到飯店

去抗議示威、丟雞蛋的應是「純左派」的朋友而不是統派的朋友了，但事實上當天「純左派」的朋友一個也不見，全都是統派的呢！可見得石原訪台是統獨鬥爭，怎可以只用「幻視」的左眼來看問題呢？

就像石原等日本的「極右翼」政客，他們的資產階級右翼性格與反華蔑視中國的法西斯性格是一體兩面，互為表裡的，李政權的資產階級性格與台獨性格也是一體兩面，互為表裡，不可分割的；不但要看到他的經濟性質也要看到他的政治傾向。台灣的純粹左翼卻自我切割，只看到他的「右」卻不情願看到他的「獨」。在台灣，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往往集中表現為反共或台獨。不能只批判他的右而看不到他反共反華的一面，或只批判他的資產階級作為卻不願面對他的反共反民族、台獨的那一面。因此，不要把左右統獨切割來看，而是要統一的辯證地來看；不能迴避統獨問題，不要認為統獨只是簡單的民族感情問題，或認為它只是現象不是本質。對台灣的左翼來說，統獨問題也往往是階級問題的一部分，往往是階級問題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現。

《左翼》第三號，二〇〇〇年一月二十四日

內戰冷戰意識型態的新魔咒

——評龍應台的一九四九

六十年來，台灣社會的快速變化，不管是經濟生活的進展或是政治轉型，從未脫離內戰冷戰的大框架。在思想領域，不管是自由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也都是在這個大脈絡下的膾遞；這些思想，由於從未有過對台灣內戰冷戰結構的徹底反省和批判，都很難超越反共自由主義和反中國意識的基調。它特別具體表現在如法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阿杜塞所指出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中，它包括黨派、媒體、文化、校園等。

台灣內戰冷戰體制的歷史起源，在一九四九年。對一九四九年歷史的反省和批判，也是在知識上思想上或者感情認同上超克內戰冷戰意識型態的起點。然而，至今連一本最起碼的有關一九四九的基本歷史知識性著作都未出現，可見內戰冷戰意識型態仍然在台灣的精神思想領域佔有統治性地位。

果然，在這一九四九歷史批判的不毛之地，長出了以「內戰冷戰現代化論」為基本價值觀點，對一九四九年進行歷史敘事的異化之果——龍應台的《一九四九大江大海》。

此書一出大為熱銷，連中國大陸也出現了一些粉絲。

這種現象印證了，內戰冷戰意識型態不但是台灣現實生活的結構，普遍地無所不在；而且在台灣的政治經濟的再生產結構中，作為維護統治集團利益的思想不斷地再生產。雖然它是脫離真實社會歷史的虛假意識，顛倒意識，但作為維持現實的社會關係，是一個客觀的存在。

龍書表現出來的，虛假的一九四九，正是這種現象的最好的例證。

一、現代話語的「反共劇」

在《中國時報》專訪中，記者問及如何克服口述歷史常有的「選擇性記憶」問題時，龍低調回答稱：這本書「是非常個人的寫作」、「不是學術著作」、「並非全貌呈現當時情況」。這回答與她大部分時間的高調、虛誇口氣大為不同。然而，這本書真的只是「非常個人的寫作」嗎？恐怕也並非如此。

龍書以高度企劃後選擇的許多個人內戰經歷為素材，再以意識流時空倒錯穿插的印象式寫作方式，帶著濃厚價值判斷的敘事，加上把事物簡單化漫畫化的煽情話語，併貼出蔣軍潰敗，軍民逃難流離的悲情場面。雖然像一幅模糊的老照片，背後卻貫穿著一句簡單又強烈的潛台詞——中共解放戰爭的殘暴。

它把國府軍民個人在內戰中遭逢的悲劇性命運，用相當任意性的文藝創作筆法，

選擇性的敘事，併湊成一幅戰場受難圖。這裡面不但沒有一絲一毫的歷史反省，還抽離了中國現代史的脈絡；除了戰場看不見一點當時的政治和社會經濟文化的社會矛盾，看不見內戰爆發的原因；也看不到到底是什麼政權是那些人，是怎麼樣使這些軍民在大江大海中流離受難的？完全沒有交代。龍筆下的戰場，除了這些受難的國府軍民和「殘暴的解放軍」之外，沒有一九四九的歷史；一九四九年的絕大多數中國同胞的命運好像從來就不存在。其實，這些同胞從來就不是她關心的對象，在她的意識型態世界裡從來就不存在，若有，也是異類的「匪」的存在。

就像她自己承認的，這本書不是歷史著作，也不算是一「報導文學」。全書表現的一九四九形像，說明了該書充其量只是一部為了控訴中共解放戰爭殘暴的「反共文學」現代版。它不禁使人想起了五〇年代流行的，在夜間的大操場上舞台燈照耀中上演的「反共劇」，令人不寒而慄；也像極了眷村叔伯向圍攏的孩子講述的萬惡共匪的故事。只不過，它使用了美式現代化意識型態的話語，再加上誇張的文藝筆調，符合了今日台灣主流意識的胃口；符合今日去歷史化的歷史論述潮流，更符合藍綠的政治正確；更諷刺的，它還投合了中國大陸「唯美」自由派對中國現代史的翻案風。

二、沒歷史沒社會的「文明價值」

在同專訪中，龍高調地說：以身為失敗者第二代為榮。

如果，失敗者徹底反省了內戰失敗的歷史，能夠超越國共恩怨，結束內戰的分裂，追求民族的和平團結；那麼，這樣的失敗者是民族的榮耀，第二代人當然引以為榮。

然而，這個失敗者，不但沒有反省歷史，還依賴美軍、美援，充當美國東亞冷戰的前線衛兵，在台灣搞人類有史以來最長的反共軍事戒嚴，對島內罩下白色恐怖的大網，在海峽築造民族分裂對峙的壁壘。一個有良識良知的人會對這樣的「失敗者」引以為「榮」嗎？其實，龍的價值思維根本不是在這個層次，因此她引以為榮的「說詞」也並不在這個層次。

她的「說詞」是：「他們到了島上，因為軍事徹底失敗，使得後來六十年，台灣發展另一套價值，這不是國家主義、軍國主義，是一套溫柔人文價值。如果不是因為軍事失敗，也許我們島上還發展不出以個人幸福為核心的文明價值。……他們可以說是『台灣現代化的開創者』」。

在她這個說詞背後的思維，我們看不到六十年來台灣在反共高壓、資本宰制、失去民族主體的黯淡歷史。

這六十年來，台灣不是依賴著第七艦隊、美援、美國市場、商品和意識型態的發展嗎？難道黃春明筆下的陽明山上和中山北路的高級美軍是假的嗎？《莎啞娜拉·再見》中的日本人是假的嗎？八〇年代以前依賴美國的「美華協防條約」，還有，直到

今天還自願受美國國內法——《台灣關係法》保護的現實，都不存在嗎？在校園、媒體和文化界，鋪天蓋地的美式現代化意識型態和「普世價值」基本教義，再加上民粹的「台灣意識」，這些就是龍的「溫柔人文價值」嗎？

沒有白色恐怖，沒有農村破產，沒有加工出口的勞工血汗，沒有染黑的二仁溪淡水河，沒有股市房市的掠奪；沒有城鄉差距，沒有高達六十倍的貧富差距，沒有這些那些台灣人民的血汗；還有，沒有今日辛苦的台商和將近半數的台灣產品向大陸的輸出，沒有這樣那樣的大陸人民的血汗，會有龍今天「個人幸福的文明價值」嗎？

這種價值，充其量只是失去歷史脫離社會的少數菁英的價值。

明明有半甲子以上的反共軍事戒嚴體制，卻說沒有國家主義、軍事主義。還有，作為反共戒嚴體制重要一環的內戰冷戰意識型態，今天，仍然以現代化和普世價值文明為話語，依舊維持著反共反中國意識的霸權支配；它以台灣人還是中國人區分善惡，以統獨藍綠分裂社會，藉此築高兩岸壁壘，掩蔽社會內部階級矛盾。對於台灣這樣的意識價值現狀，恐怕只有不知歷史為何物，脫離社會現實的少數菁英，才會認為「是一套溫柔人文價值」。

至於，「失敗者」（逃台軍民）是不是「台灣現代化的開創者」？這種說法穿鑿附會，根本不值得理會。

龍的文明價值，沒有歷史也沒有社會，好像無臭也無味，實際上，潛散著一股濃

厚的意識型態腥味。

龍的潛台詞就是說：幸好徹底軍事失敗，使得台灣發展出一套文明價值，而這套文明價值遠比大陸的有更高度的文明。換句話法是：幸好兩岸徹底分裂，台灣才得以發展出一套比大陸更文明的價值。這是她的中心思考。在今天台灣的民族國家認同光譜上，這種價值接近「獨台」。

這一套文明價值，說穿了就是美式的文明價值，不外乎自由、民主和個人主義，其背後的信條是反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現代化理論」。美國在冷戰期間，為了對抗共產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在亞非拉的快速擴張，向第三世界發動了美式「現代化理論」的意識型態戰線。這種冷戰意識型態，是直線式的社會發展觀，宣稱「落後」國家只有通過加速傳統社會向進步的現代化轉變這一條路，才是文明的發展；而美國則是高居於這普遍的歷史進程的最頂端，是最高度的現代化國家。

龍的文明價值就是這套現代化意識型態的亞流。二〇〇六年紅衫軍起來的時候，她害怕紅衫軍的變革行動會偏離「文明價值」，膽怯地說：「激情的『人民革命，革掉的會是民主』。」

五年前，趙剛在《和解的壁壘》中批評「龍女士」說：

龍女士是一個現代化派，現代化意識型態是她隱而不宜的『大敘事』，拿來污名化作為一個理念的中國。……因而從一種文明的高度來俯瞰中國以及台灣……道德

心裡位置是西化高等華人。

過去，國民黨曾以「自由中國」自居，污名化中國大陸為「極權中國」；以「自由地區」自稱，污衊中國大陸是「匪區」；自稱為「漢」，而大陸是「賊」，宣稱「漢賊不兩立」。後來，國民黨政權轉型後，先是宣稱要「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最近，變成了「民主人權統一中國」。那麼，今天龍就是站在這個延長線上，以西化高等華人的姿態，用「現代文明價值」去鄙稱中國大陸「反現代文明」。

三、建構「解放軍殘暴」印象的敘事策略

龍書對於東北長春圍城的敘事，就是其敘事策略的一個典型例子。

首先，它突兀地把二戰希特勒德軍對蘇聯列寧格勒三年圍城的血腥場面擺在最前面，娓娓訴說圍城的「慘絕人倫」。這是它精心安排的寫作策略，並不是真要譴責德軍圍城的「反人類罪行」，而是要以此先給讀者一個閱讀的聯想、暗示，形成解放軍的長春圍城和德軍圍城一樣殘暴的印象。

東北過去曾是日俄帝國為爭奪利權互相征戰之地，但大多是在日本的殖民地統治之下。在龍的筆下，日本對「滿州」掠奪式的殖民統治消失了，只見到「新京」（長春）「成為日本精心經營的花園城市」，它歌頌道：

都市規劃以歐洲大都市為範本……公園處處蔥綠……百貨公司……美麗的馬車踩

街發出蹣跚的聲音……很早就有抽水馬桶……。

另一方面，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大舉向滿州日本關東軍進攻，擊潰日本殖民者的蘇聯紅軍，卻被龍書印象敘事成「燒殺擄掠」的野獸。文中，刻意只引用親獨學者許雪姬採訪的一個日據期曾在偽滿工作的台灣人許長卿的口述歷史片段——一幅蘇聯紅軍在瀋陽車站公然姦殺母女的場面，這就成了蘇聯紅軍在東北的全部歷史形象。接著，她又不忘加一筆，突兀地加入前蘇聯反共投美作家索忍尼幸的一段詩句，突出蘇聯紅軍對德國平民的強姦暴行，再度強化紅軍獸行的印象。

在這幾頁中，其歌頌日本殖民的現代化，以及仇視蘇聯紅軍的兩極態度躍然紙上。

為了渲染解放戰爭的殘暴，它大大利用了長春圍城戰中餓死人的問題，把一兩位老人的回憶以文藝加工，大肆誇大餓殍的人數和淒慘畫面，以顯示解放軍的慘酷無人性。

不知從哪裡來的數字，它竟然說圍城前長春有八十萬到一二〇萬人，圍城後只剩十七萬人。然後推論說：「餓死的人數從十萬到六十五萬，取其中就是三十萬人，剛好是南京大屠殺被引用的數字。」後來，文中的餓死人數又任意誇大到六十萬。

它的企圖，就是取三十萬之數把長春圍城戰等同於日本人的南京大屠殺。

它還憤憤不平地說，長春圍城「這麼大規模的戰爭暴力」，竟然不像南京大屠殺

一樣有無數的學術報告，有紀念館、獻花致敬、紀念鐘聲。也不像列寧格勒，被寫成小說被拍成電影。

換句話說：它希望把長春圍城炒作成國際規格的解放軍暴行博物館。這就是為什麼它一開題就要先描寫列寧格勒圍城慘狀的原因。

它把這三場戰爭扯在一起，就是想利用今日讀者對戰爭歷史的無知，造成讀者對解放戰爭的痛恨心。其實，每一場戰爭都有它不同的性質，也都有不同的原因和目的，最終也都有正義和不正義的歷史定評。列寧格勒圍城是法西斯戰爭對反法西斯戰爭，其是非善惡至今沒有人敢推翻；南京大屠殺是日本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本來歷史是非對錯十分清楚，但是由於戰後的冷戰內戰體制使日本開始翻案。像龍就是把南京大屠殺輕輕放下，說南京大屠殺三十萬人是一「被引用的數字」，意思就是說三十萬人還未定論。長春圍城是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是中國內戰；是革命戰爭是內戰就沒有不流血的，沒有不死人的。就像林肯發動的南北戰爭，就是為了社會解放的超大型內戰，戰死者六十萬人以上，不是流血成河嗎？有人把它與南京大屠殺相提並論嗎？龍應台會嗎？敢嗎？有「失敗者」的南軍會向這段歷史翻案嗎？

其實，龍在這裡想強調的就是：你看！解放軍就和希特勒德軍、日本侵略軍、蘇聯紅軍一樣，殘暴而無人性。這就是龍的內戰冷戰意識型態的魔咒。

這不就是吃了國民黨制式反共愛國教育的「狼奶」，喝了美國好萊塢電影的「可

口可樂」長大的一代，腦子裡殘存的僵化、幼稚迂腐的偏見嗎？

四、長春圍城真相

當時的長春國府守軍，長春最高司令鄭洞國（東北剿匪總部中將副司令，兼第一兵團的司令官，吉林省政府主席），以及長春市市長尚傳道等都留下了長春圍城親歷記。從這些長春守城最高指揮官的回憶錄來看，我們可以瞭解到下面的事實。

長春真正遭到解放軍圍困糧食無法進城的期間，大約是從一九四八年五月機場被解放軍佔領後，一直到十月放下武器的五個月間。當時蔣介石給鄭洞國的命令是「固守待援，相機出擊」，鄭則計畫憑藉長春堅固的地下堡壘工事進行頑抗。但是能不能守，能守多久，關鍵在糧食。因此守軍早已先搶購了糧食，並進行了市民戶口清查餘糧登記。按當時統計，依市內人口和存糧數最多只能吃到七月底。後來守軍又動用戰時糧管法，強制市民把糧食賣給政府做軍糧，最後甚至發行大額鈔票（面額最高達一億五千萬）向民間搜刮糧食。當時的長春市長回憶道：

國民黨在長春的軍政人員、特務、警察近十萬人，除了直接向人民洗劫外，就是這樣用一堆廢紙搜掠了卡哨內外約六十萬人民的糧食和財物。

由於國民黨「殺民」政策餓病而死的長春市民共達十二萬人，人民政府進城以後，在卡哨內外地區掩埋屍體約八萬具。

從四月到十月半年間，長春特務就通過「特密處」這個機構，逮捕屠殺了革命地下工作人員、進步人士、青年學生、無辜人民共約二百餘人。處死的手段，有一小部份是用日本刀砍死勒死的，大部分是活埋的。

最高司令官鄭洞國也坦承：缺糧餓死民眾的原因還有，守軍參與糧食投機倒把、民眾囤積居奇、國民黨空軍胡亂空投食物許多落到解放軍陣地。

況且，長春圍城中餓死的人，全都是長春居民，而十萬的守城軍政人員並未到餓死的狀態。一位守軍在六月發出的家書，信中還嫌部隊伙食豬肉「只是皮和骨頭」「難以下嚥」，還說，高粱米一斤七萬元、豬肉九萬元、金子一錢三百三十萬元。可見得，守軍搜刮民間糧食，囤積以自保，是圍城會餓死人的重要原因。

另外，三月間，國民黨軍在東北只剩下三個孤立的大據點——長春、瀋陽和錦州；而「東北剿總」總司令衛立煌和蔣介石又都力主堅守這三大據點頑抗到底。這錯誤的固守戰略導致了長春圍城餓死人的悲劇。守軍司令鄭洞國在其回憶文中曾說：

我曾主張放棄長春，我認為長春距離主力太遠，被吃掉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與其將來被殲滅，不如主動提早放棄。將國民黨軍主力集中於瀋陽錦州之間……而蔣介石卻認為放棄長春對國際影響太大，固守長春可以吸引一部分敵人兵力，減輕敵人對瀋陽、錦州的壓力。

長春守軍有第六十軍和新編第七軍兩個軍。第六十軍於十月十七日宣佈「起義」，十月十九日第七軍也選擇了「放下武器」的道路。原來堅持「寧可戰死，不願投降」的司令官鄭洞國，也於翌日投降，結束了圍城悲劇。

對於長春守軍最後選擇了「反蔣起義」和「放下武器」這兩種方式結束長春圍城悲劇的史實，龍書又發揮了高明的文學修辭矇蔽史實。

龍書說第六十軍是「繳械」，第七軍是成為「俘虜」。

但是，國民黨守軍明明是「反蔣起義」，龍書卻說是「繳械」；明明是「放下武器」，它卻以「成為俘虜」稱之。該書欲以文字矇蔽解放軍圍城戰略的正當性，也欲藉此淡化國軍投共的事實。

其實，第六十軍軍長曾澤生，早在九月間就與其屬下的兩個師長密談「反蔣起義」之事；因為「九月，長春城內一片混亂，軍隊賴著微少的空降糧食活命，士兵面黃肌瘦，士氣低落，老百姓連樹皮草根都吃完了」。曾澤生在十七日「起義」的前一晚，還寫了一封勸鄭洞國一起「起義」的信，信大意是：

長春被圍……士兵飢寒交迫，人民死亡載道，內戰之慘酷，史無前例……此皆蔣介石政府禍國殃民的罪惡……反對內戰，打倒蔣氏政權，以圖挽救國家於危亡，向人民贖罪，拔自身於泥沼……望即反躬自省，斷然起義，同襄義舉……。

第七軍是選擇了「放下武器」，並不是龍所說的「成為俘虜」，是國共雙方談好了條件後才「放下武器」的。這個雙方談好的放下武器的條件是：放下武器後，保障生命財產安全，對志願參加解放軍的人按原級錄用，不願參加者遣送返鄉，不加侮辱。

長春圍城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高用兵境界；如果不圍而戰，那麼國共雙方的死傷人數絕對不少於十萬人，長春居民在戰火中的死傷更是難以計數。圍城造成人民餓殍載道，固然是悲劇；若不圍而戰，那才是更大的悲劇。

五、爭取政治解決，避免戰爭

龍應台字典中的「戰爭」是永遠與「和平」對立的，她根本不知道戰與和的辯證關係，不知道「和」「戰」是互倚互生的道理。她受的蔣式反共愛國教育也永遠把中共的「和平」看成「謀我其亟」；也看不到解放戰爭中中共如何以最高的智勇爭取「和平解放」，永遠把政治解決放在第一位，避免戰爭流血的道理。長春圍城就是一例。

再如，在華中的戰場上，長沙的「和平解放」也是一例。一九四八年八月四日，在解放軍對長沙的錐形包圍和平攻勢中，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和「華中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湖南省主席、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就率部易幟，使湖南省會長

沙「和平解放」。陳、程兩人發布「告湖南民眾書。」，宣佈：「根據中共提示的國內和平條款，在長沙成立和平協議……使湖南獲得和平的解放，藉以減輕人民痛苦，避免地方糜爛。」

對於長沙的「和平解放」，龍書又發揮了文學語言的曖昧，避重就輕地寫道：「長沙的國軍將領程潛和陳明仁決定不再和解放軍繼續戰鬥」。

一九四九年的國共內戰中，發生了各種各樣的「和平解放」事例；國共雙方許多將領都盡全力用政治解決避免戰爭，求不戰而屈人之兵，大大避免了戰爭流血的悲劇。在平津戰役，最後北平以「和平解放」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當時解放軍一面重兵包圍北平四周，一面尋求與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談判，一月二十一日傅接受了和平改編結束了戰爭，避免了文化古都陷於毀滅性的戰火。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間，國共在長江隔江對峙，同時，代總統李宗仁也與北平進行了和平談判，可惜蔣介石、李宗仁各懷鬼胎，再加上蔣頑固始終反對和談，使談判破裂；解放軍一夜渡江，戍守南京的湯恩伯部隊倉促撤走，南京也兵不血刃地在和平中易幟。

六、「偉大領袖」在台灣開的槍

掌握著國民黨黨軍政最高實權，在內戰中揮舞著無上權杖指揮每一場戰爭廝殺的蔣介石，是真正決定著龍書中的人物顛沛流離命運的人；是真正要替歷史負責，要對

每一個生靈悲劇道歉的人。然而，在龍的大江大海中他卻隱身不見，即使偶而出現，也是以一個「偉大領袖」的形象出場。

譬如，在寫到孟良崗戰役的慘烈，張靈甫為國捐軀的英勇時，最高統帥蔣介石就突然出現了；但是以一個「不是不知道士兵的艱苦」、「習慣性地對自己鞭策」，高尚偉人的形象出現的。

對於山東流亡學生案，龍書發揮了特有的文藝筆調，描寫了流亡學生生離死別的戰火流離圖，然而，對於一路帶領學生逃亡來到澎湖，卻遭到國府軍特誣陷以匪諜槍決的校長張敏之等人的案件，則以「防諜第一」替蔣軍脫罪。為了替這個慘無人道案件罪首的蔣軍說話，它不惜合理化「防諜第一」，捏造說：徐州戰場五十五萬國軍被殲滅，「關鍵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的間諜」滲透作戰決策。因此，她說「蔣介石痛定思痛之後，決定最後一個堡壘台灣的治安治理，防諜是第一優先。」

接著，龍特別用似是而非的文學語言為蔣的白色恐怖辯解說：

「很多殘酷，來自不安。」

這句話，等於替所有的殘暴者脫下了罪惡的枷鎖。

也替蔣政權在台灣反共高壓統治塗上了胭脂。

其實，山東流亡學生案是蔣政權在台灣拉開白色恐怖統治的序幕，在馬場町開的第一槍；自此，白色恐怖的槍聲開始日夜響徹台北上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蔣政權先槍決了光明報案的四名外省青年，第二天刑殺了山東流亡學生的校長師生共七人；次月，同在馬場町上，槍斃了「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案的原國民黨軍官、台籍青年林正亨。

事實上，戰後不久，台灣就已籠罩在蔣的內戰體制中。一九四七年開始實施「戡亂總動員體制」後，在台灣報頭報尾就已開始出現許多戡亂建國的標語，如：

「剿滅匪首朱德毛澤東，肅清禍國殃民的共匪」

一九四九年四月爆發的台大師大學生整肅案——「四六事件」，五月二十日的軍事戒嚴、出入境管理……等等，在台灣高壓統治三分之一世紀以上的反共戒嚴體制，早在一九四九年就已鋪天蓋地籠罩整個台灣。

這是龍的意識型態看不到的，或者是不願意看的。

這是為什麼龍的一九四九，突兀地拼接上許多一九四五年前後的台灣，卻不見一九四七到一九四九的內戰台灣的原因。

七、是國府「反動特質」的崩潰

龍的一九四九當然不會知道，也不願意知道。

蔣國府的失敗不只是軍事的失敗，而是經濟、政治、文化和世界觀整個體制的失敗；戰場上的失敗只是體制失敗的結果。

蔣國府政權在大陸的失敗和崩潰並不始於一九四九年，也並非始於抗戰勝利後，而是從戰前就已開始。一九四九只是大崩潰的末日。抗日戰爭中，美國駐華大使館有一位年輕的外交官約翰·S·謝思偉，他曾說一口流利漢語，是地道的中國通，曾深入中國鄉村做廣泛的社會考察。他曾於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給美國國務院發了一份報告——《中國的局勢和關於美國政策的建議》，簡潔描述了蔣國府的敗象。他這樣寫道：

中國面臨經濟崩潰，軍隊和政府機關人心渙散，士氣民心低沉……政府和軍事機構從上層到基層到處都是空前規模和明目張膽的貪污腐敗、網紀廢弛。受通貨膨脹之害最重的知識份子和薪水階層處於生死存亡的危險中。農民對濫肆徵兵，徵稅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強制性攤派不滿……。國民黨軍隊內部的不滿正在增長。國共之間的嫌隙不僅沒有表明有所縮小，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嚴重，現在，人們已經普遍同意，內戰不可避免。國民黨謀取自我利益的政策和拒絕聽取進步的批評意見，已使他失去了人民的敬重和支持。黨內的不滿和宗派活動……知識份子抨擊委員長的獨裁統治，越來越公言不諱。

抗戰勝利後，中國曾有短暫的和平。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國共雙方簽訂了「停戰協定」；同日，由國民黨、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民盟、青年黨等）三方共同舉行了「政治協商會議」；會議於一月三十一日結束，通過了五項政治協議（政府改組、軍隊國家化、施政綱領、國民大會、憲法草案），該協議反映了抗戰勝利後全國人民以「民主、和平、團結、統一」為基礎，建設獨立自主富強新中國的強烈願望。不料，這個代表中國人民民主願望的「政治協商決議」，竟被國民黨的頑固派撕毀。依恃軍事上絕對的優勢和美援的支持，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蔣下令國府軍向中共的中原「解放區」進行大規模的進攻，在各地發動總剿匪。自此，國共內戰全面爆發。

在這同時，國民黨政府又不斷強力鎮壓「反內戰、要和平」的學生運動，且暗殺、逮捕民主人士，取締民主刊物、宣佈「民主同盟」為非法團體。國府自絕於中間派的民主運動，連溫和的民主團體也成了敵人。

當國民黨政府得意於「剿匪」勝利之時，社會經濟卻急速瀕臨崩潰。入不敷出的軍事財政，只有靠大量發行紙幣和加緊抽稅來因應；這引發了惡性通貨膨脹，物價糧價飛漲，造成人民生活困頓，社會動盪不安。因此，從一九四六年底開始便不斷爆發工人運動和群眾運動，甚至搶米風潮。國民黨統治區陷入了空前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

這複合危機的壓迫，喚醒了千千萬萬的青年學生和民眾，奮起投入反蔣愛國民主

運動。相對於內戰戰場上的第一戰線，國民黨統治區卻形成了從社會經濟反蔣的第二條戰線。

當時有名的民主人士施復亮，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六日（也正是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時）發表了《中間派的政治路線》一文，文中指陳了國民黨政權的六大反動特點，他指出：

國民黨統治集團因目前所執行的政治路線，顯然是堅持一黨獨裁的反政協的反民主的政治路線。這一政治路線至少有下列幾個特點：

第一，在階級關係上說，只代表官僚買辦資本家和封建地主（特別是大官僚資本家大地主）的利益。

第二，越頑固越反動的集團和份子，在黨內越佔有勢力，越能控制黨政軍大權。

第三，以武力維持政權，並企圖以武力消滅「異己」（主要是中共）。

第四，在國際和國內的民主高潮下，企圖拉攏既無群眾基礎又無政治操守的小黨派和「社會達賢」，偽裝民主……。

第五，堅持一黨法統及其所制定的「憲法」……依舊保持一黨專政的實質。

第六，在對外關係上，完全依賴美國帝國主義的支持，一切「唯美是從」、「唯美是賴」，甚至不惜把中國逐漸變成美國的保護國或殖民地。

這樣的政治路線，無疑地是違反整個國家利益和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政治路線，

也是違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革命傳統的反動的政治路線。

施復亮在國民黨政權最強大最驕橫的時刻，準確地指陳了其反動的特質。這種反動特質注定了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快速崩潰。這就是為什麼不到二年之內，號稱有五百萬的大軍，擁有美式精良裝備的「國軍」，會被小米加步槍的解放軍摧枯拉朽地殲滅，只剩下幾十萬嫡系部隊狼狽逃台。

其實，逃台後的蔣政權，雖然失去了它在大陸的真實的社會階級基礎（在大陸實際統治的土地、人民、財富的社會階級關係），但仍殘留其統治階級意識，和殘存的黨政軍特政治統治機關。施復亮指陳的六大點反動特質，也原封不動地搬到台灣，君臨台灣社會之上，繼續用軍事戒嚴和白色恐怖維持在台灣統治，長達二十七年。

施復亮在戰後初期對國民黨政權批判的話語，與台灣七〇年代的民主運動反國民黨的語言是多麼地相似！只可惜，八〇年代中末期，台灣的民主運動被「本土運動」（台獨運動）所取代後，就逐漸失去了這樣的批判視野；同時，也使這種反動特質失去了被徹底批評和自我反省的機會，反而披著美式現代化意識型態和「台灣意識」的外衣，繼續進行階級統治，反現代中國，繼續築高兩岸的壁壘。龍書就是其中的最好實例。

八、國府的「戰爭和失敗」

就讓我們看看蔣政權背後的老闆——美國，如何看當時的蔣政權吧！

當時，從骨子裡反共，對「民主同盟」也不表同情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一九四八年向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對國府敗相的描寫充滿了如「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失敗主義」等字眼；認為國府「隨著軍事和財政的急速惡化……政府人員更加灰心喪志、毫無鬥志，並最後變得一蹶不振、或無所顧忌地營私自肥。」報告指出：國府高官對政、經、軍形勢日趨惡化的悲觀與絕望的情緒，與日俱增，甚至：「政府不久便會失去維持其統治所必須的最低限度的民眾……」。

相反，反共的司徒雷登對中國共產黨的描述中則充滿了正面形象。

「他們正穩步地改良組織和訓練，官兵同甘共苦，為理想而獻身戰鬥，拋棄一切自私的野心和個人享受，很少或沒有跡象表明莫斯科供給他們物資援助。」

一九四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被美國總統任命來華調查的魏德邁來到中國。一個月中遍訪了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各地，進行視察並接觸各階層人士。他於離華前二天，在國府的「國務會議上」進行了演講，痛斥了國府：貪污腐化無能、充滿失敗主義、失去信心、精神資源破產；且秘密警察橫行，濫捕濫殺，失去了人心而助長了共產黨的勢力。他還強調：必須承認徒有軍事力量不能消滅共產主義，必須立即施行徹底的深遠的政治和經濟的改革。

龍筆下出場的一個個在戰火中受害和冤屈的幽魂，應該可以從這報告中看到，真正肇造個人悲劇的力量，不是別的，而是在戰火背後的、自己追隨不渝的國府政權。這個病入膏肓、充斥腐化和失敗主義、已失去人民支持的政權，註定最後被人民解放戰爭摧毀。在兵敗如山倒的政權崩潰劇中，作為政權一部分的個人不管以怎樣的方式都難逃悲劇的命運。

把個人的悲劇只歸咎於戰爭的殘暴，而不去追究造成殘暴戰爭的政治、社會經濟原因，以及因獨裁腐敗帶來戰爭的政權的罪惡，那麼，也只能永遠活在戰爭的敵我仇恨的幻想中。

九、已無須別人來擊敗他們

龍書也提到了濟南戰役。就像書中描寫的任何戰場一樣，把無法求證永無對證的個人回憶，截取有利的一段，再用文藝手法加工，編織成一幅解放軍慘無人道的畫面。至於戰役的真相如何，則不是它所關心的。

濟南戰役最關鍵的部分，應該是守軍第九十六軍軍長吳化文率兩萬人「起義」的事件，這使濟南戰役很快結束；但是龍書對此一字不提。後來吳化文部隊加入了解放軍，而在解放軍渡江（長江）作戰時，是吳化文部隊第一個開進了南京城，和平接收了南京。

道：
當時美國駐青島領事，曾對於解放軍一星期就把濟南拿下甚為震驚，事後評論

該城迅速失陷之主要原因，乃為心理的而非軍事的……國軍及大部分山東人民對於政府之繼續內戰，使生靈塗炭，經濟枯竭，均大不以為然。於是叛變降敵者有之，不戰而退者有之。

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在向國會的報告中，提及：

國府在軍事上真正垮台，是從一九四八年上半年開始，第一批大規模的叛變和崩潰發生在九月濟南失陷之時，當時政府軍隊不做任何努力，帶著一切物資裝備投降。

美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形容濟南戰役後的蔣國府的一切變化，就如一幕「希臘悲劇」：

一九四八年最後三個月的經歷，有如一幕希臘悲劇。在軍事失敗、貨幣貶值、民情激憤的悲慘情況下，蔣總統獨能屹立不移。

一九四九年的悲劇劇本早在一九四八年以前就寫好了，只是因為「蔣總統獨能屹

立不移」的堅持進行內戰，才使得崩潰劇上演得更快，也使劇中人落入更徹底的悲慘命運，結果使悲劇更為悲劇。

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寫給總統杜魯門的信中說道：

國軍在具有決定性的一九四八年內，沒有一次戰役的失敗是由於缺乏武器或彈藥。事實上，我們的觀察家於戰爭初期在重慶所察出的腐敗現象，已經使國民黨的抵抗力量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的領袖們對於他們所遭遇的危機已經證明是無力應付的。它的部隊已經喪失了鬥志，它的政府已經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共產黨則通過一種嚴酷的紀律和瘋狂的熱忱，企圖使人民相信他們實為人民的保護者和解放者。國民黨部隊已無須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已自行瓦解。歷史一再證明，一個對自己失去了信心的政權和一個沒有士氣的軍隊，是經不起戰鬥的考驗的。

十、自囚於內戰的咒語中

龍應台自以為榮的「失敗者」，並不是敗在戰場，而是失敗在「政府已經失去人民的支持，部隊已經喪失了鬥志」，「無須別人來擊敗他們，他們自己瓦解」的事實。

這個歷史的事實，不是龍書以渲染戰場橫屍遍野、誇大解放軍的殘暴、強調個人戰火流離的悲劇，來抹黑中共的解放戰爭，來逃避歷史的責任，所能掩蔽的。

龍高調質疑中國大陸「還停留軍事的單一角度看歷史」，然而，龍的這個高調也正是對龍書自己的最佳批判。

不去正視失敗原因，不對歷史反省，而只圖以誇大戰爭的受害來掩蔽曾是加害者也是自害者的身分，再以虛誇的口氣說以「失敗者」為榮，這只會把自己和讀者囚禁在內戰的咒語中，無以救贖。

二〇一一年九月一日脫稿

本文刊載於《台灣立報》，二〇一一年十月七日、二十一日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台灣意識型態」批判 / 曾健民著.
-- 初版. -- 台北市：海峽學術，2011.09
面；公分

ISBN 978-986-6480-70-6 (平裝)
1. 社會意識 2. 政治經濟分析 3. 文集 4. 台灣

541.1407100016085

「台灣意識型態」批判

曾健民 著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發行人/黃溪南

(116)台北市景興路193號4樓之7

電話(02)8663-2559 傳真(02)8663-2466

劃撥帳號 19389534 (戶名：海峽學術出版社)

電子信箱 s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銷 問津堂書局

(100)台北市師大路165號

電話(02)2367-7878 傳真(02)2367-7432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四維巷2弄2號4樓

電話(02)2219-2080 傳真(02)2219-2180

印刷排版 輪速印刷有限公司

(235)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568巷28號1樓

電話(02)2226-4796 傳真(02)2226-5250

2012年4月初版 定價350元

ISBN 978-986-6480-70-6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